JOHN LAWRENCE REYNOLDS

[加] 约翰·劳伦斯·雷诺兹

阴影中的人

历史上著名秘密团体揭秘

INSIDE HISTORY'S
MOST NOTORIOUS
SECRET
SOCIETIES



华文出版社

三合会、黑手党、卡巴拉教、共济会、骷髅会、光明会、郇山隐修会、圣殿骑士团、光明会、共济会、德鲁伊教、诺斯替教、玫瑰十字会……

真的有秘密团体在控制着各国领导人的选举？

黑社会是怎么影响社会的？

拨开臆测、偏执和恐惧的迷雾，彻底了解几个世纪以来令人们恐惧的个人和团体。站在幕后，审视各种秘密团体的内部运作机制，让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慢慢浮出水面。

“《达芬奇密码》可能使秘密团体在小说作品中风靡一时，但是约翰·劳伦斯·雷诺兹却在现实世界中进行了揭示。这本书为我们翻开了新的一页，其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比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更胜一筹。一直以来，事实真相都比小说更令人感到新奇，也更有说服力，雷诺兹用最引人入胜的方式揭示了所有的秘密。”

——罗伯特·J. 索耶（作家，雨果奖得主）

建议上架 ◎ 人文历史

ISBN 978-7-5075-2386-7

9 787507 523867 >

定价：26.00 元

I711.4/11

2008

阴影中的人

——历史上著名的秘密团体

（加拿大）约翰·劳伦斯·雷诺兹 著

隋荷 译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阴影中的人/（加）雷诺兹著；隋荷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7
ISBN 978-7-5075-2386-7

Ⅰ.阴… Ⅱ.①雷…②隋… Ⅲ.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Ⅳ.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96224号

阴影中的人

著　　者：（加）雷诺兹

译　　者：隋荷

责任编辑：李庆　刘峰

特约编辑：张晓星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om.cn

电　　话：总编室 010-58336255　发行部 010-58336270

责任编辑 010-58336259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省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开　　本：670×970　1/16

印　　张：18

字　　数：200千

版　　次：2008年7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0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2386-7

定　　价：2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残忍拥有一颗人类的心，
嫉妒生就一张人类的脸；
恐怖具备神圣的人形，
隐秘穿着人类的裙摆。

——威廉·布莱克

你知道的事情或者假装知道的事情越多，
你就越强大有力。
至于事情是否属实却无关紧要。
记住，真正重要的是拥有一个秘密。

——安伯托·艾柯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阿萨辛派 /9

第二章　圣殿骑士团、光明会和共济会 /31

第三章　郁山隐修会 /61

第四章　德鲁伊教徒和诺斯替教徒 /83

第五章　卡巴拉教 /99

第六章　玫瑰十字会成员 /117

第七章　三合会 /133

第八章　黑手党和科萨·诺斯特拉 /147

第九章　日本黑帮 /171

第十章　巫术崇拜 /181

第十一章　骷髅会 /199

第十二章　大众文化中的秘密团体 /221

第十三章　批评家、危言耸听者和谋叛理论家 /237

编后记　关于魔鬼与荒谬 /257

注释 /261

致谢 /278

引 言

概述、基础和补充注

2　阴影中的人

他们是早期最令人恐惧的秘密团体中的一支，罗马帝国的臣民对这个秘密团体可以说是既害怕又憎恨。许多人建议把该团体中的每个成员，无论男女老少，统统杀掉；还有一些人告诫大家要提高警惕，因为他们听说过发生在与该团体对立之人身上凶残的复仇故事；也有一些人整天忧心忡忡，担心他们自己的邻居可能就是这个团体的成员，这些人可能会用那些危言耸听的话熏染他们的孩子，并怂恿孩子们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更有少数人着迷于这个秘密组织所特有的令人无法容忍的古怪行为，他们受到好奇心的驱使，竭尽所能地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并会提出一些怀疑：这些人当真能这么卑劣吗?

罗马人当中盛传的故事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据说这个秘密团体中的成员都嗜食人肉，他们在秘密的仪式上茹毛饮血，而且在这个仪式上不乏刚出生的婴儿。他们推崇兄弟姐妹之间放纵的性行为，并举行一些稀奇古怪的仪式，他们在秘密场所偷偷会面，避免与正常社会的交流，用挥舞刑具的方式作为接头暗号，辨认对方的身份。

“他们用食物盖着婴儿的身体，这样也许能蒙骗那些粗心大意的人”，一个罗马人这样写道，“这个婴儿就在他们眼前，等待自己死亡的来临，一个年轻的学生被怂恿着走上前去，好像对婴儿身体表面的饭都不会带来什么伤害，但就是他给婴儿身上留下了模糊而隐秘的伤口。他们饥渴地舔食着婴儿的血液，急切地分割着婴儿的四肢，真是可怕至极！他们当着婴儿的尸体宣誓，立下盟约对此保持永久的缄默。诸如此类的神圣仪式比任何亵渎神灵的行为都更加令人作呕……”

公元一世纪地中海地区的人，尤其是罗马人，会把高尚这种品质看得比其他任何品质都重要，但他们的故事同样令人厌恶，使人着魔。罗

马的政客们开始要求无条件地解除这个教派。大多数市民拍手称快，人们聚集在一起，相互交流着各自的故事，证实了掌握证据的真实性，并添油加醋地讲述了这个秘密团体所行之事令人不快的方方面面。过了一段时间，人们达成一致意见：必须采取行动打破这些宗教狂对人们的束缚和统治。

从两千年之后的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些令人生厌的基督徒们的所作所为听上去就像某种宣传布道——这个秘密团体由罗马元老院的成员们创建，目的是消除其他派系。我们可以这样假定，或许通过在大庭广众中广泛传播这些邪恶的故事，他们可以劝服市民不去加入基督教的种种组织，同时罗马对新宗教追随者的残忍迫害也可以赢得人们的支持。

实际上，罗马元老院跟这些令人发指的故事没有什么关系，普通民众对于嗜食人肉和乱伦的故事也许会心生反感，但是公众的观点对政客们没有太大的影响，他们所关心的是政治问题，包括抵制基督教徒去朝拜帝王（一般说来，罗马能够宽容宗教上的差异，但却把对帝王的不忠诚看做是一种令人无法接受的行为）。当基督教开始转变其他人的信仰从而信奉他们的观点时，他们的行为却代表了对基督教的背叛，这是不能忽视的。因而，罗马领袖们鼓励讲述他们丑恶活动的故事，把它们用作武器来镇压叛乱行为。

但是关于基督徒们古怪行为的故事并非来自罗马元老院和其他领袖们的杜撰，这些故事来自普通市民的丰富想象力，以基督徒自己提供的信息为基础，这些信息不乏夸大和诽谤的成分，直接来源于无知和疑心的双重打磨。我们且看一看构成故事的一些细枝末节：

隐秘。如果没有一个知名成员的首肯，对于他们的仪式，基督徒们之间只是心领神会，绝不会向陌生人透露；他们要求新成员必须经受一个信仰测试，然后才能被接受。对于这些行为，他们能够给出充足的理由。瞻仰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他们会宣布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这无异于签署了一份死亡证明。当基督徒开始隐瞒他们的活动时，人们对于他们的目标和做法的怀疑就会越来越深，越来越广，这样一来，就会引发

其成员们更加迫切的需求，进一步隐藏他们的真实身份。于是就引发了一轮轮的压制，导致他们对秘密更加讳莫如深，从而引发更大的怀疑，进而又遭致了新一轮的压制。

吃婴儿。贫穷的罗马市民缺乏有效的避孕和流产措施，他们就把那些不想要的孩子扔到外面，任其死于饥饿和寒冷。现代人可能会心生厌恶，但是多一张嘴就意味着给这个家庭增加了一份更大的负担，在这样一种文化中，这种做法是可以接受的。当基督徒们开始解救这些孩子于生死之中，并为他们洗礼，使其笃信基督教时，罗马人变得困惑不解。为什么有些人甘愿选择养育别人的孩子？这个观点是对逻辑的公然反抗。或者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得到抚养。也许，鉴于他们茹毛饮血的做法，基督徒们把被抛弃的孩子搜集起来，作为他们令人厌恶的仪式的原材料。这些孩子作为基督徒得到照顾和养育的事实不被认为是一种合理的解释，当然了，这个事实也不会那么引起人们的兴趣。

寻欢作乐和乱伦。当基督徒们参与“友好聚餐”的说法在罗马人中间盛传开的时候，人们不难想到，“友好”一词的本质含义在这里不完全是神圣的。另一个秘密团体诺斯替教的教徒们，参与一些性行为的仪式，并认为精液是一种神圣的液体，以此来使每个成员神圣化。

乱伦的因素？这来源于基督徒们为了在表达上体现友好和支持，互称对方为“兄弟”和“姐妹”的做法。在其他的文化看来，兄弟姐妹都来自于同一对父母亲，这是毋容争辩的事实，没有什么其他隐含的意思。

把刑具作为符号和特征。在罗马时期，十字架被广泛地应用在折磨和死亡上，对罗马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放置一个十字架或者用手在胸前划十字更让人安心的了，这种手势语可以理解成是对别人的威胁。试想现代社会的秘密团体组织用绞索、断头台或者电椅作为团结和价值的象征，那么你的反应也就可想而知了。

基督教作为一个重要的团体而存在的事实，一直都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当今社会，人们对此还依然充满恐惧和反感。尽管在技术和信息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我们对秘密团体依然非常着迷，而且还将持续下去。大众文化在电影和小说中对于这些秘密团体的扭曲描述，依然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团体不仅存在，而且对人们形成威胁，这一事实赶上或超过了罗马人对于基督教的微辞。

正如基督教本身所证实的那样，旁观者对秘密团体做出的最普遍的反应首先是怀疑和恐惧，这些反应根植于这样的信仰：任何有好处的东西都不应该作为秘密来保守，任何保守的秘密都不可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好处。

我们渴望了解这些秘密，以及使这些秘密得以维持和永恒的秘密团体，但是我们在与其他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热切地渴望真诚。重要的商业和军事决定不公布于众，这个我们接受；密室中的政客们选出了候选人，制定好了政策，但还是试图不让人知道，这个我们也理解。同样我们保守着来自朋友、孩子和爱人的秘密，然而，我们也试图完全了解影响我们生活的所有神秘之事，渴望掌握那些不被我们所知的信息，不论这样做是出于怎样的动机。如果有人对我们保守秘密，我们就会要求分享之；那么如果一个特定的组织独享这些秘密的话，他们的动机就一定有些值得怀疑的地方了。

秘密团体会随着时间缓慢地发生变化，但这变化却是至关重要的。在古代，秘密团体在本质上是出于哲学和宗教的考虑。但到了中世纪，政治开始取代了哲学上的份额，尽管此时宗教依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元素。十八世纪中期，秘密团体呈现出两种发展方向：或者让人联想到政治和友爱，保留着来自古代哲学和宗教上的余脉；或者朝着彻头彻尾的犯罪性方向发展，利用秘密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并获取大量的钱财。

不同的目的影响着秘密团体建立和运作的方式，因为他们的私密性是必需的，不论是作为给其成员营造一种独特性的手段，还是为了保守秘密不被发现，从而免除所谓的纷扰。以友爱为目的的秘密团体的成员中，秘密的独享会增强其成员的卓越地位，因为这些团体将作为一个整体受到执

法者和社会的惩治，因而隐秘就成了自我保护的工具。无论采取怎样的方式，其效果都是引发成员之间的不信任。不信任会导致主观臆断，这些主观臆断无一例外都是负面的，这些负面的观点会引发敌对情绪，敌对情绪则进一步强化了该组织的隐秘性，这个循环会无限地进行下去，没有止境，根本谈不上什么变化。

这种由怀疑和反馈构成的循环会导致其成员对于主观臆断的热衷，从而抵制任何试图添加些许事实的努力，当今，这个过程就像古罗马暴君尼禄接受音乐课程学习一样，力量强大，具有可预知性。正如谋叛理论的拥护者对你训诫的那样，秘密团体掌控着世界的命运，无论是宣布战争，扼杀全球性的瘟疫，还是国家领导人的选举，甚至外星生命在地球上的出现，都受到秘密团体的控制，他们的势力和目的就像好莱坞虚构的反派角色詹姆斯·邦德一样，猖獗一时，充满邪恶。宗教狂热者提出并展示出证据，就像具有高度权威的原告律师向一个可以信赖的陪审团提出充分理由一样，然而，强烈的反对意见使得这些证据被完全曲解，而且魔鬼的势力太强大了，他甚至可以说服你，他根本就不存在。

对于那些怀疑其生活受到无形力量操纵的人来说，这是纯粹的娱乐。他们会像秧苗渴求阳光一样寻找证据，甚至当光源比太阳光芒还要来得微弱的时候也是如此。对那些热衷于阴谋的人而言，所有的决定，关乎你的经济利益，你在社会上的地位，你的健康状况，并且左右你生活的制度，这些决定权都掌握在一些谜一般的人手中，他们通常无一例外都是男性，他们或者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或者藏身于为公众服务的仁慈的面纱背后。你所想所做的一切都不单独由你一个人来决定，你得接受训诫。世界的命运是由共济会或诺斯替教成员，巫术宗教或德鲁伊教成员，彼尔德伯格组织或光明会成员，黑手党或骷髅会的会员们决定的。经济灾难？资源枯竭？战争和饥荒？只有傻瓜才会认为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对于谋叛理论家来说，这一切都是一些人自主行动产生的后果，他们是长袍加身的高手、西西里岛的军阀首脑、老谋深算的蔷薇十字会会员、卡巴拉教的追随者或者其他具有威胁性的教派会员。

一些最激进的人甚至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组织都卷入其中，他们就像市

场中的商人一样交换着各自的责任。大多数人都满怀希望，他们指出，许多秘密团体都是仁慈的，或者甚至能使人受益；一些团体也许具有欺骗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危险的，或许这只是友好的表达；我们也得承认，一些秘密团体在动机上具有彻头彻尾的欺诈性，但他们所代表的风险却微乎其微。比方说，我们应不应该担忧三 K 党——一群曾经令人战战兢兢的施私刑者，会蜕变成有种族歧视观点的傻瓜组合成的组织？这不太可能。

然而，如果你认为每个秘密组织都不过是一群成年人玩的幼稚儿童游戏，那么这样就太无知，也太愚蠢了。如果自由的代价真的值得警醒，那么我们当中深谋远虑的人就应该意识到，这些秘密团体可能在完全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而不是顺着我们的意愿。挑战的关键在于弄清楚谁是谁，或者什么是什么。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本书将审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最著名的秘密团体。从各个方面来讲，它们的影响，或者至少任何臭名昭著的行为及其余孽在当今都还存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大多数秘密团体都是友好而仁慈的，只是有几个不得不让人心生疑虑，更有一些秘密团体应该扯掉颜色暗淡的秘密之袍，在他们因为这不熟悉的曝光而蠢蠢欲动的时候，让明亮之光把他们周身上下照射个遍吧。

[redacted]

10　阴影中的人

公元一一九一年，蒙费拉的康拉德就任耶路撒冷之王，这个职位是由十字军的卓越英雄狮王理查指派的。他先是指示康拉德重建基督教势力，为其重掌朝政做准备，然后便启程回家，旨在取得不朽的声名，像罗宾逊故事和英雄史诗中描绘的金发之神一样。

康拉德曾经与香宾的伯爵亨利竞争过这个王位，于是为了使其作为耶路撒冷之王的统治更加辉煌，他便谋划把穆斯林永远地赶出这块圣地，从而在历史上赢得基督英雄的神圣地位，在上帝右手附近的位置上获得一个席位。

他的时间有限，不容浪费。理查王离开神圣之地不久，三个基督教僧侣突然进入康拉德的营地，他们碰到谁，就会对谁鞠躬并在胸前划着十字。他们虔诚的行为使康拉德和他的卫兵放松了警惕，这真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当三个僧侣走到康拉德跟前的时候，他们突然从道袍下抽出短剑，一下子刺向康拉德，卫兵们还没反应过来，他们已经像屠宰牲畜一样，将乱剑刺向康拉德的身体了。康拉德被暗杀了，这三个年轻的刺客根本不是什么基督教僧侣，而是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他们并没有企图逃跑，而是向康拉德的卫兵投降，在残忍的行刑中他们一声不吭，即使像活剥皮和慢煎致死这样的酷刑他们也默默忍受着。而这两种酷刑恰恰是那个无情世界里最残暴的惩罚。

后来，在悼念耶路撒冷之王仙逝的时候，康拉德的追随者们在私底下议论纷纷，谋杀者的行为太过古怪，尤其是事后他们所采取的不抵抗行为。喧嚣声渐渐平息之时，他们却扔下武器，站在一旁等着人来抓，这真是太奇怪了。即使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痛苦不堪的日子，这些年轻人的表情却分明在说他们对随之而至的令人发指的死刑满不在乎——好像还很期待。以前，从来没有人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是的，没人看到过，也没有人解释得清楚，更没有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法国香宾的伯爵亨利并没有花太多时间仔细思量这些年轻谋杀者的怪异行为。康拉德的过早离去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是场悲剧，但对亨利而言绝对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要是生在八个世纪以后，他极有可能成为公司里杰出的首席执行官。在最后一铲圣地之土投掷到康拉德的棺材上后不久，亨利就采取了一个战略性行为，他娶了康拉德的妻子，希望能够继承他梦寐以求并要了她丈夫性命的王位。不知道是因为他在康拉德的同僚中缺乏支持，还是出于倒霉的运气，亨利没有赢得耶路撒冷之王的称号，最后不得不委曲求全，勉强接受了一个管理职位。这份工作要求他多次往返于耶路撒冷和波斯之间。在一次旅行中，他偶然了解到康拉德之死的来龙去脉，因此揭开了历史上一个最令人惊讶的秘密团体的真实面目。

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亨利与其随行人员正走在崎岖的阿尔博茨山上一条人迹罕至的小路上，这座山脉就位于现在的伊朗首府德黑兰的北部，在十字军远征时期，这块土地被伊斯兰教什叶派占领，而基督徒们则可以相对安全地通过此地。亨利和他的护卫走近位于高耸绝壁边缘的一个大型堡垒时，突然与居住在这个堡垒上的戴·艾尔·克比尔不期而遇。仆人们先是向他们表达了万般的崇敬，随后又奉上了主人诚挚的邀请，请他们参观堡垒，当接受戴·艾尔·克比尔的盛情款待的时候，这些基督徒们终于感到如释重负。这样的邀请必须如约而至，否则就会被视为对主人的冒犯。再说了，这个规模宏大的堡垒也着实引起了亨利的兴致。探寻堡垒的神秘结构，再加上一顿美餐，实在是一个让人难以抵挡的诱惑。

亨利和随从跟着仆人们来到了位于顶点的堡垒入口，人们吹着号角，主人在那里热情洋溢地接待了他们。戴·艾尔·克比尔显然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却对向客人展示城堡饶有兴致，他亲自陪同他们穿过偌大的花园，并用手指着高高耸立在岩石山谷之上的石塔，特意引起客人的注意。他在一个地方停下，指着最高的石塔问亨利，这个塔的高度和气势是否令人叹为观止？

亨利着实认为面前的景色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个石塔耸立在一个陡峭的悬崖边上，足有 100 肘尺[①]的塔尖上，两个哨兵穿着洁白的长

---

① 古代的一种长度测量单位，等于从中指指尖到肘的前臂长度，约等于 17 至 22 英寸，即 43 至 56 厘米。

袍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戴·艾尔·克比尔的一举一动。亨利此前也注意到在其他的石塔上，也有类似穿着的年轻人，每个人都朝着塔下的主人和来宾微笑，并点头致意，看上去幸福而满足。“这些人，”戴·艾尔·克比尔说，“对我的服从，远远超过了基督徒们对他们主人的服从。”

客人们被主人的这番话弄得迷惑不解，他们从来没有谈论过任何关于教派或服从之类的事情。

看到亨利困惑的神情，戴·艾尔·克比尔笑了笑，说：“你看。”他挥舞着手臂，显然这是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动作，他的手臂还没落下，最高的那座塔的塔尖上的年轻人立刻纵身跳入下面的山谷里，任由他们的躯体粉身碎骨。

亨利被吓得目瞪口呆，那两个年轻人刚才还是那么满足，那么威武英俊，而现在就是因为主人的一时兴起，他们便毫不犹豫地甘愿赴死。

“如果你希望，”戴·艾尔·克比尔说，“我会命令其他人做同样的事情，塔顶上所有的人看到我的手势后都会纵身赴死的。”

亨利婉言回绝了，看到眼前这一幕平白无故的死亡场景，不免让他有些心惊肉跳。

“基督教王子能否得到来自他臣民的相同服从？”戴·艾尔·克比尔问道。

亨利回答说，在他所认识的基督教领袖中，没有人能够对其手下人行使这样的权力，像其他领袖的护卫一样，他自己的护卫也会冲锋陷阵，为荣誉、信仰和忠诚而浴血奋战，为更伟大的目标而献出生命。如果必要的话，他们也会选择死亡，他们会为胜利和荣誉奋勇拼搏直至英勇就义。但是没人会像这两个年轻人那样心满意足地死去，而这一切就是因为他们的主人挥了一下手。

“凭借着这些值得信任的仆人，”戴·艾尔·克比尔以一种不容置疑的优越感居高临下地说，“我驱逐了与我们团体对抗的人。”

香宾的伯爵亨利碰到的这个秘密组织就是谋杀了他的前任，并对从波斯到巴勒斯坦地区进行一百多年恐怖统治的人，他遭遇到的这些人不是别人，正是伊斯兰教阿萨辛派，也叫做暗杀派。

这个伊斯兰教阿萨辛派既不是最早的秘密团体也不是盛行最广泛和持久的。他们的势力实际上才持续了一百多年，随着蒙古部落的入侵而逐步走向消亡，到了十四世纪，他们已经成了中东政坛上一股可有可无的力量了。然而，他们向来以残忍著称，以至于许多欧洲国家坚信，一直到十七世纪的政治谋杀，这些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还有些证据表明，这些谋杀者后裔的势力在印度一直活跃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直到如今，他们的势力影响仍然可以从两个方面略见一斑。

一方面，正如他们的名字所表明的那样。在英语中，assasin 的意思是一个显赫的大人物的谋杀者，而且通常采取非常暴力的方式。另一方面，为我们探寻这些谋杀者的渊源提供了适时的动机，因为他们在一千年之前首创的暴力方式和行为激励，恰恰是当今普遍存在的最骇人听闻和最广泛流行的恐怖主义组织的行为蓝本。戴·艾尔·克比尔和那些微笑着赴死的白袍年轻人的神圣后裔建立了一个很小的秘密团体，他们对整个地球实行了恐怖统治。其成员马不停蹄地穿梭于阿富汗的山脉和旱谷之间，在卡拉奇到科隆的小密室里幽会，对世界上唯一存在的超级大国构成威慑之力。这就是阿盖达基地组织。

伊斯兰阿萨辛派的前身是七世纪伊斯兰教的分裂教派，分裂后产生了两支相互对立的派系，即什叶派和逊尼派。其他任何宗教中，没有一个事件能够引发那样的敌意，甚至基督教改良运动也逊色很多，伴随穆罕默德离世而形成的分裂进一步引发了这种敌对情绪。

穆罕默德生于公元五七〇年，伊斯兰教徒认为，在亚当、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之后，他是上帝的最后一个使者。在大约公元六一〇年，他的智慧在麦加附近的一个洞穴中得到启发，接受到训诫——这就构成了古兰经的基础，代表了伊斯兰教的根本。因为信仰问题，公元六二二年，他被逐出麦加，逃跑到了雅斯里布，也就是现在的麦地那（先知之城）。公元六三〇年，为了伊斯兰教，他又重返故土征服麦加。穆斯林的日历计算就是从先知到达麦地那的那天开始的。公元六三二年穆罕默德去世的时候，

伊斯兰教已经从阿拉伯一直遍及到叙利亚和波斯[1]了。

穆罕默德离世后，他的追随者不得不面对任命继任者的问题。逊尼派的名字来自于阿拉伯语，意思是逊尼之人以及多数人的意见。逊尼派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正统分支，他们认为权威应该传承到先知最亲密和最值得信任的顾问，或者叫哈里发[2]那里。什叶派[3]坚持必须保证血统的承续，因而提议让穆罕默德的表兄，同时也是他的女婿，作为先知的继任者。

我们不可能夸大伊斯兰教的分裂所造成的影响，因为毫无疑问这样做超出了合法继承的程序。对于众多的社会和文化习俗，两派都有各自的见解，包括神圣仪式的日期和意义，临时婚姻的合法性，运用宗教和解来逃脱迫害和死亡（什叶派乐于接受，逊尼派认为这样是叛教）。

与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战争相比，基督教改革运动只是小巫见大巫，两个派系间的战争通常是以什叶派的失败告终，他们总是寡不敌众，对手拥有超过他们十倍的兵力。哈里发阿里死后不久，他的孙子侯赛因和他家里的每个成员都遭到了反对派倭玛亚的谋杀。这个事件令所有的伊斯兰教徒心惊胆战，但却进一步强化了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裂，同时也在什叶派身上渲染了一层悲剧和受迫害的色彩，这不仅影响到了他们的信仰，同时也引发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悲观情绪。在西方习俗中，什叶派一直把自己看做落水狗，一个受到压制的少数力量，但在必要的时候却甘愿为他们的信念献出自己的生命。正如近来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他们确实如此。

在十字军远征时期，生活在逊尼派中间的单个什叶派成员如果被发现，就会有死亡的危险。为了生存下来，他们不得不采取隐秘的方式，这就使得他们非常擅长保持秘密的身份，同时也要求每个成员都必须绝对服从领袖的指令。随着时间的推移，什叶派自发地组织成小的派系，分散在中东各个角落，宣传他们的信仰，并对皈依者进行保护，而小派系之间的

---

① 现在的伊朗。

② 伊斯兰教执掌政教大权的领袖的称号。

③ “阿里的追随者”。

差异就显得非常地无关紧要，但却使得它们之间的敌对情绪和怀疑愈演愈烈，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伊斯兰教阿萨辛派的扩张。

阿萨辛派有两支非常重要的派生团体，他们是十二伊玛目[①]派和伊斯玛仪派。十二伊玛目派认为在伊斯兰教中只有十二个真正的伊玛目，在过去的一千年中，第十二个伊玛目一直活着，只是隐藏了自己的身份。伊斯玛仪派进一步分裂成众多支派，包括七个伊玛目派，他们认为只有七个真正的伊玛目；尼查尔派坚持认为伊玛目永远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他们把阿嘎可汗作为他们的领袖。十二伊玛目派在数量上比伊斯玛仪派要大得多，占现在伊朗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伊拉克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虽然人数稀少是个现状，伊斯玛仪派在反应上却相当激烈。

派系之间的分歧一直没有停止过，即使对于细微的差别，比如在行动和哲学上，也总是会到一种激烈冲突的程度，这让非伊斯兰教徒既感到陌生，又觉得费解。比如，在为祈祷作准备时，必须进行身体净化仪式。什叶派认为用浸湿的双手擦洗脚就足够了，而逊尼派认为必须进行全身的清洁。祈祷时站立的姿势也有差别，什叶派认为双手必须完全垂下，逊尼派（马历吉斯派除外）坚持说双手必须是交叉的。对常人来说，这不是很小的问题吗？但对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可并非如此。这些问题以及几十个其他的问题直到今天依然引起争议，在一千年前的伊斯兰教世界，这些差别引发了强烈的敌对情绪，通常的解决方式就是激战到死，我们必须理解这个事实，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弄明白伊斯兰教阿萨辛派是如何发展壮大，并保持了他们的残忍秉性。

大约在公元一〇〇〇年，开罗的伊斯玛仪派团体成立了学习之地，开始吸引伺僧到此学习，并许诺教会他们一些秘密方法，使得信徒们能够按照真主阿拉的意愿完成神圣的任务。这就是后人所说的伊斯玛仪运动。学习之地的老师们在埃及统治者的直接命令下做事，即法蒂玛的哈里发，穆罕默德的嫡系后裔。

---

①伊斯兰教的阿訇。

学习之地的大多数老师都选自哈里发自己的宫廷，包括军队总指挥和各个部长。为了确保学习之地的成功运作，哈里发赠予了一套先进的科学仪器，并且每年捐赠十万金币。在该校创办的早期阶段，男学员和女学员都可以参与其活动，尽管采取性别隔离的方式。

学习之地除了提供学生受教育的机会外，还确保其学员提升到学术上的最高层次，同时像他们的老师一样，赢得类似的尊重。如果在一个文化环境里，政府官员和教师都来自于同一个阶级，那些渴望白手起家、飞黄腾达的年轻人就会受到这种教育机会的极大吸引，他们既可以学会反击使他们深感痛苦的逊尼派教徒，还可以憧憬命运的改变，这对于头脑容易发热的年轻人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无论哈里发为学习之地树立了怎样的目标，最终还是化作了泡影。在穆斯林世界中，没有什么因为学习之地的存在而有丝毫的改变。然而，其影响却一直延续到当今时代，几个世纪以来，它所倡导并履行的组织结构已经成为秘密团体广泛使用的模型，所作的改变微乎其微。

一般来讲，政府机构和大型公司的组织形式都是金字塔结构，塔尖上是最有权威的个体，紧挨着下面的是一群具有凝聚力的小型智囊团，你想一想民主政治的内阁和公司董事会的构成就知道了。从塔尖往下，其影响力和权威性呈现出递减的态势，各个层次的行政管理系统朝着塔底的方向延展，位于最底部的是薪水最少、地位最低的员工。这种普遍的权力控制形式直到今天依然为我们所熟知。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一种组织管理模式，就秘密团体而言，它所采用的就远非这种最恰当的方式。

许多秘密团体和邪教都不采用金字塔的形式，他们采用一系列的同心圆的方式，最高权力者居于中心地带。圆形结构其实不像金字塔结构那么通俗易懂，因为其内部机制是隐藏不露的。而且，圆形的多少也是不定的，这就意味着圆心外面的人永远无法弄清楚他们距离真正的权力中心有多近。从金字塔的底部，你可以看到塔尖，但是在圆形结构的任何地方你都永远不能准确地丈量出你与权威者之间到底多近。这样一来，相比金字塔结构，圆形结构就可以更有效地保护中心地带。

几百年来，以宗教为基础的秘密团体都复制了学习之地的圆形结构模式，首先采用这种模式的是一个叫做圣贤协会的学习团体，其目的在于摒弃那些缺乏足够奉献精神的人选。

从圣贤协会成功毕业的学生要进入一个九阶段的入会程序，这个程序就建立在典型的圆形机构基础之上。该过程代表了一种经典的方式，既可以确保对该组织事业目标的绝对效忠，还建立了一个无条件服从的基础。

在入会程序第一个阶段，要在学生的头脑中培养对价值和观念的怀疑，这些价值和观念是他们用一生的时间学到并且尊重的。老师们采用错误的类推法，逐步拆卸学生的整个信仰体系，任何不能否决其信仰和价值的学生都会被开除掉。那些接受了教导的学生，从本质上说就是倒空了他们所有的思想，受到教导者的热烈欢迎。现在，我们把这个方法叫做“洗脑”。由于丧失了适当的价值体系，学生们不得不依赖老师，把他们作为知识的源泉和应用知识的手段。那些最专注的学生会向他们的老师盲目地宣誓效忠，于是他们被提升到第二个阶段。

到达了第二个阶段的学生会被告知，代表智慧和知识的那七个伟大的伊玛目是先知穆罕默德派来的，而这些伊玛目都各自把这个知识传授给了老师。学习之地的老师都是哈里发政府显赫的高级官员，这就意味着学生们可以获取神圣的指导，从先知直接到那些把先知智慧传递给他们的老师那里。了解到这些之后，学生们就会信心百倍地通过这个阶段。

在第三个阶段，学生们会获悉这七个伟大伊玛目的名字，以及命令他们对自己进行援助和保护的秘密话语。

第四个阶段继续着伟大的启示，这个时候，在七个伊玛目之外，老师们还会增加七个神秘立法者的名字。这七个神秘立法人的名字依次是亚当、诺亚、亚伯拉罕、摩西、耶稣、穆罕默德和伊斯玛仪，他们拥有七个神秘人的帮助，他们是塞斯、闪、以实玛利、亚伦、西蒙、阿里和伊斯玛仪的儿子穆罕默德。通过进一步的学习，学生们还可以获悉其他一些人的名字，包括七个先知之下的十二信徒，以及他们各自的职责和神秘力量。最后，学生们得知一个叫作时间之王的神秘代理人的存在，他只借助哈里

发之口传话。

具有资格的学生可以进入第五个阶段，这里，他们可以通过个人专注的力量获得影响他人的能力。资料表明这实际上是一种冥想形式，学生们必须一刻不停地重复一个字：AK-ZABT-I。冥想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放松方法，因为它有效地阻碍了个人的思维过程。然而，如果冥想的时间够长，注意力够集中，就会严重地损害一个人的思维能力，这就是第五个阶段的目标。

第六个阶段包括对分析性和破坏性论据的指导，也就是老师在第一个阶段用于解除学生戒备的方法。通过考试后，学生们就具备了进入第七个阶段的资格。在这个阶段，他们要教导学生所有人类和生物都是统一的，包括积极权力和消极权力。学生们可以为了创造或毁灭而运用他们的权力，但是只有神秘的时间之王才能赋予他们这样的权力。

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接受第八和第九阶段的训诫了，即使在我们看来，这里的训诫同最初推动这个运动的精神价值已完全背道而驰。

第八个阶段要求学生认识到，所有宗教和哲学都具有欺诈性，地球上的首要力量是个体的意愿和奉献，个体只有通过做伊玛目的奴隶，才能真正地达到目标。这样一来，学生就为第九个阶段做好了准备，这里他们得到的教诲是：根本就没有信仰这回事，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行动，对领袖发布的指示做出直接反应所采取的行动，只有领袖本人才拥有执行这些命令的理由。

贯穿不同层次的指导，这九个阶段的教学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一切皆虚幻，万事都许可。

学习之地创造了这样一个组织，越来越多的成员心甘情愿完成他们领袖交待的任务。学习之地的最大成就在于它的一个毕业生于一〇五八年占领了巴格达，他给自己冠以苏丹[①]的称号，并以埃及哈里发的名字铸造钱币。学习之地的任何一个学生都无法与这个功绩相提并论，但是这种荣光却只是昙花一现，就像这个毕业生本人一样。不久他就遭到了土耳其人的杀害，

---

① 某些伊斯兰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他们宣称任何与学习之地有联系的人都将付出生命的代价。再加上其他事件，其中包括来自哈里发后裔在道德和经济上的支持逐渐削减，该团体的运作日趋萎缩，到了一一二三年，学习之地永远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学习之地的消亡可能使得这项运动的正式训练程序告一段落，但是并没有终结秘密团体，很多年以来，其成员一直在地下工作，每个人都会把该团体的运作和成就告知下一代成员。其中有一个非同一般的人带着惊愕的表情倾听，他叫哈桑，是萨巴的儿子，他的家庭兴起于喀拉逊，这是伊朗东部与阿富汗接壤的广阔地区。萨巴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学识也很渊博，其祖先是学习之地的成员，曾经到达伊斯玛仪教的第九个阶段，他至少把他知道的一些东西传给了他的儿子。

哈桑年轻的时候，接受过来自伊玛目穆瓦非克的指导，这个老师只选择指导那些最具前途的学生，向他们灌输取得权力的奥秘。这个伊玛目的讲授方法一定有些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因为与哈桑一起听课的学生中就有未来的诗人和天文学家欧玛尔·海亚姆，还有一个卓越的年轻人尼扎姆·穆勒克，此人发迹后，成了波斯的国王。当他们跟伊玛目学习的时候，他们达成共识，无论其中的谁最先获得权力，都必须协助另外两个人。

尼扎姆是个信守诺言的人，他在波斯人当中获得了具有权威和影响力的职位后，立刻确保海亚姆享受到了养老金，这就使得诗人能够在所热爱的尼沙布尔地区过上安逸的生活，在那里他创作了《鲁拜集》。至于他的朋友哈桑，尼扎姆在沙阿[①]王宫里给他谋了一个大臣的差事。

事实证明，哈桑是个杰出的行政长官，先是得到了波斯国王的赏识，而后又获取了他的信任，最后波斯国王把全国财务管理的职责委派给了他。不知道哈桑从一开始就是个喜欢偷窃的人，还是黄金和珠宝的光芒使他的道德规范荡然无存。波斯国王用错了人，因为哈桑侵吞了王国大量的钱财。波斯国王的侍卫没有追上哈桑，于是他逃到了开罗，他想起了父亲讲述的关于学习之地的故事，认为自己在那里将会免于一死。他与一群伊斯玛仪派信徒不期而遇，他们是旧团体所剩无几的核心力量。几十年以

---

①伊朗国王的称号。



哈桑·萨巴，他所创建的阿萨辛派发动了恐怖主义袭击，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来，他们一直在等待机会和领导者，能够让他们重整旗鼓。哈桑就是那个领导者。

魅力超凡，狡猾奸诈，残忍无情，聪明过人，凭借着这些能力，哈桑的周围聚集了大量的皈依者。他使他们相信，他拥有先知授予的魔力。他们对他的忠诚越来越强烈。有一次，他们坐船到非洲，在路上遭遇了暴风雨的袭击。一霎时，海浪汹涌澎湃，浪高超过了船体本身，一时间电闪雷鸣，即使海水不把船身和船上的人吞没，暴风也会把船掀到岩石上撞个粉碎。

船上的每个人都惊慌不已，一时间恸哭声、哀号声连成一片。但只有一个人除外，这就是哈桑，他显得镇定自若，没有受到任何惊扰。当他们问他，在就要面临死亡的时候，他怎么能如此平静？哈桑笑了笑，回答说："我们的上帝保证过我不会遭遇什么不测。"

真的没有什么不测。暴风雨很快就过去了，大海又恢复了平静，哈桑的崇拜者对他更加敬畏，也更加仰慕了。回到开罗以后，有关哈桑镇定坚忍品性的故事被人们一遍一遍地重复。哈桑是一个受到庇护免于灾难的人，是一个值得我们听从的人，是一个值得我们追随的人。哈桑对待这些故事所表现出的小心谨慎和耐心，就像一个精明的农民期待着硕果累累的好收成。

同时，他继续潜心研读学习之地采用的训练方法，开始认识到任何人只要能够重新改良学习之地的方法，并根据不同的目标，灵活地应用于不同的场合，那么权力肯定会归属那个人。这样过了几个月后，在他最新任的支持者的陪同下，哈桑回到了他父亲的出生地。这时，他已经成为命运的主宰者了——他把从伊朗王宫偷窃的财宝全部用于投资，并使用了学习之地惯用的洗脑程序，他将要构建一个具有惊人的欺骗性的谋杀团体。

哈桑的方案是，通过运用学习之地首创的方法，在一群年轻的追随者

中建立信任感和忠诚感。到达阿尔博茨山以后，他去现今伊朗西北部的卡兹维城旅行，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城堡，四周被高耸的山峰包围。这个地方的地势尤其崎岖，附近还有一座火山，叫达马万德山，该山海拔六千米，在里海和伊朗中部的平原之间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许多年以来，逃离逊尼派迫害的什叶派都会到阿尔博茨山上寻求庇护。伊朗首都德黑兰距此也只有一百公里，但是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一个很偏僻的地区。

城堡坐落在崎岖的阿尔博茨山脉顶端，只有大约五百米的长度，有些地方还不到几米宽，从远处望去，这个城堡就像一个天然的石头墙，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看上去是一片令人眩目的白色；日落时分，呈现出蓝灰色调；凌晨时分，则是一派血红的景色。走近这个建筑，旅行者会看到一个布满砂砾的陡峭斜坡，任何试图到达头顶城墙的努力都会遭到挫败。实际上，这个城堡只有通过一个螺旋状的陡峭楼梯才能上去，这样的设计就使得一个射手守卫塔顶成为可能。

哈桑对于这里的地形和城堡都非常熟悉，他也知道城堡上的许多守卫对极端什叶派都充满了同情之心。有了这些支持者的合作，哈桑得以进入城堡，并与城堡主人面对面，要求他把这个城堡转让给自己。奇怪的是，考虑到自己以后的发展，哈桑付了一大笔钱给这个主人，并打发他上路，这样不费一兵一卒他就完全控制了这个城堡。他给城堡重新命名，叫阿拉穆特，意思是鹰巢，并把这里变成训练基地和操作中心，专门用于谋杀与哈桑敌对的人。

哈桑要采取的下一个步骤，是把山谷里一个隔离区域改造成带围墙的花园，远离城堡的视线。再转变河流的流向，使其从花园内穿过，他建造了许许多多的喷泉，并把漂亮的“天国”美女安放在那里。根据那个时期的阿拉伯历史传奇文学 《大学者回忆录》 的描述，哈桑——

派人建造了一个巨大的花园，里面还修建了喷泉。在花园的中央，他修造了一个达四层楼高的凉亭，凉亭的四面是装饰华丽的窗户，四个拱门上用油漆喷涂金色和银色的星星。他随身带来了二十个奴隶，十男十女，他们都是跟着他一起从尼罗



阿萨辛派的最初要塞阿拉穆特的遗址，位于伊朗北部。曾经有二十多个这样的城堡点缀在这里。

河地区来的，他们刚刚到达青春期。他给他们穿着丝绸和上好的亚麻，让他们佩带金银手镯……

他把花园分成四个区域，第一个区域种植梨树、苹果树、葡萄、樱桃树、桑树、李树和其他果树；第二个区域培育桔子、柠檬、橄榄、石榴和其他水果；第三个区域是黄瓜、西瓜、豆科植物等等；第四个区域生长玫瑰、茉莉、罗望子、水仙、紫罗兰、百合和银莲花……

几年之后，马可·波罗从这个地区经过，详细地描述了这里的景色：

在一个迷人的山谷里，坐落着一座豪华气派的花园，里面种满了各色美味可口的水果和各种芬芳的灌木，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看不到的。大小不同和形状各异的官殿矗立在不同的位置上，都用金子、不同颜色的油漆和颜色鲜艳的丝绸家具装饰着。水果酒和蜂蜜像河流一样流向四面八方。进入花园的

唯一入口是城堡外的一个秘密通道。

这个地方住着举止优雅、长相漂亮的少女，她们各个精通歌唱、乐器演奏、舞蹈，尤其是各种各样的调情游戏和煽情诱惑。她们穿着华丽讲究，在花园和凉亭里尽情地嬉戏娱乐。

建造这个花园的目的是：穆罕默德曾经许诺过，那些服从他意愿的人将会在天堂里享受永久的快乐。在天堂里，你会得到各种各样的感官满足，包括美丽多情的少女的陪伴。这里面的首领自称是穆罕默德的后裔，他也是一个先知，拥有权力让那些得到他恩宠的人死后升入天堂，包括那些为了执行他的命令而献出自己生命的人。

凭借着这个人间天堂，哈桑吸引了不少年龄在十二到二十岁之间的年轻人到阿拉穆特去，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选择那些能够成为杀手的年轻人。他还从父母那里购买没人要的孩子，然后以特定的目的抚养他们长大，就像现代驯马者为德比马赛而塑造未来的赢家一样。他还利用从学习之地获取的教育方法，在一个圆形的领导结构内，把学生提升到一个大有前途的



阿拉穆特一瞥

位置上，同时通过重复不断地描述天堂的快乐，哈桑还进一步煽动年轻人的渴望。当他们的好奇心被提升到一个足够的高度时，哈桑爆料说他能够把年轻人短时间地送到天堂里，这样他们就可以不以死亡为代价来品尝天堂的快乐。

对于那些看上去相信他编撰的故事的年轻人，他会给他们服用印度大麻或其他麻醉药，直到他们进入一种深沉的，几乎是昏睡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下，他们被人从秘密通道带到隐蔽花园的凉亭上。哈桑和他信任的侍从回到城堡，这时，天国之美女就会按照哈桑的吩咐，在年轻人身上泼洒醋，让他醒来。这些迷惑不解的年轻人被告知，他们已经来到了天堂，因为他们服药以后处于昏昏沉沉的状态，所以这话听上去很是合情合理。这里的水果和酒应有尽有，他们则躺在丝绒般柔软的缎垫上，而对于他们所有关于青春期的怀想，天堂少女竭尽全力地满足，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这些少女会对每个来此的年轻人耳语这样的话：

> 我们只是在等待你的死亡，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为你而设的。这里只是天堂中的一个凉亭，我们是天堂之美女，我们是天堂的孩子。如果你死了，你就会永远地和我们在一起。但是你只是在做梦，很快你就会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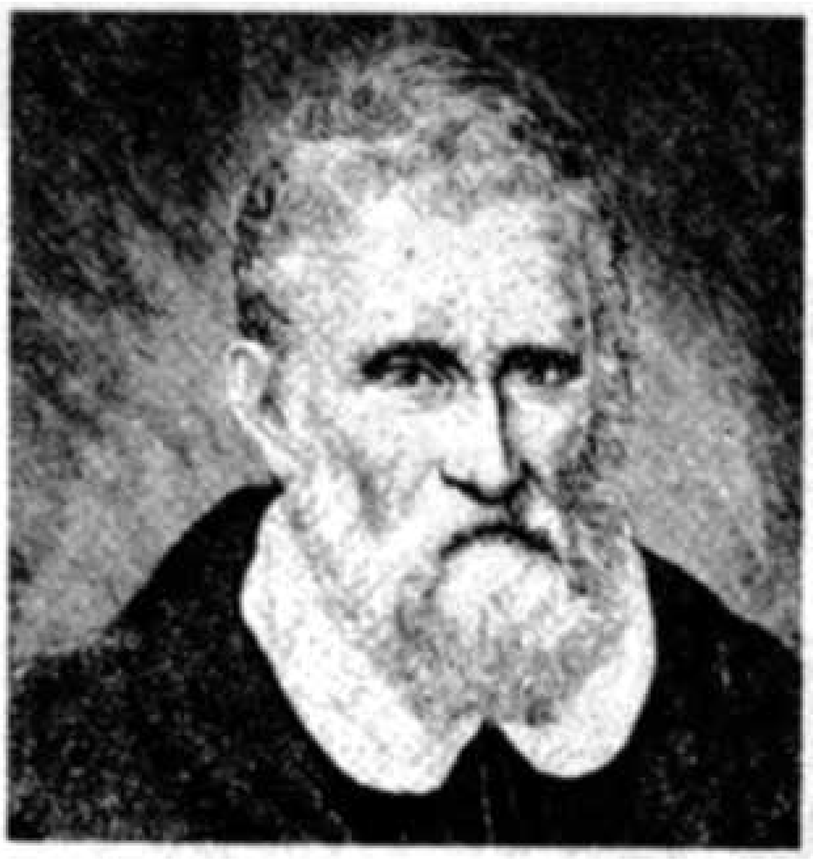
年轻人抱着这种幻觉过了一天，他们还得再次服药，又一次进入到一种无意识的状态，然后被带回到城堡，在那里他们会自己慢慢地醒来。

哈桑以及把他们放在那里的侍卫会先后问他，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们会回答说：“承蒙陛下的厚爱，我到了天堂。”然后，在哈桑的鼓励下，他们会把在天堂的经历详尽地描述给其他人。那些年轻人听了关于极具媚惑力的少女的故事，他们各个充满艳羡，并受到蛊惑，再加上用都用不完的水果和酒，那场面一定非常壮观。

“我们拥有先知的保证，”哈桑以及他后来的代理人会这样跟年轻人说，“谁捍卫了他的君主，谁就将永远进入天堂，如果你对我绝对服从，那么你的命运就将充满幸福。”那些容易轻信别人的人早就迫不及待了。

这种欺骗手段在多大程度上令人信服？相当令人信服，以至于一些追随者为了这种信仰而甘愿自杀，他们认为自己死后会立刻被送往天堂，享受所有的快乐。哈桑抵制了这种自杀的做法，他解释说，只有那些因为服从他的命令而死亡的人才能够拿到通往天堂的钥匙。他们就是那些假扮基督教僧侣，刺杀蒙费拉的康拉德的年轻人，并在被抓之后一声不吭地忍受可怕的酷刑。他们也是那些听到主人命令后，从塔顶上纵身跳下赴死，来证明他们不折不扣地服从的年轻人。他们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伊斯兰教阿萨辛派，也叫暗杀派，是中东地区报复和政治权力之争的工具。

一些历史学家也质疑过这种可能性，十二世纪的人真的那么容易被欺骗，那么容易相信别人？他们指出这个故事不过是一个寓言，或者至少是不足以采信的。作为回应，其他一些人指出这些年轻人确实是些容易受到影响的人，他们把亨利和马可·波罗的描述作为证据，说明哈桑的骗术确实在起作用。从今天的观点，以及最近的事件来看，哈桑的欺诈方法不仅大获成功，而且对未来的人们都起了很大的影响。在巴格达、贝鲁特和特拉维夫的街道上，年轻人尤其越来越多的年轻女人正在进行恐怖主义活动，许多人抱着这样的信念——当他们用自己的身体作为炸弹爆炸以后，死后会马上进入天堂。了解了这些，我们几乎就无法怀疑哈桑和其狂热的追随者的故事的真实性。一千年以前的穆斯林青年几乎没有机会碰到自己家庭之外的任何到达已婚年龄的女性，如果一个近乎全裸的美丽少女愿意与他共度下午时光，并给他带来肉欲上的美好感受，通常会对尚处于青春期的少男产生影响，再加上服用大麻后产生的幻觉，他不相信才怪呢。



马可·波罗准确地记载了哈桑对年轻的穆斯林信徒施行的残酷控制。

哈桑对其年轻追随者的操纵所产生的不仅仅是一个个富有成效的杀人机器，还引发了其他一些或多或少基于事实的传说故事。

如同大马士革的阿卜杜·拉赫曼所撰写的古代作品《欺诈艺术》所描述

的那样，为了在信徒中夸大他的权力，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挖了一个又深又窄的坑，然后他在坑里放了一个年轻人，这人在城堡里是广为大家熟知的，这样这个年轻人的头的位置就好像高于地面似的。然后，他把年轻人身体周围的空间填满，哈桑拿来两个中间有孔的圆形碟子，套在年轻人的脖子周围，外人看上去就像盘子里放着一个人头一样。为了增加欺骗性，他还在盘子上滴了几滴鲜血，给人的印象就是，盘子里放的是被割断了的活人的头。

那些新教徒吸食大麻后被带到这个房间，当着他们的面，这个“头”解释说，他按照主人的指令去做，已经给自己在天堂里赢得了一个位置。当他的教友听得目瞪口呆的时候，这个活得好好的年轻人讲述了他在天堂里享受的所有快乐，吃不完喝不完的水果和酒，周围奢华的环境，以及美丽而主动的少女。

“你们亲眼目睹了这个人头，他就是在执行我命令的时候死的。”哈桑对那些瞪大双眼、将信将疑的旁观者说：“这个人你们都认识，我命令他亲口说出了他的灵魂在天堂里享受的快乐，现在你们就去执行我的命令吧。”这些话听上去很有说服力，还有一件显得更加合情合理的事情呢，这些年轻人走了以后，哈桑砍掉了那个说话人的头。毫无疑问，头的主人肯定诧异万分，随后哈桑把人头悬挂在城堡的矮墙上，向大家展示。哈桑的追随者认为，当他们还留在地球上的时候，他们先前的教友一定正在天堂享受快乐呢。他们会多么迫不及待地想要跑去加入他的行列呢。

对当代专家来说，哈桑以及后任者所采取的任何方法都不会令他们感到震惊。精神病学家罗伯特·J.利夫顿在他的《思想改革和极权主义心理学》一书中列出了秘密团体的三个主要特点，这些特点在当代与在哈桑时代同样有效。这些特点是：

1. 当最初维持一个团体的总体原则丧失能力的时候，一个具有神授能力的成为崇拜目标的领袖应运而生。

2. 出现一个高压劝服或思想改革过程。

3. 团体成员受到领袖和统治派系在经济、性和其他形式上的剥削。

阿萨辛派在选择他们牺牲品的时候并不是特别挑剔。在十字军远征时期，在与逊尼派树敌的同时，他们支持和拥护任何能够满足他们目的的一方。至少有一次，他们与圣殿骑士团联合，与萨拉丁和耶路撒冷的伊斯兰保卫者结怨。凭借这种向其他人收费的雇佣谋杀的运作方式，阿萨辛派多年来聚敛了大量的钱财。

当他们对选定目标的恐怖统治达到白热化的时候，就凭一个谣言，像某个人冒犯了哈桑，或者这个人被选定作为死亡的对象，这些就足以成为他逃命的原因——几乎没有人能够苟活。

伴随着死亡的确定性的是死亡时间和地点的不确定性。苏丹自己的首相尼扎姆·穆勒克就是被一个阿萨辛派教徒乱剑刺死的。当时尼扎姆正坐着轿子回后宫，阿萨辛派教徒假扮成一个伊斯兰教托钵僧，当短剑刺入尼扎姆心脏的时候，他脑子里可能还在想着寻欢作乐的美事呢。他的艾塔伯克[①]曾经警告过他，他已经被阿萨辛派选择作为谋杀的对象，于是他让全副武装的侍卫时刻守候左右，以防意外发生。当总督进入清真寺祈祷之时，侍卫放松了警惕，因为在这个时候，谁敢因为谋杀罪而冒犯真主？在一眨眼间，总督就被阿萨辛派教徒包围，碎尸万断。当基督徒克拉多·迪·蒙特费尔特罗侯爵被指定死亡的时候，他受到了两个暗杀派教徒的谋杀，他们假扮成僧侣，而且侯爵当时正在宴会上接受蒂尔主教的款待。其中的一个暗杀派教徒被杀以后，侯爵也受了伤，另一个暗杀派教徒设法逃走并藏身于小礼拜堂，他知道侯爵一定会到这里来，感谢上帝让自己免于一死。他确实来了，当侯爵跪下来祈祷的时候，那个幸存下来的教徒从祭坛后面偷偷出来，完成了暗杀的任务，然后满脸喜悦地死在侍卫的手里。

当他们处于有利地位的时候，暗杀派教徒还会施以直接的恐吓。在暗杀派教徒处死了尼扎姆·穆勒克的儿子以后，这位父亲说，他会带领一支

---

① 艾塔伯克是用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王公贵族的头衔，开始于十二世纪，指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其位置在皇帝或国王之下，但在可汗之上，同时也是年轻而且缺乏经验的王子的军事顾问。

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军队，向阿拉穆特进军，摧毁这个地方及其所有的居民。一天晚上，他们终于能够看到城堡了，于是在阿尔博茨山脚下扎营。尼扎姆·穆勒克呼呼大睡，他坚信第二天早上他起床后，就会率领他的士兵与暗杀派血拼，把他们永远从地球上消灭干净。但当他早上醒来时，发现睡觉的沙地上埋着一把匕首，只有刀把露在外面，匕首刺着一张纸条，警告说等待着他和军队的将是一场大屠杀。

尼扎姆·穆勒克的随从中谁也解释不清匕首和纸条是怎么放到那里的，他们没看到任何一个人接近帐篷。是鬼魂还是精灵？不管是什么，尼扎姆·穆勒克决定取消这次袭击，并命令其军队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定不要触碰这个地区，这样就使得哈桑和其追随者在穆斯林的世界里肆无忌惮地横行。

哈桑在增强权力和财富的同时，也拓展了其权威性，在阿尔博茨山的峭壁间进一步加强了防御工事，每个工事都易守难攻，只有最强大、最不怕死的敌人才能攻破。随着时间的流逝，哈桑得到了一个称号，今天的人听上去非常像父亲般的慈祥。领导暗杀派的他本人以及后裔，包括戴·艾尔·克比尔在内，都被人叫作“山中老人”。

阿萨辛派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和精神劝诱，他们对于达到目标的心理力量也不缺乏理解，这可以从他们对苏丹的恐吓事件上略见一斑。伊玛目拉兹是他那个时代伟大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他居然蠢到公然冒犯阿萨辛派，他声称他们不是有资格的神学家，后来该团体派来公使，当面让他做出选择：用匕首刺死，或者每年一千金币的养老金。这个伊玛目的鄙视神情顿时荡然无存，事后一个同僚问他，你这个聪明人为什么不再批评阿萨辛派了，这个老人快速地扫视了周围一遍，“因为，”他放低声音说，“他们的论据是如此尖锐，而且一针见血。”

对阿萨辛派的恐惧不仅来自他们的惨无人道，还在于其行为的不可预知性，而且一旦袭击命令发布出去，就根本无法阻止。“休眠细胞组织”策略是哈桑和其继任者首创并完善的，他们把那些忠诚的杀手派往几百英里之外的社区，然后命令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直到接受行动指令。这些杀手可能要等上几年，才能等到使者跟他们接洽。这时，他们如果接近谋杀

对象，就不会引起他们对其身份或意图的丝毫怀疑。使得问题更加有难度的是暗杀派教徒的举止态度，他们表现得异常平静，愉快而乐观，对于随后的报复一点也不恐惧，反而很欢迎似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很快就会升入天堂。

在哈桑及其副手的指导下，阿萨辛派对中东的恐怖主义统治一直持续到十三世纪。哈桑死后，他的儿子和忠实的追随者掌握了政权，他的后裔中至少有三代人继续了他未竟的事业。但是即使暗杀派也无法抵御凶猛的蒙古人。

哈桑的孙子是第一个与谋杀传统决裂的人。一二一〇年，他被提升到伊玛目的位置，这时哈桑三世做了一件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皈依了逊尼派的信仰，重新恢复了伊斯兰法律，并邀请逊尼派教师来访问阿拉穆特。显而易见，这次信仰的转变同神学没什么太大的关系，更多的考虑是基于实用性和生存的需要：成群结队的蒙古人纷至沓来，他们带有传奇色彩的残暴甚至让阿萨辛派都闻风丧胆，他们纷纷穿越大草原，逃到伊朗。面对共同的敌人，什叶派和逊尼派都冰释前嫌，开始共同对敌宣战。

不幸的是，哈桑三世的审时度势并没有传递给他的追随者，尤其是他的儿子穆罕默德三世，他也叫阿拉丁（最高信仰）。穆罕默德重新恢复了该团体的信仰，他不但继续坚持什叶派教义，而且其残忍程度远远超过了所有前任阿萨辛派领袖，以至于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他是个疯子。他是如此地叫人难以忍受，以至于追随者们很快就效忠于他的儿子库沙，这个人试图与蒙古族人达成共识，因为现在他们已经大举入侵山区了。

这一切都为时太晚了。十三世纪中期，蒙古族领袖旭列可汗便开始有条不紊地对阿萨辛派的每个山区要塞进行逐个歼灭。凭借着欺诈、残酷和强大的军队力量，蒙古人逐个占领了要塞，屠杀了堡垒上的人，损毁了哈桑精心策划的人间天堂。

阿萨辛派太忠诚，太狂热，人数太多，以至于很难完全彻底地消灭掉，即使蒙古人的屠杀像海啸一样席卷了整个地区。少数人逃到印度，后

来成了人们所知道的霍贾派[1]，并在有限的规模上继续他们的传教。暗杀派的残余势力仍然存在于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但他们不过是好战的什叶派的分支教派。

阿萨辛派不仅是杀手集团的最早原型，而且他们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论是以好的方式还是以坏的方式。哈桑采用的学习之地的同心圆结构，成为秘密组织和秘密团体的原型。最著名的是共济会，他们从圣殿骑士团那里获得组织结构上的灵感，圣殿骑士团是十字军远征时期阿萨辛派的著名同盟者。

哈桑的一支最极端也是最值得信任的追随者和他后来的继任者组成了非达因集团[2]，这个名字仍然与伊斯兰狂热者密切相关，他们抵御的对象还是与先知为敌的人，无论他们是西方的异教徒，还是走向错误道路的伊斯兰信徒。对于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包括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劫持美国飞机撞击世贸中心大楼的狂热年轻人，激励他们采取这样行动的诱因仍然是永久进入天堂的许诺，即使没有哈桑预谋好的“表演式”劝服，这个动因依然会起作用。

把追随者作为“休眠细胞”安插在目标社会的策略，自杀性狂热分子以他们事业的名义准备屠杀更多的人，这些都是从一千年以前继承下来的另外一个元素。无论是对天堂的承诺，还是那些多年潜伏在他们发誓要摧毁的文化中的信徒，如果你还知道基地组织，这些你就不会感到陌生。

基地组织并没有完全复制阿萨辛派首创的方法。他们的假想领袖奥萨马·本·拉登是逊尼派，而不是阿萨辛派，尽管两种派系的极端元素在抗击大多数西方世界上是统一的。阿萨辛派招募年轻男人作为自杀性杀手，并承诺死后立即升入天堂，还有充满期待的年轻少女，暴力的伊斯兰派系最近已经开始成功地招募年轻女人来完成类似的任务了，当然对她们而言，重要的是为团体取得成功的奉献精神。然而很明显，哈桑的阿萨辛派和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仍然在同一个链条上。如果山中老人哈桑与基地组织领袖奥萨马·本·拉登会面的话，他们会互视对方为同胞加兄弟。

---

① 可敬的皈依者。

② 意为准备献身者。

第二章

圣殿骑士团、光明骑士会

骑士的权力席位

地球上隐藏的各种秘密团体中，哪些成员最具危险性？哪些成员拥有改变我们生活并推动历史运转的权力？据那些声称能够得到秘密团体真实意图的内部消息透露者说，他们是共济会成员。共济会阴谋者选举国际领袖，发动战争，控制货币流通，他们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资料表明，他们对其秘密权力的发挥运用不胜枚举。当任何人对这个假设提出质疑的时候，谋叛理论家马上会摊开一大堆给人形象深刻的证据，首先就是详细讲述那些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人物的故事，毫无疑问，他们同共济会保持着联系，这些人就包括签署《美国独立宣言》的开国元老。在美国伟大的英雄和思想家的长廊里，谁能比本杰明·弗兰克林、乔治·华盛顿和安德鲁·杰克逊还居于更高的地位？所有这些人都是共济会会员。事实上，至少有二十五位美国总统和副总统都是共济会积极和活跃的支持者。其中有两个人——哈里·杜鲁门和杰拉尔德·福特，都可以吹嘘自己达到了三十三级的地位，这是该组织内部所认可的最高级别。

一个具有秘密仪式的私人俱乐部被提升为滋养领导人、预言家和知识分子的温床，这真是一个卓越的成就。从表面上判断，共济会激励的似乎都是具有超常天才的人，远远超出任何其他组织，从童子军到罗兹学者集



许多年以来，共济会会员控制着西方的政治和文化。这些成员中就有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和哈里·S·杜鲁门，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以及优雅的艾灵顿公爵。

团无一能比。这个团体到底具有怎样的价值和体系，从而培养了这么多杰出人物?

对于几个具有宗教狂倾向的历史学家而言，他们几乎都是共济会会员。他们认为，这些杰出人士取得成功的根本是与圣殿骑士团之间历史上的渊源，以及从中得到的精神激励。圣殿骑士团开始是基督教信仰的保护者，然后成为中世纪欧洲的银行家，并听任一个贪婪的国王和与之串通一气的教皇的操纵。



早年，圣殿骑士团的骑士纯洁、虔诚和勇敢，后来，他们的声望变得越来越不令人钦佩。

由于圣殿骑士团的成员颇具骑士风度并经常做善事，人们对此深感敬仰，他们曾经代表基督教的利益，保护去圣地的朝圣者，并为了控制耶路撒冷与伊斯兰军队英勇作战。在那个时代里，真正的骑士头衔给他们带来的是尊重和羡慕，他们服从骑士精神和禁欲主义的法则，为了上帝的荣光和对基督教朝圣者的保护而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

这是该团体令人仰慕的一面，比较黑暗的一面就是种种谣言的流传，比如像圣殿骑士团与阿萨辛派之间有联系，圣殿骑士团的道德价值被直白的贪婪所替代，他们那值得褒奖的品质在走下坡路，并且他们经常对上帝进行猥亵和亵渎。这些品质都不是任何拥有很高威望的组织应该具有的，更不用说这还是一个以提供世界领导人物和地区利益为骄傲的团体。但是，令人难以理解的错综复杂的猜疑为后来的这个团体提供了不必要的纠葛和特质，该团体最初的目标是保护小商人的秘密，逐渐地，圣殿骑士团的精神领袖试图把自己比作，甚至可能误认为自己就是基督本身。

圣殿骑士团是十字军远征的产物。与普遍的观点相反，十字军远征不

是英勇行为带来的结果，甚至也不是基于对基督教信仰的奉献，而是出于封建主义者的职责。

历史学家对于封建制度的定义与对封建制度结构的定义一样，总是举棋不定，这也是他们的做事方式，现在有些历史学家甚至抵制“封建主义时期”这个理念。无论我们冠以怎样的头衔，生活在公元八〇〇年到一三〇〇年之间的欧洲人经历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把初期野蛮主义同民主政治的根本连接起来。在这一时期，国王可能会宣称拥有对于诸如法国、德国和英国这些国家的大部发地产，但是农村地区则不受帝王的控制，实际的统治者是封建领主和大财主。他们对其地产范围内的土地进行统治，推行正义，征收捐税，自己铸造钱币，并要求居住在他们土地上的居民服兵役。实际上，大多数封建领主征募的军队都要比国王的强大，因为那些所谓的皇帝不过是傀儡皇帝。

这种社会结构分成许多层次，而且界限清晰。农奴代表着最低的等级，他们要进行最基本的劳作，对于他们创造的财富也没有权力享受；诸侯为了封建领主的利益在土地上工作；对于骑士们来说，他们的基本特征包括拥有足够的钱款，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马匹和头盔，他们也维护封建领主的利益；而神职人员则按照要求给予精神上的援助。同样，对于更有权力的统治者来说，封建领主就被看做是诸侯了，而在国王看来，所有人都是大大小小的诸侯。

封建制度下的忠诚分成两个分支。封建臣民发誓向封建领主效忠，支付其需要征收的捐税，而且听从宫廷召唤随时出庭；封建领主的责任包括保护诸侯免于外敌入侵，这样做既是出于诸侯的利益，也是为了封建领主自己考虑。

骑士精神的概念就来自于这个线性排列，径直接受基督教的影响。诸侯和骑士对封建领主的权利和财产小心看管，这种理念通过像“骄傲的屈服”和“有尊严的服从”这样的措辞得到提升，也许这正是受到了基督故事的某种激励。因为这样的措辞方式，那些看上去是反映了一种主人——奴隶关系的行为，却转而成为了某种更令人尊敬，更高尚的做法了。听上去同样自相矛盾的是，为了某个更崇高的目标，个体骑士会屈尊就驾。大

众文学表明，具有骑士精神的行为动因来自于对窃取了骑士之心的优雅女士的浪漫爱情，他发誓对她永远地崇敬。实际上，骑士的“骄傲的屈服”追根到底或者是对上帝的服从，或者是对控制他们命运的封建领主的服从。骑士行为的浪漫一面，即对女性的赞美，是把对处女的崇拜与受到压抑的性欲望结合起来，仍然是许多小说的灵感之源，但从根本来说，还是更深刻动机的一个副产品。

对骑士的要求非常严格。他们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诸侯和骑士都应该接受一项神圣的任务，那就是赤手空拳保护他们上级的荣誉和财产。中世纪的社会是金字塔形结构，而基督就位于塔顶，封建领主、骑士和诸侯同样要负起保护上帝权利和荣誉的责任。

整个欧洲的封建主义制度根深蒂固，封建领主和骑士，再加上他们的侍从，开始把向耶路撒冷朝圣作为表达他们基督信仰的一种方式。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希腊时期，希腊人长途跋涉到特尔斐去寻求智慧，欧洲的基督徒们开始出发，踏上了通往圣地的朝圣之路，开始是为了向基督表示敬意，后来则演绎成了一种洗涤罪行的手段，最后就是对来自教皇的直接指令做出的回应。

在早期著名的一批寻求纯洁灵魂的朝圣者中，就有布列塔尼的弗洛特蒙德，他杀害了自己的叔叔和弟弟；还有一个人是福尔克·德·内拉，安茹的伯爵，他活活烧死了自己的妻子。即使在毫无秩序可言的女权主义运动前期，这也是严重的婚姻不合和暴力事件的典型例证。两个人都想通过朝圣来寻求宽恕，两个人都取得了成功，尽管使用了完全对立的方法。

弗洛特蒙德用了几年的时间漫游在红海海滨一带，在亚美尼亚的山脉中找寻诺亚方舟的遗骸。返回故土后，他完全沉浸在以往的回忆和愧疚之中，在雷东修道院度过了余生。对于福尔克·德·内拉来说，他因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而游荡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身后跟着一群仆人侍从，他们会用棍子打他，同时让他重复这样的话：“上帝，怜悯我这个背信弃义的基督徒吧！饶恕这个远离故土四处流浪的罪人吧！”他表面上的诚恳让伊斯兰教徒异常感动，他们甚至准许他进入圣墓，而这里通常禁止基督徒的进出。在那里，他俯卧在饰以珠宝的地板上，在为自己可怜的灵魂哀号的时

候，德·内拉撬出了几块珍贵的宝石，并把它们放入自己的衣兜。

弗洛特蒙德、德·内拉以及其他人的所作所为对虔诚的基督徒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公元一〇五〇年的时候，去圣地朝圣被认为是每个有能力的基督徒的职责，同时作为减轻罪孽和平息上帝之怒的手段，于是教会也开始把指派朝圣任务作为赎罪和悔过的惯用方式。到了一〇七五年，朝圣之路已经像贸易路线一样顺畅，非常适合人们来来往往了。

朝圣者长途跋涉的路线，首先是经由亚得里亚海滨，然后再经陆路到君士坦丁堡，穿越小亚细亚到达安提阿，与同样长度的其他路线比较起来，这条路危险丛生。一〇九五年，拜占庭皇帝亚力克修斯·科穆宁请求教皇乌尔班二世的援助，帮助他抵抗一个叫做塞尔柱土耳其人的穆斯林部落，这条朝圣之路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塞尔柱土耳其人占领了安纳托利亚，也就是拜占庭帝国最富足的省份之后，又攫取了安提阿、的黎波里，最后是耶路撒冷。现在他们好像对君士坦丁堡虎视眈眈了。如果教皇能够组织一支具有献身精神的基督徒军队来援助拜占庭部队，亚力克修斯指出，他们联合起来就能够重新夺回安提阿，重新恢复基督教对耶路撒冷的统治。

基督教对圣地统治的许诺，再加上对拜占庭国王的宝库和源源不断的财富的期待，这些都令人欢欣鼓舞，足以促使乌尔班二世发起了第一场由教皇支持的圣战。就这样，双方之间将近两百年的可怕屠杀开始了，其目标与其说是出于宗教原因，不如说是基于金钱上的考虑，在一〇九六年，十字军九次远征的第一次在乌尔班“上帝所愿”的呼喊声中终于开始了。



徽章上所展示的马背上的两个骑士，表明了兄弟般的友爱，但后人却窥视出一种性取向。

是否参加十字军远征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决定，即使对于最虔诚的基督教徒而言亦是如此。它意味着至少两年的长途跋涉，要穿过地形崎岖，充满敌意的国家，后来由于十字军从普罗旺斯沿着地中海向东航行，把时间缩短了一些。从欧洲到巴勒斯坦，再返回来，在这个长途跋涉中要寻找食物和栖身之地，朝圣者和十字军不得不应付来自伊斯兰教和希腊正教管理者的公

然敌视。针对这种情况，杰拉尔德·马提涅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所医院，作为避难所。这所医院由十二个相互连接的房子组成，包括花园和一个很壮观的图书馆。很快，当地商人就在附近开办了市场，与朝圣者进行贸易，他们必须交给医院管理者两块金币，才有权把摊位摆出来。

对封建领主来说，这真是个大好时机，他们怎么能置之不理呢？当朝圣者像洪水一样涌来，来自于阿马尔非地区的一群意大利商人又建立了一家医院，位于圣棺教堂附近，由本笃会修士自己掌管，同时他们还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盈利市场。很快，这家医院就人满为患，这促使修士们又创建了一所医院，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圣约翰。

圣约翰把建立医院的概念提升到一个新的精神高度。他们为了给朝圣者提供安全保障和舒适环境，不惜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把病人当作主人看待，为紧随其后的慈善机构创立了可供效仿的原型，尽管没有一家机构可以同他们的奉献精神和谦逊态度相提并论。当然了，这个做法反映出骑士精神的根本和目标。这吸引了很多骑士，他们对自己的军事目标置之不理，更愿意热心钻研最慈善的基督教义。然而，他们的军事风采和纪律从来没有被完全弃置于一边。对于他们的服务对象，这些骑士慷慨大方，富有同情心；而对他们自己，却相当严格和苛刻。他们发誓信守贫困、贞节和服从，其着装无非就是一个黑色的斗篷，胸前缀有简单的白色十字架。他们被叫做罗兹和马耳他的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俗称为医院骑士团。

贫穷、贞节和服从的誓言，作为他们在骑士行为上的职责可能很适合（而且毫无疑问，他们也期待，并希望自己进入天堂之门更便利），但在保护医院骑士团免于受到各种派系袭击的危险上他们却所做甚少。随着时间的推移，医院骑士团在慈善行为上的关注，同保护他们秩序的军事行为上的关注几乎毫无二致。大多数人都是具有武器装备的骑士，而且他们毕竟出身高贵，恪守着高标准的骑士精神。

他们同那个时代或者我们时代的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当力量强大的欧洲公爵们向医院骑士团表达爱慕之情，赠与他们广袤的土地时，骑士团成员欣然接受了捐赠。除了这个经济来源之外，他们还拥有享受从战败的伊斯兰战士身上获取战利品的权力。到一一一八年杰拉尔德去世的时候，

医院骑士团已经从赞助人那里得到了数量可观的资产，而且享受独立于教会权威的超凡独立性。这样，医院骑士团就从最初的一个帮助穷人、伤者和病人的无私团体，演变成了一个更像现代服务俱乐部的组织，对于他人的帮助，他们更乐于帮助那些富有或者更有地位的人。

医院骑士团成员也许是非常有作为的军事人才，但是他们得以存在的理由是继续为公众服务。他们在履行义务的同时，也参与同穆斯林的作战，这与他们最初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医院骑士团成员在全身心地给基督徒以细心关照的时候，他们还需要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与敌人作战上。

如果说医院骑士团成员因为慈善的服务行为而聚敛了大量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又激发了更加卓越的教友们，那么这听上去有些愤世嫉俗，但是历史证明财富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不管怎么说，在杰拉尔德死后十年，一个新团体成立了，这个团体最初由九个骑士组成，领导者是休·德·佩恩斯，追随者们恪守着禁欲和虔诚的准则，这也是最初的医院骑士团的信条。然而，在他们去圣地长途跋涉和在耶路撒冷停留期间，这个新组织主要关注的是朝圣者和十字军成员所面临的危险。而到现在，这个特点已经变得非常模糊，甚至没有任何意义了。

这个危险来自于多重威胁。埃及人和土耳其人憎恨别人从他们国家经过进入其他的国家；阿拉伯的游牧部落袭击并抢劫朝圣者；而叙利亚的基督徒对外国人也表现出敌视态度。

该团体早期的谦逊和勇敢的声望根源于德·佩恩斯的个性。人们是这样描述他的："脾气随和，全身心地奉献，为了信仰近乎残忍。"就现代人的理解能力而言，脾气随和与近乎残忍这两个概念看起来也许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对中世纪的评论家来说，两者则绝对相容。德·佩恩斯是经过了第一次十字军远征的千锤百炼的老战士，在重新计算他曾经俘虏的战俘时，他依然津津乐道，很明显，这并没有使他每天的仁慈之心受到些许破坏。为什么他应该情绪糟糕？即使更虔诚的克勒窝[①]的圣伯纳德也曾经宣布，那只是除恶而非屠杀。在圣地死亡的成千上万的教徒也许会要求他们

---

① 明谷。

做出改变，但是没有什么人理会他们的观点。

德·佩恩斯对其他任何事情都毫不在意，他一心一意地敬仰上帝，在他身边聚集着很多十字军成员，他们致力于保护朝圣者免受危险，就像杰拉尔德的医院骑士团治疗和照料他们一样。德·佩恩斯声称，这个新团体将会把禁欲僧侣和勇敢战士的品性结合起来，他们过着纯洁和虔诚的生活，为了服务于基督教而挥舞手中的剑。为了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有些相互矛盾的角色，他们选择“上帝的温柔之母”作为他们的女赞助者，并宣誓按照圣奥古斯丁的宗教法规生活。

鲍德温二世是当时的耶路撒冷之王，对于这个团体的特点和目标，他大加赞赏和推崇，甚至把宫殿里的一个角落贡献出来，作为他们的生活区域，并且每年发放薪金支持他们的工作。进入他们的生活区域要穿越教堂和女修道院旁边的一个通道，于是他们称呼自己为寺庙军人，或者叫做圣殿骑士团。

随着时间的流逝，圣殿骑士团给许许多多的贵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纷纷赠与团员们同样种类的财物，就像医院骑士团所享受的待遇一样。当一个法国伯爵宣布说，他将每年捐献出三十磅重的银币时，其他人也跟着效仿。很快，这种新生的运动就使得圣殿骑士团沉浸在各种各样的财富中，而在他们最初的计划中是要对这些加以抵制的。

值得赞扬的是，在圣殿骑士团存在的最初几年，他们抵制诱惑，只把钱财使用在支持和保护朝圣者上面。在该团体成立七年以后，克勒窝的圣伯纳德是这样描写圣殿骑士团的：

> 他们的来去都要受到总团长的控制。他们一起快乐而有节制地生活着，没有妻子，没有孩子，为了达到福音派新教会所倡导的完美，他们好像什么也不缺少。他们只是住在一个房子里，没有任何财产，这样一个人的内心和灵魂似乎就都驻扎在他们身上了。他们不会懒散地坐在那里，也不会在听到什么消息后就四处聒噪。在抵御异教徒的战争结束后，他们会稍做休息，但不是慵懒地吃着面包，而是忙于修补衣服，整理武器装

备，或者按照总团长的命令做事，要不就是做一些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

说些不体面的话语，对别人轻微的嘲笑，小声嘟哝或者无节制的大笑，都不会轻易逃脱责骂……他们避免进行象棋或者赌博这类游戏，对于能够给其他人带来快乐的狩猎或者猎鹰这样的活动，他们也是竭力反对的。他们憎恨所有耍把戏的人和江湖郎中，憎恶所有淫荡的歌曲和戏剧，认为这些都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虚荣和愚蠢的行为。他们听从基督教传教者的话，把头发剪得短短的……他们很少洗澡，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看上去头发蓬乱，满身灰土，由于胄甲和太阳的灼烤，他们的皮肤呈现出一种褐色……

因此他们无一例外地显得很奇特，而同时又比羔羊还要温文尔雅，比狮子还要狰狞残酷，这样，人们就会犹豫不定，是该叫他们为僧侣，还是称他们作骑士。但是两个名字都适合他们，他们身上兼备了僧侣的文雅和骑士的英勇。

准确地说，这绝对不是一种吃喝玩乐的生活。即使为圣殿骑士团树立了榜样的西多会修士们，也会一方面尽力避免战死在沙场上，一方面从生活中寻求乐趣。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那些具有最崇高品格，以及最诚恳品德的人才能隐忍做圣殿骑士这样的事业。但是在那些具有雄心大志和虔诚的年轻人中，很多时候，他们依然难以抵制诱惑。令人感动的是，很多年轻人都努力成为圣殿骑士团中的成员。因此，骑士的数量与日俱增，从而提升了这个团体在欧洲贵族中的形象，贵族们纷纷表达出对这个团体的支持，承诺捐献钱财和土地，有时候甚至把自己的儿子都贡献出来了。

随着圣殿骑士团成员的不断增加，该组织施行了一种正式的结构模式，确立了三个等级：骑士等级，他们都出身贵族家庭，既没有结婚也没有订婚，并且没有个人债务；教士等级，这些人要宣誓保持贫穷、贞节和服从；服务性教友等级，他们生活富足，充满才气，只是缺少骑士所必需的贵族出身。然后教友又进一步细分为兄弟型教友，他们与骑士们一起并

肩作战；以及手工艺型教友，他们主要从事一些琐碎的工作，如烘烤、冶炼金属以及饲养动物，在整个结构中，他们的地位是最低的。

骑士和教士都需要经历一个严格的入会过程，这种做法一直沿用到今天，只是在形式上稍微做些改动，成为我们了解作为秘密团体的圣殿骑士团和其后裔的基础。

在接受候选人入会的那天晚上，该候选人在其他骑士的陪同下，被引入一个小礼拜堂。没有任何人在场负责这件事情，候选人也不能把这件事情透露给任何人，这个仪式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举行或者是否举行过。

入会程序主要集中在对候选人的警告上，要告诫他以后将会碰到的困难，并要求他在上帝面前宣誓忠于圣殿骑士团的意志。如果今天你读到了关于这种入会仪式的描述，你就会联想到中世纪的新兵训练营。当候选人想要睡觉的时候，会得到命令，必须执行守夜的任务；当他想要守夜的时候，会得到立刻上床睡觉的命令；当他想要吃东西的时候，却被告知必须工作。对于这些条件他能赞同吗？每个要求都得有回应，而且必须声音清晰洪亮："是的，先生，在上帝的指引下！"初入会者还要承诺永远不袭击或伤害基督教徒；没有上级点头，永远不接受来自妇女的服务或照料；永远不要亲吻妇女，即使她是你的母亲或姐妹；永远不要在洗礼池边上怀抱婴儿，或者当人家的教父；永远不要谩骂任何无辜的人，或者说些污言秽语，要永远保持彬彬有礼。

对于一个致力于这种骑士风范的行为和高标准的基督教原则的团体，谁能够抵制呢？教会是不会的。一一四六年，教皇尤金尼三世宣布说，为了表示对他们所面临的战争殉难的认可，圣殿骑士团的骑士们可以在他们白色的束腰上衣上佩带一个红色的十字架（与医院骑士团的穿戴完全相反），而且从今往后，他们摆脱了教皇的直接监督，包括开除教籍这样的风险。这就促成了土地、城堡和其他资产更大量地从有名望的赞助商那里流向他们的宝库。

对于永恒诱惑的抵制都是有限的，这个团体衰败的种子很快就种下了。人们谣传着，圣殿骑士团从阿萨辛派那里掠夺财物。这种说法发始于雷蒙德侯爵的被暗杀，据传暗杀他的就是阿萨辛派。圣殿骑士团对此事的

反应是，他们曾经进入阿萨辛派控制的领地，但并没有同阿萨辛派展开对峙，而是要求他们献出一万两千块金币。没有任何记录表明阿萨辛派把这笔钱给了他们，不久以后，阿萨辛派派使者到耶路撒冷之王阿莫里那里，主动提出如果圣殿骑士团放弃这笔钱，他们就会皈依基督教。很明显，他们之间达成了某种和解。

后来，圣殿骑士团截获了埃及的苏丹阿巴斯，当时后者正带着儿子、女眷，以及从埃及偷来的大量财宝逃向沙漠。圣殿骑士团先是杀死了这个苏丹，劫掠了所有的财宝，随后同苏丹的敌人进行谈判，达成了共识，把苏丹的儿子交到开罗，换取六万金币作为回报。在那个时候，这也许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交易，但问题是，那个儿子已经同意皈依基督教了，这一条应该足以让他免于一死了。然而，当圣殿骑士团与埃及人的交易一结束，苏丹的儿子就被关在铁笼子里，送回埃及。他和圣殿骑士都心知肚明，等待他的将是死亡。

诸如此类的事件标志着圣殿骑士团正在走下坡路，他们正从一个致力于保护穷人和无助人的禁欲团体，蜕变成一个如同现代社会的公司一般只注重物质利益的组织。实际上，他们建立了一套非常广泛的银行系统，在巴勒斯坦和欧洲之间快速地转移他们的钱财，这种行为与传说中的实施慈善和恪守贫穷的誓言简直是南辕北辙。

他们的腐化堕落并没有以金钱结束，从严格的禁欲主义到广泛的实利主义的改变，同当代任何一个白手起家的故事何其相似。之前他们是多么地朴实而谦虚，现在却变得傲慢而贪婪，他们利用信手拈来的欺诈手段，把令人目眩的财富越堆越高。一二〇四年，巴勒斯坦盛传着这样的话，大马士革附近有个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她的双乳里流出某种东西，如果饮用了这种液体，罪孽就会从虔诚犯罪者的灵魂中不可思议地移走。不幸的是，这里距离耶路撒冷十分遥远，而且沿路经常有强盗出没。圣殿骑士团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踏上了前往雕像之路，挤出那具有神奇力量的液体，再把它们带到朝圣者那里，当然了，他们是要报酬的。可想而知，对于这种液体的需求，连同价格本身，呈现出急速上升的趋势，而这具有神奇魔力的液体也给这个团体带来了殷实的收入，而他们

最初的目的恰恰是保持赤贫。

圣殿骑士团并没有把所有的财富用于帮助穷人或者与伊斯兰教徒作战上。很大一部分钱财似乎都投到了饮酒和其他的肉体享乐上了。很快，“像骑士一样饮酒”就成为描述某个对葡萄酒有过度品位的人的通用语了，而日尔曼语也获得了一个新的表达方式，他们用 Tempelhaus 这个词来描写一所拥有恶劣名声的房子。

过着这样一种舒适而满足的生活，谁还愿意在巴勒斯坦的伊斯兰教徒中穿着刚毛衬衣[①]？圣殿骑士团可不愿意这样做，与保卫基督信仰比较起来，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获取大量的财富。起初与他们生死与共的医院骑士团，也改变了价值观，更多的是唯利是图，而不是以宗教为动机。他们也摒弃了先前对于牺牲精神和仁慈善良的强调，像圣殿骑士团本身一样，在战场上他们更加实际。几年以来，两个骑士团相互向对方放冷枪，直到一二五九年，双方展开了一场战争，据说是因为圣殿骑士团想要把对手的金银财宝弄到手才发动的。医院骑士团因其更加斗志昂扬（也许因为数量更多）而赢得了战争，他们把落入其手的每个圣殿骑士团成员都碎尸万段。不久，圣殿骑士团撤退到了欧洲，那里毕竟储存了他们的钱财。

到了一三〇六年，圣殿骑士团已经心满意足地定居在了塞浦路斯，这个地方距离巴勒斯坦足够近，以便使人看起来他们还在坚守着誓言，就是他们仍然从事最初的使命；同时远离具有袭击倾向的伊斯兰教徒，这样他们就可以安全地享受财富带来的好处了。克莱门特五世在几个月前登上了教皇的宝座，同年，他决定过问关于圣殿骑士团的谣言事项，即他们“对上帝无法形容的背叛，使人反感的偶像崇拜，令人憎恨的恶行，以及很多异教邪说”。他命令圣殿骑士团的总团长，一个叫雅克·德·莫里的具有领袖魅力的人来到罗马做出解释。

德·莫里是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身高六英尺，其长相和举止可以同中世纪娱乐业的名流相提并论。大约一二四〇年的时候，他出生在勃艮第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贵族家庭，二十五岁时，他参加了圣殿

---

① 宗教禁欲者苦修时直接穿的一种粗糙的粗毛衣服。

骑士团，在接下来的二十年时间里，他一直在耶路撒冷英勇地战斗，直到五十五岁时被选举为总团长。

德·莫里在六十名圣殿骑士的陪同下，一起到达罗马。他还带来了十五万弗罗林金币以及大量的银币，所有这些都是圣殿骑士团在中东的各种侵略中获得的。几天之后他就离开了，带着所谓的对教皇的歉意，克莱门特是这样解释的："因为这似乎是不可能或者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信奉这种宗教的人……在日课经文和斋戒中表现出的奉献精神是如此伟大和众多……会忘记他们灵魂的拯救，来做这些无谓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倾听这种含沙射影的话。"德·莫里离开罗马的时候，耳边可能还回荡着克莱门特的许可之声，但是他留下来的却是大量的弗罗林金币和银币。

法国美男子国王腓力四世感觉到这里一定有贿赂的行为，这使得他非常恼火。以前还很支持圣殿骑士团，现在他开始与他们对立，一部分原因是对他们臭名昭著的生活方式做出的反应，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权力和财富不断地增加，对于前者他感到恐惧，对于后者他又垂涎三尺。腓力四世认为，圣殿骑士团必须解散，其大部分财富都储存在腓力的领地内，因而应该交到国王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腓力国王采用了一种为当代犯罪小说粉丝熟悉的策略：监狱告密者。

一个名叫斯奎恩·德·弗莱克辛的前任圣殿骑士，因为被指控犯有叛乱罪而被囚禁，并面临死刑惩罚，他得知了腓力国王对于这个团体的憎恶。于是德·弗莱克辛给监狱看守报信，声称他有关于圣殿骑士团的令人恐惧而隐秘的故事要向国王报告。这足以给予他一次免费旅游巴黎的机会，在那里，他连篇累牍地对圣殿骑士团进行了冗长的指控，包括与伊斯兰教的秘密结盟，入会仪式中居然有向十字架吐痰的细节，使妇女怀孕并谋杀她们刚刚出生的婴儿，以及涉及到放荡堕落和亵渎上帝的各种行为。正如期待的那样，德·弗莱克辛的讲述让国王和宫廷人员大发雷霆，对这些令人着迷的细节，他们再怎么听也不嫌多。放荡堕落？亵渎上帝？与敌人结盟？秘密仪式？有哪个君主能够拒绝对这些恶魔采取行动呢？尤其他们还拥有如此众多的弗罗林金币，说不清的金银财宝，以及等着被占领的广袤土地和数不清的城堡？

一三〇七年十月十三日[1]爆发了一场战争，这堪称是由天才的战地指挥官指挥的。圣殿骑士团遭到了来自欧洲各地的联合袭击，发生了历史上最为残酷的逮捕事件。在严刑拷打之下，包括德·莫里在内的许多圣殿骑士团成员都坦承了与弗莱克辛（因为一些纠纷他被绞死）描述的类似活动。多年以来，被囚禁的圣殿骑士团成员试图为自己辩护，陈述法国国王对他们指控的种种不公，直到一三一三年，教皇宣布彻底废除圣殿骑士团。根据他们的职位高低，对罪行的承认与否，以及他们在斥责自己罪行时的真诚程度，或者被流放，或者被处以其他处罚，只有德·莫里以及与他最亲密的三个同盟者除外。

这四个圣殿骑士被带到了巴黎圣母院前面的教皇审判席上，他们刚要接受终身监禁的惩罚，这时德·莫里站起来说话了。这个圣殿骑士团总团长用一种直接而富有煽动性的语言，为自己的无辜进行辩护，并当众诋毁他在折磨之下所招供的事实，以及许多被指控的其他圣殿骑士的供认。他拒绝承认罪行的顽强态度，以及要求得到向教皇申辩的机会的执著，都得到了来自法国奥弗涅的皇太子的兄弟的支持，他是被指控犯有类似罪行的三个职位最高的圣殿骑士之一。

审判席上的人目瞪口呆。他们本来希望圣殿骑士团成员能够无声地接受他们的命运，并对于赦免一死而心存感激。法国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一点也没有感到吃惊，而是表现得非常愤怒，他要求那两个圣殿骑士马上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只是这个过程要慢慢来，这样两个人就得遭受尽可能多的痛苦了。

第二天，德·莫里和来自奥弗涅[2]的盖伊被带到了西岱岛下游的一个地方，这里就是现在的瓦尔—嘉朗广场，是巴黎最吸引人的地点之一。他们被脱光，绑在柱子上，同时还在大声疾呼自己无罪。一个圣殿骑士学者是这样描述的：



雅克·德·莫里像烈士一样死去了，他的死提升了该组织日渐失去光泽的声望。

① 这天正好赶上星期五，引发了人们对于十三号星期五会发生不幸事件的迷信说法。

② 是位于法国中部的一个大区。

大火首先从他们的双脚点燃，然后烧到身体更加至关重要的部分。血肉之躯烧起来的恶臭气味充斥了周围的空气，这更增加了他们的痛苦。然而他们还是坚持不懈地大声疾呼（自己的无辜）。最后，死亡终结了他们的痛苦。看到他们坚贞不屈的样子，周围的观众纷纷落下眼泪。晚上，他们的骨灰作为遗骸被搜集起来。

腓力国王攫取了圣殿骑士团的财宝，他声称大多数战利品都用在了审讯和处决骑士团成员所产生的花销上，他把剩余部分发给了医院骑士团和英国国王爱德华二世，并不情愿地把圣殿骑士团从他自己的领地驱逐出去。

据传说，德·莫里被绑在火刑柱上等待处死的时候，他曾经预言教皇克莱门特将在四十天之内也跟着他走上黄泉之路，国王也会在一年之内加入他们的行列。如果传说属实的话，他还真就说对了。一个月之后，克莱门特就死于疝痛，当他的尸体庄重堂皇地躺在教堂的时候，一场大火席卷了那里，大火几乎把棺材全部吞噬了。几个月之后，腓力国王从马上摔下来，脖子摔断致死。

在另一个传说，也是一个更接近当代的事件中，德·莫里被认为是都灵的神秘裹尸布上印着的人物。这个裹尸布最初是在一三五七年展出的，据说是十字军在一三〇七年洗劫君士坦丁堡的时候收复回来的。裹尸布上那个明显的留着胡子的人像通常被认为是基督耶稣——耶稣的尸体从十字架上拿下来之后，就是用这块布包裹的。通过碳年代测定法[①]表明，这块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末期，这就激起了一些新的假设，也就是德·莫里在被囚禁的那些年中，有一次被折磨后，曾被裹在一块布中。裹尸布上那个人像的大小和面貌可以看成是德·莫里的，也可以说是其他任何人的，这也给德·莫里的殉难增加了神秘的色彩。

被劝诱效仿法国榜样的腓力、爱德华和其他统治者，没能彻底歼灭圣

---

①通过测量古代文物，如考古标本中碳 -14 的含量，从而断定该古物的大致年代。

殿骑士团。该团体的残余势力为了不遭受与德·莫里和盖伊同样的命运，以一种非常秘密的方式保全了这个组织的机构。曾经在德·莫里领导之下的秘密团体力量越来越强大，也愈发神圣。有好几个消息来源都提到了德·莫里临死之前准备好的遗嘱，遗嘱中让贝特朗·杜·盖斯克兰继承圣殿骑士团总团长的职位，很长时间以来，这个领导位置一直由一些杰出的法国市民充当，包括波旁家族的几位公子。

还有一件事情的影响力更加持久，尤其是在法国市民当中，普遍存在对腓力国王的怀疑，认为他并没有攫取圣殿骑士团的全部财产。几个世纪以来，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就是大量的金银财宝仍然躺在地底下，等着人们发现它们。有一个故事涉及到爱丁堡附近的一个漂亮的罗斯林教堂，一些人声称那里错综复杂的石头雕刻就是一套密码，只有圣殿骑士团和共济会成员运用解码的技术才能解密。根据推测，凭借这个密码可以找到圣杯和圣殿骑士团财宝隐藏的具体位置，它们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罗斯林教堂与圣殿骑士团之间的联系不免令人产生怀疑，因为该教堂是在德·莫里死后一百七十年修建的，然而这个故事依然广为流传，尽管经过广泛的调查和挖掘，在小教堂周边或地下，根本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或好处的东西。另一个传说表明圣殿骑士团的大部分财富都埋在了大西洋沿岸的新斯科舍橡树岛[①]。

关于圣殿骑士团财宝的故事在无限地蔓延，而如今现实生活中的圣殿骑士团却并非如此猖獗，只有一支通过血统纽带延伸到现代的共济会。说到与圣殿骑士团的纽带关系，共济会会员一直都拿不定主意，没有一个明确的观点。一方面，如果共济会是具有殉教精神的圣殿骑士团的嫡系后裔，那么无疑会给共济会蒙上一层神秘和庄严的色彩。无论他们曾有怎样的错误，圣殿骑士团的形象得益于时间这个锐器的打磨，现在人们普遍的观点是，他们是为了一个喜欢盗窃的国王和背信弃义的教皇而甘愿牺牲生命的贵族骑士。另一方面，在圣殿骑士团和共济会之间没有直接的历史联系，当然了，这一点并没有阻止把两者联系起来的猜想和华丽故事的广泛

---

①加拿大省名。

传播。一个像共济会这样的组织，是否应该努力争取得到认同和赞美，从而来维持一种较高水平的审慎行为，然后培养一个根本没有事实依据的联系？后者已经不再是人们关心的严肃话题了，因为考虑到逐渐减少的成员和最近的几次崩溃，共济会还是能够从中得益的，他们把自己沐浴在了圣殿骑士团反射的光辉中。

共济会的运作无疑呈现出下滑的趋势，尤其在美国这个曾经拥有最伟大的光荣和最持久的力量的地方。只要我们回顾美国的历史，就能够与共济会不期而遇，他们潜伏在每个合约、战争和法规背后，他们的成员担任像美国国务卿、陆军上将和最高法院检察官这样的要职。从乔治.C.马歇尔到约翰.J.潘兴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再到最高法院的法官沃伦和瑟古德·马歇尔，在美国的权力席位上，共济会比其他任何团体都占有更多的人数上的优势。至少有不下十六位美国总统都曾经骄傲地宣称自己是共济会成员。

这也决非美国特有的现象。温斯顿·丘吉尔爵士，曾任加拿大总理的约翰·迪芬贝克，以及四位墨西哥总统都在共济会担任过很高的职位。这么多年以来，有哪一个保密团体能公然宣称自己对权力席位产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呢？

如果你选择相信阴谋热衷者的言论，共济会对世界事件发挥巨大作用的证据可以在世界各地的口袋、钱包和钱夹子中找到。美钞上印有美国国徽，在背面有一个印章，许多人认为这个图案证实了共济会对这个国家的支配和控制。这个印章的设计是这样的，在一个显然没有竣工的金字塔上漂浮着一个三角形，三角形里则有一只眼睛。金字塔的底部是用罗马数字雕刻的一七七六字样（MDCCLXXVI），框住了这个设计图案的是两行拉丁文字：Annuit Coeptis（上帝支持我们的事业）和 Novus Ordo Seclorum（时代的一种新制度）。根据那些畏惧共济会的人的说法，眼睛和金字塔都是共济会的象征，眼睛俯视下面徽章的神情证明他们的权力仍然是不容挑战的。

果真如此吗？一直以来，共济会都使用三角形作为他们成员的象征，但这只是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三角板，这是创造该团体的石匠使用的工具；美国国徽中不仅有三角形，还有一个金字塔，之所以选择金字塔是因

为它代表了力量和稳定，这是一个新兴国家应该具备的重要品质。那只眼睛象征的是上帝的全能之眼，仅此而已，这只眼睛确实在一个三角形的内部，但几个世纪以来，三角形一直被基督教团体所喜闻乐见，它代表了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位一体。



美元上的国徽——这是不是共济会阴谋的证明？

历史证据对这个观点也是支持的。一八二一年，托马斯·史密斯·韦伯代表共济会这样写道，共济会直到一七九七年才开始采用眼睛或三角形作为他们的象征，而这是在美国国会批准使用国徽之后的十四年了。韦伯用早期的优美的维多利亚散文体解释了国徽中的各个元素：

> 尽管我们的思想、语言和行为能够躲避世人的眼睛，但是那个万能之眼，那个太阳、月亮和星星都服从的眼睛，在它的悉心照料下，连彗星都能完成它们奇特的旋转，这个万能之眼也能够渗透到人类心灵的最深处，它将根据我们的功绩进行奖赏。

一些怀疑论者相信他的观点，但大多数人都不认同。

两个世纪以来，共济会会员一直试图摆脱与美国国徽的联系，但是始终没有成功。他们也竭力证明一个事实是错误的，这事发生在大约 800 年前，因为对该团体展开的谩骂攻击，共济会决心代表圣殿骑士团的利益而实施报复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否认与光明会的任何联系，这是一支由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在现代传媒出现的两百年前，他们让一些受人欢迎的掌权者实施，共济会的一些秘密策略，以对全球的社会和政治进行控制。

十字军远征的骑士，受复仇驱使的后代，颠覆世俗传统的革新，全球霸主，令人眼花缭乱的名人，共济会运动幕后到底是什么？正如所有秘密团体一样，现实比我们亲眼看到的不是多点就是少点。

几个观点偏激的评论者宣称亚当是第一个共济会会员（同样一群人还认为德·莫里团体的残余势力早于哥伦布两百年就已经逃到了美国），共济会的起源就如同这个名字本身一样简单而直接。在十七世纪的英国，手工业者团体开始形成，目的是把本行业的专门技术知识隐藏起来，不被外人知晓，以防他们从中获利。手工业者互助会宣布，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在行业中确立质量标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限制入会的人数，来确保一些会员的较高收入，这样他们就可以提升会员的收入，但对此，他们却不大公开。

那个时候最有权力的手工艺者就是石匠，他们拥有建造结实而笔直墙壁的工具和技能。要想找到证明他们才能的证据并不难，在今天，英国有许多石头建筑还像四百年前建造的时候一样坚固。石匠的技术是根据三个层次分级的：学徒、工艺技工和资深石匠。每个层次的技术水平都把石匠提升到一个具有较高认可程度的位置，并确保他有资格得到更高的收入。保守秘密成为石匠之间至关重要的事情，他们在选择伙伴的时候非常谨慎，并让新入会者宣誓，对于他们经过了几个世纪而逐渐完善起来的技术要保持缄默。为了实行对会员的控制，并确保秘密不浮出水面，石匠们以社区为基础组成非常小的支部，每个小团体都选举自己的领导或团长。

一七一七年六月，这个最初的手工艺者组织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团体，四个伦敦支部的领导在苹果树客站集会，成立了共济会总支部。这个总支部的目标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当初的手工业者互助会了，它还涵盖了伪宗教的现状，反映已经确立了的新教价值。总支部的成员宣誓在基督教原则的框架内运作，阐释基督教教义，通过运用逻辑和科学分析拨开基督教神秘的面纱。这就标志着共济会已经作为一个全球力量建立起来了。

共济会的理念传播到了法国和欧洲的其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它也扩大了招募网络，网罗了范围更广大的成员。共济会成员不仅仅局限于手艺人，对于所有符合他们要求的人，他们都热情接纳。共济会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兄弟般友爱的组织，在那里，他们可以交流各自的观点，追求共同利益，并进行重要的商业和专业上的交流。保守秘密誓言的做法得以保

留，同时这个团体还增加了一个神秘的入会仪式。很快，企图把共济会同圣殿骑士团联系起来的历史阴谋就开始了。

与罗曼蒂克的殉教者的历史渊源会让一个组织和个人的地位提升不少，三百年前如此，如今也是一样。为了给这个以兄弟般友爱为基础的组织进一步增色，共济会成员开始声称自己是圣殿骑士团的后裔。一个建立在手工艺者实际利益基础上的组织，因为这种假定的联合，而演变成了一个由上层社会的商人和专家组成的兄弟团体。

他们与圣殿骑士团的纽带关系刚刚站住脚，许多热情洋溢的共济会会员就开始给他们的组织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像所有的秘密团体一样，共济会也由于时间的流逝而镀上了一层带有真实性的光泽。苏格兰共济会会员声称，在德·莫里被处死后不久，他最衷心的几个追随者就从法国逃出来，逃到了苏格兰。还有些人更是越说越没谱，他们坚持说德·莫里本人也逃脱一死，他也来到了苏格兰，在这里，他同罗伯特·布鲁斯于一三三二年进行了达普林之战，一三四六年进行了达拉谟之战[①]。

共济会的历史档案把圣殿骑士团与共济会的联系追溯到了一个演讲上，这是一七三七年一个叫做谢瓦利埃·拉姆齐的共济会成员在法兰西共济会总支部发表的演讲。拉姆齐宣称共济会可以追溯到十字军远征时期“与耶路撒冷圣约翰的骑士们的紧密联系”，以及那个“苏格兰的旧支部”仍然保留着英国人废弃的真正的共济会。从这个相当值得推敲的历史联系引发了苏格兰仪式[②]，或者如同共济会章程所确定的说法，叫做古苏格兰接纳新成员入会仪式。还有一个更有可能的解释，是说十八世纪中期，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石匠移民到法国的波尔多地区，在那里他们被称为埃格赛[③]。

埃格塞把石匠原始的三个等级扩展为七个等级，后来到了二十五个等级，最后发展为今天的三十三个等级。那些选择高于基本的三个等级继续向前的石匠就会进行苏格兰仪式。

---

① 根据德·莫里的领导才能和殉道精神，成立了德·莫里国际组织，这是年龄在13到21岁之间的年轻人的兄弟般的组织。在共济会顾问的指导下，从根本上讲，它为父母组织提供招聘服务。

② 共济会中的一种庆祝仪式。

③ 一种苏格兰花呢。

一七三三年，美国的殖民主义者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建立了一个共济会支部，美国第一个支部的成员飞速增长，到了独立革命时期，已经建立了一百多个支部。实际上，圣安德鲁共济会支部的成员有效地引发了一场革命，他们发动了波士顿倾茶事件，他们穿着印第安莫霍克族服饰，把英国茶叶倾倒在港口中，目的是抗击不公平的税收政策。与英国一样，美国的共济会成员代表的是社会上最具雄心大志，最有天分，也是最有权力的人，所以五十个签署《美国独立宣言》的人都宣称自己是共济会会员，这也不足为奇。有那么多卓越的反叛者的积极参与，认为共济会而不是其他任何单个团体煽动了这场革命，也是在理的。这些人包括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弗兰克林、约翰·亚当斯、帕特里克·亨利、约翰·汉考克、保罗·里维尔、约翰·保罗·琼斯、伊桑·艾伦、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及使同时代美国共济会会员懊恼的是，还有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美国独立后，美国共济会与英国切断了一切联系，于一七七七年创建了具有美国特色的共济会美国总支部。

美国的共济会加强了团体的力量，改进了入会程序，其影响力扩展到了支部大厅以外的地方，不仅仅局限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共济会成员。再加上对于仪式和隐秘性的强调，它们的发展和权威性导致人们对其真实动机的种种猜疑，共济会的政策和会员的做法从一开始就鼓动着人们的思索，这个组织所附加的隐秘性越强，人们就越认为这是权力阶层秘密参与活动的组织。共济会决定非但不去冲淡这种看法，反而竭尽所能地使其愈演愈烈。比如，苏格兰仪式共济会最高理事会的地址选在了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因为这座城市位于北纬三十三度，以此来表现共济会成员的三十三个等级。

对旁观者而言，这种有意识地营造一种不可思议性的做法或者很有趣，或者具有威慑性。在过去的许多年中，人们对共济会的真正目标给出了许许多多的奇异解释。下面给出的就是共济会一些相当令人震惊的做法和成就：

共济会与光明会结盟。像一个套着一个的俄罗斯玩偶一样，据说秘密团体都是存在于相互之中的，较大的团体藏匿着较小的团体，即由于旧时

联盟所致的更集中的划分。谋叛热衷者和反共济会者当中最为流行的主张是，共济会支部秘密窝藏光明会的成员。

这些危言耸听者的观点是，光明会成员是那些幕后操纵者的操纵者，他们躲藏在暗处的暗处。据说光明会就是共济会和其他团体的后台，这些团体包括郁山隐修会、卡巴拉教、蔷薇十字会，或者走上神学极端的锡安长老会。

光明会（“思想启蒙”）由亚当·维索兹在一七七六年创办，他是巴伐利亚耶稣会的学者，被人们描述为“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没有必要经验的不切实际的书虫”。光明会是一个秘密组织，只有当会员的意识和理解能力达到“神职人员”的程度以后，这个秘密团体的真正目标才能告知给他。那些设法通过了维索兹的选择和准备程序的人最终会认识到，它们只是政治和哲学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要受到理性的操纵，这是光明会创建者对“理智超越情感”的耶稣会训诫的极端延伸。有了光明会，人们就能够从偏见中解脱出来，变得成熟而有道德，从而超越教会和国家在宗教和政治上的局限。

然而，到达这个乌托邦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光明会成员必须认真观察与之有社会关系的每个人，搜集每个人身上的信息，并把经过密封的报告呈送给上司。通过这种方式，光明会就可以控制和掌握公众舆论；限制王子、总统和首相的权力；使那些颠覆者和反动者保持沉默，或者彻底消灭他们；同时令敌人闻风丧胆，内心充满恐惧。“在最黑暗的深渊的内部”，光明会的早期批评者之一这样写道：“一个秘密团体成立了，一个具有新生命的团体，尽管互相之间从未谋面，他们却彼此了解；尽管没有任何解释，他们却相互理解；他们为对方服务，却没有任何友情的成分。这个秘密团体采纳了耶稣会原则中的盲目服从，借用了共济会的审讯和仪式，照搬了圣殿骑士团的地下神秘和鲁莽勇猛。”毫无疑问，这是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

维索兹的早期策略之一是与共济会结盟，这个举动在开始阶段证明很成功。几年之内，“启蒙了的共济会”在欧洲的几个国家就相当活跃了。但由于他们始终没有泄漏真实目的的细节，公众对此是持反对意见的，直到一七八七年八月，巴伐利亚州宣布招募光明会成员就是犯罪，这样做的

结果使得这个团体更加坚定地转入到了地下，但同时也向维索兹阐明他的观点是严重错误的。维索兹先是背弃了自己的团体，然后又写了几篇向人类致歉的文章，才达到了与他的天主教的和解。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在哥达援助建立了一个新的大教堂。

在光明会有限的存续期内，一直都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就是它要对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发展负有责任。鉴于这个团体对理智而不是情感的强调，这个主张不免让人笑掉大牙。推翻法国国王纯粹是受到激情的驱动，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类似的事件。

光明会与共济会之间的微妙关系引发了一个传说，直到今天，一些谋叛热衷者还坚持这种说法。许多反共济会评论家继续坚持说，光明会的会长控制着共济会和其他秘密团体，致力于把维索兹最初的控制世界的计划付诸实践。然而，光明会一直以存在于其他秘密团体内部或中间的面目出现，所以，似乎谁也不能够把特定的具体行动归功于他们。而且，与其他任何在这里阐述的秘密团体不同，光明会内部没有一个成员违背了保守秘密的誓言，把其内部运作机理公之于众。如果你完全从逻辑的角度上考虑，你会怀疑光明会是不是一个虚幻的组织，既没有什么目标，也没有什么成员。如果你对秘密团体感到恐惧，你会相信他们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否决自己本身的存在。

共济会谋杀了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根据这个理论，华盛顿退出了共济会，并打算把这个组织更加受人谴责的行为公之于众。据说，共济会计划以他的名字矗立一座纪念碑，他对此非常愤怒，因为阴谋者把这个纪念碑设计成一个方尖石塔的形状，而总统却认为这个东西并非如此，他认为这是巴力[①]之神的生殖器。为了让这个国父保持沉默，在他死的那天，共济会医生给他放了四次血。共济会成员已经达成一致，总统大限的日子应该在一七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也就是十八世纪的最后一天。尽管华盛顿总统持反对意见，生殖器形状的华盛顿纪念碑还是矗立起来了，高度

---

① 古代迦南人信奉的司生育之神。

达到了五百五十五英尺，巧合的是，这与魔鬼宗教（或撒旦宗教）代表暗杀的代码相同。

显而易见，这个观点很有趣。放血是十八世纪一种广为接受的医疗手段；再说华盛顿死于一七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而不是十二月三十一日；关于华盛顿纪念碑的讨论至少到他逝世一个星期后才开始；而且也不存在足以令人信服的参考资料证明有魔鬼宗教这么一说，或者使用数字“5”作为死亡的象征，并用“555”作为暗杀的代码。



为了努力证明共济会对美国生活的控制，理论家在华盛顿特区的街道布局中找到了撒旦的图像。

华盛顿特区的街道绘有共济会和撒旦符号。与他大多数同事一样，一七九一年，建筑师皮埃尔·查尔斯·朗方被要求在华盛顿特区设计联邦政府旧址时，是一名共济会会员。多方面的证据表明，朗方遭到了来自华盛顿和杰弗逊的双重压力，要打造一系列魔鬼般神秘的符号代表共济会，来表明它对美国政治的永恒控制。华盛顿街道布局中的符号有邪恶的五角星形，经典的共济会金字塔形，还有魔鬼本身的描画，所有这些都揭示了共济会的邪恶意图，以及他们对美国的绝对权威。

这些断言的荒谬性应该是不证自明的。五角形不是独一无二的邪恶符号，在共济会资料文献中也没表明起到过什么作用，再说，它的存在怎么可能对美国事件产生任何影响，更不要说对全球的控制了。三角形（金字塔是三维图形，无法在街道布局上得以复制）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社区的街道布局中找到，复制的撒旦画像是幼儿园艺术课上喜闻乐见的内容，在成年人中并没什么。

共济会谋杀了那些扬言要泄漏秘密政策和议事日程的人。对于威廉·

摩根我们知之不多，但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是一个有很多缺点的人。一七七四年，他生在弗吉尼亚州的卡尔佩珀镇，后来与他年轻的妻子搬到加拿大，在那里他们开办了一家酿酒厂。一场神秘的大火烧毁了这家工厂，摩根不得不搬回美国，定居纽约北部，经过几次失利后，他试图加入共济会。纽约巴达维亚的一个新建的共济会分会拒绝了他入会的请求，并指控他是一个骗子，当然理由非常充分了，于是他采取了报复行动，写作并出版了一本抨击共济会的书。这引发了一长串的事件，印刷此书的印刷厂神秘着火，三名共济会成员指控犯有纵火罪，涉及摩根威胁共济会的一系列被捕事件，以及他和这个组织之间不断的斗争。

摩根于一八二六年突然消失不见，很明显，此次事件让大多数当地市民大快人心，他们的生活终于可以恢复正常了。一个月以后，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在安大略湖上飘浮，被人们发现，许多市民都声称这是摩根的尸体。他的妻子开始否认是她丈夫，后来又承认说是，但最后又加以否认，然后就逃到了纽约，成了约瑟夫·史密斯数个妻子中的一个，这个人是摩门教会的创立者。后来，有证人报告说看到摩根在波士顿、魁北克城和其他地点出现过，只是换了一个新的身份和新的妻子。

不管这个飘浮的尸体属于谁，这个事件本身足以促成这样一种断言，就是摩根已经准备好要揭示共济会活动最隐讳、最黑暗的秘密，这是在他的书中没有提及的。没有什么比不解之谜更能刺激公众的想象力了，尤其是一个无法找到谜底的谜团。威廉·摩根的神秘故事足够持久，以至于两百年来，一直支持着共济会具有谋杀性的观点。

共济会仪式像魔鬼般邪恶并具有颠覆性。许多人认为兄弟般友爱并不是共济会的目标，对于他们来说，一个更加准确的共济会仪式的描述也许是愚蠢而幼稚的。

共济会通过一到三十三级来注明他们的地位，作为共济会成员，第三十三级代表个人成就的顶峰。第一级也就是成员授予级别，其经过是这样的：首先初入会者要穿着一种特别样式的衣服，然后被蒙住双眼，带到一扇锁着的门前，他敲敲门，进入到门里，象征着他与外部世界的隔离，进

入到共济会的内部密室。在就遵循共济会原则的能力问题做出回答，并保证永远不把这个组织的秘密泄露出去之后，初入会者要经历指南针尖压向胸口的过程，然后有人问："你渴望什么?"接着是仪式般的回答"更多的光明"，然后眼罩被拿开，入会申请者才能第一次看到他的会员朋友们，这也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

圣地兄弟会会员[①]把这种愚蠢的行为发挥到了极致，它是共济会内部的一个组织，起源于十九世纪末期。圣地兄弟会会员就是想要玩得开心，他们通过代表儿童医院的利益完成一些慈善工作来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一些表面上的修正。最近，他们的形象已经大打折扣，有消息透露他们所接受的 80 亿美元的捐赠中，真正用于慈善活动的只有不到四分之一。

共济会善于蒙骗公众。这里，"蒙骗"的意思是"蒙住双眼"，至少有一次这个指控是成立的，尽管现实本身可能并非如此。

入会仪式就包括在质问的过程中蒙住申请入会者的双眼，最初还包括在头上放置一块头巾。"wink"这个词的古老用法是指"眼睛"，与入会过程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初入会者据说是被蒙上双眼的（hoodwinked）。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词逐渐发展为欺骗的意思。

共济会的早期成功刺激了一些批评家，他们害怕那么多占据高级政治舞台的共济会成员会联合成一股巨大的力量。而且效仿共济会的也大有人在，比如秘密共济会会员，他们改写了共济会的秘密仪式，同时忽略其伪历史和神秘的渊源。

在那些吵吵闹闹的共济会批评者中间，罗马天主教无疑是叫嚣得最欢的，从最开始，批评家们就在共济会和天主教之间投放了不同程度的敌对情绪和怀疑。早在一七三八年，克莱门特十二世就谴责过共济会，他说："我们要求忠实的信徒们弃绝与那些团体的交往……开除教籍，将是对那些违反这个命令的人的惩罚。"显然，教会不仅仅是有些恼怒，而是相当

---

① 美国秘密兄弟会的一个成员，非共济会，只吸收圣骑士团团员和第三十二级的共济会会员为其成员。

愤慨，或许还感觉到了某种威胁。

几年以后，克莱门特的继任者本尼迪克特十四世继位，他提出了共济会给天主教造成的六个威胁：（一）共济会成员的不同信条主义（或者不同宗教信仰）；（二）他们保守秘密；（三）他们的誓言；（四）他们对教会和国家的反对态度；（五）好几个国家的元首都宣布禁止这个团体的传播；（六）他们的邪恶行为。

天主教和共济会之间不仅仅是学术或神学观点上的差异，三百年以来，天主教会事实上是把共济会与惊跑中的魔鬼撒旦相提并论。十九世纪末期，利奥十三世把共济会支部描述为“那些密谋团体挖掘的痛苦的无底深渊（原文如此），这里有异端邪说和不同教派，可以这样说，就像在一个厕所里，他们把胃内所容的悖理逆天和亵渎上帝的污浊全部呕吐出来。”很明显，利奥对基督教仁慈的看法还是有它的限度的。

十八世纪的语言刻薄并没有因为二十世纪的启蒙思想有所冲淡，也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天主教仇视上。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娄恩·威廉姆斯谴责共济会与基督教水火不相容，就是由于其隐秘性，以及“可能来自撒旦激励的”信仰。美国南部浸信会早些时候所作的陈述中，指控共济会基于神秘性举行异教仪式，带领一千六百万强有力的大会成员把共济会定位为“亵渎神圣”。

宗教领袖不是唯一态度明朗地谴责共济会的人，从世俗的观点来看，共济会对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的指控也难辞其咎。在边远角落，这个团体仍然坚持把白人支部和黑人支部分离开，以至于许多白人组织不仅仅抵制宗教融合，而且拒绝对黑人教友的完全认同。他们很随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黑人共济会成员一直都存在，包括艾灵顿公爵，纳特·金·科尔，美国最高法院检察官瑟古德·马歇尔，作家艾里克斯·哈利，以及值得尊敬的政治牛虻杰西·杰克逊。

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成员，对于任何吸收妇女加入共济会的建议都持抵制的观点，就像美国最高法院在一九八七年给扶轮社下达的命令，“共济会是一个兄弟团体”，得克萨斯共济会值得尊敬的会长道格拉斯·柯林斯吐着唾沫星，口若悬河地说：“‘弟兄’指的是男性。事实就是如此。在美

国，任何表演那个绝技（吸收妇女入会）的主流总支部都将遭到其他会员的驱逐，与之脱离兄弟般的友爱关系。他们将要成为被流放的总支部。”

也许在一株快速枯萎的葡萄藤上，一切都将最终消亡。在北美，所有专门招收男人的士兵俱乐部都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达到顶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进入了一个长期的滑坡过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共济会成员估计有四百万人，而到了二〇〇〇年，人数已经锐减到一百八十万，这是由于社会团体已经与各个支部相脱离，转而追求其他的组织识别的方式，比如职业球队和音乐组合。在数量上，尤其在影响力上，共济会会员一直是这个团体的阴影中的人，他们的影响力贯穿了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的大部分。

尽管共济会人数逐渐减少，形象也大打折扣，但一些人仍然认为它对世界，尤其对美国，是一股威胁的力量，对于许多人来说，当让他们给“秘密团体”下定义的时候，第一个浮在他们脑海的还是共济会。然而，一个团体的各种集会地都众所周知，其比较有声望的成员也全部公开，该团体还能具有怎样的私密性？当一个秘密团体吹嘘说，在其历史上地位最高的成员——伟大的艾灵顿公爵，是一个最不可能做任何比钢琴独奏曲还具有颠覆性的人，那么，该团体意图能够具有多大的致命性？

共济会与圣殿骑士团和光明会的微妙联系，再加上数量众多的成员都在政治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进一步激发了那些人的狂妄武断，他们倾向于认为只要是试图隐瞒的事情，就一定具有邪恶的属性。然而，这仅仅是极端的假设。几乎没有人能够指出圣地兄弟会会员的邪恶行为或意图，对于一些人来说，情绪激昂的共济会成员古里古怪的行为可能令人讨厌，但是他们的慈善活动绝不仅仅是其成员所提及的那么包罗万象。

主流媒体几乎很少提到共济会的消极方面，或者声称它是全球力量的源泉。事实上，对于共济会的新闻报道只有在对一些震惊事件做出反应的时候才会出现，例如，二〇〇四年三月，发生在长岛地下室共济会支部的事件，那天晚上，四十七岁的威廉·詹姆斯与大约十二名共济会会员在地下室集会，吸收他进入这个组织。詹姆斯知道这个过程的设计几乎令他感到恐惧，同时也会建立支部会员兄弟的信心，于是那天晚上到达那里的时

候，詹姆斯充满了兴奋和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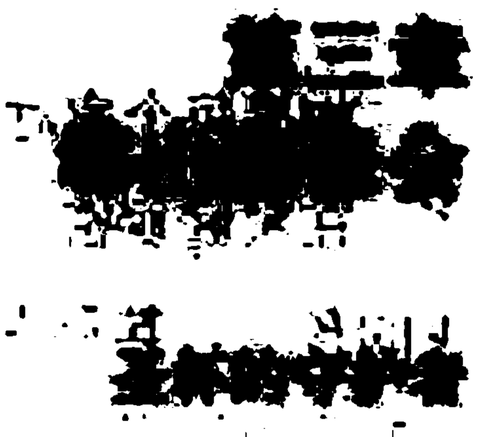
经过了蒙眼、敲门、回答“更多的光明!”之后，詹姆斯被要求把鼻子放到一个仿制的断头台旁边，当然断头台不会给他的鼻子带来任何伤害，然后他又被命令在零星地摆放在各处的老鼠夹子上小心翼翼地走路，最后是在一个厚木板上面走。

一切都是有惊无险，直到这个仪式最具戏剧性的一部分出现，也就是詹姆斯被安置在一个架子前面，上面摆着两个空的马口铁罐头，接到信号后，一个共济会弟兄就要朝着詹姆斯的方向开枪，于是两个罐头从架子上滚落下来，这样做是为了让詹姆斯确信枪里面确实有子弹。

开枪的人应该是七十七岁的阿尔伯特·伊德，他来到了仪式举行的地方，一个衣兜里装着一支点二十二口径的左轮手枪，另一个衣兜装着一支点三十二口径的左轮手枪。小口径的枪膛里面没有子弹，而点三十二口径的枪里装的是真子弹。看到一个兄弟发出信号后，伊德把手伸进衣兜，拿出了一支手枪，但他没有瞄准空罐头，而是直接对准了威廉·詹姆斯，然后扣动了扳机。他选择的不是那支没有上子弹的枪——子弹射中詹姆斯的头部，他当场死亡。

共济会领袖快速作出反应，竭力与这场悲剧保持距离，他们说这个人会程序与真正的共济会传统或仪式没有任何关系，使得反共济会者一时间无话可说。这次悲剧事件过后，谁还能郑重其事地把共济会当作一个有危险的团体？后来又出现了一些修正论者。一年的时间里，互联网上和其他地方到处充斥着这样的故事，说什么詹姆斯的死亡根本就不是什么意外。伊德是执行命令才除掉了詹姆斯的，因为这个即将成为共济会会员的人，先是密谋潜入共济会，然后打算揭示其真正的秘密活动。伊德是詹姆斯最老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是最不可能被任命执行暗杀任务的人选。理论家们对这个事实置之不理，他们却指出了法院对待伊德态度上的温和，他们认为詹姆斯的死亡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悲剧，宣布伊德获刑 5 年，缓期执行。他们说，这就是证据，证明共济会把媒体和司法系统双双控制起来。

一个新的传奇产生了。如果共济会还能继续存在几个世纪，威廉·詹姆斯就有可能会同威廉·摩根联系起来，成为共济会和他们的秘密团体的阴谋诡计的另一个悲剧性牺牲品。



如果每个家庭都有秘密，那么有些秘密就比其他秘密更加普遍。当然了，在家庭秘密中，最为我们熟悉的是秘密婚姻（或者根本没有婚约）产生的孩子，其存在永远不会得到承认。这就是郇山隐修会[①]的基础，隐修会的会员众多，其追随者都是极端的狂热者，根据研究人员的严谨考证，其历史或者非常平庸，或者极其古怪。

需要提起注意的是，这个故事非常吸引人——这是可以理解的。谁能够不对这样一个故事产生浓厚的兴趣呢，因为它涉及到虚假死亡、变形娼妓，以及可以通过卓越杰出和天才秉赋的个体追溯到一个血脉相承的线索，他们是列奥纳多·达·芬奇、艾萨克·牛顿爵士、克罗德·德彪西、儒勒·凡尔纳、维克多·雨果。辗转于圣殿骑士团、纳粹党和一笔暗藏的巨大财富之中，并且保证说能够追回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遗物（圣杯），因而这个史诗一般的故事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比好莱坞编剧的故事更加引人入胜。基于这个原因，郇山隐修会吹嘘自己拥有成千上万的皈依者，这些人都能够给出其存在的证据，并争辩说，两千年以来，该团体一直对世界重大事件施加着影响。

尽管许多著名人士的名字都与郇山隐修会有联系，但事实却表明，真正的故事是围绕着三个主要人物展开的：一个贫穷的教区牧师，需要对他积累的个人财富作出解释；一个反对闪米特的法国人，他在寻求一种方式来完成其关于战争的梦想；以及一个充满魅力的中世纪公主。这里不必提及耶稣基督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了。

这个故事的基本部分比莫扎特的作品还要富于变化，它是这样的：

---

①也叫锡安会。

尽管在基督徒中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玛利亚·抹大拉不是耶路撒冷的娼妓，而是耶稣的中产阶级犹太妻子，按照现今习惯的描述法，两个人的结合既没有宣布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基于这个渊源，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件就是伪造的，事实是他和妻子逃到耶路撒冷躲避死亡，或者玛利亚·抹大拉在耶稣基督死后孤身从巴勒斯坦逃走。无论是哪种方式，她到达了法国的地中海沿岸，使人联想到她是坐船到那里的，当时她怀孕了。后来，她孕育出一个健康的婴儿，他的出生可以追溯到二〇〇〇年前，而且他对世界发展的影响，达到了一种巨大的程度，即使这种影响一直都不被普通大众所知[①]。

玛利亚·抹大拉居然通过基督耶稣生下了上帝的后代，很难想象有哪一个故事比这个更能把基督教的每个教义都批驳得体无完肤了。这个假设本身就引发了对于历史事件的几十种解释，包括那些换一种方式也无法“解释”得清的解释。举例来说，圣殿骑士团的创建和最初的成功，一些人就追溯到了基督耶稣后代的法国血统。这个理论的倡导者指出，法国是圣殿骑士团力量的公认来源，而且它的毁灭也是由一个法国君主组织发动的，这个人也许了解了他们血统遗产的真相。这个刚刚上任的教皇知道，如果事实真相被揭穿，那一定会给教会带来危险，法国国王懂得与这样的教皇合作意味着什么，于是他越来越坚定信念，一定要彻底消灭圣殿骑士团。当然了，他这样做不是因为害怕圣殿骑士团的力量，也不是对财富垂涎三尺，而是完全基于净化基督教的需要。

事实上，在“秘密卷宗”上可以找到冗长的基督耶稣后代的名单，这些卷宗写在古代羊皮纸上，现在就陈列在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卷宗上面的很多名字都模糊不清，很难辨认，学者认为有些名字与神秘事件有联系，尤其是中世纪时期。还有些名字被认为是历史上的头等名人：罗伯特·波义耳、艾萨克·牛顿、维克多·雨果、克罗德·德彪西、简·哥克顿，当然还有列奥纳多·达·芬奇。

为什么保留这么多著名人士的记录，并把这个秘密保守了二十个世

---

① 根据那些支持隐修会存在的人的观点，“圣杯”不是指《最后的晚餐》上所使用的圣餐杯或其他器皿，而是指从基督耶稣一直到其后代的血统线索。

纪，直到两千年行将结束的时候才公之于世？也许是为了重建玛利亚·抹大拉创立的王朝，这个王室血脉不仅延伸到法国的王位，而且还拓展到其他欧洲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由共同血脉相联系的国际阴谋集团，并致力于控制世界大事。这个家族血脉，也就是广为人知的梅罗文加王朝，从公元四七五年开始控制法国，在罗马帝国崩溃的时候弥合了权力上的空缺，从那以后，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就一直没有间断过。

“梅罗文加王朝”这个词来自于梅罗温，希尔德里克一世的父亲，他是高卢第一个非罗马人统治者，高卢就是现在的法国。据传奇故事的记载，梅罗温能够追溯自己的祖先，从亚利马太的约瑟到基督耶稣。或者也许并非如此。修道院的记录是这样记载梅罗温的，而历史学家普利斯库斯则声称，他是一种神秘的海底生物繁衍的后代，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解释了他神秘知识和技能的出处。他与海底生物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如下证据中略见一斑：（一）玛利亚·抹大拉是从一个船只上下来步行到法国海岸的，在那里她生下了基督耶稣的儿子；（二）一直有这样的努力，试图把同一个事实与神话混为一谈，从而让事实真相更加扑朔迷离；（三）反向努力也存在，证明梅罗温的祖先与基督耶稣的关系，因为鱼就是基督教的象征[①]；（四）梅罗文加王朝是外星人的后裔，他们与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一起，创造了一个真正的超级种族。

这个传说故事一直都莫衷一是，直到六七一年，梅罗文加王朝的王子达戈伯特二世迎娶了吉塞尔·德·雷塞斯，她是雷塞斯伯爵的女儿，西哥特人最高国王的侄女，因而这次联姻统一了两支巨大的力量，为了控制法国双方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达戈伯特看上去是那个时代博学多才的人。他在爱尔兰修道院接受教育，与约克郡的玛蒂尔德结婚，她是个塞尔特公主。两人结婚后，就定居在英国，在那里，他与约克郡的主教威尔弗雷德成为了好朋友。玛蒂尔德死后，主教指引他与吉塞尔完婚。根据对吉赛尔的记载，她具有令人陶醉的美貌，对艺术非常精通，所受的教育也完全超越了其同代的妇女，从这

---

① 或者如果你喜欢。

个角度来看，这个婚姻可以说是天赐的美满姻缘，或者至少在朗格多克如此，这是位于马赛和西班牙边境之间的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地区。在雷德城附近，一个献给玛利亚·抹大拉的旧式西哥特小教堂里，他们举行了婚礼。

多亏占据了几个地理上的优势，雷德的人口可以达到三万多人。这座城市周围有几条路一直延伸到周围的山谷，雷德城就位于道路的交叉口，附近有几条清澈的泉水流过，其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这是一个庆祝两个强大家庭联姻的天然地段。

最开始的时候，事情进展得还算顺利，尤其是对于黑暗时代的[1]勇士而言，更是如此。达戈伯特设法从三兄弟那里攫取了现在的法国，三兄弟在父亲死后就一直统治着这个地方。吉塞尔更是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继承人，在那个时代这可是很大的贡献。同时，达戈伯特开始巩固自己的政权，这震怒了教会和他的老朋友威尔弗雷德。与同时代的大多数统治者一样，达戈伯特给自己树敌太多，以至于他在一次狩猎途中遭到伏击，手下的臣民中几乎没有谁流露出惊讶的神情。仅仅是出于运气、直觉或者神的干预，吉塞尔和他们的儿子西吉斯贝特在一小群忠诚骑士的保护下，逃脱了死亡的厄运。从那以后，西吉斯贝特和他的后代就隐瞒了真正的身世，这个秘密对外人对自己人都不公开，这样其成员就能够认为祖先是神圣的，并利用这一点来取得某种更大的辉煌。

不久以后，雷德城就丧失了其中心地位，逐渐走向衰败。在与西班牙的一次战役中，该城市遭到了毁灭。在大瘟疫时期，这个城市的居民受尽了苦难。加泰隆尼亚土匪的抢劫掠杀迫使剩余的居民弃城而逃。大多数人都逃向了内陆，有几个勇敢的居民留了下来，重建了属于自己的小村子——雷恩城堡。

同时，耶路撒冷成立了一个修道院团体，叫锡安圣母，这个组织后来把总部迁到了巴勒斯坦的圣伦纳德—达卡，最后又迁回西西里岛。这个组织在那里运作了一段时间，在一六一七年被耶稣会[2]吞并，通过正统的教会记录，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证实这段历史。就我们所了解到的史实，似

---

① 欧洲史上约为公元四七六至一〇〇〇年，也叫欧洲中世纪早期。

② 天主教修会之一。

乎可以证明这个锡安隐修会与那个时代的几十个类似团体没有什么差别，作为冥想和拯救的中心，它与周边的社区相互作用与影响，行使着基本的职能，成为封建社会或者中世纪的社会中心、灵感隐退地和文化发源地。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该团体涌动着叛乱者，或者窝藏着企图密谋报复教会的圣殿骑士团，或者作为后来的梅罗文加王朝的宗谱来源。它在历史上的唯一角色就是为一个团体提供了一个名字，一个存在了两千年并威胁和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团体的名字。

这个故事接下来就进入了一八八五年，这时，一个叫做弗朗索瓦·贝伦杰·索尼埃的天主教牧师被派到了雷恩城堡周围的一个教区。达戈伯特和吉塞尔的婚姻把西哥特王国和梅罗文加王朝两大家族的血脉统一起来，距此，这件事情已经过了一千多年。具有战略地位的老城雷德，也曾经是两人结婚的场地，现在却变成了仅有二百户人口的穷乡僻壤。

索尼埃[①]是个非常有趣的历史人物，因为他卷入了我们时代最具有传奇色彩的秘密团体，这可能更增加了人们对他的兴趣。受过良好的教育，长相英俊，雄心勃勃的索尼埃到了这个新岗位后，如果不是完全崩溃，至少也是相当失望。雷恩城堡位于比利牛斯山脉的背阴坡，距离卡尔卡松大约四十公里，对于一个壮志凌云的牧师来说，这个地方就像月球上一样冷冷清清。索尼埃当年只有三十三岁，他可能认为这个任职如果不是梦想的末路，也是仕途的末日了。



弗朗索瓦·贝伦杰·索尼埃。是圣杯保护者还是教会骗子？

雪上加霜的是，索尼埃继任的不是一个教区教堂，而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废墟。教堂的大部分屋顶都不翼而飞，大雨倾盆而下直接倾泻到祭坛上。窗户不是着色玻璃的，而是用粗糙的木板挡着，牧师住处更是惨不忍睹，当时还没派女

① 读过《达芬奇密码》的读者稍加留心，就会发现这本书中也使用了这个名字，书中他是一个神秘的人，在开始部分，他的死亡促成了小说情节的发展。

管家过来，他每个月七十五法郎的薪水连买面包都不够。本来索尼埃所任职的教堂的衰败就已经够让人惊讶了，而他居然做出了留下来的决定，这不免更令人费解。

至少他做出这个决定的部分原因在于受到了肉体的激励而不是牧师的职责。虽然牧师准许招募妇女作为管家，但教会建议两者的年龄必须相差三十岁或者更多，也就是说索尼埃寄宿管家的年龄应该是六十多岁。但是索尼埃把年龄的指针向相反的方向调了一下，很快，十六岁的玛丽·德纳尔诺就来到这里与他一起分享这个破败的住所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个人分享的就不仅仅限于这个建筑了，还包括里面的一张床，对于这种状况，教区居民和索尼埃的上级，那个仁慈而和蔼的卡尔卡松主教，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玛丽·德纳尔诺对这个牧师的倾心更多的不是出自于他的英俊，而是别的原因。也许是索尼埃富有激情的天性，这在他就任几个月之内就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在一八八五年十月的一次国家选举中，索尼埃神父成为当时执政的共和党的狂热反对者，他大声疾呼甚至命令他的教区居民投反对票。他带有责骂性的说教对选举结果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共和党还是赢了。当共和党人得知索尼埃激进的说教的事情时，他们立刻开始寻机报复，而且很快就找到了机会。作为对他政治轻率行为的惩罚，索尼埃微薄的工资被停发了。他向卡尔卡松主教恳求，这个宽容了牧师与年轻女管家之间不被允许的暧昧关系的主教，再一次大发慈悲之心，把索尼埃派到了附近纳巴达的一所小神学院作了教师，这个情绪激昂的牧师在这里焦急地度过了六个月，直到撤销了工资暂停的命令。

如果教会领袖认为他们已经粗暴地镇压了索尼埃，那他们就错了。事实上，索尼埃回到了那个村子和就要倒塌的建筑里，这次是在一个富有的支持者的帮助下，他计划要改善他的教区和自己的命运。

也许是出于对他政治立场的羡慕——这刚好与她自己的观点相吻合，这个颇具影响力的侯爵夫人在索尼埃刚回到教区时，就给他捐赠了三千法郎。这是个不小的数目，因为据说索尼埃已经从别处获得了大约两千八百法郎用于修复教堂。值得称道的是，他看上去似乎把侯爵夫人的捐赠全部

贡献出来，用于教堂的重建和修缮。

在整修过程中，索尼埃对有关他的教会可能具有历史意义的传说逐渐产生了兴趣。有几个消息来源表明，教会的故事在当地市民中已经广为流传，还有些消息称，直到修缮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对教会的历史意义发生兴趣。结果证明，这两种解释中，任何一种解释都没有什么意义。

索尼埃的教堂，是献给玛利亚·抹大拉的，就建在达戈伯特二世和吉塞尔·德·雷塞斯的结婚旧址上，索尼埃在帮忙重建的过程中，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建筑物的原址上，有一块做祭坛用的厚重的石头，由四根柱子在下面支撑着。索尼埃亲自把厚石板挪开，却发现其中的一个柱子中间是空的。从柱子内部，他小心翼翼地取出了四张古代羊皮纸，他把这些东西藏起来，没有让周围干活的人看到一点蛛丝马迹。两张羊皮纸上写的是家谱，另外两张是用一种神秘的密码写的，这让巴黎的密码破译专家花了不少时间才弄明白。破解出密码后，着实令他们大吃一惊，用现代的文字说，是这样的：这些财宝属于国王达戈伯特二世和锡安山，他死于这里。

财宝？什么财宝？当第二块石板被发掘出来的时候，答案才渐渐露出了端倪。这背后一定有什么隐藏的秘密，只有索尼埃神父才知道的秘密。只扫了一眼，他就知道他曾经梦想着被委派到波尔多或者巴黎，甚至是罗马可能得到的利益，与埋在眼前的财富比较起来，真的是小巫见大巫。很快，索尼埃和两个最信任的帮手就像金花鼠一样忙开了，他们在教堂周围的各个角落进行发掘，一直到村子的外围。

开始修建旧教堂的时候，为了资金问题，索尼埃神父可能还求爷爷告奶奶的，但从那时以后，索尼埃教堂的建筑活动就变得紧锣密鼓，如火如荼了，其规模是如此豪华，以至于引起了巴黎上上下下的修道院主教的艳羡。小教堂经过了重建，现在已经变得富丽堂皇，到处装饰着油画和雕刻，这些都是索尼埃专程去巴黎购买的。有些是传统的绘画，比如《阿卡狄亚的牧羊人》，画的是一个与雷恩城堡相似的阴森森的场景，一群人聚拢在一个石棺旁。其他装饰无论在风格和意义上都显得模糊不清，包括教堂入口处的一个塑像，上面用拉丁语雕刻着：这是个可怕的地方。



玛丽·德纳尔诺，神秘的索尼埃神父的女管家兼情人。她掌握了多少秘密？

牧师积累起来的财富可不仅仅用于购买这些人工制品，他还在教堂附近购置了好几英亩的土地，建造了抹大拉塔，这是为了向抹大拉表示敬意；他还建造了一个里面有众多房间的大房子，命名为波萨尼亚别墅；是为他和玛丽建的。财务支出可以说是巨大的——建塔耗费了四万法郎，别墅用了九万法郎，修建周围的花园又用了二万法郎，全部算下来，索尼埃的花费估计达到了二十万法郎，支出这些巨资的人在几年前还只能靠每个月领取七十五法郎的微薄薪水生活。从现在看来，一九〇〇年的二十万法郎大约等于七百万法郎，或者一百二十五万美元[①]。

索尼埃也许被指派到了法国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乡僻壤，但是他的生活就连梵蒂冈红衣主教和东方郡主加到一起都没法比，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物质上的、精神上的、文化上的和肉体上的，都一一得到了满足，显然这一切都多亏了那用之不竭的资金来源。他给鸭子喂食一种特殊的饼干，目的是烤制的时候能够产生一种比较柔和的口味；他吹嘘自己的酒窖里面的酒应有尽有，而且每个月都会从牙买加购进七十升的朗姆酒。一八九一年六月，索尼埃在村子里举办了一次游行活动，目的是为了展示他刚刚得到的一个卢尔德圣女的塑像，他把这个塑像安置在一个祭坛上，这个祭坛就在一个新建的精美的教堂花园里。第二年，他又增建了一个新的忏悔室和布道坛，并且神秘莫测地设计了一个耶稣受难像，放在一个古怪的圆形图案里，据说这个图案代表了一个密码信息。圣水钵很快就以拥有精心制作的守护魔鬼著称了，包括玛利亚·抹大拉的塑像，还有其他众多的雕像，很快把这个小教堂的品位和文化层次提升到了一个高度，远远超出这个平庸无奇的地区居民的想象。

---

①对索尼埃花费总价值的其他估计达到了二亿五千万法郎(五千多万美元)，这个数字简直太不切实际了，这向我们的信任极限提出挑战。



除了对行将坍塌的教堂进行了精心的修缮，雷恩城堡很快就以拥有一个壮观的献给玛利亚·抹大拉的塔而著称了。

雄心勃勃的牧师不仅仅停留在刻意装饰他热爱的教堂上。村民对于他的另一个计划也欢欣鼓舞，就是在镇广场的人造洞窟里建造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塑像，和真人一样大小。玛丽·德纳尔诺也一样地兴高采烈，她穿着最新款式的巴黎时装，在市场上踱着方步，有时手里拿着一个女式坤包，里面装着索尼埃刚刚以她的名义购买的财产的契约证书。

当地居民对于索尼埃巨额财富的来源多少有些好奇，但也不是特别地刨根问底，毕竟，他为当地的手艺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并为该地区的荣誉增添了光彩，而这点正是这里所迫切需要的。再说，一个在道理上解释得通的故事，同时也多少满足了他们难以遏制的好奇心，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多大的兴趣一定要知道个究竟。下面就是当地居民所相信的：

在挖掘过程中，索尼埃发现了某种比金银珠宝更有价值的东西，达戈伯特的财宝，以及被埋葬在这里的尸体（“……他死在这里”），不属于早已故去的梅罗文加国王本人，而是基督耶稣，祭坛下的柱子里面藏着的写有密码的羊皮纸上准确地标记出了尸体埋葬的具体位置。

想象一下这个发现的重要性。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法国小村庄居然埋葬着耶稣的尸体，这将会摧毁基督教的每种教义，击碎基督教信仰的所有基础，并彻底推翻梵蒂冈的每个机构。或者耶稣根本没有死在十字架上，或者三天之后他的灵魂根本没有从身体里出来，升到天空。基督教的每个神学原则都将经过重新思考、重新改写，或者彻底地摒弃，随之而来的还有两千年的虔诚和牺牲。

索尼埃打算怎么办？也许一个虔诚的教徒会永远地保守秘密，死死固守着他赖以生存的信仰，不去击碎数百万人的精神支柱；而一个唯理论者会把这个发现公之于众，向旧的意识形态提出挑战，并伸出援助之手用一

种新的理念取代旧的理念。

索尼埃既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也不是唯理论者，他是一个实利主义者。他把他的发现悄悄地泄漏给一个精心挑选出来的教会领袖组成的小组，然后他向他们保证一定会保守这个秘密，但交换条件是一笔数目可观的定期津贴，教会一边谋划着下一步的策略，一边应承了下来。实际上，基督教受到了一个与年轻的女管家兼情人公开同居的无名法国牧师的敲诈。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满足他的需求几年后，教会的最终反应首先可能是解除索尼埃的职务，然后痛打落水狗，就此结束这一切。事情也确实是这样的，但这一切都是在好几个神秘事件发生之后，这些事件足以令小城镇的饶舌者奔走相告，让那些谋叛爱好者们垂涎三尺。

整个过程是以当地的两个教会官员神秘死亡而戏剧性开始的。一八九七年万圣节前夕，一个隐居在附近古斯土萨村的牧师阿贝·杰里斯被人在自家厨房里残忍谋杀，使用的凶器是火钳子和斧头，牧师的尸体被凶手摆放在地板上，双手虔诚地安放在胸部。尽管他的住所遭到了仔细搜索，但是很明显，抢劫财物并不是主要的犯罪动机，因为在旁边一个伸手可及的抽屉里整齐地放着八百法郎，没人动过。到最后，也一直没有找到凶手。

五年之后，性情随和的卡尔卡松地区的大主教彼拉德也被谋杀。彼拉德不仅没能对索尼埃的巨额财物和奢华的生活方式提出质询，而且似乎还在有意地怂恿和纵容，他遭到了与阿贝一样残酷的命运。杀害他的凶手也一直逍遥法外。

彼拉德的继任者阿贝·德·波塞卢可不像彼拉德那样，对索尼埃采取宽容的态度，尤其是当详细地翻查了牧师的背景之后。这个新主教指控索尼埃犯有非特定的残暴行为罪，要求索尼埃对所作所为给出解释，同时查清这个牧师收入和支出的全部账目。开始索尼埃对此不屑一顾，后来他试图用虚假和不完整的账目记录哄骗他的上司。

到一九〇九年，大主教终于忍无可忍了，他命令索尼埃马上离开他在雷恩城堡的职位，索尼埃拒绝离开，他则当即解除了他的神职。八年以来，这个被革职的牧师仍然待在村子里，由他忠诚的玛丽·德纳尔诺照料生活起居，当他在一九一七年去世的时候，按照遗嘱，他把在世间所有的

财产都留给了她。索尼埃的遗产里包括几本书，屈指可数的几个没有什么价值的小装饰品，但玛丽却可以享受一种相当舒适的生活，因为索尼埃把波萨尼亚别墅转移到了她的名下。她又生活了三十年，靠出租别墅里的房间为生，最后，她把心爱的牧师留给她的这些财产的所有权转让给了当地的一个商人，交换条件是一生的养老金。这份收入使她的余生在平静和安逸中度过，直到一九五三年一月，她与世长辞。购买了这份房产并给她提供年金的人名叫诺埃尔·柯布，是当地的一个企业家。记住这个名字。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间，也就是玛丽·德纳尔诺过着平静的生活的时期，她凭借着美好的回忆，以及她所保守的秘密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这时，法国历史上出现了两个相互竞争的政治派系，一派是保皇党，他们倡导回归君主主义制度的政府，享受来自天主教会的公开支持；其反对方共和党则拥护民主选举政府的制度。共和党运动中的许多领袖都是共济会成员，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他们就开始在法国的政治舞台占据主导位置。

两个派系之间的冲突相对和缓，直到法国遭遇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的巨大动乱，使得希特勒在相邻的德国崛起。法国的极右派团体在姿态上具有纳粹党的很多特点，因而变得越来越具有种族歧视性。再加上反犹太人的浪潮正在席卷欧洲，法国的右翼极端分子把共济会增加到了可能成为叛国者和颠覆者的清单上。由于欧洲的叛乱，以及经济大萧条所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替罪羊遍地都是，无论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共同敌人，力量就会自然而然地联合起来。极端的拥护君主制度者把力量联合起来，自诩为一支具有骑士精神的团体，来完成修复一个迷失的国家的任务，这个国家正受到犹太人和共济



到一九〇〇年，这张明信片所展现的雷恩城堡和波萨尼亚别墅已经开始取得名誉和声望了。

会成员的控制。犹太人莱昂·勃鲁姆作为社会党人第一次被选举为首相，这就促使君主制度拥护者和极端右翼力量的联合，为维希政权和二战期间法国与纳粹党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在这股政治动荡的漩涡里应运而生的君主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团体就是阿尔法—伽拉特团体（也叫至尊高卢人）。这个组织一直没怎么激起人们的兴趣，并且也没什么影响力，直到其成员，一个叫皮埃尔·普朗达的十几岁的年轻人当选为有名无实的头领，事情才发生了变化。不知道是因为他的早熟，还是良好的血统，普朗达取得的名声和威望远远超越了他工人阶级的出身和平庸的智力水平。

有些时候，普朗达会摆出法国黑社会成员所特有的迂腐举止和面容：憔悴而隐晦，永远流露出讥笑之声，高卢人特有的向下耷拉的双唇；有些时候，他却表现得像个知识分子，一个存在主义者，与马尔罗和萨特为伍的人。对普朗达最好的描述是，他是一个变色龙般的人物，一会儿把自己叫做法国的皮埃尔，一会儿又把自己称为圣克莱的普朗达，只要有什么好事落在了他视野可及的范围，为了达到目标，他会改变其生活和价值的诸多方面。对于这个人的其他描述就不那么中性化了，包括骗子、伪艺术家和已定罪的罪犯。后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证实，法国的皇家档案表明他曾经犯有勒索罪和挪用公款罪，并蹲过六个月的监狱。

一九四〇至一九四四年，法国维希傀儡政府时期，普朗达和他的阿尔法—伽拉特团体出版了一本杂志《征服》，这本杂志致力于法国民族主义和君主制度的恢复。杂志登载的许多文章都是公开反对犹太人和共济会的，后来普朗达为自己辩护说，他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来自盖世太保的非难。但是这种策略败得很惨，最终不得不关门，一九四三年，普朗达入狱，因为按照纳粹党的记录，他对法国纳粹观点的支持超出了对德国纳粹观点的支持。后来，普朗达又有了一个更加谄媚的解释：



皮埃尔·普朗达（一九七九年与儿子托马斯在一起）是一个有罪的骗子，他最成功的骗局导致了一本畅销小说的问世。

德国纳粹党发现《征服》上登载的文章中含有法国抵抗力量的密码。

不管普朗达站在哪一方，当谈到法国民族主义的时候，他还真的是一个火炬，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以后，他更是精力充沛地投入其中。两年之后，普朗达创立了拉丁学院，其公开目的是进行历史性研究，但更直白的目标是继续阿尔法—伽拉特团体的右翼活动。作为对该组织成功性的质疑，一些文献具体记载了“学院”把普朗达的母亲列为该院名义上的领导。

普朗达成为巴黎某些天主教领袖所熟悉的人物，尤其是圣叙尔皮斯神学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是在那里，他开始宣称梅罗文加是觊觎法国王位者。后来在一九五六年，他又进一步拓展了身份，宣称自己是一个由神指引的团体的领袖，该团体是在十字军远征时期由戈弗雷·德·布永创立的，其成员自从耶稣诞生以来一直影响着世界——这个团体就叫郇山隐修会。

这个团体的名称可能有变化，借用中世纪修道院的名字，开始叫做锡安圣母，但在诸多方面仍然是阿尔法—伽拉特团体，只不过换了一张面孔，换了一份杂志，这份杂志叫做《联盟》。普朗达的刊物很快就开始登载索尼埃神父的故事，暗示牧师在遥远的比利牛斯山脉小村庄发现的秘密。这些文章最终构成了普朗达写作的一本书的基础，这本书详细讲述了索尼埃的发现，并暗示基督耶稣的尸体就埋葬在献给玛利亚·抹大拉的小教堂附近；由于达戈伯特和吉塞尔的婚姻关系，基督耶稣的后代与法国哥特血统的联合，以及历史上伟大人物的生活中所隐藏的石破天惊的秘密。

这本是一个非常引人入胜的故事，但普朗达的写作风格却不那么扣人心弦，因为似乎没有人对出版这本书感兴趣。在给他的文学作品筹集支持所做的一次努力中，普朗达宣布，他已经获得了索尼埃在祭坛下的空柱子里发现的两张羊皮纸，并虚张声势地把它们捐献给法国国家图书馆。这两张羊皮纸的存在就代表了索尼埃神秘行为和郇山



郇山隐修会背后的真相线索就隐藏在这张羊皮纸上的复杂密码里，但却不是你可能期待的样子。

隐修会之间的重要联系。突然之间，曾经还是站在那里微笑并摇头的怀疑论者，现在也变得对此深信不疑了。

普朗达提供的两张羊皮纸上都写着秘密信息，一张是祝贺达戈伯特与吉塞尔的婚姻，另一张则更加神秘，提到了郇山隐修会。纸上的内容（如果不具有完全的真实性）一经证实，普朗达立刻宣布他是达戈伯特和吉塞尔的直接后裔，这就解释了他作为郇山隐修会总会长的角色，这着实令学者和历史学家　目结舌。

紧接着羊皮纸被发现，由此诞生了那本书的修订版本。现在由于羊皮纸事件，以及合作者杰勒德·德·赛蒂的一些严肃的重新改写，书终于可以出版了。这次书取名为《雷恩的财富》，一九六七年出版，详细介绍了隐修会的来龙去脉，开始是玛利亚·抹大拉和耶稣的孩子们，然后是耶稣或者他的尸体，穿过地中海逃往高卢。在那里，该书追溯了吉赛尔·德·雷塞斯的血统脉络，并对于贯穿历史一千三百年的后代进行一一盘查，最后以羊皮纸和索尼埃其他个人物品的发现而结束。

这本书所披露的事情引发了两种截然不同但却同样强烈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个故事是毋庸置疑的，他们依靠各种信息来源来证实它的真实性，包括索尼埃聚集的大量财物，羊皮纸的存在，对达戈伯特和梅罗文加王朝联系的历史依据，以及普朗达自己令人信服的陈述。持这种观点的人迫不及待地想象着达成这样的共识，经过了几代具有优越智商和创造性的后人的传承，一个拥有人类最伟大秘密之一的团体，可以通过与创世主的直接联系得以阐明。这些拥护者急切地寻找着支撑普朗达观点的历史依据。他们不可避免地找到了一些，随着每个显而易见的理论得以证实，这些人心中滋生了某种冲动。

另外一种却是怀疑的观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渐渐发现了几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真相。

隐修会之路上的第一个加速器是普朗达的两个同僚——杰勒德·德·赛蒂和菲利普·德·塞雷西，他们起诉普朗达，要求给曾经许诺给他们的书的版税。德·塞蒂作为合著者之前已经提到过了，那么塞雷西又是何许人也？据披露，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但是却有着爱搞恶作剧的名声。

到《塞恩的财富》出版的时候，他已经养成了酗酒的习惯，后来这也要了他的命。更为重要的是，德·塞雷西声称，呈交到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羊皮纸是伪造的，他知道如此，因为为了出版普朗达的书，他曾经把它们拿出来做宣传并验证真实性。

到现在为止，普朗达的《雷恩的财富》在宣传和销售上正蒸蒸日上，他很快认同了塞雷西的指控。他承认，羊皮纸不是真品，而是从原羊皮纸那里精心抄写过来的，考虑到原稿的价值，普朗达把它们存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至于具体地点，他拒绝透露。同时他还宣称他的家庭也隐瞒了这个事实，即原文并不全都是用法语写的。他宣称，普朗达的祖先与圣克莱（英语的意思是辛克莱）之间与众不同的纽带关系，圣克莱是苏格兰仪式共济会的创始人。这些口口声声的联系就解释了这么多世纪以来，郇山隐修会的秘密得以保存下来所使用的方法。这些披露让那些相信的人更加坚信，但却促使那些怀疑论者更深入地探究事实真相，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

第一个发现涉及到对索尼埃教堂支撑祭坛的柱子的仔细检查，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雷恩城堡，在那里，柱子已经成为这所镇子的部分遗产了。四个柱子没有一个是空的，事实上，其他三个都相当结实，只有一个例外，但也只是有个小小的裂缝，充其量只够藏匿一两张明信片。接下来的披露更加令人吃惊。

还记得诺埃尔·柯布这个人吗？他购买了波萨尼亚别墅，索尼埃因为发现所谓的尸骨或财宝，而挣得了一大笔钱，这个别墅就是用这些钱修建的。索尼埃离开人世后，玛丽·德纳尔诺把这所大房子改造成公寓用于出租，然后又用它与柯布交换了终生年金。一九五三年玛丽去世后，柯布把波萨尼亚别墅改造为一个小型的饭店和旅馆。除了索尼埃古怪行为和他神秘的财富之外，雷恩城堡几乎没有什么吸引游客的地方了，而柯布对此做出的投资也永远不会得到太高的回报。于是他仅仅使用了一种营销工具，就解决了问题，这种方法只跟企业策略有关，几乎没有多少事实的依据。

在索尼埃神秘的巨额财富背后，柯布编造了一个充满戏剧性的传奇故事，故事里的人物肯定对小说《哈里·波特》非常熟悉，柯布还具备讲篝火鬼故事的才能。他用自己的声音把故事录制下来，然后在饭店里播放作

为给食客的消遣，后来还以小册子的方式把它们出版，作为纪念品分发给客人。

很难说索尼埃和雷恩城堡的故事具有约瑟夫·康拉德的叙事特点，但是还是能够吸引住那些吃着迦素来的人的兴趣。他们饶有兴致地听着这个城镇与罗马和哥特的渊源、与西班牙的不同战役中所遭受的破坏、1885 年贝伦杰·索尼埃的到来、他早年的困顿生活，以及后来解释不明的财产的突然积累。

柯布从来不否认自己是故事的作者，在这一点上，这些故事与可以确定的事实之间相去不是很远。但是当他开始解释索尼埃财产的来源时，虚构的成分就把事实弄成了模糊不清的东西。

根据柯布的讲述，卡尔卡松的文件证实，一二四九年，索尼埃偶然发现了埋藏在他教堂下面的一笔财富，这笔财富是布兰奇·德·凯斯蒂尔埋起来的，也就是路易斯九世的母亲，路易斯九世是最后一名十字军战士，还是唯一被称为圣人的法国国王。在路易斯九世动身赶往巴勒斯坦后不久，由追逐权力的男爵们和受到压制的诸侯们发动的小型叛乱就开始了。他的母亲立刻意识到，巴黎并不是存放皇家财富最安全的地方，于是她秘密地把国王的金银财宝用船运到雷恩城堡。路易斯从巴勒斯坦回来后，镇压了这场叛乱，然而几年后又离开了巴黎，这次是去领导第八次十字军远征。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回来，死在了突尼斯，他的儿子腓力·德·哈蒂继承了皇位。腓力认为把国家的财富埋藏在这个偏僻的山村比放在王宫更安全，于是他加强了对村子的防御措施。也许他忘记告诉他英俊的儿子腓力四世，也就是圣殿骑士团的摧毁者，他已经把这个国家移动的财富存放在了遥远的乡村，因为从那时以后，根据柯布的讲述，这笔财富就被淡忘了。

忘记了？一个中世纪的法国国王怎么能忘记一百八十吨重的金子，这还不算其他的珠宝和艺术品，根据柯布在一九五六年的估算，这些东西价值“四万亿”。甚至更加基本的是，国王的仆人是如何把一百八十吨重的金子和其他财宝运往六百五十公里（四百英里）以外的地方？而且，不运到别的地方，偏偏选择了雷恩城堡，这是距离巴黎最远的地方之一，并与

法国的敌人接壤的小镇?

似乎没有人对这种做法提出质疑，也许是因为柯布接下来的披露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

> 这些财宝被发现了两次。一六四五年，一个名叫伊格纳茨·帕里斯的牧羊人掉进洞里，然后带回了很多金币。后来他又声称看到了一间堆满黄金的屋子，再后来他疯了，因为他总是试图为自己看到金子的行为进行辩护。城堡主人到处搜寻，但没能找到（那些金子）。直到索尼埃来了，发现了那些金子……
>
> 世界上最惊天骇俗的财宝之一就藏在这个拥有卓越景色和著名历史的小村子里！

比起《巴黎竞赛》杂志上热烈的评论文章，这种故事也许更能有效地吸引赞助商到柯布的旅馆和饭店来。柯布知道这一点，他充分利用与媒体的联系来在报纸和杂志中传播他的故事。雷恩城堡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摩纳哥，但它似乎也吸引了同样多的兴致勃勃的游客，其中就有皮埃尔·普朗达，也许他是在寻找某种阴谋。柯布与普朗达之间的会面并不单单是推测，有照片证实，两个人确实在一九六〇年前后见过面，也就是普朗达写作那本书的第一稿后不久，这本书最终以《雷恩的财富》为名出版了。

柯布的故事中最显眼的部分就是没有任何地方提到可爱的吉赛尔，以及她与达戈伯特的婚姻，从而把西哥特人与耶稣的血统联系起来。柯布怎么可能忽略这个历史传奇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情节呢？答案很简单：吉赛尔·德·雷塞斯从来都不存在。她和白雪公主一样是个虚构的人物，公元七世纪的时候，她既没有以肉体的方式存在，也没有以精神的方式存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她也只存在于那些易受欺骗的追随者、阴谋论者和轻信畅销小说的读者的想象中。尽管有些记载声称追溯了吉赛尔之前和之后的家庭纽带，但是著名的中世纪学者兼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教授阿维德·克林伯格认为，那个美丽、聪明而迷人的吉赛尔充其量不过是“二十世纪的

一个发明”。

如果吉赛尔不存在，那么普朗达虚构的故事就像搭建的沙堡一样砰然倒塌，他杜撰这个人物只是为了建立哥特人与梅罗文加王朝的联系。普朗达时而否认，时而又全部承认，前后一致确实不是这个法国人最重要的品质，一九八九年，他又发布了新版本隐修会的故事。当时法国总理密特朗有一个熟人，即一个叫做罗杰—帕特里斯·波拉的人，普朗达声称这个人就是当下邬山隐修会的总会长，而不是普朗达本人，虽然他自己冠以这个头衔已经三十年了。波拉的身份一直没有得到确认，但至少有一点他与普朗达是臭味相投的：两个人都犯有欺诈罪和挪用公款罪，在普朗达被提升为总会长之后不久，对他的审讯就开始了。

一九九三年九月，在官方对波拉的活动进行深入调查的时候，从未面对过这些负面新闻的普朗达挺身而出为他的朋友辩护。这是一次令他后悔终生的举措，因为法庭首席法官当时发布命令，对普朗达的住所进行搜查。此次行动搜出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许多资料都是宣布普朗达就任法国国王的，这足以让法官给普朗达发布命令，让他宣誓以后对质询做出回答。不知道使用了宗教裁判所的什么方法，普朗达很快便承认了整个事件完全是个骗局，对于血缘纽带的全部细节，都是他凭空编造的，包括吉赛尔与达戈伯特的婚姻，索尼埃在教堂地下或周围发现的财宝或尸体，以及他自己作为邬山隐修会总会长的身份，一切都是假的。仁慈的法官可能考虑到普朗达的年岁和那颗太过悲伤的心，于是宣布他是一个无恶意的怪人，随后把他释放了，但是警告他，不要再跟法律耍什么花招。普朗达离开法庭后，就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直到二〇〇〇年二月去世。

当时的法国媒体广泛报道了这些事件，包括对波拉的调查，普朗达声称波拉在邬山隐修会担任总会长的职务，那些伪造的材料，以及普朗达对欺诈罪的供认不讳。但是没有一个人对这些事件提出过质疑，他们相信这些事件都是真实的，是可以得到证实的，就像相信吉赛尔的故事是凭空虚构的一样。

当然了，对于索尼埃的故事，以及普朗达谎称（不是当他讲述那个总

是改来改去的故事的时候，而是当他声称隐修会的事情全都是捏造的时候）的虚假的血缘纽带，这里面还是有足够的真实性的。也许他最初讲述的故事是真实的；也许他发誓时声称的所有这一切都是虚构的，不过是一个勇敢的人隐藏一个神圣秘密所做出的努力。比方说，头脑如此简单的一个人如何能够创造出一个诸如梅罗文加王朝这样情节复杂的故事，而这一切都有过去的文件加以证实？

答案就隐藏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席卷欧洲的那场政治骚乱所形成的漩涡中，那个时候，普朗达正在努力地把自己塑造为法西斯原则的假想奉承者。那些年里，一个叫做朱利叶斯·埃沃拉的意大利宗教狂引起了极右翼拥护者的兴趣，包括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奥斯瓦尔德·莫斯利。这时，他的《锡安长老会草约》[①]的意大利版本出版，他声称犹太人领袖在十九世纪曾经会面，构建他们用以统治这个世界的策略方针。埃沃拉则推崇与君权神授学说类似的一种哲学理论，极力宣传一种旧的权力制度，这种制度的基础是认为一个真正君主的权力是神授的，神的品德和权力经过他而传达到臣民那里。他尤其佩服戈弗雷·德·布永，巴勒斯坦的第一位欧洲统治者，据说他也是郇山隐修会的创始人。

大约就在同一个时候，一个叫做沃尔特·约翰尼斯·斯坦因的德国学者出版了《第九世纪：圣杯光芒下的世界历史》。这是他的一篇博士论文，里面包含一份家谱，也就是斯坦因所称的“圣杯血统”。尽管这份血统家谱是那些具有高度宗教本性和超常能力的历史人物的象征性代表，但是任何人只要浏览一下斯坦因的论文，都会把这些象征误当作真正的人，尤其是斯坦因的家谱还包括戈弗雷·德·布永和法国皇室家庭。

这些内容，以及在法国图书馆唾手可得的其他秘密文件，可以轻而易举地刺激普朗达的想象力。再加上他用于欺骗而得到证实的羊皮纸，以及希望得到公众认可的渴望，普朗达改变了历史的核心部分，在这些大量虚构的内容之外，他裹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放到一个神话般的球里面，然后从山顶向下滚动这个球，越往山下滚，球的重量和体积越增加，直到最

---

① 关于《草约》的更多内容，请参见本书第十一章。

后引起了三位英国作家的密切关注，他们把这个故事改造成一本畅销书，这本书是《圣血与圣杯》[①]。

仍然有一个谜团悬而未决。索尼埃神父用于奢华建筑和生活的钱到底来自何处？与故事的其他方面不同的是，这不是个神话。索尼埃的抹大拉塔，豪华的教堂内饰，以及波萨尼亚别墅，直到今天依然矗立在那里。既然没有发现路易斯九世的财宝，也没有用耶稣的尸骨敲诈教会，那么，他又是如何聚集了那么多的钱财呢？答案已经得到了证实，普遍而为人熟悉，就是简单的欺诈。

天主教牧师可以索要津贴来举行弥撒，目的是治愈那些受到疾病折磨的人，或者加速一个死去的人从炼狱到天堂的过程。作为对牧师和他的教区的经济支持，从这些弥撒中获得的收入是一种可以被接受，甚至是被鼓励的方式。

然而很快，一些无耻的牧师就开始把这些委托弥撒看做是一笔殷实收入的源泉了，他们不仅可以从自己教区获得，在其他的教区也可以得到，甚至把手伸到了其他的国家。很快，弥撒就像任何邮购物品一样开始了销售，他们在报纸和天主教刊物上大做广告宣传。那些忠实的信徒如果想要为他们渴望的人举行弥撒，就可以把钱寄过去，并向名字出现在广告上的牧师详细叙述具体的情况。

除了上帝和牧师本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证实弥撒是否真的举行过。一个牧师可能会收到成千上万封请求的信件，每封信都会附有几法郎的现金，目的是为了在同一个星期或者同一天举行弥撒。这种做法叫做“弥撒交易”，索尼埃似乎很好地掌握了这个诀窍。它们以各种出版物形式出现在欧洲的广告上，很快就渗透到了雷恩城堡的牧师那里，通过对其账目的详细检查，以及他对自己的广告营销策略的记载上来看，索尼埃可能并没有举行所有付费的弥撒，即使他每天二十四小时，每个星期七天都从事这项工作。

一八九五至一九〇四年间，弥撒请求的数量以及随信附上的现金可以

---

① 关于这本书及其站不住脚的假设，请参本书第十一章。

轻而易举地超过二十万法郎，这些钱足够支付所有的建筑费用，以及所有的山珍海味，包括从加勒比海定期运送的朗姆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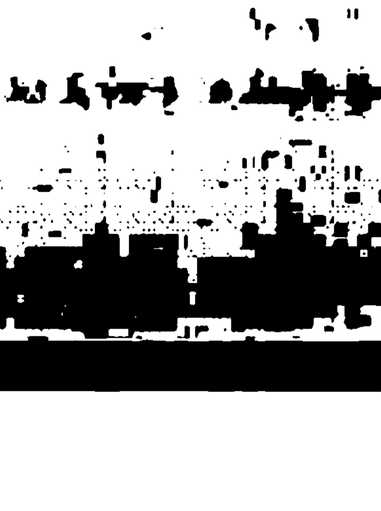
索尼埃被免职时，从他的教堂里搜出的信件表明，他的产业范围确实非常广。一个家庭邮寄二百五十法郎，为两个死去的姐姐分别举行一百二十五个弥撒；一个寡妇投递四十五法郎，为他死去的士兵丈夫支付三十个弥撒的费用；一个女修道院的成员支付十六法郎，为她们刚刚过世的修道院院长举行弥撒，而院长本人在生前也为举行弥撒付钱给索尼埃。

对于他的弥撒营销策略而言，索尼埃可能拥有一个无声的导师，调查研究表明，卡尔卡松大主教彼拉德在临死之前也因为类似的行为接受过调查，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彼拉德对索尼埃的不审慎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现在他们都已经仙逝——贝伦杰·索尼埃、玛丽·德纳尔诺、皮埃尔·普朗达、杰勒德·德·赛蒂、菲利普·德·塞雷西以及诺埃尔·柯布，多亏他编造的那个埋藏的财宝的故事，塔楼酒店和饭店生意打理得红红火火，一九六四年他以很大的价钱把它卖了出去，然后就退休了，但是没过多久，一九六八年，他就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不幸死亡。

神话传说还在继续着，因为人们希望它存在，甚至能够有所发展，只要能够满足那些热衷神秘和阴谋的人的胃口就好。有人声称看到了吉赛尔·德·雷塞斯的鬼魂，美丽而光芒四射，穿着她华丽的结婚礼服徜徉在抹大拉塔附近的空地上，为了她死去的达戈伯特而声声叹息，为了那些埋藏的财宝而到处寻找，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也只有抹大拉塔本身是真实的了。

第四章



很难想象有这样两个团体，它们的起源和利益之差别比德鲁伊教和诺斯替教还要尖锐。一个前身是凯尔特神秘主义，另一个前身是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宗教学；一个源于自然论，另一个源于唯心论；一个寻求现世的完美来与来世的完美相匹配，另一个则认为这个世界不可救药的迷惑而邪恶。

它们两者的结合凭借的是误解和压制，正是这两种因素把个人和团体推进了秘密的深渊。还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组织在起源和活动上，都是虚幻而隐晦的，当阴影足够地深，时间足够地长，即使最和善的团体也会遭到怀疑。尤其是他们乐于在树林里跳舞，或者正统的宗教团体对此不屑一顾，德鲁伊教徒和诺斯替教徒都乐于沉湎于小把戏——而这些对这两个团体的声望都是百害而无一利。

每年，在北半球快到冬至的时候，许多基督教国家的男男女女都会非常快乐地进行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就源于德鲁伊教。这种习俗带有非常明显的性暗示，这种活动是在一种有毒的寄生类的生命形式前进行的，这就暗示德鲁伊教是一个由具有颠覆性的超出常规的人组成的团体，他们在敞开式的寺庙，如史前巨石阵内部举行异教的仪式，其实，这是对这种秘密教派一个经典的误解。



从很多方面来讲，德鲁伊教徒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嬉皮士的灵魂先驱。

这个仪式在圣诞节时举行，夫妻在槲寄生树下亲吻，其实这种习俗跟德鲁伊教没有什么联系，只是教徒们赋予槲寄生植物以及生长这种植物的橡树非常神圣的地位。在德鲁伊教与史前巨



十九世纪末期的一个艺术家对一个女德鲁伊教徒的描摹，一只手拿着槲寄生，另一只手拿着金镰刀。

石阵之间也没有什么确认的联系，充其量也只是一些当代边缘团体对此做出的种种猜测。

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德鲁伊教我们确实知之甚少，原因在于他们没有书面记录，而且他们的存在更多的是作为皇室成员之间的一种社会地位，而不是作为一个组织而存在的，这种情况对西欧的凯尔特社区尤其如此。我们对于德鲁伊教的所有了解都是从第三渠道得来的，并且经过了时间和社会偏见的双重过滤，甚至对于他们在仪式中使用槲寄生植物也主要来自于一世纪罗马作家老普林尼的作品。根据普林尼的描述和泰尔箴言录，德鲁伊教徒认为橡树是上帝神性一个可视的象征，这主要是德鲁伊教徒一直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结果。“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比槲寄生更具神圣性”，普林尼写道，“它借以生长的橡树也是如此”。德鲁伊教徒误解了槲寄生这种植物的真正习性。这是一种寄生植物，需要从树液中汲取养分，毕竟德鲁伊教徒的专长是神学研究，而不是植物学，他们认为是槲寄生赋予了橡树生命。冬季时，橡树的叶子全都掉光了，进入到一种冬眠状态，而槲寄生还保留着叶子，这种现象更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生长在（橡）树上的任何东西”，普朗尼继续写道，“都被认为是上天派来的生命，象征着这种树是神选中的。每当（槲寄生）被发现，人们都会在这个月的第六天举行盛大的采摘仪式”。根据普朗尼的叙述，首先人们会在生长槲寄生的橡树下举行宴会，宴会结束后，穿着白色法衣的德鲁伊牧师会爬到树上，手里拿着金镰刀或者修枝刀，把采摘到的槲寄生放到一块白布里。当他拿着这神圣的植物返回地面时，两头白色公牛会遭到屠宰，以敬献给神，作为对槲寄生的交换。

值得一提的是，德鲁伊教徒并不是唯一对槲寄生这么尊重的人，日本人对这种植物也有类似的敬意，尽管他们更偏爱的是长在柳树上的一个变种。瑞士人、斯拉夫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也认为槲寄生是一种超乎寻常的植物，这种植物代表着许多神秘的品质，大多数与肥沃多产有联系。这种多

产性的联系就引发了冬至时夫妻在槲寄生果实下亲吻的习俗，他们憧憬着妇女会孕育生命，来年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

槲寄生和冬至（圣诞节）仪式，是德鲁伊教留给大多数人的唯一有形的联系，然而，一些人认为这个活动其实孕育了一个秘密团体，一个朝着隐秘目标运作的组织。

“德鲁伊教徒”不是指一个宗教派系的成员，而是凯尔特和高卢团体的牧师阶层，尤其是在不列颠群岛地区。这个词的真实起源已经被时间的薄雾遮盖了，有几种理论非常盛行，其中一种认为是希腊词 drus（意思是橡树）和 vid（意思是知识）的结合，而且梵文树木就是 dru。希腊语把森林神和树神称作 dryades，这也是一个线索。凯尔特学者把 drui 归类为一个术语，指“橡树上的男人”，盖尔族语 druidh 的意思是一个聪明人或魔法师。还有些线索指向日尔曼语和威尔士语。不管这个词有怎样的词源学来历，探究其来源就像引人一个无止境而且难以回答的母鸡和蛋的循环讨论中。也许，只有一个意思就足够了：牧师的。

“牧师的”词义暗指德鲁伊教徒所执行的宗教功能，他们的作用可远非如此，还包括哲学、科学、传统、训教、判断，以及履行皇家顾问的职责。用今天的话来说，也许最好的描述方式是：宗教知识分子。需要我们了解的是这里的“宗教的”暗含比这个词本身更广泛的意思。凯尔特人与任何古代民族一样，他们与大自然的关系非常亲密，或者比大多数民族还要亲密。他们的神话、信仰和习俗反映了根深蒂固的森林环境，这个大自然既会支持他们、恐吓他们，同时也会在精神上激发他们。

在这个运动影响的顶峰时期，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一〇〇年到公元一〇〇〇年之间，那些极力要成为德鲁伊教徒的人，根据三个不同层次的能力而具备不同的资格。最初的层次是奥瓦德（Ovydd），包括新人会者，不需要特殊的涤罪或准备。他们穿着绿色衣服，根据他们自然而然获得的医药、天文、诗歌和音乐方面的知识，其加入是受到欢迎的。那些渴望备受尊重，期待权力增长的奥瓦德会继续学习，成为巴德（Beirdd），即吟游诗人，要想取得这个层次的资格，得要求他们记忆一首有两万诗节的德

鲁伊诗歌的至少一章。巴德通常被刻画成弹奏着一把古代竖琴，琴弦的数量像人身上的肋骨一样多，而且是用人的头发做成的。成为巴德的候选者穿着蓝色、绿色和白色条纹的长袍，这三种颜色与德鲁伊穿着的颜色一致，当他们取得了全部的身份和地位，他们就会转而穿着天蓝色的长袍。

第三个层次也是最高的头衔，就是德鲁伊，他们穿着象征纯洁的白色长袍，与其他层次加以区分。德鲁伊的职责是满足人们的宗教需求，在其内部，根据不同的智慧和力量水平，又细分为六个阶层，每个阶层上的德鲁伊都在白色长袍上配有不同颜色的腰带加以区分。处于最高位置的是大德鲁伊，由其他德鲁伊根据其品德和廉洁性选举出来。在同一个时间，大德鲁伊的数量从来都不会超过两个，他们的特征是手上拿着金节杖，头上带着橡树叶的花环。

具备真正的德鲁伊的资格需要占用一个人很长的时间，一些历史学家声称，吸取并理解教义要花费二十年的时间。获得这样高的智慧水平自然会让德鲁伊享有特殊的权力，在皇家庆典中，德鲁伊总是坐在国王的右侧，是国王的心腹之人。正如一位卓越的凯尔特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德鲁伊劝谏，国王行动”。也许现代版的最佳类比是一个公司 CEO 的法律顾问，CEO 可能会向股东传达不好的消息，但是措辞却来自这个法律顾问。

顺便提一下，有研究表明，许多德鲁伊都是妇女，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氛围保持一致。凯尔特妇女比她们同一时代的任何女性都享有更多的自由，包括参加战争的权力和与丈夫离婚的权力。至少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妇女在德鲁伊教的实践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观点是非常现实的。把刚才的那个类比再推而广之，凯尔特族人中极有可能出现更多的女性德鲁伊牧师，其数量比我们现代社会的女 CEO 还要多。

男性德鲁伊在生活上相当节制，并信奉禁欲主义，他们把生命完全献给了对诸如自然的研究，智慧的积累，对加入该教的被推荐者进行评估，以及对该教秘密的维护等活动。许多人发现，独身生活能够更好地适应他们的哲学需求，尽管有些人住在修道院一般的住处，但大多数都居于森林深处粗制滥造的小屋里，他们到村子和镇子里去只是为了履行宗教职责。

即使在欧洲中世纪时期，这种行为也被视作有些古怪，德鲁伊身上开

始被赋予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属性。他们开始与不可思议和神圣的事件有联系，譬如，他们有能力命令大团的浓雾和薄雾出现，从而把侵略者赶出自己的国家。他们可能也代表了和平实践主义的最早形式，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认为，德鲁伊是人类和神之间的中间人，他描述了德鲁伊在作为战争的协调人这种角色中的表现。

十几个世纪以来，德鲁伊教一直在欧洲人的信仰中占据主导地位，直到罗马帝国衰落，基督教的影响蔓延开来，该教的影响才逐渐淡化，并开始向西推移。实际上，这与凯尔特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并行。之前，他们在欧洲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后来凯尔特人先是让位于罗马人，然后让位于撒克逊人，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地区也在逐渐缩减范围。最终凯尔特只在爱尔兰一直保留着他们的影响力。

凯撒在观察和记录社会发展时，与其指挥才能一样是个天才，他发现德鲁伊尤其有趣。他评论说，高卢和凯尔特团体维持着三个阶层：平民，他们比奴隶强不到哪儿去；特权市民，也就是贵族；德鲁伊，在圣事和智慧上提供指导。“数量众多的年轻人都向他们寻求指导”，凯撒写道，“(德鲁伊）受到人们的尊重和崇拜，是他们在裁断所有的公共和个人争端时；当有犯罪或者谋杀事件发生的时候，遗产或土地边界出现争端的时候，德鲁伊会做出裁决，哪一方是错误的，哪一方受到了损害，然后确定损失和惩罚……所有的德鲁伊都服从那个大德鲁伊，他对他们的权威性是至高无上的”。凯撒也不无讽刺地说道，考虑到他们的声望和主要职责，德鲁伊不参加战争（他们被免除了任何一种军事服务），并且不用缴税。

德鲁伊教是一个相当宽容和顺从的团体，任何一个人，只要成功地进行了一个艰苦的学习过程，并集中在自然世界和代表神性的方式上，那么，这个人就会受到欢迎，并加入其中。鉴于我们对当代有组织的宗教的熟悉和了解，新成员自主选择领袖的开放式做法也许不会给人特别深刻的印象，但是仅仅凭借教育和才能就能进入特权阶层的前景，则几乎是革命性的。每个凭借学习和奉献而取得资格的人都能得到接受，这种做法影响了基督教。基督教徒不要求根据血缘关系或者一些神秘的由神操纵的偶然事件来选举领袖，就像先前的宗教所做的一样，他们认同德鲁伊的教条，

即任何人只要吸取了足够的知识，并具备高水平的奉献精神，就能够履行这个职责，而不管他们的社会出身如何。这种做法非常新颖，而且相当地有裨益。这也遵从了一个基督教传统，有些人更愿意把它说成是策略，即适应它试图取代的异教模式的所有特征。这种方法行之有效，从公元五〇〇年往后，德鲁伊教和基督教一直都骑跨在同一个跷跷板的相反两端，基督教力量上升得越高，德鲁伊教力量就会越下降。

那么，对于德鲁伊教的衰败谁负有责任，罗马人还是基督教徒？这取决于你站在哪里，以及你的立场如何。在欧洲大陆，罗马的影响是至高无上的，高卢人适应了罗马的法律和习俗，以此作为一种精明的自我保护手段。在古罗马，德鲁伊教徒已经完全融入当地的社会，以至于从根本上来说，它已经不再存在，直到后来再度复活，只是存在的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它已作为基督教的一个部分而存在，德鲁伊的高级牧师被大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取代。在大不列颠群岛，皈依天主教不是唯一的出路。在这里，德鲁伊教力图在充满危险的现境中顽强地生存下来，但最后还是让位于撒克逊人了。爱尔兰阻止了罗马人和撒克逊人的入侵，因而，我们对德鲁伊教的大多了解都保有绝对的爱尔兰特色。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德鲁伊教在范围的广度和复杂性上也许比我们知道得还要多些。

在爱尔兰凯尔特人采信了基督教，并成为最具有宗教热情的传教士之后，德鲁伊教进行的就是一场几乎没有希望的抵抗战争了。卓越的德鲁伊教徒撤退到偏远的地区，在那里，他们秘密地把教义和传统习俗口头传播给为数不多的几个顽固的追随者。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德鲁伊教的权力和影响力开始缩水，直到普通百姓仅仅把他们看做是算命者和预言者，不足凭信的梅林[①]以及同类的后代，他们施魔法诅咒和影响着人们，但是除了带来一点娱乐之外，就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既然有记载的历史资料屈指可数，他们取得的成就又那么有限，那么，为什么德鲁伊教在我们所了解到的秘密团体中还能占有一席之地呢？答案就在该教派与诸如史前巨石阵这种神秘的事物的联系和人们的臆测

---

① 亚瑟王传说中亚瑟王的顾问，是一个魔术师和预言家。

里，德鲁伊教囊括了被人们遗忘已久的神秘做法和秘密的超自然知识。毕竟，没有什么线索比遗失的知识更能提升一个团体的地位了。

德鲁伊教徒所了解的东西是我们其他人所无法知道的，这个观点来源于十八世纪人们对英国的着迷，用带有神秘色彩的眼睛注视苏格兰，德鲁伊教徒通常用一种开玩笑的方式来缓解卡尔文教、路德教和其他教派所带来的沉闷的限制，这些宗教认为享受任何开心有趣的东西都是一种犯罪，或者应该有罪。在这个期间，共济会已经被具体化为一个秘密的兄弟团体，公众对德鲁伊教神秘做法的错误认识，使他们也开始逐渐地适应了一些元素。共济会会员使用一种奇异的头饰，以及其他的仪式和习俗，都来源于德鲁伊教和各种古代文化传统。

德鲁伊教与史前巨石阵的普遍联系更多是基于神秘主义而不是历史事实。德鲁伊教徒可能不时地会在史前巨石阵那里举行某种仪式，但他们是生活在森林中的人，而不是受到大风侵袭的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骑马人或舞蹈者。再说，历史学家已经确定了巨石阵的成形时间，即大约公元前二〇〇〇年，这比德鲁伊的存在时间要早得多。史前巨石阵的功能可能是作为寺庙、望台、纪念碑，或者任何其他的功能。我们并不确定地知道它



现代德鲁伊在史前巨石阵祈祷太阳升起，巨石阵与德鲁伊教没什么联系。

到底是什么，但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这绝非专属德鲁伊教。

爱尔兰文化同化吸收了许多德鲁伊信仰和价值，我们可以从威廉·巴特勒·叶芝的诗歌以及詹姆斯·乔伊斯的长短篇小说中找到这种摹仿和影响的蛛丝马迹。德鲁伊教中的几个神秘元素确实可以代表一种风格上的精髓，这种风格把爱尔兰作家与其他作家区分开来，同时解释了他们对于英国文学独特影响的原因。性情甜美的德鲁伊教徒葬送在罗马人和撒克逊人手中，相比之下，他们是多么地平庸，这一点可能也揭示了凯尔特文学的忧郁沉思之根。叶芝在他的诗歌中多次运用了这一点，包括他的诗歌《致时光十字架上的玫瑰》中的一些诗句，囊括了温柔的凯尔特人的全部伤感，爱尔兰民歌《丹尼少年》的几句合唱同样显示了这种感情。

> 红玫瑰，骄傲的公玫瑰，我一生的悲哀的玫瑰
> 请来到我近前，听我歌唱那些古代的故事，
> 奋勇与凶险的大海浪潮搏斗的库胡林，
> 那鬓发灰白，目光平静，幽栖山林，给佛格斯周围撒下无数梦和祸根的祭司，
> 还有那脚趿银屐在海面上跳舞，渐已衰老的群星用高远而寂寞的曲子，所歌唱吟咏的你自己的悲戚。①

与叶芝的悲哀忧郁相比，德鲁伊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多了些喧嚣，少了些敬仰。当斯蒂芬·迪达勒斯告诉勃克·穆利根他刚刚收到钱时，穆利根狂喜不已。

> 四枚金光闪闪的沙弗林金币，勃克·穆利根兴奋得呼喊起来。我们得摆一桌华丽的宴席，让德鲁伊大吃一惊。四枚万能的沙弗林。他甩开双手，砰砰地跑下石阶，操一口伦敦口音走调地唱着歌。

---

① 译文摘选自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版《叶芝诗选》。

在爱尔兰文学和民间传说中，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地方提到了德鲁伊，这就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德鲁伊的影响穿过几个世纪，可能一直持续到今天。如同共济会更愿意把自己与圣殿骑士团联系起来一样，许多人都声称与德鲁伊信仰一脉相连，这不免使人想到，古老的团体直到今天还在暧昧的环境中秘密运作。他们的努力似乎给一个小宗教派系提供了一种神秘的氛围，而德鲁伊对人们的影响多于它的实际内容，它的构成更多的是传说而不是事实。

要想了解诺斯替教的影响广度，你只须想象一个其规则和活动可以同时吸引休·赫夫纳和特雷莎修女的私人俱乐部。如果你能够把握住这样一个概念，即使你并不是他们当中的拥护者，或许也可以开始深入了解古代诺斯替教更深入的教义和矛盾。

该教的名字来源于希腊语 gnosis，意思是知识（“g”不发音，no-sis）。在特定的语境中，这个定义并不充分，也许解释为洞察力或者启迪性更准确一些。知识暗示事实、理性的一面，而这正是诺斯替教所否决的，他们认为，我们真正的精神本性只有通过内省才能找到，我们的身体和我们所处的这个物质世界都是邪恶的，因为我们是由《旧约》中充满恶意的上帝创造的。相比之下，我们纯洁的内部精神，却是更高尚、更抽象的上帝的产物，即耶稣基督的创造物。因此，诺斯替教的目标可以这样描述，把我们纯洁的精神从我们邪恶身体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除了他们信念的这个核心部分，关于诺斯替教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轻松地确定，包括他们的起源。有些来源宣称他们在时间上要先于耶稣，也有些资料表明他们与第一批基督徒处于同一时代，更有一些证据把诺斯替教看做是对许多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信条的反抗。过去的两千年以来，只有少量的线索和为数不多的证据可以用来界定这个教派的信仰结构和影响。

诺斯替教徒同所有宗教的追随者一样，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但诺斯替教徒更进一步，他们坚持认为这是个邪恶的世界。与佛教一样，诺斯替教承认生活充满着痛苦，事实上，痛苦是不可逃避的。地球上的所有

生命都依靠吞噬其他生命而存在，而人类对其他生命的吞噬比他应得的那份还要多。除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外，人类还通过战争大规模地施加多层次的痛苦，通过侮辱和背叛对个人施加痛苦。伴随着痛苦而来的是由自然灾害带来的伤害和死亡，比如地震、洪灾、火灾、干旱、瘟疫和疾病。

根据诺斯替教的教义，人类的精神是纯洁的，只是存在于其周围的物质世界，包括它所占据的身体本身才是有缺陷的。这样一来，生命就是荒谬的，只有通过逃离这个不完美的世界，精神才能最终获得真正的满足。

这种纯洁精神存在于一个邪恶世界内的理念，与传统的基督教原则完全背道而驰，尤其是创世纪中所详细论述的事实。《旧约》中第一个故事就描写了一个完美的天堂，两个接近完美的人快乐地生活在其中，直到一条巨蟒到来，劝说他们用罪行玷污了天堂以及他们自己。诺斯替教徒争辩说，在巨蟒到来之前，这个世界就已经是邪恶的了，这个观点并不会赢得基督徒们对他们的钟爱。

世界是邪恶的这个论断导致了诺斯替教信仰和做法的极大分歧，从而形成了两个极端的派系，即苦行禁欲派和放纵淫荡派，这也就导致了那个公开的类比，打着同一把哲学大伞的休·赫夫纳和特雷莎修女。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两种派系却拥有同一个理论原则。

苦行诺斯替教徒萨图宁及其追随者和摩尼教徒，认为人类的身体是邪恶的，并试图使自己与其行为尽可能地分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把纯洁的精神与身体分离开来。在他们看来，把灵魂与身体分离，是提升灵魂的第一步。他们认为由身体代表的物质是有罪的，让自己远离所有的物质会使灵魂得到升华和净化。因此，这些诺斯替教徒只食用那些能够提供最基本营养的食品。婚姻是得到批准的，因为它把两个纯洁的灵魂结合起来，但性交则是禁止的，这种论断毫无疑问导致了极度的困惑，并且没有后代的繁衍，因为孩子被认为是更加邪恶物质的单纯复制。

同样的哲学基础也适用于放纵诺斯替教，比如奥费特斯派（蛇派）和卡珀克雷特派。这些教派认为，如果纯洁的精神或灵魂与这个邪恶的世界毫不相容，那么他们在地球上做了什么事情就无关紧要了。对于这些诺斯替教徒而言，罪恶和不道德的概念很少提到桌面上来，按照定义，灵魂所

做的每件事情都是纯洁的，而身体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邪恶的。既然灵魂和身体是不同的两个实体，为什么还要担心它们的分离呢?

这个观点导致了诺斯替教的几个令人震惊的故事的发生，许多故事都不是那么容易令人相信的，有些故事却不免让人回忆起早期基督徒们广为传播的令人反感的谎言。就诺斯替教徒而言，基督徒本身也许充当着煽动者的角色，而不是接受者。

乱交是这个诺斯替教团体的一个特征，他们通过相互使对方神圣化，从而获得拯救，以现在的观点看来，这完全是有悖法律的。“地是地，土是土”，他们是这样被教导的，“你在哪里播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播种”。大约二千年以后，这句话可以简化为：“如果你感觉好，那么就干吧。”

奥费特斯派是诺斯替教的一个支派，其名字本身就表示对蛇的崇拜，他们整个的圣餐礼都以蛇的出现和活动为基础。圣餐仪式以吸引爬行类从洞里爬出来开始，然后鼓励它在面包上滑行，面包是要留着以后吃掉的。这条蛇或者非常温顺，或者吃了大量的麻醉药，该教成员必须亲吻蛇的嘴，然后双膝跪在地上，像敬神一样对这个动物顶礼膜拜。

诺替斯教的支派卡珀克雷特派的追随者，则获得了更多的特许和鼓励。卡珀克雷特派教徒认为，灵魂的纯洁不可能受到玷污或者变得邪恶，就像一颗珍珠，不能因为掉在泥土里，它的价值就有所贬低，就其本质而言，一颗珍珠永远都是珍珠。基于这种放荡不羁的观点，灵魂应该经历这个世界呈现给它的任何事情。卡珀克雷特派教徒分享性伙伴，他们纵酒作乐，尽管男性会接受指导进行中断性交，但这并不是计划生育的一个方法，而是为了搜集精液，像耶稣的身体一样用来食用，月经血也是一样。卡珀克雷特派的招募方法是很基本的，毫无疑问一定能够成功地吸引男性追随者。最漂亮的女性成员受到鼓励，主动把自己奉献出来，作为诱饵吸引皈依者，一个类似的团体组成了一个叫做利未茨的男性精英组织，他们公开进行同性恋活动。

如果一个妇女参加这样的活动后怀孕了，那么胎儿要流产，然后在研钵里把它捣成胶状，再与蜂蜜和调味料混合，由教派成员吃下，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做法不免让人想起与早期基督徒有关的最骇人听闻的故事。

这种做法代表了一个极端的，也许甚至是疯狂的诺斯替教的一个分支。比较大一些而且更加受到尊重的是由西蒙·马格斯领导的一个派系，他是一个具有神授能力的学者，并在至少一个圣经故事中出现，提供了英语中一个词的出处。

他出生在撒玛利亚一个叫做吉塔的小镇，但从小在亚历山大长大，这是他那个时代文明世界的一个伟大的智慧中心，在那里他接受了一等的希腊教育，由腓力国王亲自给他施洗礼。据说他也获得了足够的阿拉伯巫医技能，可以让自己隐身起来，随意地升入空中，并且能够变形为一种动物，或者至少可以使他的观众信服他确实能够做到。

作为施洗者圣约翰的追随者，西蒙也招揽了自己的信徒，并且被当作早期基督领袖一个很有潜力的竞争者。他以不太光彩的姿态出现在《旧约》中（八卷：九—二十四），讲的是他遇到了耶稣的两个门徒，彼得和约翰，并试图购买两个人的神圣权力，构成了英语中“simony”这个词的起源，意思是买卖圣职罪或类似的做法。

彼得的责难[①]也许刺激了西蒙，从而使他创办了诺斯替教，这也是一些追随者们声称的观点。即使真正首创这个宗教的人不是他，他也被公认为是一个教派的灵感动力，该教成员被认为具有西蒙主义思想。在西蒙看来，当然这也是大多数诺斯替教徒的观点，真正的上帝拥有一副女人的面庞，这个上帝圣母有时被人叫做索菲娅，作为对她智慧的认可。

这种观点让早期的基督徒们大为恼火，但还远没有今天看上去那么富于革命性。旧约的希伯来语版本把上帝的灵魂等同于“灵”，这是一个阴性词。西蒙意识到了这种联系，所以他可能把它作为一个垫脚石，迈向对上帝本质的新的诠释。当自由思想者向占主导地位的权威进行挑战的时候，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更多关注的不是西蒙倡导了什么，而是他倡导的方式。

他后来又把女性化的上帝赋予到海伦这个人名上，这是来自泰尔的一个妇女，一些基督徒声称她是一个妓女，一些人把她描绘成“不知羞耻的

---

①“你的钱财会随着你一同死亡，因为你认为上帝的赐予也可以用钱买到。在这件事情上，你既没什么责任心也没什么好运气，因为在上帝看来你的心术不正。”



诺斯替教徒西蒙·马格斯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一个不受欢迎的行为，当他试图升入空中的时候，却重重地跌落在古罗马广场上。

荡妇”，西蒙从他的前任导师迪斯西奥斯的床上勾引来的。不管海伦向西蒙展示的是怎样的肉体，很明显，她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给了他灵感，因为他声称在她的身体里看到了上帝的灵魂。这一点构成了诺斯替教许多信仰的基础，包括上帝之灵魂存在于所有物质中的观点，西蒙主张要用一个堕落的女人来向人们展示神性，这让基督徒们非常愤恨。

基督徒们也许成了他的敌人，但西蒙也有自己的朋友。其中就有罗马皇帝尼禄，他接受皇帝的任命成为宫廷魔术师，西蒙不触碰家具就能让它们移动，穿过一面火墙，从另一面出来的时候却毫发未损，这些把戏让尼禄很是消遣。

据传说，西蒙的魔术本领也有局限性，依据不同的消息来源，他曾经以某种方式陷入困境中。一个记载说，西蒙吹嘘自己能够像耶稣一样被活埋，三天之后，他能安然无恙地从坟墓中出来，埋葬确实发生了，但复活却没有。

另一个材料记载，西蒙夸耀说他能从古罗马广场升入天空，信徒彼得和约翰做目击证人在那里观察，他运用升空技能，纵身一跃升入天空，彼得和约翰则跪在地上，虔诚地祈祷西蒙回到地面上。他们的祈祷得到了应验，西蒙跌落在古罗马广场，在神圣之路附近摔得粉身碎骨。这种说法的拥护者们以参观圣弗朗西斯卡—罗马娜大教堂为快乐，那里展出了彼德和约翰曾经跪在上面祈祷的石头，他们下跪的痕迹印在了大理石的表面上。

西蒙·马格斯和其他诺斯替教派领袖的死亡既没有导致这个宗教的衰败，也没能促成它的繁荣，这与基督教不无相似之处。诺斯替教的核心信

仰继续缓慢地发展着，同时得到新领袖的激励，而该教义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在不断地更新，结果是当人们谈到诺斯替教的价值和做法时，其不同的变种在范围上着实令人眼花缭乱。

实际上，除了相信上帝是真实、至高无上、先验的，人类生存的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之外，诺斯替教派中一个不变的因素是永世万古的理念，居于中间的生命填满了人类与上帝之间的空虚。永世万古和上帝占据广阔的领地，或者说完满的领地，因为他们享受着神性的所有权力。在诺斯替教的教义中，西蒙·马格斯的海伦，为了纪念她的智慧又改名为索非娅，她就是那个永世万古。只要人类的灵魂依然沦陷在不完美而且邪恶的身体里，根据诺斯替教的观点，他们充其量也只是存在而已。我们不是生活在完满中，而是空虚里。

这种精神最有价值的成分就是神性火花，这种元素把我们与其他的生命形式区分开来，却依然桎梏在身体的监狱里。这种人神性火花将会在死亡的时候重新体现在另一个不完美、邪恶的生命形式上。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达到在尘世之外保留神圣元素的目标，那些神性足够强大能够确保这种变形的学派叫做气体力学学派，他们将达到灵知和释放。第二个学派叫做心灵学学派，他们在外物和精神之外对灵魂世界知之甚少，他们也许可以通过足够的努力和洞察，达到气体力学学派的程度。大多数人都属于心灵学学派，他们为世俗利益所束缚，非常讲求实际，他们对于现实世界的贡献，以及他们到达灵知的无能为力，都注定让他们永远居留在这个不完美而邪恶的世界。

由于基督教在力量上逐渐强大，它越来越无法宽容诺斯替教，在基督教徒们看来，从本质上来讲，诺斯替教徒是远离于常轨的基督徒，他们的信仰变得有些异端。不管诺斯替教徒是否遭到了基督教的攻击谩骂，他们的数量在逐渐减少，因而开始展示出与秘密团体相联系的



圣弗朗西斯卡—罗马娜教堂里的这块石头上就有彼德和约翰下跪的痕迹，他们曾经跪下祈祷西蒙回到地面。

一些经典行为，包括使用入会仪式、暗号、秘密握手以及通过密码和手势交流。到了公元三世纪末期，诺斯替教已经不再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组织，尽管其核心教义的一些片断仍然可以在二元论宗教的摩尼教，以及诸如阿比尔教派、波各米勒派和保罗派的中世纪宗教团体那里找到蛛丝马迹。卡巴拉教的学生们在那个哲学中感知了诺斯替教的精髓，据称，有一支较小的非基督教教派曼德安派在伊朗和伊拉克的一些地区存在。将近一千七百年以来，在西方世界，诺斯替教成了基督教不断发展和占统治地位的某种模糊的注解，多亏了诸如亚可·波美这些人为复兴这个宗教所做出的努力，以及其哲学思想在威廉·布莱克作品中有所反映，才避免了它渐近消亡的命运。



1945 年，在埃及拿哈玛地附近一个荒凉的隐藏地找到的诺斯替文字。

在二十世纪的时候，诺斯替教又两次引起了人们重新的关注。一次是在一九四五年，在埃及村庄拿哈玛地附近，一个农民在挖灌溉渠的时候，发现了十二本手抄本，包含有五十篇关于诺斯替教的文章，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四世纪。有可能是附近的圣帕科米乌斯修道院的修士写作的，然后藏匿起来，避免遭到刚刚出现的东正教的破坏，这些经文提供了关于诺斯替教教义和价值的大量信息。

同时，心理学家卡尔·荣格也把诺斯替教作为一种灵感源泉来评估，为他关于心理活动的惊世骇俗的试验和作品提供灵感。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与诺斯替教比较起来，传统的基督教缺少洞察力。“在古代世界”，荣格写道，“诺斯替教在争辩的时候更多地受到了心理经验的影响，他们比教堂的神父们能在更广的层面上解决问题”。

这些事件，再加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席卷北美洲的探究神秘习俗和信仰的近乎病态的狂潮，激起了人们对诺斯替教的新一轮的兴趣。然而，一般来说，在上演了两千年的教会戏剧中，诺斯替教仅仅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他们的秘密与其说是实施一些针对社会的行为和做法，不如说是作为一种防止基督教袭击的自我保护方式。

[redacted]

[redacted]

传说是这样的：

一个人为了寻求普遍真理到以色列游历。在那里，他对一个古老的神秘主义派别进行研究，该派别以希伯来文字为基础，这种文字是圣经最初版本的文字。他从一个年长的犹太学者那里汲取了那个时代的智慧，这个学者通过其他的信仰体系已经达到了顿悟的程度，但是他还没能到达这个目标。随着这些古代知识一个个被顿悟出来，他觉得自己的灵魂得到了升华，力量取得了扩展，洞察力受到了打磨，视野获得了开阔。

他的导师去世后，这个人发誓把他所获得的知识延续到一个精选的团体中，他们已经准备做出必要的牺牲，从这个教义中汲取知识和益处。他将会把他的教义延伸到地球的各个角落，作为改变人类命运的一种途径来传递这个力量，成为古代智慧的新来源，这就是卡巴拉教。

卡巴拉教既不是一个宗教派别也不是团体组织，它是一套思想系统，从犹太通神学、哲学、科学和神秘主义提炼而来。这个词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解释（和拼写），但所有这些解释都与一个秘密的口头传统的理念有关，经过几代人的口授传递到几个精选出来的学生那里，这些学生是从学者和聪明绝顶的人中选出的。知识的排他性和卡巴拉教的封闭结构导致了英语单词“cabal”的产生，意思是具有邪恶本质的一个密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解释逐渐偏离了轨道。不管最初的意图如何，现在这个词的词根就具有这个含义。许多人认为，卡巴拉教的运作就是根据“canal”这个词的解释而来的，特指犹太密谋组织秘密运作，通过秘密手段达成目的。

卡巴拉教是作为一个口头传统开始的，是对《旧约》前五卷中上帝所说的话的解释，这五卷分别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

《民数记》和《申命记》。在《律法》，也就是《摩西五经》中，这些书为卡巴拉教提供了一个总体的哲学基础，包括犹太教起源的历史描述，以及六百多年的具体法规。

那些熟悉《旧约》的人会认识到，除了《申命记》之外，这些书中几乎没有法律的存在。其他书，包括《创世纪》和《民数记》，主要也是一些故事和类比，只提供了一些观点，但这些观点可以转变为法律。

就法律而言，古代希伯来的神学可以分成三个部分：首先是一般的圣经法律，以色列所有孩子的必学知识；其次是米示拿[①]，也就是法律的灵魂，只传授给拉比[②]和老师；最后是法律的灵魂的灵魂，也就是卡巴拉，只有最具直觉力和最有才能的犹太人才能学习，对其他人则是保密的。

除了这个界定之外，对于那些缺乏特定经验的人来说，事情依旧十分令人迷惑不解。一方面，卡巴拉教的追随者和犹太人通常认为，《摩西五经》中的每个单词，以及每个单词的每个字母都传递着特殊的意义，但要想破解其真正的含义，则需要智慧和洞察力。另一方面，《摩西五经》中的故事不是按照严格的时间顺序叙述的，一个故事和另一个故事的相对位置可能更多是与信仰结构的理念相联系，而不是与其前后的故事有关联。鉴于诠释的范围是如此之广泛，所以各个派别把《摩西五经》内部隐藏的各种假定的信息解释作为己用，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个派别甚至提出，《摩西五经》的整个内容代表了上帝的真实名字，然后分散成几个按照顺序讲述的故事，那些缺乏神性识别力的人类可以汲取这些知识。

设法了解那些不可能了解的事情是一项富有挑战、令人迷惑和具有约束力的任务。一方面，卡巴拉教提供了一种迂回的逻辑方法，通过意识的转变来彻底了解这些意义。其他教派也利用类似的方法取得了类似的结果，比如印度教、佛教、道教、禅宗和瑜伽的某些形式。首先，需要把探究者的意识提高到必要的水平，这就必须通过广泛的训练过程，这个过程涉及到一系列的经验，在方法上，每个经验都更加激进而且要求更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卡巴拉教成为了一种标志，它囊括了犹太哲学的整

---

① 即口传律法。

② 犹太人的学者。

个范畴，旨在通过找到上帝的精髓来探究生与死的神秘。作为证据，卡巴拉教学者指出了圣经当中的这种探究元素，包括《以西结节》开篇的部分章节：

> 天堂之门打开，我看到了上帝的影像……我看了看，看呀，一阵狂风从北方席卷而来——巨大的云团和闪电之火外面包围着一层光辉，在火的中央，是燃屑散发出的微弱之光。（以西结节第一章：一，四）

对上帝的人神灵交的研究也许是重要的，但在许多拉比看来，这样做太危险了。根据一个众所周知的犹太法典故事的记载，有一次，四个拉比聚在一起，沉浸在人神灵交的研究中，发誓对《摩西五经》意义陷入深刻的冥想沉思中，直到达成共识为止。过了一段时间，一个拉比疯了，还有一个夭折了，第三个成了一个异教徒，抛弃了他父亲的信仰，只有第四个参加了和平的讨论，然后平和地离开了。这个故事，以及其他的故事都讲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对卡巴拉教义进行深刻冥想的时候，他们的大脑可能会形成某种紊乱，几个世纪以来，这些故事一直是一种警告，这些深刻的人神灵交的秘密可不能够等闲视之。

不管《摩西五经》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一般来讲，卡巴拉教徒一致认为，最好把它作为一种实用工具来看待，而不是智慧上的操练。像所有工具一样，它应该被用于启迪人类智慧，而不是用它来单独行事，这样就可以达到丰富读者精神生活和改变人类自私本性的目的。从根本上来说，卡巴拉教徒与传统宗教在目标上是相似的，尤其是诺斯替教。两个教派都寻求令人厌烦的问题的答案：为什么善良而仁慈的上帝会给他所创造的世界中引入邪恶？一个无限的上帝怎么创造了一个有限的世界？人类怎么可能知道那些无法知道的事情？

卡巴拉教以两种方式解答神秘的问题，一个是逻辑的方法，另一个是寓言的方式。逻辑的解释方法认为，每个观点都有其自身的矛盾，由于上帝是所有观点的集合体，他就包含所有的矛盾，善良的和邪恶的，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仁慈的和残忍的，局限性和无限性，以及其他相矛盾的事

物，所有这些都统一在一个更伟大的整体那里，就是上帝。

寓言的解释方式认为，上帝是一面镜子，把明亮的光芒投向这个世界。在光芒照射到我们身上之前，有一系列的镜子会调整它的方向，每一次上帝的光芒都会被反射到我们身上，从而失去一些光芒，到上帝之光到达地球上时，大多数的光辉已经被吸收，纯粹的上帝之光已经被玷污了。在这些瑕疵中就有邪恶和痛苦的元素，人类必须或者超脱这些瑕疵，或者距离这个光源和其原始之圣光更近。

多少年以来，如果卡巴拉教的追随者只是在寻求那些困扰每个文化的问题的知识，那么为什么他们会被认为是秘密而邪恶的？如今，这个团体在解决这些秘密时又具有怎样的效力？

为了更容易地理解卡巴拉教和其追随者，我们可以把这个团体分成三个时期或阶段：古代、中世纪和现代。每个时期都与其他有所不同，其差异性远远超过了相似性。

根据你对宗教信仰的了解，卡巴拉教可以追溯到亵渎伊甸园的时期，那时，所有的天使都从上帝那里直接获取卡巴拉智慧，他们对亚当进行训诫，希望能够帮助他和夏娃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这个故事的支持者认为，同样的知识也传递给了诺亚、亚伯拉罕，最后到达了摩西那里，他把圣经的前四卷书都囊括在卡巴拉教的教义中。

除了这些圣经故事之外，还有三本书也统领着古代卡巴拉教的哲学思想：《创造之书》（Sepher Yetzirah）、《光辉之书》（Sepher ha zohar）和《启示之书》（Apocalypse）。卡巴拉教的一些追随者认为，亚伯拉罕是《创造之书》的作者，尽管现代学者认为其创作应该从公元十二年开始。《光辉之书》大约创作于公元一六〇年，作者是拉比·施米安·巴哈·约哈伊，被罗马皇帝奥雷利·安托宁追捕，他在一个洞穴里藏身十二年，该作品就是在这个期间完成的。

《启示之书》的作者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圣约翰，他在卡巴拉教和基督教团体中的地位仍然存在争议。有几个学者认为这是“异教徒的写作”，这些东西来自于埃及和希腊神秘主义的阴谋思想，是基督教为改变异教徒信仰所作努力的反击。这些观点在二十世纪初期非常流行，即“异教徒”

很可能就是那些犹太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娱乐和目标，对基督教进行嘲讽。不管其起源和意图是什么，《启示之书》中死亡的场面、毁灭和有选择的拯救都很难让现代读者理解，尤其是许多与寓言相关的内容。对于一千五百年前的读者来说，启示录中的大淫妇指的就是巴比伦，她所骑的七个脑袋的怪兽可以理解为代表罗马和它的七座山。

不去理会这些带有密码的解释，当代读者，尤其是那些信奉正统派基督教或者福音传道者的人，对于启示录中的这些想象似乎很感兴趣，他们发现一些预言，并预见到了神话，这是两千年来希伯来学者所忽略的东西。

比作者身份问题或者古代书籍的具体目的更能激发人们兴趣的是源体，或者叫做生命之树，来源于完美的上帝之光在反射到地球途中被玷污的这个比喻。从上帝发散物这个概念中又衍生出九个点，从而形成了十个相互连接的中心点。其结果就是一种类似宇宙棋盘游戏的装置，对忠诚的卡巴拉教追随者表达着应有的尊重。

生命之树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世纪，一些希伯来学者提出，它的起源可以早到公元三世纪就出现在《创造之书》中。根据书中描述，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利用了三十二条秘密的知识通道，由十个源体的发散物（每个发散物叫做源质）再加上二十二个希伯来字母组成。这三十二个元素放到一起代表了生命之树，并且是卡巴拉教　想的中心意向。除了上帝用于下降到物质世界的路径（也就是凡人升入上帝之处的必经之路）之外，生命之树的各个元素实际上代表了上帝的神圣名字。

在这一点上，事情变得晦涩而复杂。

生命之树的底座（马尔库特）代表世界，这个具备所有缺点和完美的世界。最高点（凯特尔）代表上帝，或者最高皇冠，其他如下图所示：

Chokma（胡克马）	智慧
Binah（巴伊纳）	知性
Chesed（切塞德）	仁慈

Gevurah（盖布拉）　　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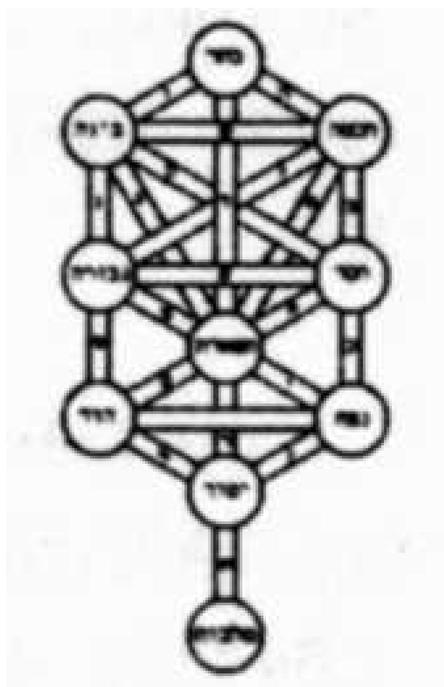
Tiferet（蒂法雷特）　　美丽

Netzach（内察克）　　胜利

Hod（郝德）　　辉煌

Yesod（耶索德）　　基础

九个源质构成了三个三角形，在马尔库特上方用路径相连。它们是人类身体的象征，最顶端代表头部，中间部分代表人类的躯干和四肢，最底部代表腿和生殖器官。



古代源体，或者叫生命之树，追踪从地球到天堂完美的路径。

利用这个生命之树，人类可以攀升到上帝那里，每次都向上升到一个源质，获得智慧，然后再到达下一个源质。每个源质都分成四个部分，每个部分都代表四个世界的一部分：原型的世界（Aziluth），创造的世界（Briah），形式的世界（Yetzirah）和物质的世界（Assirah）。每个源质都含有上帝神圣的不可知和不可言说的名字，耶和华或者是表示上帝的四字母词[①]，这个词是如此地神圣，包括神（Elohim）、我主（Adonai）和耶和华（Jehovah）在内的其他词，也在卡巴拉使用的经文中用于替换。

作为宗教哲学之谜或者教会灵应盘，给这个生命之树的概念增加一点刺激的小花招，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天使在每个源质处守护。其作用是阻止攀登者距离上帝太近，除非他们获得了必需的智慧，灵魂的净化，以及继续爬到下一个源质的决心。

每个熟悉卡巴拉教的人都知道和理解生命之树，但是几乎没有人完全赞同它的目的或作用。一些人认为，它代表了上帝整个造物过程的各个阶段，上帝创造了一系列的领域，最终产生了宇宙；另一些人提出，它象征物理的基本法则，比如地球引力和磁性。

对于古代的神秘主义者来说，生命之树提供了在知性上和精神上探索

---

① 用于圣经中由四个字母组成的表示神的正式名称的希伯来词，通常为 YHWH 或 JHVH，Yahweh 或 Jehaah。

根本的生命之谜的无限机会。追踪它的路径，评定它的成分，对其意义在观点上的交流，都给他们提供了文化上的消遣，但它就像二十一世纪的电子娱乐装置一样，为我们带来只是精神上的娱乐，尽管生命之树的目标是崇高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卡巴拉教和生命之树的运用传遍了整个欧洲，包括德国和意大利，以及它是怎样繁衍出这么多分支和这么多的诠释。这些不断变化的解释或者受到了支持者的强有力的捍卫，或者只在秘密集会时用密码讨论。

生命之树设计的复杂性，解释的多样性，卡巴拉教献身者独享的破解密码的角色，以及潜在的反犹太主义的倾向，这些都为旁观者滋生了恐惧和怀疑，许多人怀疑卡巴拉教献身者是秘密团体的成员，他们旨在推翻基督教。

在十三世纪，一个叫做摩西·德·利昂的西班牙籍犹太人又给卡巴拉教注入了新层次的神秘思想，从而为那些把此教派看成是威胁的旁观者提供了新的佐证。德·利昂或者是一个卓越的宗教神秘主义者，有幸涉猎一个古老的卡巴拉教文献，或者是一个中世纪的P.T.巴纳姆（费尼尔司·泰勒·巴纳姆），这取决于个人的判断。

摩西·德·利昂出生于一二五〇年，他能够利用华丽的词藻，在没有任何明确思想的前提下，对几乎任何话题都侃侃而谈，就像当今午夜电视上兜售厨房小玩意的口若悬河的电视推销员。他写了好几份有关卡巴拉教原则的手稿，有些手稿有意地带有某种煽动情绪，但是他的《拉比·施米安·巴哈·约哈伊的米德拉西》[①]，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光明之书》[②]，从根本上使得卡巴拉教获得重生，成为人们再次关注的焦点。

这本书是用阿拉姆语写的，也是《犹太法典》采用的语言，《光明之书》是对《摩西五经》的进一步注释，《摩西五经》是《圣经》的前五卷，主要探究广为熟知的故事的秘密层面。《光明之书》把人类的灵魂定义为包含三个元素：那非施，或者称为较低的动物灵魂，直接与直觉和身

---

①犹太法学博士的圣经注释。

②犹太神秘主义对摩西五书的注疏。

体的渴望相联系；鲁阿，或者叫中间灵魂，包含道德品质；以及纳什玛，灵魂的最高境界。纳什玛除了把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还使得人类在来世能够资源共享。德·利昂声称，他已经拥有了拉比·巴哈·约哈伊起草的原始文献，并进行复制，开始在市场上销售。

从一开始，《光明之书》的读者对其意义和真实性莫衷一是。卡巴拉教最虔诚的追随者和《犹太法典》的许多卓越的学者都接受了德·利昂的主张，认为《光明之书》的内容是来自上帝的启示，是在一千多年以前，通过拉比·巴哈·约哈伊传递到他的忠实信徒那里的。其他人却不那么确定，有很多人甚至怀疑德·利昂本人就是个骗子。后面的这个观点可以通过一个富人的故事得到证实，他在一三〇五年德·利昂过世的时候，与德·利昂的妻子接洽，给她提供了一大笔钱，作为得到《光明之书》古代文献的原始版本的一个交换。困顿不堪的遗孀承认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始版本，她说她的丈夫是唯一的作者。“当我多次问及他为什么让自己的教义从其他人嘴里说出”，她解释说，“他总是回答说，让教义出自一个能够产生奇迹的施米安之口，会是一个更好的获利方式”。

寻找原始《光明之书》复印本的富人也许会因为这个故事而幻想破灭，但是其他更狂热的追随者却没有。“如果德·利昂真的写了这些话”，他们反驳道，“那么，他一定是在上帝的魔力帮助下完成的，他把他的教义放在谁的嘴里说出来并不重要，这些都是出自上帝之口的，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宗教狂热者胜出了，部分原因在于德·利昂引人入胜的写作风格，使得很多追随者确信，只有上帝才能说出这样雄辩的话语。不久，人们对《光明之书》的引用就像对《圣经》的引用一样充满了敬意和虔诚，甚至连《犹太法典》的学者也开始把它看做是一部圣贤之书，当处理各种神学上的疑问时，也把它看做权威来求助了。

一个成功往往会引起另一个成功，在出版业和神学界都是如此。很快，《光明之书》的增补本就问世了，取名为《拉亚—梅赫穆纳》，作者不详，该书在《光明之书》的描述上又增加了灵魂的另两个部分：沙亚，给人类提供神的生命力的意识；叶伊达，灵魂的最高层面，与上帝的统一

成为可能。

《光明之书》、《犹太法典》和生命之树为它的追随者既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灵感之源，也成为无尽的推测之源，但是这些神秘的观点是如何把卡巴拉教推向秘密团体的领域，以及威胁和阴谋的漩涡里的呢?

反犹太主义起到的作用跟往常一样，不时得到一些猜想的滋养，即那些绝无谬误且本身自然会实现的猜想。从十三到十七世纪，尽管人们有些忧虑，但在英国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犹太人进行秘密的宗教仪式，在那里讨论卡巴拉教的各种教义。英国大惊小怪者很健忘，或者故意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爱德华一世曾经于一二九〇年把犹太人从英国国土驱逐出去。那些斗胆回来的人，带着他们的后代，只能被迫进行一些秘密活动，而同时否认他们真实的存在，这是满足秘密团体存在和发展的经典前提条件。

卡巴拉教以其所有的复杂性和神秘主义，为谋叛拥护者提供了必需的一切，把这个派系界定为具有颠覆性和危险性的。在纳斯塔·H·韦伯斯特经过充分调研但带有使人反感的种族主义倾向的作品.《秘密组织和破坏活动》中，她提出了两种卡巴拉教。古代版本的卡巴拉教，指的是在《光明之书》出现之前，这时候的卡巴拉教是好的，里面充满了犹太元老一代一代相传下来的智慧；现代卡巴拉教，包括《光明之书》和其滋生派系都是邪恶的。在韦伯斯特看来，《光明之书》最初的明智的忠告已经“与拉比的野蛮迷信混为一谈，又加上了他们自己的想象，因而明显带有他们的印记”，因而韦伯斯特就做出了合乎情理的判断，“虚假而应该受到责难，罗马教廷认为拉比们对犹太法典的传统进行了篡改和破坏”。

只要有机会，某个个体的古怪行为就会成为卡巴拉教及其颠覆本质的化身，尤其对于那些选择以这个角度看待这个教派的人。在十八世纪中期，没有人比哈伊姆·塞缪尔·雅各布·法克更能胜任这个任务了，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古怪伦敦人。法克除了极力鼓吹自己与卡巴拉教的联系之外，还声称能够创造奇迹，原因是他从卡巴拉教的智慧汲取才能。法克可以让一根很小的蜡烛燃烧好几个星期，通过重复一个特殊的咒语，他还能让地窖里填满煤炭，并且拿一个昂贵的晚餐盘子与一个当铺老板交换现金，在他回家之前，这个盘子又神秘地出现在他家里了。大概故事

就是这样讲的。当伦敦的犹太人大礼拜堂受到火灾威胁时，据说法克阻止了这场火灾的发生，他在门上写了四个希伯来字母，大火就绕过了这个建筑，这个建筑幸免于难，而其他建筑则被大火吞噬。

对于他周围的这些神秘之事和超自然的做法，法克似乎沉湎其中。他也很享受奢华的生活，苦行禁欲在法克的生活方式里可是没有落脚之地的。与法克同时代人给朋友写的一封信就描述了与这个卡巴拉教神秘人物的一次会晤：

> 他的房间由墙上的一个银烛台照得通亮，中间是一个分成八瓣的灯，是用纯银精心打造的。虽然里面有油，日日夜夜地燃烧，但是可以一直燃烧三个星期不灭。有一次，他隐居在房间里六个星期，不吃不喝，当隐居结束后，十个人接到了进入其中的命令，他们发现他坐在类似宝座的东西上，头用一条金色的头巾包着，脖子上系着一个金链子，链子上有一个下垂的银星坠儿，上面刻有神圣的名字。毋庸置疑，这个人凭借着他的神圣的秘密知识，高踞于同时代人之上。我无法向你详细地讲述他所完成的奇迹。我要感谢的是，我是那些寄居在他智慧羽翼下的人中的一员，我觉得此生很值得。

法克的财富和人格力量把同样富有而著名的人士吸引到了他的身边，这中间有公爵、王子、外交官和银行家。当他去世的时候，法克已经成为伦敦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把大量的钱财遗赠给了慈善机构和犹太教会，一个多世纪以后，穷人仍然可以拿到他的财产所支付的年金。

所有这些可能都是个性鲜明的一个人的天真无辜的古怪行为，除了他与卡巴拉教的联系，以及他死后广为传播的一张照片，法克拿着指南针和大卫王之星（犹太教的六芒星形），嘴里念着“啊哈！”他的声音从伦敦传到了里斯本，谋叛理论家声称这颗星星不是犹太教的象征，而是两个相互缠绕的三角形，它象征着共济会，他们坚持说这个论断显然站得住脚，因为他手里还拿着一个指南针。



哈伊姆·塞缪尔，雅各布·法克以及卡巴拉教与圣殿骑士团相联系的“证据”。

与共济会有联系的主张足以让卡巴拉教跳回到秘密团体的马背上，这匹马很快就四蹄蹬开，飞奔而去。第一站是生命之树，谋叛热衷者在那里看到了各种各样隐藏的信息。蒂法雷特（美丽）占据着生命之树的中间位置，后来的解释表明，要想到达蒂法雷特的状态，个人必须从人类形状过渡到“无形”的状态，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徒可能把这个过程叫做“超验自我”，从而导致再生或者复活，最终转化成耶稣的一个象征。从这里到与圣杯之间的联系只有一步之遥，据说，圣杯是由圣殿骑士团拥有，后来转到了共济会手中，激发着与新的一群秘密谋叛者的新联系。这些经过了改动的解释，既受到煽动者本人想象力的局限，又产生了一批不受约束、不受限制而且通常深不可测的组织，他们对待各种神秘哲学就像瑞典式自助餐馆的神秘菜肴一样，一个个地等着被抽样品尝。

这些组织中有一个叫做金色黎明隐居团体，它以卡巴拉教哲学为基础，把生命之树理论同各色的希腊和埃及诸神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异国情调的大杂烩。为了增加菜肴的风味，印度教和佛教也加入其中，这锅浓汤被盛入了从共济会和玫瑰十字会会员借来的盘子上。

出于对神秘学的浓厚兴趣，金色黎明吸引了英国精英分子作为其成员，他们的生活需要神秘事件的注入，不论来自怎样的渠道，也不管是否具有合理性。也许最惹人羡慕、最著名的金色黎明成员是诗人威廉·帕特勒·叶芝，我们知道，这个诗人也把德鲁伊教作为灵感的来源，但最招人唾骂也是最声名狼藉的人毫无疑问是阿莱斯特·克劳利。

他于一八七五年出生，他的家庭从祖父那里继承了一笔不菲的财产，在严格的高级维多利亚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克劳利的兴奋点就完全放到了性上，这个矛盾刚好可以解释他奇特的生活。十四岁的时候，他使



声名狼藉的阿莱斯特·克劳利年轻时的照片。在纵酒狂欢，沉湎于鸦片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卡巴拉教。

家里的一个女佣怀孕，并且因为类似行为被好几所学校驱逐出去，其中有一个学校，当发现他从一个妓女那里感染了淋病而把他开除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凭借着自己的聪明（以及财富）进入了剑桥大学，那里，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创作带有明显的性意味的诗歌上。在他二十一岁的那一天，他获得了他的那部分家庭财产继承权，于是克劳利离开了剑桥大学，这是双方都不会感到后悔的事情。从此以后，他开创了一种纵欲的生活，他沉湎于性、麻醉品、广泛的旅行和神秘的好奇心。他甚至抽出时间写作了好几部书。

加入金色黎明使得克劳利接触到生命之树，这种用机械的方法探究灵魂的内在秘密的观点，激发了他的灵感，他创办了自己的组织，取名为银星（Astrum Argenium），并且夺取了对东方圣殿骑士团组织（即 OTO）的控制。两个组织都在他们的教义中利用了卡巴拉教的某些方面。由于他过于旺盛的性能力（“我咆哮，我强奸，我撕裂，我扭转”是他的一个更加赤裸裸作品的一句话）和广泛的写作，深得后爱德华时期读者的厚爱，即便同时他因其道德败坏遭到谴责，克劳利仍然是整个欧洲令人关注的人物。他在意大利和埃及生活多年，纵酒狂欢，沉湎于鸦片，但还是设法完成了几部手稿。他的两本最为人熟知的书是《吸毒恶魔的日记》和《秘术的理论与实践》，他对卡巴拉教和生命之树的研究可以略见一斑。还有一本书《书籍七七七》里面包含一系列的表格，用三十二个数字把仪式秘术和宗教信条与东方和西方宗教联系起来，这三十二个数字代表生命之树内部的十个源体和二十二个路径。他的声名狼藉以及与卡巴拉教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论断，即犹太教的神秘主义哲学对基督教价值构成严重的危险，是某种没有联接的全球谋叛的一部分。

克劳利于一九四七年去世时，仍然孑然一身。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个人影响可能在逐渐衰退，但是他成功地在许多人头脑中确立了卡巴拉教

作为秘密团体的形象，同时让人感觉到与圣殿骑士团和共济会等类团体存在某些联系。

还记得那个人吗，他到以色列寻求普遍真理和古代智慧，然后带回了卡巴拉教的秘密的那个寓言故事吗？那个人的名字叫费维尔·格鲁博吉。一九六八年，他到以色列游历，不是为了寻求普遍真理，而是寻找那些购买他兜售的保险单的人们，从而免于向他遗弃在布鲁克林的妻子和八个孩子支付赡养费。为了缓解在一个陌生国度的孤独感，格鲁博吉让他的前任办公室秘书，离了婚的凯伦陪同前往。

当格鲁博吉遇到卡巴拉教著名的学者拉比·耶胡达·布兰德温的时候，什么在以色列卖保险的机会，全都被他抛到了脑后。根据广泛传播宗教知识的法则，格鲁博吉如饥似渴地汲取了拉比·布兰德温对于卡巴拉教的深刻知识，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对复杂宗教哲学的洞察力和理解力完全超乎于导师之上，至少他是这样说的。把格鲁博吉叫做一个学得快的人，真的是有些低调了，因为当拉比在他们碰面一年之后去世的时候，先前的保险销售员已经一跃成为布兰德温组织的领军人物。

拉比·布兰德温死后不久，格鲁博吉摇身一变，成了摩西的直系后裔，取名为菲利普·博吉，成为卡巴拉教的世界一流权威，同时把拉比创办已久的神学院改造成卡巴拉中心，总部迁移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有关费维尔·格鲁博吉的任何相关信息都不复存在了，同时逝去的还有那个玩弄女性的保险销售员，或者他在布鲁克林的家庭。那个陪同格鲁博吉一起到以色列的保险办公室女秘书也不见了，那个有两个孩子的离婚妈妈，此前对宗教和神学从来没有展示出任何兴趣或者才能，现在也摇身一变，成了凯伦·博吉，写作并出版了几本关于卡巴拉教的畅销书籍。



布鲁克林的保险代理商费维尔·格鲁博吉变身为菲利普·博吉，现代卡巴拉教精神导师

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的神秘宗教组织的出现，向人们承诺所有的事情，从精神舒适到更好的性

爱，所以从一开始就吸引了很多皈依者。加利福尼亚的这种团体就像这个州的橘子园一样大量存在，几乎到处都是，而两种产品的保存期也通常是类似的，但是卡巴拉中心在很多方面都显得与众不同。

首先，其结构和吸引力是独特的。没有任何一个教派能够吹嘘两千年来所获得的智慧，及其以生命之树形式达到神学知识顶峰的路线图。而且，达到顶峰就像驾车人在麦当劳的外卖窗口购物一样容易。新人教者无需对哲学教义进行语法上的解析，这些教义是用古代风格写成的，充斥着模糊的参考，到处都是比喻，他们只需要遵循一种视觉上的十个步骤，然后以自己的速度通过各种途径达到目的。为了取得额外的娱乐效果，他们还能够试图破解各种线索，以希伯来字母表中的字母形式出现，但根据卡巴拉中心领袖的观点，这是随意而不必要的。

它是对古代信仰结构一种奇怪的适应。中世纪学者曾经认为，生命之树代表了迈向启蒙思想的通道。现在许多加利福尼亚人都在急切地尝试这个信条，把这看做是一种时尚的消遣，他们主张达到内心的平静和理解，这是其他人不得不举双手赞同的东西。

包括凯伦的儿子耶胡达和迈克尔在内，博吉和他的工作人员都被证明是卓越的推销商人。两千年以来，在对精神生活的最深入的问题进行神秘解答之后，卡巴拉教转型为具有虔诚装备的大型超市，配备有时髦的精神小装饰品和论说的沃尔玛。到二〇〇五年，二十多本书和 CD 已经制作完毕，作者都是凯伦·博吉和她的儿子。有本书叫《上帝擦口红》，还有二十二卷本的《光明之书》，往好处说，这些书代表了对容易上当受骗的业余涉猎者一个成功的市场利用，往坏处说，是对一个古代传统的嘲讽。好像是为了测试他们追随者的可信度，博吉一家还增加了产品的内容，从带有香味的蜡烛和卡巴拉婴儿服，到神圣的矿泉水和七十二个石头的盒子，每个石头上的不显眼位置都刻有上帝的不同名字，当然了，相信石头上有文字是对信仰的测定。但也许那就是关键所在。

市场营销策略达到最高（或最深）层次是因为一个最成功也是最获利的招数：一小段的红绳，据称是从一个曾经缠绕希伯来女族长雷切尔坟墓的绳索上剪断的。卡巴拉教信徒会感到心安理得，当红绳系在左手腕上，

用下面描述的方式：

> 我们可以感受到与围绕在雷切尔坟墓周围的保护能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联系，它也可以让我们身上带有雷切尔的强大的保护能量，随时从它那里获得能量。通过寻求圣人的光芒，比如雷切尔，我们就可以利用他们的强大影响来帮助我们。根据卡巴拉教，雷切尔代表我们居住的这个物质世界。

连同《操作指南》同时配送，这个两英尺长的红绳可以卖到二十六美元。



卡巴拉教红绳以及操作指南。

为了取得智慧，绑红绳可能是卡巴拉教成员需要完成的最艰巨的任务了。追随者从卡巴拉中心购买书是非常重要的，但阅读内容却是可有可无的。博吉和他的指导者向每个人保证，只要用手指尖在书的内容上轻轻滑动，这个过程叫做“快速冥想”，就能够让你汲取他们的智慧。对于准备复习考试的大学生而言，这个办法毫无疑问会相当受欢迎。

一根神圣的绳子和其他卡巴拉教的东西能够以如此高的价钱出售，并且还那么堂而皇之，这种做法让虔诚的犹太人感到非常震惊，而犬儒主义者则觉得非常好笑。当许多演艺界明星也开始大加追捧卡巴拉中心，对前任保险公司推销员褒奖有加，并在他们的手腕上戴上红绳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才变得非常沮丧。支持呼声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名人就有麦当娜、布兰妮·斯皮尔斯、黛咪·摩尔、帕丽斯·希尔顿、芭芭拉·史翠珊、伊丽莎白·泰勒、黛安·基顿、大卫·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贝克汉姆。由于这些人以及其他各界名流对博吉和他的卡巴拉中心的公开赞同，世界各地的编织者开始把绳子染成红色，一英寸就可以卖到一美元。

一个王国诞生了。很快，二十多个卡巴拉中心就在世界各地运作起来，其所在地从俄罗斯和波兰到巴西和加拿大，每个中心的成员都在猛增。其吸

引力可想而知，一个普通人怎么才能归属于麦当娜和英国的约克郡公爵夫人萨拉·福格森所在的同一个俱乐部？或者戴上与伊丽莎白·泰勒左手腕上完全一样的腕饰？

高调的名人对博吉以实利主义为基础的伪宗教呼声很高，而且态度异常热情，心理学家认为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们指出，其吸引力不是来自对那个时代知识的寻求，而是找到一种应对已有罪过的途径。许多名人对于他们的成功表现出相当大的不安全感，他们知道有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也和他们一样有才能，只是运气没有他们好罢了，而这些人依然默默无闻，不为公众所知。为什么明星可以沐浴在荣耀和财富中，而其他人就得苦苦挣扎摆脱名不见经传和困顿的状态？他们渴望一个说法来让自己的罪恶感有所减轻，于是对任何这样的信仰体系都趋之若鹜，因为这会把他们的成功说成是一种命中注定，或者幕后控制的。具有讽刺意味而且令人费解的是，那些被拒之门外的人却在模仿他们名人英雄的行为。



依卡巴拉教寻求力量和慰藉的名人就有米克·贾格尔、大卫·贝克汉姆、麦当娜和帕丽斯·希尔顿。

卡巴拉中心的会员，以及具有卡巴拉标识的产品的销售，再加上向其追随者征收百分之十的税收，大量的钱财像潮水一样涌入博吉的口袋。凯伦和他的两个儿子并排住在贝弗利山的别墅里，而菲利普·博吉，又名费维尔·格鲁博吉则常住在纽约华尔道夫—阿斯特酒店的一个公寓里。当然了，卡巴拉中心的定位是一个非营利的宗教机构。

几千年以来，卡巴拉教的隐秘属性更多地来自于种族主义和宗教偏见，而不是由于其成员有意识地从事秘密活动，而它所获得的“秘密团体”的身份也主要是集中于最近商业上的成功。其难以理解的教义对于许多试图寻求所谓智慧的人来说，都是个障碍，但对博吉则是一种推动力，他竭力说服潜在的追随者，使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拥有那个特定密

码的真正钥匙。

但是如果一个教义声称拥有通往上帝的路径，并且拥有经过了二十个世纪的锻造才形成的信仰体系；它的名字出现在日落大道的广告霓虹灯上，其领袖允诺只要手指尖在纸上移动就能够汲取深刻的智慧，而且它的象征就是一段红绳，那么，这个教义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

第六章

现役十字会成员

玫瑰十字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两个人身上，其中只有一个人真正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他是一个善于欺骗的人，他把早年的骗术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机构，声称为人类做善事，但其运作的方式却是古怪而神秘的。

传说大概是这样的，这个团体是以一个年轻人开始的，他于一三七八年出生在德国的一个贵族家庭。因为拥有高涨的宗教热情，基督教徒罗森克鲁斯进入了神学院学习，决心把他的毕生精力奉献给对上帝。当神学院的生活没能满足他的精神需求的时候，罗森克鲁斯去了圣地，游历了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在他游历的某个阶段，他与阿拉伯神秘主义者邂逅了，他们把炼金术法则教给他，并提出建立一种无教皇的基督教形式，这是在马丁·路德出生前的一百年。

回到家以后，罗森克鲁斯及其大量的追随者开创了一个秘密组织，致力于探索神秘力量的根源，其运作超乎于教皇教会的限制，并对病人和穷人提供援助和安慰。为了履行职责，其成员要进行广泛的游历，他们每到一个国家，都按照这个国家公民的方式和风格穿着，因而追求一种无名英雄的感觉。他们发誓守护这个团体的秘密，长达一百年之久，他们的相互识别是凭借玫瑰和十字架的组合图案，每年，他们都会在这个团体的秘密总部圣灵大厦集会。为了保证该团体的延续，每个成员都得按照指令提名下一个继任者，只有当任命他们的兄弟死亡之后，继任者的身份才能被大家知道。

选择玫瑰和十字架作为象征是关于这个组织的许多争论中的一个。这个图案是对创建者的名字玩的文字游戏，还是其中另有更深层的目的？玫瑰象征着安静和秘密的要求，在召开秘密集会的房间的天花板上都刻有玫

瑰的图案，玫瑰图案的存在是向大家指明，那个空间内所有的对话都必须保守秘密，因而“subrosa”这个术语的意思就是秘密地，或者私下地。十字架的四个架臂都是同样的长度，中世纪的炼金术士用来象征物质世界。两种图案组合到一起，暗示着这个团体从事于炼金术和其他魔力活动的贸易交换，他们所声称的到处游历去帮助那些生病的人实际上是在以一种秘密的方式交换信息。有几个持怀疑论的人把这个图案与早期诺斯替教徒使用的图案联系起来，后来又有人指出，玫瑰和十字架这两个图案都出现在马丁·路德的家族盾形纹章上。还有一些人认为，玫瑰和十字架是对被放逐的圣殿骑士团的红十字架的改造，他们提出，罗森克鲁斯和他的追随者正在使圣殿骑士团重振旗鼓，同时引入古代卡巴拉教的一些元素到它的教义中。

在罗森克鲁斯相当长的生命历程中，没有发生过一个这样的讨论，他活了一百零六年。除此之外，对于他的同时代人而言，基督徒罗森克鲁斯也没有其他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没有任何记载表明他曾经存在过，或者追随他并分享他的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兄弟们曾经存在过。直到他去世130年之后，关于这个人以及他创立的这个组织的记录还是没能找到。是否因为它所创立的这个组织在隐藏其存在和真正目的方面太过成功了呢?

直到一六一四年，世人才开始得知罗森克鲁斯和他的组织的事情，这时，一本名叫《兄弟会与玫瑰十字架高贵组织的传说》的手稿开始在德国流传开来。第二年，第二本小册子问世，对第一本书的内容进行了扩充，并且描写了于一六〇四年发现的罗森克鲁斯的坟墓。这个手稿指出，经过了一百二十年以后，这个组织的创立者的尸体仍然“完好无损”，与他埋葬在一起的还有几本书和装饰物。



《兄弟会传说》的封面。

像《男孩俱乐部》年鉴一样，第三年，第三本同样论题的书，在斯特拉斯堡出版，书名非常惹人争议，叫做《基督徒罗森克鲁斯的化学婚礼》。书中多次提到

了圣殿骑士团，这立即招引了天主教会的谴责，《化学婚礼》是以罗森克鲁斯的故事写出的，描写了他参加国王和王后的一个婚礼的过程。在他们富丽堂皇的城堡里，具有皇家气派的新娘和新郎挑选出一些来宾，利用古代炼金术的神秘方法，先是把他们统统杀掉，然后再恢复他们的生命。

早先的两本书在读者中激起了好奇心，但是毕竟有限，《化学婚礼》则引发了人们浓厚的兴趣。很快，玫瑰十字会团体就开始在欧洲各地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了。其成员中也出现了很多显赫的人物，其中有卓越的英国人弗兰西斯·培根爵士、罗伯特·波义耳以及数学家兼神秘学家约翰·李。这三个人的共同利益促成了英国皇家学会的建立，这么多年以来，担任会长的就有克里斯托弗·雷恩、塞缪尔·佩皮斯和艾萨克·牛顿。这个学会一直到今天都存在，成了英国的皇家科学院。

培根与玫瑰十字会的联系，关于他的生平以及玫瑰十字会对文学的影响，激发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推断。培根出生于一五六一年，这个智力早熟的英国人成为了一个卓越的学者和政治家，他被任命为国王詹姆斯一世的首席检察官，后来又被推选为英国上议院的大法官。国王甚至委派了培根一个至关重要的职责，就是对英语版本的《圣经》进行最后的校订，也就是我们今天广为使用的詹姆斯国王钦定本。

培根生活中的两个方面引发了秘密团体学生的浓厚兴趣。对政府官员行贿的指控让他不得不离职。追溯过去，人们广泛认同，这个指控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原因主要在于当时培根正陷入国王詹姆斯一世与下议院的权力之争。对培根罪行的不确定性，以及他作为政治阴谋的烈士的推断，都为这个情节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不管怎么说，一六二一年，培根被迫引退，他余生所作的事情，完全可以与他同时代人伽利略相提并论，他试图打破亚里士多德逻辑理论对科学研究的控制，而用演绎推理取而代之。很明显，这个人的智力是无限的。

第二个方面，也是更加吸引人的一部分，就是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他与玫瑰十字会的联系在于他与莎士比亚的关系。一小撮学者固执地认为，如果没有得到一个同行的帮助，莎士比亚不可能创造出所有归功于他的作品，这个同行比他更富有创造力，更加有技巧，而且受到的教育程度也更

高。他们认为，埃　河畔的斯特拉特福镇不可能是莎士比亚文化的宝库，成为他的戏剧和诗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他们还说，莎士比亚的父母都目不识丁，而且他们的儿子在学习上也没有展示出任何特别的才能。“莎士比亚是从哪里获得的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丹麦语的知识，更不要说古典拉丁语和希腊语了?”怀疑论者声称，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本·琼生曾经提出，莎士比亚“对拉丁语知之甚少，对希腊语更少”。他们拿莎士比亚的书法做例子，全部都是他的签名，他们提出，这个人“对钢笔的使用根本不熟悉，很明显，这些签名或者是复制的，或者在他手写的时候有人从旁指导”。

本书不是讨论这个问题来龙去脉的地方，代表英国文学核心的戏剧和十四行诗的真正来源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对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极力搜寻并找到了秘密入侵人们日常生活的证据，同时也证实了一些人的牵强的论断，他们坚持说我们的生活受到了秘密组织的操纵。

关于莎士比亚的生平和作品的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文学学者有他们自己的解释，但是谋叛理论家则集中于一个颠覆性的解释。他们以玫瑰十字会哲学的秘密性为基础，坚持认为，不仅仅是培根创造了归功于莎士比亚的所有作品，而且，在英国文学史上一个单独作家创造出来的最大量的作品，从实际来说，只是代表玫瑰十字会的利益而进行的广泛的劝诱改宗。

他们争辩说，莎士比亚是为培根打前锋的人物，他是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或者是一个阴谋合作伙伴，把玫瑰十字会的信仰和原则嵌入英国的文化中。他们指出，培根巨大的图书馆里，里面就有给莎翁戏剧带来灵感的所有引用和轶事，在他的那个时代，许多书还没有英译本。那些戏剧的创造和演出不是基于娱乐或商业的价值，而是作为与其他玫瑰十字会成员交流的载体。故事大概就是这样说的。



莎士比亚的作品是由卓越的玫瑰十字会成员，而且博学的培根完成的吗?

英国文学一个最大的传统仅仅是一系列的信封里包含着的用密码写成的秘密信息，这可能吗？看看下面几个主张：

* 弗兰西斯·培根爵士的密码，他作为玫瑰十字会会员的代码是33。在《亨利四世》的第一部分，“弗兰西斯”这个词在同一页上出现了三十三次。

* 表明培根身份的藏头诗般的署名频繁出现在莎翁的戏剧作品中。注意在《暴风雨》第一幕第二场米兰达的表述（斜体为后加）：

You have often

*Be*gun to tell me what I am, but stopt,

And left me to a bootless inquisition,

*Con*cluding, “stay: not yet.”

你总是

刚要开始告诉我我是什么人，便突然住了口，

对于我的徒然的探问的回答，

只是一句“且慢，时机还没有到”。①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但是，假定这种说法有它的真实性，那么，为什么培根和他的同行要从事这么一件既复杂又晦涩的琐事，利用（假定的）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不具备多少才能的莎士比亚作为他们的替身，他们到底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

①* “hog”这个词频繁出现在各种莎士比亚戏剧集的第三十三页上。

* 莎士比亚作品中的水印显示出玫瑰十字会或共济会的标志，包括玫瑰十字架、瓮和葡萄。

* 在许多莎士比亚作品集中都有页码的标记错误，好几个印刷厂连续出现同样的错误，这代表了培根密码的关键所在。这些错误通常涉及到以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和五十四结束的页码，比如，第一版和第二版的两个版本的对开页都标错了，把一百五十三页错标成了一百五十一页，二百四十九页和二百五十页分别被错标成了二百五十页和二百五十一页。

* 莎士比亚出版作品的装饰性设计融入了玫瑰十字会的图案标志。

呢？培根怎么可能创作所有归功于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诗歌，而同时他还得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包括詹姆斯国王钦定版《圣经》的最后编辑工作？古代神秘传统和古人智慧的手抄本作者曼里.P.霍尔，提出了一个解释：

> 培根不仅仅被当作一个人看待，他还是一个无形的机构和一个世界之间的焦点，这个世界永远无法把信使和他所传播的信息区分开。这个秘密团体重新发现了那个时代遗失的智慧，并且害怕这个知识会再次失落，于是通过两种方式使之永恒：（一）通过一个团体（共济会），以符号的形式向其新入会者揭示它的智慧；（二）通过巧妙的数字组合和谜语，利用那个时期的文学载体来体现它的奥秘。

为什么要那么秘密和复杂呢？霍尔的解释是这样的：

> 有证据表明一个由聪明而显赫的兄弟会成员组成的团体的存在，他们承担起为后代出版并保存精选的古代秘密之书的责任，同时还包括由他们自己提供的其他特定的文献。他们兄弟会的未来成员不仅可以辨认这些书籍，而且还能立刻注意到里面重要的段落、词汇、章节或部分，他们创造了一种象形设计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字母表。通过某种特定的线索或顺序，那些能够辨认清楚的少数人就可以找到那种能够把人类“提升”到一个光明生活的智慧。

也许吧。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小的问题没有解决，玫瑰十字会会员著述的作品来源何在，作者又是何许人也。

当罗森克鲁斯的书籍和这个团体出现的时候，人们对此充满了极大的兴趣，每个人都想加入、确立或者复兴这个组织，一个叫做约翰·凡勒丁·安德里亚的路德教会本堂牧师站出来，做出了一个震惊世人的供认，是他写作了《化学婚礼》以及前两本书。有关玫瑰十字会的整个故事都是一



约翰·凡勒丁·安德里亚的家族盾徽，盾牌上有玫瑰和十字架。

个骗局，安德里亚承认说，他是想对炼金术和失去控制的热诚的皈依者进行嘲讽。

基督徒罗森克鲁斯从来没有来到过这个世界上，他也从来没有为了寻求古代的阿拉伯秘密而到巴勒斯坦游历，包括他从来没有建立过一个秘密团体，显然，他活了一百零六岁，并且在他死后的一百二十年被人发现他的尸体被完整地保存着，且没有任何变化这些都是谎言。他和他的游历都是安德里亚想象的结果，其他什么都不是。他写作《兄弟会传说》的时候完全是出于恶作剧，当许多人那么认真地看待这本书以后，他才又增补了第二本小册子，以及第三本书《化学婚礼》。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安德里亚确实有爱搞恶作剧的名声，在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因为在校长办公室门上用钉子钉了一张诽谤的纸条，而被否决了参加期末考试的权利。没有取得大学学位，接下来的几年他都用在了穿越欧洲的徒步旅行上，然后又回到学校学习，成功地写完了礼拜仪式的试题，这时他 25 岁。在安德里亚承认他像现代魔幻小说作者虚构故事情节、背景和人物一样，杜撰了罗森克鲁斯这个人物和他的团体，人们开始注意到，他的家族盾形纹章确实是由玫瑰和十字架图案组成的。现在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这个新组织内最狂热的成员中确实有人怀疑。如果安德里亚能够声称他出于恶作剧的目的写作了罗森克鲁斯的故事，一些人纳闷，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个所谓的坦承不是一个真正的恶作剧呢？或许他写作这些书的目的，就是激励人们做善事，追求秘密的利益。即使罗森克鲁斯的生活完全都是虚构的，他们继续争辩说，它确实激发了一种有利于世人的观念的形成，激发了能够给予人类洞察力和精神价值的哲学的发展。也许，我们可以假定，安德里亚是这样声称的，这些故事存在的目的就是期望那些信奉其原则的人能够创建一个团体，而他们确实这样做了，那么，这又有什么呢?

争论还在继续。如果，当然这是可能的，基督徒罗森克鲁斯和他秘密

追随者的故事完全来自安德里亚的想象，这也只是他的时机到来了。但是首先，到底是什么激发他杜撰了这样一个故事呢？问题的答案也许就在罗马的百花广场，一六〇〇年二月的一个早晨，经过了八年的牢狱生活和折磨，神秘主义者和多米尼加前牧师乔达诺·布鲁诺因为被控散布异端学说而在火刑柱上被处以火刑。



玫瑰十字会之父可能是乔达诺·布鲁诺，他颜色偏暗的塑像就在罗马的百花广场上方忧思着。

布鲁诺是历史上最能激起好奇心和最神秘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教会反叛者。这个人坚持，自由地思索神学和存在的问题，而不应该受到教会的限制。他在欧洲和英国进行了广泛的游历，受到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接见，布鲁诺的想象力和感知力使得他到达了一种曲高和寡的境地，教皇权威对此也持否定态度。布鲁诺抵制对炼金术和所谓的神秘力量的信仰，而只相信他自己的演绎推理和集中的洞察力。他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无限的空间，里面存在其他的生命形式，并且进一步强化了哥白尼地球围绕太阳运转的学说。他也首创了对统计学的研究和评估，为需要的人提供援助，并对一些领域进行了探索，这在十六世纪还被科学家认为是不可知的事情，并且是亵渎上帝的行为，而如今，小学生都能够不费力气地讲得透彻而明白。

布鲁诺为真理殉难后，他的作品开始四处传播，尤其是在新教国家，因为在那里可以大胆地宣传哥白尼学说和其他理论，而不用担心受到宗教裁判所的惩罚。安德里亚非常仰慕布鲁诺，这个多米尼加人拒绝把炼金术作为一个严肃的话题探讨，也许这个事实激励了安德里亚，他提出为穷人的利益从事善举，并且坚持不要受到教会的监督。如果《化学婚礼》反映了布鲁诺对炼金术的嘲讽，那么，罗森克鲁斯下令实行慈善活动，而不要受到来自教会的任何参与，就可以作为是对布鲁诺理论的表达，这就能够回答安德里亚受到何种激励的问题了。

是否受到了布鲁诺的激励，暂且不说，一六五四年安德里亚过世后，玫瑰十字会的理念继续呈现出发展的势头，这一切都源于一个古老的神秘主义的吸引力以及一个新兴的机械设计——印刷机。

基督教、圣殿骑士团、诺斯替教、德鲁伊教和早期卡巴拉教的倡导者都是用一种古老的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播他们的观点的，手抄本的分布也是相当有限的。玫瑰十字会是第一个利用古登堡发明的秘密教派，这种发明能够快速而廉价地复制成千上万张拷贝。在《化学婚礼》出现的几年之内，复制品就开始在欧洲各个地方散布、翻译和重印，其影响力超过了古登堡之前任何一个类似哲学思想的传播。听到一个过路的陌生人向你耳语一个神秘故事是一回事儿，把它清清白白地印刷在纸张上，而且带有新的解释或装饰，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排他性也为这个教派的猛增提供了另一个动力，阅读能力只局限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社会中享有最多特权的等级，他们对于玫瑰十字会原则的支持和拥护给这个扎根于欺诈的运动增加了真实性。

越来越多的新皈依者不断地接受这个结构宽松的哲学体系，这种浪潮可以说是汹涌澎湃，其结果就是使这个教派同时开始汲取其他团体的信仰观点，并且分裂成相互竞争的小派系，每个支派都声称是兄弟会的“真正”手足。隐居派、诺斯替派、毕达哥拉斯派、东方贤人派、柏拉图派、炼金术士派和帕拉塞尔苏斯派，所有小型教派都聚集在玫瑰十字会这个大伞下面，即使主流成员开始被结构更加严谨的较大教派逐渐接纳。大约在一七五〇年，当玫瑰十字会和共济会出现哲学上的品种杂交后，已经分裂出来的派系又进一步分裂，这时诸如圣杰曼派、卡里欧斯特罗派、斯克罗皮佛派、沃尔纳派和其他支派逐渐从主流中分离出来。在一个世纪内，英国和美国的某个共济会总会长已经创立了一个共属于共济会和玫瑰十字会团体的“大学”。同时，与共济会无关的玫瑰十字会成员开始把他们的组织称为“兄弟之光”。

退出和分裂似乎会挫败玫瑰十字会的生存前景，但是这个团体即使在成员数量上没有变化，至少在地理范围上也扩大了很多。其大部分发展壮大都发生在一八五〇年到二〇〇〇年的美国支持者的拥护下，其中就有像

乔治·利帕德这样的个体的一些激励，他利用其显得怪异的背景来把自己营造成一位丰富而具有神授权力的玫瑰十字会成员。

如果相信玫瑰十字会的故事，我们曾经提到过“智力早熟”这个词，但这个词也并不足以用来描述这个人。十五岁从威斯理安学院毕业后，这个费城出生的利帕德暗自下定决心，任何无法生存在与基督同样条件下的人都是口是心非的骗子。因为不想让自己与骗子相提并论，利帕德成为一个法律系学生，师从于未来的宾西法尼亚州首席检察官。四年时间他都与律师为伍，这促使利帕德把这个职业界定为教士的范畴。鉴于他强烈的犬儒主义观点，他认为最适合自己的消遣就是从事新闻事业，他开始为著名的《星期六晚邮报》写作传奇文学和非小说的历史专栏文章。

他坚信完美的道德是最重要的，一八四七年，当他二十五岁的时候，他成为玫瑰十字会会员，这样做是为了同生活中遭遇的一些邪恶势力做斗争，包括美国的蓄奴政策。后来，他成立了联盟兄弟协会，其目的是把玫瑰十字会的基本原则传播给更广大的公众。

利帕德去世的时候只有三十四岁，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的作品则达到了十多部。他穿梭于上层的圈子里，声称与荷瑞斯·葛雷利和埃德加·爱伦·坡保持良好的友谊，据说爱伦·坡的神秘小说的创作就是得益于他的影响。有点罗曼蒂克的利帕德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沿着维莎西康小溪孤独地散步，他甚至选择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在小溪岸边举行婚礼。我们暂且不谈论利帕德的浪漫之处，他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对玫瑰十字会教义的拥护，以及他对美国历史的影响。

根据玫瑰十字会的文献记载，利帕德对玫瑰十字会原则做出积极回应之后不久，就与未来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碰面，他还声称，是他激起了林肯对废除奴隶制的兴趣。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林肯和利帕德两人似乎确实见过面，除了玫瑰十字会之外，没有一个人认为是利帕德影响了未来美国总统的行为），安德里亚的恶作剧真的改变了整个世界。

利帕德的一个同时代的人，名字叫帕斯卡尔·贝弗利·伦道夫，也与林肯过从甚密，对美国的玫瑰十字会活动施加了更大的影响。伦道夫的生平故事具有十九世纪浪漫小说中的所有戏剧冲突，不费多少力气就可以改编

成好莱坞电影。他声称自己是西班牙、东印度、法国、东方和“皇家马达加斯加”的混血儿（对于他是美国黑人奴隶和种植园主的白种人调情的产物这一谣言，他一直都猛烈地否决），伦道夫在纽约救济院生活过一段时间，直到后来被一个过气的演员和她的丈夫非正式收养。就像利帕德对宗教和律师的幻想破灭一样，这个经历给伦道夫身上留下了永恒的疤痕，他声称自己是如何亲眼目睹一个丈夫把自己的妻子赶出家门的，目的就是让她为了家庭的生计而从事卖淫活动。“这样，在不到十岁的时候”，伦道夫写道，“我就对人性阴暗的一面相当了解了……到了十五岁上，我就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摸爬滚打了”。

周游世界的这几年中，他成了一名出色的记者，后来，伦道夫开始对玫瑰十字会运动产生了兴趣。他首先加入了德国的组织，然后在一八五一年回到美国，在那里，他也像利帕德一样，被引荐给了林肯。与利帕德不一样的是，伦道夫从来没有声称自己说服林肯对奴隶制采取抵制的态度，但是两个人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实际上，林肯总统遇刺后，在尸体运回伊利诺斯州时，伦道夫曾经被邀请与载着总统尸体的火车一同前往，由于他属于有色人种，最后被赶下了车。

不久以后，在德国的一个秘密会议上，伦道夫荣获了玫瑰十字会在西方世界的最高总会长头衔。他建立了玫瑰十字兄弟会，成为美国玫瑰十字会的真正中心，他把余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推进玫瑰十字会的理念上，即通过古代神秘方式取得最终的智慧，并且还从事写作，可以说他的作品颇丰。玫瑰十字会历史学家认为，他写作并出版了二十多部作品和小册子，大多数都是改变人们把玫瑰十字会与爱、健康、神秘主义和超自然力量相联系的观点的。一些书名大胆的图书，比如《处理死者》（一八六一年）、《爱及其隐藏历史》（一八六九年）和《吸烟习惯的邪恶》（一八七二年），



帕斯卡尔·贝弗利·伦道夫。他与亚伯拉罕·林肯的亲密关系并没有使他有资格坐上葬礼火车。

伦道夫试图吸引大量读者的兴趣，但这些人可能通常会对这些书置之不理，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汲取东方神秘主义的思想和中世纪的超自然习俗。

伦道夫最后的生活证明他几乎与林肯一样具有悲剧性，一八七二年，他被逮捕，指控的罪名是推进“自由性爱”和不道德行为，法庭文献资料表明，这个指控是他以前的商业伙伴蓄意捏造的，因为他们想要得到他作品的版税。尽管伦道夫最终被宣布无罪释放，但是他不得不为自己辩护，这个事实始终没能让他释怀，最后他被发现死于枪伤，系自杀。尽管伦道夫只活了四十九岁，但他设法在美国范围内提升了玫瑰十字会运动的意识和力量，他作品里展示出的动力一直持续到下一个世纪。

伦道夫也许帮助扩大了玫瑰十字会的影响，这使得它在会员数量上仅次于共济会，但他却无法克服分裂教派的影响，这种状态从一开始就困扰着这个组织。每个支派都把自己的信仰和局限强加给其成员。这些变种通常是国与国之间文化差异的结果，到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玫瑰十字会已经发展成与其他国家迥然不同的教派。

众多组织中的每一个都声称自己是这个运动的真正原点。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伦道夫的玫瑰十字兄弟会；C.F.玫瑰十字会[①]是一个非常小的团体，起源于英国和苏格兰的共济会，在接受入会之前，会员首先必须是共济会成员；美国玫瑰十字会是从SRICF派系分裂出来的，只接受非共济会成员入会；玫瑰十字会联盟，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欧申赛德建立的，旨在推进占星术和其他秘术的邮购服务；玫瑰十字会见神论联盟，致力于研究大自然的神秘法则，并帮助人类“达到自觉的不朽，这是进化的最高成就”；莱克托利姆玫瑰十字会，起源于荷兰的与美国同类的支派，目的是传播其创立者J·凡·瑞肯堡的教义；A.A.协会，其创立的目的只在于促进美国黑人的玫瑰十字会价值观；以及古代神秘玫瑰十字会。

所有这些支派中，AMORC声称是规模最大的，其成员也是最活跃的，其在原则上唯一“真正的信仰者”可以追溯到这个组织的根基。它的创立者是一个名叫哈维·斯宾塞·刘易斯的人，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耗

---

① 简称SRICF。

在了旅行上，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地理位置上都是如此。他于一八八三年出生在纽约城，刘易斯在这里以及在法国和佛罗里达主要从事他感兴趣的神秘之事，直到后来定居在旧金山附近的圣何塞。AMORC 在圣何塞的总部是个复合建筑，包括玫瑰十字会大学、一个天文馆、玫瑰十字会研究图书馆，其中最壮观的要数埃及博物馆，就凭着这一点，这个建筑成为当地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

仅仅依据设施而言，AMORC 有理由自诩为世界上最大的玫瑰十字会机构，尽管这个组织拒绝透露其成员的规模，但它在九十个国家里都有自己的小团体，每年都要举行集会，并出版了两本杂志，一本是针对普通大众的（《玫瑰十字会文摘》），另一本则仅限成员阅读（《玫瑰十字会论坛》）。

AMORC 竭尽全力为自己正名，它不是一个宗教团体，而是“一个非营利的教育慈善机构”，帮助其成员“更好地欣赏建立在他们个人宗教和哲学信仰之上的神秘主义原则”。该团体认为其成员“是务实的人，他们相信进步、法律、秩序和自我发展……（他们）不……赞同错误的行为，努力……提升人的自信心，（并且）教会……他们对妇女的忠诚和尊重（原文如此），以及对法律、社会和世界的忠诚和尊重”。这是一个可能让约翰·韦恩[①]都引以为豪加入的俱乐部。

他们对自己的描述变得越来越富有正义感，其具有崇高精神的成员必须具备三种品质：一个纯洁的生活，“具有男性气概，而且强壮，但是纯洁无瑕”；“探索大自然神秘之处”的渴望；以及乐于“牺牲自我的发展，同时帮助别人走上正路”。

在所有这些义正言辞和派系分裂中，玫瑰十字会的信仰系统似乎被人们忽略了，实际上，这都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它根本不存在。

玫瑰十字会在确认他们理想的个性特点和价值观方面反应非常敏锐，但他们却拒绝评注任何像信条或教义这样不可动摇的东西，他们声称自己不是提供一个公式，而是一种研究方法，正如 AMORC 所说：

---

① 好莱坞以演西部片著称的演员。

我们不提出一种信仰系统，也不颁布教义上的命令，而提供一个私人而实用的生活方法，每个学生都应该通过自己的经验学习并掌握之。我们的教义不会试图命令你应该想些什么，我们想让你们自己独立思考，我们所提供的只是能够使你们达到这个目标的工具。

玫瑰十字会的一个不同寻常的方面是其对谦虚的强调。其他组织可能会以引起注意力为乐趣，看看圣地兄弟会就知道了，但玫瑰十字会更喜欢不出风头。鲁本·斯温博恩·克莱默在二十七岁的时候就成了玫瑰十字会的总会长，并出版了几本相当于玫瑰十字会宣言的书籍，根据他的观点，“一个真正的玫瑰十字会成员不会通过秘密的手势、庆祝、虚荣的财富展示……或者无意义的仪式；相反，真正的玫瑰十字会成员应该是这样一个人（男人或女人），在工作中默默无闻，在讲演中思路严谨（没有夸大，‘我是一个玫瑰十字会成员’），他也会做善事，服务一切，并且记得‘真正有力量的是善良而不是知识’”。

对于那些把玫瑰十字会价值与共济会混为一谈的人，克莱默谴责道：“与共济会不同，玫瑰十字会没有特殊的戒指，他们也没有（像一些秘密团体一样）穿戴玫瑰十字架，或者拥有任何能够让他们鹤立鸡群的东西，真正的玫瑰十字会会员甚至不会在乎是否被人知晓。他们更喜欢研究和工作，而不是在好奇的大众之前展示自己。”后来，克莱默又增加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比喻：“真正的金币在经过这个世界的时候默不作声，而你的赝品无论在哪里，都会发出巨大的噪音，伪玫瑰十字会成员亦是如此。”

毫无疑问，为社会做有益的工作，同时还把自己隐藏在谦虚的外衣后面，这是一种值得褒奖的品质。然而，它确实也产生了一个严重的缺陷。如果你的善举都是秘密进行的，外面的世界看不到你慈善行为的证据，而且鉴于公众更容易把秘密等同于邪恶，可能就会出现相反的效果：你产生的不是敬佩，而是怀疑。

玫瑰十字会可以如此地向每个人保证：所有成员都是道德楷模，他们

寻求最纯洁的精神成就，鉴于这些理由，他们更愿意用一种最谦虚的方式做事，即采取秘密行动，而这些都与他们值得称道的品质南辕北辙。

在二〇〇五年的一期《玫瑰十字会文摘》上，一个名叫斯凡·约翰森的作者，也是大家公认的欧非英语语言司法权大分会的总会长，他提出了神秘主义发展的七个要素。①

在约翰森冗长而接近聊天式的文章里，读者获悉，这是来自于“世界和平会议上的总会长或者权威统治者所提出的论述”。最初，按照计划，这些论述是要集结成书出版的，但是，“由于一些论述含有高层次的专论”，最后的决定是不透露其具体的内容。

为什么要保守秘密？“高层次的专论”对普通的读者而言，是不是理解起来太有难度了？还是许许多多的总会长聚集在一起探讨玫瑰十字会之内或之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更喜欢把秘密保守起来？

---

①这些要素本身并不是那么神秘的，根据约翰森的观点，这些要素包括想象力、专注力、形成思维图像、冥想、沉思、心理参与以及致力于上帝的经验，对于“上帝”，他界定为“最伟大、最包罗万象的真实存在。”

第七章

三台会

文化娱乐

大多数秘密团体都来源于一种需求，传播或捍卫他们的宗教信仰的需求。不同的信仰之间通常会发生两败俱伤的战争，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把该团体的真实原则隐藏起来就变得非常有必要。但这似乎主要是西方国家的现象，其根源可能在于单一的教义可以有众多的诠释，每个教派的皈依者都把任何一个意见纷争看做是异端邪说的表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尤其是新教教派分裂成数量众多的宗教诠释。我们也可以从阿萨辛派的例子略见一斑，穆斯林自己就分裂成相互对立的几个教派，其结果是更深入的怀疑和暴力冲突。没有什么能够像怀疑（以及遭受迫害的少数人的需要）那样滋生出对秘密的关注了。

在很大程度上，东方团体都在竭力避免由于相互冲突的教义而引发的痛苦，也许这是因为佛教的盛行，而且这也是一个公认的前提，即在大多数东方文化中，宗教主要被看做是一个私人的问题。如果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团体不会对个人生活形成威胁，那么宗教就无法成为对个人安全担忧的理由。当谈论到秘密团体的时候，中国的三合会把东方和西方文化的明显差异全部反映出来了。其根源几乎完全在于古代的民族主义和文化差异，只是在最近几年来，他们才偏离了正轨，从事一些原始的犯罪活动。

西方人对三合会的评价是从种族主义的视角进行的。尽管暴力并不是三合会闻所未闻的事情，但是跟诸如黑手党和日本黑社会这些团体比较来看，确实出现得很少。并且它也仅仅局限在中国的土地上，那些沦为三合会活动牺牲品的西方人充其量也只是附带的损伤，他们并不是主要的攻击目标。在其他方面，三合会满足秘密团体的许多经典特点，它与任何秘密团体一样封闭而具有仪式性，但比大多数都更加活跃。

西方人也错误地把“三合会”同“堂”或“亚洲帮”混为一谈，堂[①]是十九世纪的一个社会组织，由到美国和加拿大做劳务的中国移民创立。从十九世纪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这些劳务人员的生活，以及他们被操纵在西方人手里的命运，不仅仅是历史上的一个污点，而且也是历史的耻辱。在加拿大，一万七千中国人被带到那里建造横贯大陆的铁路，他们拿到的工资还不到白人工资的一半，铁路修成后，甚至有七百多的苦力失去了生命。在美国，中国人成了黑奴之后的廉价劳动力，用于运送奴隶的许多古旧木船纷纷改变了航线，不是把非洲人运过大西洋，而是把中国劳工运过太平洋。

在北美，他们曾经被迫从事一些服务性工作，这是欧洲移民所不屑做的事情，大多数工作都被分类为“女性工作”，包括做饭和洗衣服，所以基于实用的或许是种族主义的原因，只有男性中国人才被获准进入北美，他们的地位与美国黑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类似。在绝望当中，中国人成立了帮会。

在中国南方，许多村子的家庭都共有一个祖先，这是很普遍的事情，堂为那些未婚的男性移民提供了援助和安慰。在异乡，他们常常感到孤独——无论在社交上还是在文化上。堂给他们提供服务和建议，这些是他们从其他渠道无法获得的，堂一方面保护了中国人不受剥削，一方面提供了经济援助、法律咨询和社会服务。

最初，这些剥削者都是白人老板，但随着多年来中国移民的数量不断增加，堂也帮助保护中国人不受其他势力的剥削，这些可能是他们在本国非常熟悉的。这些人包括一些力量强大而且显赫的家族成员，比如李姓、谭姓，以及四邑方言片[②]，他们是生活在广州附近的中国人，通过血缘或传统，他们相互之间非常忠诚。堂的成员不是靠血缘和传统作为联结的纽带，他们坚定保守秘密和保持忠诚的誓言，增加了一些秘密仪式、私密代码以及秘密手势，作为相互识别和打交道的一种方式。

十九世纪有一段时间，堂在对一个遭受剥削的民族提供安慰和安全感

---

①“堂”的意思是“会议厅”。

②台山人。

方面被证明非常有成效，然而到了一九〇〇年，中国团体内部的犯罪元素已经控制了较大、更有效力的堂，利用它们来对赌博、卖淫、贩毒、征税和其他非法活动进行控制。在保护自己和扩充领域方面，堂的规模变得更大，更有力量，也更加无情，因而引发了一场“堂斗”，有几十名成员都卷入其中，在纽约和旧金山的街道上发生冲突。他们手持刀剑和斧头，不同帮派之间一顿乱砍，直到街道上血流成河，不幸的伤者在人行道上挣扎着。

实际上，类似的冲突非常稀少，而且也没有那么暴力，这与当时煽情的新闻报纸的描述大相径庭。后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读者们，战战兢兢地蜷缩在一起，对中国人参与暴乱的带有种族倾向的描述感到很吃惊，但其实这与遍及美国矿区和港区的暴徒叛乱比起来，还是远远不及的。也许堂斗中最悠久的传统就是这样一个描述，堂的一个成员在头顶上挥舞着切肉刀，他的武器以及决心导致了这样一个称号的产生，就是“打手”，比起唐人街上所发生的事情，这在今天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里更加常见。

堂在北美继续起着作用，直到后业几代移民的到来时，它们的权力和影响力才经历了严重的淡化，对于这些人而言，堂最初的前提和功能既没有受到重视，也不是必需的，然而，三合会却是另外一回事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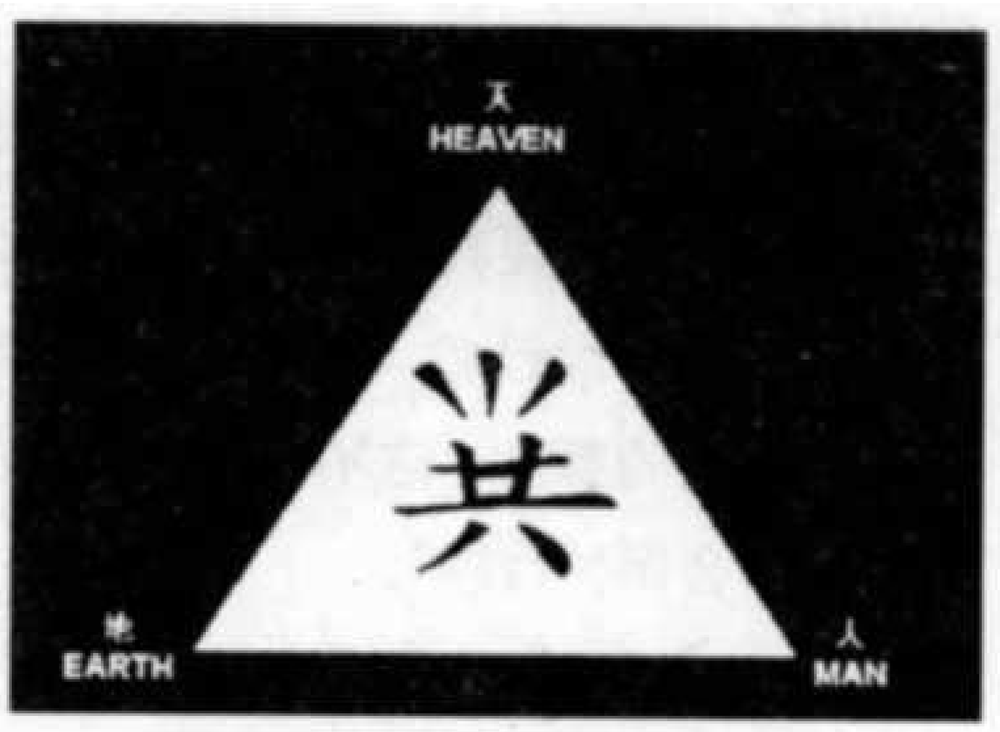


清朝的旗帜，推翻清朝统治者的努力激励了早期三合会组织。

中国的秘密团体与对皇帝的文化崇拜有关，这个传统由来已久，古代皇帝就像天主教会的教皇得到的崇拜一样，而且曾经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这个传统表明，中国皇帝拥有特殊的品质，包括绝对美德、诚实和仁慈。在诸多方面，早期的中国皇帝在其臣民眼里，就像基督教徒对待耶稣一样，他们被认为是地球上的天子。

与基督教对待耶稣不同的是，中国人普遍认为天子也是一个凡人，如果他失去了作为皇帝应该具备的品质，他的“天赐权力就会丧失”，臣民们就有责任举行起义，废除这个皇帝。

在公元九年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时的皇帝汉哀帝因为试图让他的男宠继位，于是王莽废除了他。当王莽成功地黄袍加身，稳坐帝位的时候，一群臣民聚集在一起，试图恢复汉朝。[①] 在一次战役中，他们在自己的眉毛上涂上红色的颜料，并称自己为赤眉军，他们协助王莽，并且把大量新的汉朝家族成员安插在王位附近。于是在一个大家都广为熟知的发展过程中，赤眉军不但没有解散，终止自己的行为，反而把他们的作战技能转向了普通的老百姓，成为到处漫游，并对国家形成恐怖威胁的土匪。



“三合会”这个词来源于洪门所使用的三边图形。三边分别代表天、地和人。

五百年以后，一个新的组织出现了，他们称自己为白莲教，他们是受到迫害、虔诚的佛教徒。许多历史学家都把白莲教看做是真正的三合会的创始者，尽管真正称得上这个称呼的组织要到一百年之后才能出现。

真正的三合会组织的第一次出现于一六四四年，当时满族人推翻了明朝皇帝，建立了清朝。由一百三十三名佛教僧侣组成的一个团体，他们立下血誓，要光复明朝，许多年来，他们同满族人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但

---

① 上述观点系作者本人观点。

他们的反抗最终证明是无用的，一六七四年，除了五名和尚，其他全部被抓，并遭到了残忍的杀害，作为他们总部的寺庙也遭到了摧毁。

幸存的那几名和尚，出于对入侵者的憎恨，发誓要伺机报复。他们组成了一个秘密团体，旨在彻底消灭满族，他们选择了一个三角形作为象征，三个边分别代表天、地和人，这也是中国哲学中的三个基本元素。三角形的选择还有其他的含义，中国文化非常注重数字的意义，数字“3”就被视为具有特殊的力量，尤其是从犯罪的角度来说。比如勒索比率，通常就是三七开的。这五个和尚，也就是我们今天称作的“五祖”，把他们的这个组织叫做“洪门”，或者更为大家熟知的天地会，三角形也是他们的象征。因此“三合会”这个词几乎是西方人专门使用的。中国人通常把这些团体叫做“黑社会”，从字面上翻译就是“秘密、不详或邪恶的团体”。

虽然“洪门”没能推翻清王朝，但是多年以来，它的活动一直非常地活跃，他们与白莲教合作，对清朝的统治形成干扰，他们也影响老百姓为捍卫正义而举行起义。其成员对佛教充满敬意，他们对农民的权利和生计表示出极大的尊重，这不免让我们想起了这样的格言“军队保护皇帝，但是秘密教会保护百姓”。

三合会没能实现推翻清朝的最终目标，清朝继续与百姓疏远，三合会还在继续发挥着作用和影响力。直到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前，人们都是正面地看待这个团体的成员的。尽管三合会仍然关注其政治和文化目标，但是英国统治者对它们的存在感到非常不舒服，他们宣布该团体“与维护良好秩序不相容”，声称它们增加了“犯罪和犯人逃跑的便利”。遵从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力量对中国的统治模式，英国政府宣布，加入三合会不仅是犯罪，而且甚至假装加入也是犯罪，惩罚是：三年以上的监禁。如果三合会直到这个阶段还没有犯罪的企图，那么，这种恶毒的高压法令无疑把它推到了那个方向。

一八四八年，洪门与广东地区的一个新秘密团体合作，这就是拜上帝教，他们一起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对广东进行围攻，并且在上海和其他

城市发动起义。到了此时，三合会仪式仍然强调正面的社会品质，太平翻译过来就是“世界和平与社会和谐”，由于中国受到英国、美国和法国统治者的压迫，三合会代表了这个国家对外国侵略和掠夺的唯一有组织的反抗力量。



诸如这样的反叛者义和拳，他们试图把外国入侵者赶出中国，却把三合会推向了全面犯罪的深渊。

一九〇〇年，来自英国、德国、沙皇俄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和奥地利八个国家的两千多军人，在英国海军司令爱德华·西摩尔的带领下，于一九〇〇年六月大举入侵中国领土。义和团和中国皇室的强烈反抗挫败了西摩尔的力量，促使他全军溃退，并回去请求救兵增援，八月，两万增兵赶到。占领天津之后，外国入侵者又长驱直入，于八月十四日到达北京。

占领中国的列强军队的数量在几个月后逐渐扩大，完成了对北京的占领，然后逐渐延伸到农村地区，目的是捕获反叛的义和团的成员。一九〇一年二月，中国政府同意解除义和团，在那年的晚些时候，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签署了一份和平条约，从官方角度制止了义和团运动。中国的主权和尊严都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当外国列强被获准巩固他们的利益，并且继续他们的剥削活动的时候，中国人更是受到了严重的侮辱。这个事件产生的连锁反应一直延伸到二十世纪。

从那以后，三合会很清楚地看到，他们在决定中国的国家利益方面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义和团与任何其他的三合会一样，从事着秘密的地下活动，他们不仅没能保护国家，反而被彻底镇压下去，侵入中国的外国列强在中国各地驻扎，他们全副武装，决心镇压任何国内的起义。

这时，三合会开始向内发展，如果他们不能在抗击外国入侵上取得胜利，他们则可以通过剥削自己人获得成功。他们在力量上越来越强大，并逐渐使自己摆脱非中国人的影响或威胁，尽管他们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对中国的政治事件发生兴趣，并施加影响。

孙中山国民党政府的继任者蒋介石也是三合会成员，这几乎没什么疑问。当中国共和政体由于内战逐渐走向消退，而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力逐渐增强时，蒋介石试图取得三合会的支持，但是此时，什么也挽救不了蒋介石的腐败团体了。毛泽东领导人民在一九四九年取得胜利，把蒋介石及其追随者赶到了福摩萨[①]，那些选择留在大陆的三合会领袖被四处追击，然后被处死。有几个逃往了葡萄牙政府统治的澳门，或者香港，在那里，他们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港英政府继续宣布三合会是非法团体，但却没能以严苛法律来制裁他们。

二十世纪的后半叶，香港成为许多全球企业的总部所在地，也成为了三合会的活动中心。其中最大、最著名的团体就是 14K，这个名字来源于一个地址（广东波湾路十四号），以及其创建者的首写字母，国民党少将向前，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成立了三合会，就在香港这一个地方，14K 的会员估计就达到了二万五千人，14K 组织是海洛因买卖的主要参与者，其分支机构遍布荷兰、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简称 RCMP）的调查者声称，14K 和其他三合会组织在遍及北美每个重要的中国社区，几乎从事任何一种能够获利的犯罪活动，从勒索和放高利贷，到信用卡诈骗和盗版活动。

三合会越是远离其文化和政治目标，转而从事犯罪活动，他们对自己的秘密仪式就越是在意，他们进行了改良，并增加了一些新的复杂仪式。该会的入会程序的核心仍然以其历史背景为基础，复杂的仪式需要八个小时才能完成。其中新入会者要完成的一个仪式就是“经过一道剑墙”，在这个仪式里，他们要缓慢地穿行于摆放在他们头顶上方的令人恐惧的一排剑中。

新的三合会成员要学会秘密握手和微妙的信号，这是该团体长久以来形成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手拿筷子或者放下筷子的方式，以及喝酒时用几根手指握住高脚杯，都在三合会成员之间传达着重要的信息。他们还使用特定的短语来表达只有他们之间才能懂的信息。RCMP 对三合会的理

---

① 6 世纪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台湾省的称呼。

解和评估要比任何其他的西方警察局都要有影响，根据他们的报告，“吞云”曾经指“吸食鸦片”，而“黑狗”则是枪的暗号[①]。加入更有势力的三合会可能包含有活鸡斩首的仪式，他们把还在扭动的鸡身上流出的血倒在一个大碗里，然后与入会者的血液混合，再加上大量的酒，在场的每个人都要喝这种经过调和的酒。喝完这个酒和血的混合物后，他们就把酒碗摔在地上，这样做是要表明，任何可能违背三合会信仰的成员，都要遭受与这个碗同样的命运。

新的三合会成员必须宣誓，他对这个团体的忠心将会超出他对家人和爱人的忠诚，这个宣誓过程包括三十六个誓言，可以追随到十七世纪三合会形成的阶段。入会誓言非常具体，而且要求很高，不容动摇。在第一个誓言中，新入会者宣誓，他必须像对待自己的亲戚一样“对待宣誓会友的父母和亲属”，并且“如果我不遵守这个誓言，就会被五雷轰顶”。在第四个誓言中，他宣誓：“当我的会友确定自己身份的时候，我将永远承认他们；如果我对他们不予理睬，那我就会被乱剑穿身。”用这么多的誓言，新会员保证他必须“忠诚或被处死”。

第三十六条誓言反映了最初的三合会目标，这对于所有的堂都是共同的。“进入堂门之后，我将会忠心而诚实，将会发奋推翻清朝，光复明朝……我们的共同目的是为我们的五祖报仇。”这个誓言至少过时一百年了，但是作为这个团体的传统，仍然将其列为其中的一条，这给他们的活动增加了一丝神秘的色彩，这也总是秘密团体想要得到的一个组成元素。

三合会成员所授予的头衔与数字命理学有关，这又延伸了该团体的神秘性。所有的三合会成员都以两种方式加以区分：通过一份工作的描述，用一种无甚关系的方式，说明他们在组织内的责任；还有一种就是通过数字。

该团体的领袖叫做龙头[②]，称为四八九，这三位数字加到一起正好是

---

①这里使用了“曾经”，因为在1987年的《RCMP公告》一期以及随后的几期杂志上登载了一系列的密码之后，如今三合会可能不会再保留同样的解释了。

②又称香主或老大。

二十一，中国汉字的二十一与“甘”这个汉字非常相似，再者，二十一也是三[1]乘以七，数字“3”在中国文化中受到的尊重就像西方国家一样。这样一来，四八九就设法归纳了一个团体的生命周期。

这个团体的财政顾问所充当的角色与美国黑手党的军师一样，被叫做白纸扇，数字代号是四一五。受过功夫训练的执法者，也叫红棍，其数字识别是四二六。其他工作人员包括草鞋，代码四二六，他们负责交流沟通；副香主，代号四三八，是龙头的各种代理。四三八这个数字也用于香主，这些人主要掌管仪式，三合会中最低的级别，叫四九仔，他们的代码是四十九。

在三合会和意大利黑手党之间进行对比是一件很吸引人的事情，两者的区别非常显著。黑手党的核心可能是意大利，但在过去，它还策略性地与其他种族团体加以合作，尤其是与犹太和爱尔兰的罪犯团体进行合作。相比之下，三合会在成员资格和文化上一直保持着中国人的特色；与意大利为基础的罪犯不同，他们对于自己定位目标的个体和组织不做什么分别，三合会只选择中国人作为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尽管三合会跟美国黑手党和日本黑社会团体之间都存在某些联系，但是三合会是这三个秘密犯罪元素中最独立和最私密的。

三合会与黑手党之间的另一个主要差别在与结构和纪律。任何看过电影《教父》以及《黑道家族》中一段情节的人都可以证实，这支有组织的意大利黑帮结构严谨，而且控制紧密，就像任何公司一样（或者曾经如此，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意大利黑手党必须接受来自上方直接权威的认同，才能从事任何赚钱的活动，并且达成一致，把其获利的一部分上缴给这个权威。如果对这个法则置之不理，或者公然反抗，那么惩罚是相当严厉的。

三合会就没有那么严格了，上级到下级的批示，下级给上级老板提交利润，这个概念根本就不存在。下面就是香港著名的 14K 三合会的一个会员的描述，这是在一个讯问程序中，对澳大利亚议会犯罪调查员所作的一

---

① 构成三合会标志的三个元素——天、地和人。

个回答：

> 我不必按照百分比把任何利润上缴给14K领导，三合会的运作方式不是这样的。三合会成员会为对方做有益的事情，互相提供介绍和援助，互相商讨犯罪计划，但是一般来讲，三合会不像意大利黑手党那么纪律严明，结构紧凑。比如，三合会成员在从事一个特定的犯罪之前，不一定就得得到龙头的批准……另外，在……传统的中国假期，比如中国的新年，三合会成员通常会把礼物送给“大哥”或“大叔”，他们通常是三合会的官员级人物。

可能存在这样的争议，就是三合会成员相比黑手党而言，他们更加讲究高明的技巧，而黑手党的残忍嗜好简直令人发指。三合会的执行者可能也很直接，但是在采取真正的谋杀之前，通常会用一种微妙的方式表达出他们的威胁。一个选择公开反抗三合会威胁的香港商人，收到了一个切断的狗头，也许这个执行者对那个经典的场面不能释怀，就是《教父》中割断的马头那个情节。只有当那个人对威胁置若罔闻的时候，几天之后他才被施加死刑。

他们有限的联系使得西方的执法组织很难介入其中，北美的中国社区是所有种族中最孤立隔绝的，他们有正当的理由怀疑旁观者探究他们的文化。因此，对三合会领袖的接近通常涉及到打开两层防护网：一层是所有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竖立的广泛的文化壁垒，另一层是三合会成员之间佩戴的秘密面纱。

法律执行官所面临的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三合会具备与当地警察力量达成和解的能力，尤其在香港更是如此。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大陆之前，香港皇家警察（简称RHKP）不具备充足的任何形式的犯罪情报系统，可还似乎降低了殖民地内三合会的规模和影响力。但是一九八三年的一个详细的研究揭示了这个秘密组织的真实规模。该报告也揭露了RHKP内部非常严重的腐败现象，包括高级警察官员与三合会领袖之间在毒品买

卖上的长期勾结。许多 RHKP 官员通过与三合会的联系而变得相当富有，根据 RHKP 提供的消息，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之前，有许多官员从香港移民，并且带上大量的钱财，到国外定居后，在当地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一九九七年七月香港回归中国，也促使一些三合会成员移民海外，逃避必然的追捕，但是许多熟悉共产党体制的评论者却充满期待，三合会已经达到了他们先前的影响力。然而，有一个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在英国统治下，被抓到的为数不多的三合会领袖被指认有罪，等待他们的惩罚是监禁。但如果中国政府在香港使用与内地相同的政策，那么三合会的高级成员就面临着死刑的危险。

英国的国家刑事情报局[①]对三合会在英国的活动情况进行了一个研究，该研究起了一个缺乏想象力的名字叫筷子工程。一九九六年 NCIS 的一个报告指出，英国活跃着四个三合会团体，其中任何一个团体都不受香港的控制，因而这些团体并不是国际犯罪集团的一部分。该研究表明，三合会的牺牲品通常是小型企业，它们由中国移民经营，通常避免向英国当局报告案情。研究同时声称，三合会在这个国家的毒品买卖上也不占据主要位置，这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情况不同。

一九八八年，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个研究估计，进入到那个国家的百分之八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五的海洛因都是中国的三合会在控制。然而十年后，美国的调查表明，与东南亚国家和他们的组织相比起来，三合会的主导地位正在逐渐下降，这些国家主要是越南、柬埔寨、缅甸和菲律宾。

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大多数产于土耳其进入北美的高质量的海洛因，都被船运到马赛进行加工，然后再运往美国[②]，其销售完全由黑手党控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三合会领袖从香港移民出去，使得中国能够对这个网络进行控制。绕道曾经控制大量毒品的马赛，三合会建立了其他路线，或者通过阿姆斯特丹，或者直接运往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温哥华，最后把这些毒品弄到美国这个终极市场。大多数调查者都认为 14K 三合会是

---

① 简称 NCIS。

② 这就是著名的法国贩毒网。

毒品的主要提供源。

然而，归根结底，三合会的策略可能就是其毁灭的原因。在北美的毒品市场，三合会的统治地位受到了来自暴力的新越南帮的挑战，这些人置传统和神秘性于不顾，而偏爱原始的身体恫吓。很久以来，越南人就被认为比其他亚洲团体更加残忍和具有进攻性，这种传统从他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首次侵入北美就开始了。正如 RCMP 的一个前禁毒小分队解释的那样："早期帮派的领袖是越南战争的产物，这些人已经非常冷酷无情了，他们也许曾经受过军事训练，或者在街头犯过罪，当（北越）接管时，他们首先定居在难民营，然后他们要经过长期的斗争和生死考验，才能进入加拿大或美国。他们身上没有一文钱，而且已经亲眼目睹了大规模的死亡和暴力，他们暗自庆幸自己能够幸存下来，所以他们真的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事实上，在许多城市，三合会成员已经与一些刑事犯罪活动渐渐疏离，从而避免与更加暴力的越南人的正面冲突，他们更愿意把目光转向中国的企业和个人，把其他市场留给新来者。

中国三合会秘密团体的未来仍然不很确定。一些人推测说，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力量，将会促使三合会活动相应增加，尽管中国对高水平犯罪严惩不贷。还有一些人提出，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中国历来对外国势力比较注重，三合会已经很繁荣了，而且由于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能力和国际影响，三合会可能会回归到重视文化的轨道上来。

不管三合会的发展方式如何，它们将继续保持其秘密性和结构特点，这是自赤眉军聚集力量推翻专横的皇帝，用两千多年建立起来的。在世界上活跃着的所有秘密团体中，三合会仍将维持在一个文化和语言的环境中，没有几个西方人能够对此完全了解。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没有什么比“拒绝作证”更能把黑手党与他秘密团体区分开了，这是黑手党徒的一种严格的保持沉默的行为准则。至少在美国来说，对于黑手党准则和地位的逐渐下滑，有两个黑手党的高级成员的下场表明了这一点：一个是路易斯·（利普克）·布查尔特，一个臭名昭著的雇佣杀手集团的头目；另一个是四百磅重的约瑟夫·马西诺[①]，他是纽约曾经显赫一时的伯纳诺犯罪家族的头领。布查尔特死于一九四四年，神情漠然地坐在电椅上。六十年之后，马西诺给他自己的组织一个潜在的致命打击，这使得急性子的布查尔特突然进入中风的状态。

在他们之间，我们可以见证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一个秘密团体的衰落过程——从权威和统治的顶点，堕落为一群无组织的凶手刺客，如果不是涂上了一笔浓浓的死亡色彩，他们中的许多人的功绩还很具有幽默色彩。

“拒绝作证”就像黑手党本身，不是来自一个犯罪幕后操纵者的阴谋，而是出于中产阶级的西西里岛家族对自己生活寻求控制的迫切需要。像三合会和圣殿骑士团，黑手党以及后代子孙令人发指的行为也是扎根于最初的善良目的。

在有关地中海地区的任何地图上，最容易识别的国家就是意大利，以及其靴形的半岛。意大利靴形半岛的脚趾部分在距离西西里岛海边不到二十公里的地方截止，使得这个岛屿看上去像是一个膨胀的足球，永远地等待着被人踢过大海。鉴于其战略位置，这种比喻非常恰当。几百年以来，西西里岛一直是强大的外国势力的入侵、殖民和剥削的目标。对地中海的

---

① 号称大幼袋鼠。

贸易和殖民化，西西里岛的作用至关重要，对于出入北非、中东和亚得里亚海地区的商队和军队，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港口。

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西西里岛遭到了一系列入侵者的统治，每个入侵者都给岛上的人民和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伊斯兰教的传播把阿拉伯人侵者带到了这个岛屿上，这是在公元八二六年。结果证明，穆斯林对于现存的社会还是相当宽容的，他们允许非穆斯林信奉他们自己的宗教，他们对西西里岛文化的影响是黑手党两种属性的根源，这些属性一直持续到今天。

一个是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在穆斯林到来之前，西西里岛的社会运作就像任何其他受犹太教与基督教共同影响的社会一样，妇女在家庭决策中也占据相对重要的地位。相比而言，伊斯兰法律规定了妇女的从属地位。他们到来之后，家庭内部和文化内部的决定通常就由男人做出了，这种态度在西西里岛文化中扎根很深，而且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而其他受到伊斯兰教影响的基督教国家，则没有这么深的文化影响。

阿拉伯人也把一种内部正义感带到了这里。由于在处理犯罪行为上缺少一套强制系统，伊斯兰力量依靠个人责任感来对犯罪力量进行打击。这两种属性，即妇女的有限权力和通过个人力量谋求打击报复的责任，在伊斯兰入侵者离开这里之后的很长时间，其在西西里社会中还有很深的影响。

在公元一〇〇〇年，诺曼底人随着入侵浪潮接踵而来，他们用一种强加的封建制度取代了伊斯兰的影响，在这种制度下，各个诸侯对他们的庄园主宣誓效忠，并随时准备奉献自己的生命。每个庄园主都以自己的方式行使正义，这就促进了一种大杂烩系统的形成，使得当地西西里岛的居民非常愤怒而且迷惑。西西里岛居民对自己的命运无法控制，并且要听命于外来入侵者的心血来潮，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内部，大力支持这样一种论断，即除了家庭直系亲属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人是值得信任的。只有家庭才能提供安全感和正义感的希望，一个男人犯的任何罪行都没有比背叛家庭更残忍的了。凭借着这样的推断，黑手党的种子就开始在这个肥沃的土壤中种植了。

几百年以来，西西里岛一直是外国势力棋盘上的棋子，一二六五年，教皇克莱门特四世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任命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兄弟，即

法国安茹的查尔斯作为西西里岛的新国王。与他一起到来的是一支数量众多、力量强大的军队，以及完全征服西西里岛人民的远大目标，查尔斯忠心耿耿地执行着教皇的命令，成为所有中世纪统治者中最傲慢、最残忍的一个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针对查尔斯国王和其法国管理者的越来越高涨的愤懑情绪，孕育了一个故事，这也许就可以解释“Mafia”这个词的起源。根据这个故事，西西里人对法国的憎恨是通过一个口号表现出来的，这些具有反叛精神的西西里人相互见面后，会轻声说“Morte ala Francia Italia anelia!”（法国的灭亡是意大利人的呼声）。为了防止法国士兵偷听到这句话，他们把它简化成了首写字母缩略字“Mafia”。这个故事是不足凭信的，大多数字典都把这个词归结于西西里人的一个方言，意思是“夸耀”或者“具有男人气概”，在西西里岛，它未必就暗指罪犯的意思。无论其渊源如何，“黑手党”这个词通常用来代表与西西里人有关的隐藏的和怀疑的本性。

查尔斯和他的军队对西西里岛人民的统治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直到这个岛国的整个居民集体变身为一颗巨大的炸弹，就等着引爆器了。那一天终于到来了，是在一二八二年的一个复活节星期日，而且是以经典的“黑手党成员”的方式进行的。在那天，巴勒莫城一个年轻的西西里岛妇女在去做晚祷的路上，一群法国士兵上来搭讪，并且侮辱了她。几个怒不可遏的西西里岛男人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向法国士兵发动了袭击，当场要了他们的性命。关于他们袭击士兵事件的言论很快传播出去，首先到了附近的城镇，最后穿越了整个岛屿，致使其他的西西里岛男人也加入其中，他们的暴动是爆发式的，很快就包围并彻底击溃了法国的驻防地，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西西里晚祷”事件。

西西里的人民领袖们知道，查尔斯一定会集结力量回到西西里岛进行大屠杀，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于是他们采取了战略性行为，就是向阿拉贡的彼德三世请求援助，他是查尔斯的不共戴天之敌人，并且在西班牙拥有广袤的土地。彼德欣然接受了他们的请求，按照计划，首先宣布对西西里岛行使主权，然后阻止查尔斯对西西里岛人民施行可怕的报复行为。然而在彼德去世后，西西里的命运又落到了西班牙统治者的手里，而且持续了

五百年。

穆斯林允许西西里人接受其他文化的影响，但是西班牙统治者与此不同，他们通过对这个国家的严格审查，实行密切的控制。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西西里岛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而在这个时期，西欧的所有其他国家都沐浴在文艺复兴的艺术和科学的春风中。因此，改变了欧洲文明特点的理性和文化发展，刚好绕过了西西里岛。在这一时期，音乐、绘画、雕塑、哲学、农业、科学、建筑的发展和其他方面的奇迹，那些能够看得见靴子形状的意大利人对于里面发生的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简直一无所知。

封建制度已经在欧洲的主要地区土崩瓦解，但是西班牙统治者还保留着诺曼底人强加的封建制度。在西班牙人的统治下，西西里人所遭受的痛苦比诺曼底的统治还要多，这是因为西班牙人实施正义时更具有歧视性和残忍性。比如生活在西西里岛的一些有权势的西班牙庄园主，就被免除了任何的税务。为了填补这个空缺，其他庄园主必需对他们自己的诸侯和农民征收更高的税务，从而增加了西西里人生活的不平均性。

敢于对西班牙统治者的权威进行反抗的人，要冒杀头的危险，执行死刑的人或者是他们的庄园主，或者是西班牙政府的代表。西班牙统治者的另一个杀手锏就是可怕的宗教裁判所，对于那些以任何方式斗胆说出或者公开反抗权威的西班牙人，这又增加了一个可怕的折磨。

在历史的长河中，其他文化也遭受过类似形式的镇压，但是只有在西西里岛，一个民族的权益受到了如此严重的损害，才使得他们学会了内省，作为一种抵抗和自我保护的手段。只有在西西里岛，那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都没有接受到文艺复兴的正面影响，以及天主教会越来越具有启蒙思想的观点。而且只有在西西里岛，像黑手党这样的组织才能迅速膨胀，他们需要对暴力和侮辱做出直接的反应。

大约在一五〇〇年，欧洲文明开始影响西西里岛，这时岛上的工匠开始组成行会。在其他国家，行会的主要功能是为工匠提供人员培训和确立标准，就像共济会开始在英格兰所做的一样。西西里岛的贸易行会由于其所行使的司法职能，而与其他行会截然不同，它们可以对其成员施行惩

罚，而不需要当地官员的参与，当然了，他们也不值得信任。

行会的兴起与匪帮的形成刚好在同一个时间进行。这不免让我们回想起 500 年前，英国的罗宾汉领导的绿林好汉，这些帮派的人把西班牙君主和贵族作为他们的目标，对他们进行抢劫和谋杀，这种做法代表了想对镇压者进行反击的大多数西西里人愿意采用的方式。他们也把食物分发给巴勒莫以外的乡村里忍饥挨饿的家庭。为了保证分配均匀，这些家庭会选出某个人作为他们的代表，然后在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中间分发。这些人中很多人都是匪帮的成员，被称为分支头目。

就像那些绿林好汉一样，西里匪帮也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民族英雄，把他们当作榜样，对他们的勇敢和功绩进行赞美。其中有一个最著名的人，名叫萨伯纳拉，他在一五七八年被捕并投放监狱。根据西西里的民间传说，萨伯纳拉受到了西班牙统治者的百般折磨，试图从他口中套出同谋的名字，但是萨伯纳拉宁愿痛苦地死去，也不肯背叛自己人，他的勇敢行为成为每个市民的楷模，他们相信，他们的拯救只有通过彼此忠诚才能实现。

匪帮的力量不断地壮大，他们的胆量也越来越大，许多西班牙庄园主不得不放弃他们在乡村的土地，重新回到西西里岛最大的城市巴勒莫定居。到十七世纪初期，大多数大庄园都是由 gabelloti 管理着，他们是由西班牙庄园主选择的德高望重的管理者，gabelloti 最重要的功能是征税，这个任务由 uomo di fiducia 完成，他们被指派亲自走访每个市民，把他们应付的税款装入口袋中。收税者经常有 campieri 的陪同，他们通常是全副武装的骑手，职责是维护和平、博得尊敬。

对于任何熟悉现代黑手党的人来说，他们都知道 gabelloti、uomo di fiducia 和 campieri 构成了早期的黑手党组织示意图，甚至都可以在这里看到管理上的技巧。从一个遥远而富足的地方，传来了向老百姓收取津贴的命令，首先收到命令的是一系列的老板，随后老板做出指示，在全副武装的人员的陪同下，低等工作人员将会对锁定目标的收取源进行亲自走访，从而确保命令的顺利施行。阿尔·卡彭和托尼·瑟普拉诺两人都不可能为这个让他们腰缠万贯的系统草拟出一个更加恰当的图示。

西班牙庄园主从农村退出来，然后指派老板代替他们的位置，这更加

激励了西西里人对自己命运的掌控。与此同时，刚好赶上中产阶级迟来的上升时期，他们通过（在西西里）扮演中间人这一新的角色而寻求富足的途径，取得财富和权力的模式已经确立了，而十九世纪中期西班牙的撤离也为这种人预留出了可乘之机。

西班牙统治者的离开形成了西西里岛权力上的真空时期。一千年来，西西里岛没有一个有效的管理机构，而当西班牙撤离后，只有一个组织能够完成这个任务，那就是黑手党。意大利的建国者和解放者加里波第在一八六〇年到达这里，把西西里岛带进了意大利王国内，但是成百上千年形成的隐秘性和独立性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废止。实际上，正如历史所展示给我们的那样，它们根本就没有被取消。黑手党继续对罗马强加给西西里的政府制度发挥着权力和影响，在几年之内，几乎每个政治机关和法庭都渗透着黑手党的成员，并受到他们的控制。

几个世纪以来，外国势力的控制已经给西西里岛刻上了一道深深的疤痕，使得大多数的岛民都不相信任何强加政权，无论其权力是多么地合法，或者手段是多么地公平。即使是政府实施的法律，他们也不相信能够代表正义。对大多数西西里岛人来说，只有族间仇杀才是真正有效的，因为所有罪行都涉及到个人，所有的报复都可以分配给那些受压迫的牺牲品和他们的家庭来实施，正如“拒绝作证”所说明的那样。

“拒绝作证”的准则规定，任何请求法律实施机关对错误进行纠正的人不是傻瓜就是胆小鬼，任何受伤或者受到侵犯的人说出了袭击者的姓名，那么他一定会遭到轻视的白眼。一个受伤者对于袭击他的人应该做出的经典反应，大声说出或者小声嘟哝，是：“如果我活着，我要杀掉你；如果我死了，你就得到了宽恕。”

黑手党的组织结构既是其力量的来源，而且也将源源不断地给予其力量。鉴于其他更加慈善的组织机构，比如政府和天主教会，黑手党的结构可能很原始，但是它试图形成一种结构，能够对其成员进行纪律的约束和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组织被打磨成一个卓有成效的权力机构，就像无组织的游击队通过适应一个有组织、士气高的军队的管理方法，转化成一个有效的作战力量一样。

按照级别从上到下，西西里黑手党的组织结构包括如下：

Capo Crimini/Capo de tutti capi（超级老板／老板中的老板）

Capo Bastone（二老板或者主谋帮凶）

Contabile（财政顾问）

Caporegime or Capodecima（黑手党小组头目，十个斯格里斯塔的头领）

Sgarrista（斯格里斯塔，执行家庭日常事务的士兵；在美国，专门指“有地位”的成员）

Piciotto（低级士兵；执行者或“枪手”）

Giovane D’ Honore（非西西里岛或非意大利同伙）

意大利人主张，黑手党的存在给人们树立了一种攻击性的原型，这种说法不错。不是每个意大利人都是黑手党成员，当然了，就像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是三合会成员，或者不是每个穆斯林都是基地组织支持者一样。但即使最具有爱国热情的意大利爱国者也必须承认，黑手党并不是唯一的致力于犯罪和暴力的意大利秘密团体。实际上，犯罪帮派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大型都市中心都存在，只是意大利黑手党的固定结构更加与众不同，而其为了达到目标更依赖于暴力手段而已。

黑手党也并不代表唯一的意大利秘密犯罪组织，事实上，至少存在其他三个以意大利为根基的大型机构，它们仍然十分活跃，其存在受到了黑手党的激励，如果说不是滋养的话。

这些秘密团体中，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历史上看，恩德拉盖达与黑手党的联系最为密切。恩德拉盖达活动在卡拉布里亚一个崎岖的山村，位于意大利“靴子”的最南端，意大利政府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了解散黑手党，把最具暴力和最有权力的领袖以及家人从西西里岛驱逐出去。

这是个愚蠢的举措。这些家庭只是重新定居在与墨西拿海峡隔海相望的本土上，在遥远的卡拉布里亚乡村，他们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这个组织与黑手党在两方面截然不同：一是更加具有隐秘性，二是更加具有暴力

性。最近一个意大利高级政府官员把恩德拉盖达描述为："由于其邪恶性，恩德拉盖达是意大利最具权力和最有危险性的犯罪组织。"

该组织的名字来源于希腊词汇"andragathes"，意思是一个值得尊敬的高贵而勇敢的人。恩德拉盖达是专门按照家庭纽带建立起来的，这折射出了其渊源，因为他们来自那些暴力家庭，从他们祖居的西西里岛被赶了出来，这样一来，它就和西西里岛黑手党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别。西西里黑手党是依靠誓言团结起来的，而恩德拉盖达是凭借血统联合在一起的。而且据说，恩德拉盖达不时地让妇女充当活跃的角色，尽管在结构上它依然保持着绝对的男人主导地位。

与黑手党经典的金字塔结构不同，恩德拉盖达的组织建立在水平基础上，并分裂成清晰明确的各个家庭。两个相互邻近的家庭的活动或地理区域不存在重叠的部分，每个家庭在自己领地内都享有完全控制权，对那里的所有活动具有垄断性。紧密的结构和家庭血缘的组合，使得恩德拉盖达具备巨大的能力，一方面维持了私密性和忠诚感，另一方面通过精心安排的婚姻加强了各个家庭间的联系。在西西里岛和卡拉布里亚的文化中，没有什么比家庭还要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家庭之间是靠婚姻维系的，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如果它做了任何威胁姻亲关系的事情，那么这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不道德行为。正如一个西西里教区牧师解释的那样："在神圣而坚不可摧的家庭结构中存在着一种力量，家庭是唯一安全的地方。只有血缘关系不会背叛。"

与恩德拉盖达相比，在其内部纪律要求上，黑手党看上去几乎是懈怠而邋遢的。黑手党成员的儿子可以选择踩着父亲的脚印走进这个团体，或者选择不加入；而恩德拉盖达成员的儿子则别无选择。成为犯罪家庭的一个成员是他们血统的权力，是在出生时候就已经安排好了的。为了让这份终生工作做得更好，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发育期后不久就开始了，男孩子成了"荣誉男孩"，成年以后，他们成为"荣誉士兵"，必须没有疑问、没有失败地执行其上级发出的命令。最好的士兵被选为卡莫里斯达(cammorista)，负责管理士兵团体。当他们晋升到上一个层次成为桑提斯达（santista)，他们终于具备了索取固定数额报酬的权力，而不是支付给

地位较低的人的一小部分津贴。

经过卓绝的努力，并且在《圣经》上庄严地宣誓效忠，桑提斯达就可以晋升到凡杰里斯达（vengelista），也许以后还可以加入坤替诺（quintino），也就是五个具备特权的小老板，与卡珀巴斯通（capobastone）直接取得联系，卡珀巴斯通在恩德拉盖达家族内部享有最高的权力。坤替诺成员允许纹上五角星的图案来明确自己的地位。

严格的秘密性，加上绝对暴力的名声，一直是恩德拉盖达维护其权力并扩大其影响的力量所在。与黑手党不同，没有人能够信誓旦旦地估测出恩德拉盖达的规模，以及其犯罪活动在全球的广度，尽管在二〇〇四年，意大利政府提出，恩德拉盖达由一百五十五个家族组成，成员总数超过六千人。

不管是出于诚实的无知以及这个组织极端的私密性，还是由于对恩德拉盖达权力故意淡化所作的努力，一些评论家指出，这个团体对于非意大利人不具伤害性，意大利人自己很快就认同了这种感知。这个地区被推升为一个度假胜地，卡拉布里亚的旅游局承认“你不会在卡拉布里亚找到佛罗伦萨人或威尼斯人”。相反，旅游局以一种非常坦诚的口吻说：“在卡拉布里亚的道路上可能出现非常残忍无理的人，警察的道路封锁系统偶尔会在这里启用。”负责管理卡拉布里亚地区旅游业的旅游局保证说：“我们避免在特定的岛屿地区对旅游线路进行事先规划，因为那里是恩德拉盖达的要塞之地，当地黑手党的主要收入来源于绑架北部富足的产业家的孩子们，然后藏在阿斯普罗山上人迹罕至的洞穴里，直到他们肯拿出天文数字来赎回他们的孩子。需要说明的是游客永远不是这种犯罪的目标，而且实际上，如果你到卡拉布里亚旅行，可能永远不会碰到诸如此类的危险。”

这让人松了一口气。当然了，如果你进入一个卡拉布里亚村庄，你也许会遭遇与托利亚诺瓦市民目击到的类似场面，这是距离勒佐卡拉布里亚不太远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当地恩德拉盖达的一个成员首先斩首了一个议员，原因在于他反对他们对这个地区的控制，然后又把这个人的人头摆放在市镇广场上，成为人们打靶的目标。这可不是中世纪时期的行为，也不是一百年以前发生的事件，而是一九九五年真实发生的事情。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坐船到达那不勒斯的游客注意到，当他把船费交给船夫后不久，就有一个人出现在船夫身边，小声说了点什么，然后就从游客所付的船费里拿走一部分，接着快速地消失在阴暗处。还是这个游客，那天坐着四轮马车来到他住的酒店，他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个类似的事件，一个人出现在马车夫身边，检查了一下他拿到的车费，然后索要了一部分。到了酒店房间门口，这个游客停下脚步看着那个脚夫，他刚才帮忙把行李拿到他的房间，而刚刚得到小费，脚夫停下来，把拿到手的部分小费给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与前两个人一样鬼鬼祟祟、偷偷摸摸。那天晚上，这个游客观看了一场歌剧，他发现类似装束和举止的人，认认真真地数着主顾赏给卖票员的钱。第二天，游客跟一个意大利熟人讲到这件事，他本来希望从朋友嘴里得到某种解释，不料这个朋友闭上双眼，轻轻摇晃着头，只是说了句，“卡莫拉党”。

卡莫拉这个词可能源于西班牙语，这点上还是有争议的，但是现在，人们只是把它简单地翻译成“帮派”，这个组织起源于那不勒斯，与黑手党和恩德拉盖达同属于秘密团体类型。但是与这两个犯罪帮派不同，卡莫拉不是在血缘纽带的家庭内部形成的，其成员主要来自监狱囚犯，他们脱离监禁后，把管理组织和恐吓的才能带到街道上。

卡莫拉是在那不勒斯内部和周围建立的，更像一个家长式的组织，致力于为那不勒斯的市民和商业提供保证，使其不会受到任何人的骚扰，当然了，除非卡莫拉党没有收到他们的付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的黑手党家庭采用了这个策略，也就是传说中的“保护网”。卡莫拉成员也随时准备解决争端，并为贫穷家庭或事故、疾病的受害者提供援助。

该组织在处理自己成员的事宜上表现得非常邪恶，这与他们对公众的恐吓态度一样，公众的收入成为他们抽取的目标。新入会者要想加入组织，必须犯一个重大的罪行，来证明他们的勇敢和献身精神。一旦一个人被要求申请成为卡莫拉的成员，摆在他面前的就是一场危机，因为任何拒绝通过犯罪手段加入这个组织机会的人，都意味着签署了自己的死亡契约，因为谋杀他的任务可能已经指派给了一个更加勇敢而是非不太分明的候选者。

不知道是他们认为与卡莫拉成员进行斗争是徒劳的，还是为了履行他们自己的马基雅维利主义[①]的策略，那不勒斯政府官员不仅对这个团体采取宽容的态度，而且据说他们还为了政府本身的利益对之加以利用。很多年以来，那不勒斯大大小小的监狱都由卡莫拉在管理和控制，并且据说这个组织还与当地警察通力合作，对于任何犯罪行为，只要不是卡莫拉成员所为，他们就会协助进行追踪并给予惩罚。

在很大程度上，该团体的组织结构都受到了黑手党的影响，卡莫拉头目负责向较小的组织收取并分发报酬，小组织有二等领导人物和士兵构成。然而，与黑手党不同的是，该组织似乎有意回避神秘的入会仪式和程序。

与其他从事犯罪活动的秘密组织一样，卡莫拉党的命运也是起起落落的。遏止犯罪的政客们会不时地声称，卡莫拉党的势力已经被镇压下去，或者力量正在越来越衰弱，已经不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最近的评估表明，卡莫拉由一百个不同的宗派组成，其成员达到了大约七千人。

横亘二十世纪的大部分，卡莫拉主要的收入来源是贯穿意大利和周边国家的香烟走私，这种犯罪活动非常有成效，卡莫拉与黑手党集结力量，来控制该组织在欧洲的毒品销售，这是一个极其获利的举动。同时也促成了卡莫拉内部一系列的区域之争，结果导致了大约四百人丧生在暴力的铁蹄下，迫使二百多卡莫拉成员逃往美国，在那里，他们很快成立了一些帮派，主要从事洗钱、敲诈、抢劫、勒索、绑架和造假。尽管卡莫拉的力量一度出现了扩张趋势，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其运作还是以那不勒斯为基础的，缺少黑手党所具有的神秘性和历史魅力。

然而，另一个与黑手党有关的组织在意大利南端开始形成，这次是在普利亚区，即“靴子”半岛的跟部。与卡莫拉一样，联合圣冠也是以监狱匪帮发起的，他们聚集在遥远的区域，这样就可以避开中央权威的监督。总部设在意大利东南部港口城市布林迪西，联合圣冠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穿越亚得里亚海往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和其他国家偷运游客。在运作规模

---

①权谋术的，不择手段的。

上，它永远都没有达到黑手党或者卡莫拉的程度，无论在意大利还是在美国均是如此。

如果黑手党仅仅保持在意大利这个范围，那么除了那些专门论述犯罪团体的书之外，它几乎不能出现在任何其他书籍上。然而，二十世纪初期，它传到了美国，并变形为一个纯粹的具有美国特色的秘密团体，这就把公众意识提升到了拱顶，并确保它在大众文化中稳占一席之地。在美国，每个人都知道“黑手党”，然而，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了解它的结构、运作和影响。

比如，如果用“黑手党”这个词来表示在美国的对等物，那么可能不完全正确，因为在美国，黑手党成员把这个组织称为科萨·诺斯特拉(Cosa Nostra)[①]，意思是“我们的事业”。虽然为了确保私密性仍然采用“拒绝作证”和其他手段，美国分支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反映美国商业原则的机构，而不是神秘的中世纪誓言的进一步延伸。至少在美国，华尔街的感知价值比一千年历史的西西里岛仪式承载了更多的权威。

以黑手党为基础的第一次有记载的犯罪于一八九一年发生在新奥尔良，西西里的一个犯罪家族谋杀了当地的警察局长，原因是该局长用逮捕和骚扰手段对他们施加压力。家族领导因为谋杀罪被审判，但是由于一些被贿赂的证人，以及其他受到死亡威胁的人的证词，他们全部无罪释放。然而，在他们获释之前，一群高呼着反意大利口号的愤怒的私刑暴徒涌进了监狱，把犯人连拖带拉地弄到街道上，当场枪击或绞死十六人。这也许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尽管新奥尔良的犯罪率是任何其他同等大小城市最高的，但是在这里，美国黑手党的影响从来没有达到其他社区的水平，尽管奥利弗·斯通在他的电影《惊天大刺杀》[②]有那样的主张。

美国黑手党的根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很好地确立了，但是两件事情，一件发生在意大利，一件发生在美国，却进一步把这个组织推向了颠峰。

---

①新闻记者总是写成“La Cosa Nostra”，这在语法上是不正确的。

②又名《刺杀肯尼迪》。

一九一九年美国禁酒令的颁布，为犯罪分子营造了一个低成本、高需求和高利润的机会，尤其是那些处于组织内部的犯罪成员，他们能够在执法部门的眼皮底下（或者与他们合作）生产、进口并销售产品。没有任何一个犯罪活动能够提供这么大的利润。

同时，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大权在握，他发誓彻底铲除犯罪势力，并确保火车按时运行，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承诺。他在这两方面都成功了。他的法西斯政府是唯一足够残忍可以对黑手党统治形成威胁的力量，很快，许多黑手党家族就开始了穿越大西洋的移民活动，他们加入到那些能够通过非法酒运谋取大量钱财的家族中。

诸如纽约、芝加哥、克利夫兰和底特律这样的北部城市，与美国黑手党活动的关系最为密切，但是还有二十多个这样的城市，它们风光旖旎，景色秀丽，如爱荷华州的得梅因，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也成了运营中心。一九三三年禁酒令的废除使得这个组织毫发未损，它把目光投向了其他获得利润的非法领域。对于犯罪分子而言，这再次成为了一个绝好的时机，而对于普通大众，则是一场灾难。在禁酒令解除前两年，内华达州宣布赌博合法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边缘，美国人对麻醉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美国黑手党家族快速而卓有成效地利用了这两个事件。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黑手党几乎是美国每个犯罪活动的主导因素，并成为拉斯维加斯的现金挤奶器，每年从赌博、卖淫、毒品和古老的保护网络上就能够获利几千万美元。

折射出由恩德拉盖达加以完善的策略，美国黑手党继续坚持家族结构，尽管它放弃了卡拉布里亚组织对于血缘纽带的要求。实际上，美国黑手党轻易地忽略了其成员必须是意大利籍的这个先决条件，任何以合作为基础的人，无论是犹太罪犯还是爱尔兰罪犯都受欢迎。

尽管美国的每个城市中心都置于一个或更多的黑手党家族的庇护之下，在纽约州及其邻近的新泽西州，鉴于其权力和报道其活动的媒体而言，有五个家族是最为显赫的。这五个家族包括：

伯纳诺家族：其创建者是约瑟夫·伯纳诺（号称约瑟·香蕉），该家族曾经是服装业一股强大的力量，但后来美国 FBI 深刻地渗透其中，这在电

影《唐尼·布拉斯科：我在黑手党的卧底生活》中有描述。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该家族最近的老板乔·马西诺给这个家族带来的悲伤比布拉斯科有过之而无不及。

科洛博家族：最初的老板是乔·普罗法西，他从一九三〇年开始管理这个家族，直到一九六三年他去世，乔·科洛博接替了他的领导位置。科洛博一直都是一个富有成效的老板，直到一九七一年，在意大利和美国人的一次集会上，他遭到了枪击，虽然活了下来，但是七年来，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直到最后告别人世。家族内部展开了一场广泛的斗争，最后卡迈尔·皮赛克胜出，成为该家族领袖，直到因为谋杀罪和勒索罪被判处一百三十九年的监禁。

他的儿子阿方斯·皮赛克（号称阿里男孩），是黑手党家族老板中少数几个具有大学学位的人，但是他似乎主修的是服装专业。阿里男孩穿着考究，甚至当他在佛罗里达群岛的水域中驾驶着高速游艇的时候也是如此，该游艇命名为“好前景”。一天，美国海岸巡逻队刚好看到了皮赛克和他的游艇，在船上发现了一支手枪和一杆猎枪，海岸巡逻队马上下达命令，命令他立刻把枪从船上扔掉，随后对整个船进行了搜查，发现一切都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于是命令他们开路。

阿里男孩躲过这一切全凭运气，因为海岸巡逻队没有一个人对他的犯罪记录进行过检查。只是在海岸巡逻队队员返回港口后，他们才得知皮赛克刚刚因为联邦勒索罪刑满释放，目前禁止使用任何枪支，如果被发现违反规定，就得处以十年监禁的惩罚。看到海岸巡逻队走远了以后，大多数大学毕业生的做法是立刻扔掉枪支，但是皮赛克似乎没有上过大学逻辑课，因为，几个小时之后，海岸巡逻队的快艇把“好前景”逼到基韦斯特岛一个船坞里时，那些武器还在船上，皮赛克的前景可没那么好了，他得在监狱里再待上十年。像这种判断上的失误使得阿里男孩成了一个软蛋老板，纽约的其他家族也不再认可科洛博家族了。

甘比诺家族：这就是声名狼藉的约翰·高蒂的家族，这个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卡洛·甘比诺命名的，他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



保罗（娘娘腔）卡斯特兰诺处在权力和声望的顶峰时期。

七六年管理这个家族。甘比诺被认为是美国黑手党中最卓越的家族老板之一，他是个低调的人，对公众采取回避态度，只与家族成员保持联系，通过毒品和赌博把这个家族建成了财政动力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又增加了汽车偷窃生意，把他们偷来的豪华轿车通过科威特运往中东地区。甘比诺的继任者是他的堂兄，叫做保罗·卡斯特兰诺，他疏离了好几个黑手党老板，包括约翰·高蒂和他的二老板萨尔瓦托·格拉维诺（外号公牛沙米），高蒂在一九八五年精心策划并谋杀了卡斯特兰诺。二〇〇一年，高蒂在终身监禁期间死在监狱里；格拉维诺据说犯有二十项谋杀罪，但他已经进入证人保护程序。通过一系列的权力更迭，现在这个家族的领导人是高蒂的儿子小约翰。

杰诺维塞家族：纽约另一个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家族就是杰诺维塞家族，最初与查理·卢西安诺和弗兰克·科斯特罗过从甚密。五十多年以前，约翰·高蒂满脸堆笑地出现在报纸页面上，高视阔步地在电视新闻上露面，其样子活像萨克斯第五大道橱窗展示的逃跑者，此时弗兰克·科斯特罗已经确立了等级的印记，就像美国黑手党老板所声称的那样。

科斯特罗是拥有政治敏锐力，以及策略规划的天才，他在黑手党领导中素有“黑帮总理”的称号，这个人更喜爱平和的谈话和贿赂，而不愿使用左轮手枪和机关枪，尽管必要的情况下，他总是诉诸后者。多年以来，在遍及美国东北部的整个地区，市长、州长、法官和警官不论是看到弗兰克·科斯特罗，还是提及弗兰克·科斯特罗，随之而来的都是装满现金的信封。起初，科斯特



“娘娘腔”卡斯特兰诺在纽约阴沟里，约翰·高蒂下令把他谋杀。

罗是一个注重外表、衣冠楚楚的老板，他穿着剪裁讲究的一千美元的西装，定制的鞋子，完美的指甲修饰，以及防弹发式。对弗兰克而言，外表就是一切。面对逃税的指控，科斯特罗的律师建议他在穿着上不要过于考究，因为这样可能会疏远工人阶级组成的陪审团，“开始穿廉价的服装，旧鞋子，邋遢的领带”，律师说，“这样你就可以更好地与陪审团合作了”。

弗兰克没有同意，“我宁可输掉这个破官司”。他回答说。

他确实输了官司。在服刑期间，科斯特罗试图在铁窗内操纵这个家族，但是维多·杰诺维塞则另有主张。杰诺维塞想取代科斯特罗的教父地位，而且他采取的是最为广泛的继任方法。科斯特罗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不久，一次他在纽约街上散步，突然听到有人喊道，“这是给你的，弗兰克!”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科斯特罗马上转过身，从那个健谈的职业杀手手枪里射出的子弹刚好从他的头皮上擦过。



弗兰克·科斯特罗宁可选择考究地修饰自己，也不愿逃避刑事责任。

弗兰克可能感觉到了某种暗示。在医院休整过后，弗兰克传出话来，说他要从家族生意上退下来，并把领导权指派给阿尔伯特·阿纳斯塔西亚。他可没有鲁西阿诺和科斯特罗的好运气，一九五七年十月，他躺在理发店的躺椅上准备刮脸的时候，当场被枪击中。杰诺维塞取代了领导职位，并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家族，但他权力享受的时间也不够长，几年之后，他就因为勒索罪获刑十五年，并在联邦感化院死于癌症。目前的老板是多米尼科·希瑞洛（外号安静的多米），他是甘比诺家族模式的人，这使得他的家族成为美国最具权力和凝聚力的家族。

至于弗兰克·科斯特罗，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时光都用于与纽约精英分子的社交上，他在曼哈顿公寓和长岛房宅里举办晚会，客人清单上包含有那个时代的一些最著名的社会和政治人士，其中有 FBI 主管 J·埃德加·胡佛，他秘密的同性恋倾向，以及喜爱穿着异性服装，都被科斯特罗加以利用。当美国黑手党“总理”与一九七三年死于睡眠中时，他留下的最壮观

的一笔财产可能就是他刺耳的声音，马龙·白兰度在《教父》中所饰演的维多·柯里昂就采用了这种声音，这是直接模仿自他的。

卢切斯家族：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七年葛塔诺·卢切斯（外号汤姆斯）的任职期间，他一直活跃在纽约的服装业，在其分支头目中有一个叫保罗·瓦里欧的人，也就是电影《教父》中的人物保罗·西塞罗的原型。最近这些年来，该家族的势力越来越弱小，原因是三个关键成员转而成为政府的证人，他们是阿尔方斯·达科（外号小阿尔），二老板安东尼·卡索（外号煤气管）和彼得·奇奥多（外号胖子彼德）。

随着美国黑手党的公众形象在社会中的不断提升，这些帮匪身边开始萦绕着一种神秘魅力的光环，与社会名流的联系更起到了助燃作用。贯穿弗兰克·辛纳屈的整个职业生涯，身边经常有黑手党老板陪伴，他的许多朋友也是如此，包括迪恩·马丁、阿尔·马提诺、乔治·拉夫特，而且据说还有平·克罗斯拜和吉米·杜兰特。辛纳屈的祖父母都是西西里人，这至少给了他一种血缘上的联系。这个歌手曾经慷慨激昂地否认与任何犯罪家族有联系，但是一张著名的照片显示，辛纳屈与犯罪团体老板卡洛·甘比诺和保罗·卡斯特兰诺，以及职业杀手吉米·弗拉提阿诺肩并肩坐在一起，表明他们所有人都是好朋友。是这个歌手受到了帮匪的吸引，还是帮匪受到了辛纳屈的吸引，这一直是这个具有西西里血统歌手的一个引起争议的事情。



尽管弗兰克·辛纳屈的否认，在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出他与黑手党老板的联系，比如他的老友保罗·卡斯特兰诺（最左边）和卡洛·甘比诺（右数第三）。

局外人赋予黑手党的光环和魅力大多来自其“拒绝作证”，这是一个秘密入会仪式所具有的行为准则，在新会员的心里深深地铭刻准则的神圣性。

一九九〇年，这个秘密以及这个组织其他的神秘性全部被打破了，这是因为FBI记录了一个秘密入会仪式，即吸收罗伯特·德卢卡加入波士顿的帕特里阿卡家族。他们聚集在马萨诸塞州贝德福德的一所房子里，家族头领操着西西里方言，大声地宣布道："以家族的名义，这个家族是开放的。"

潜伏在里面的FBI听到有人指示德卢卡重复老板所说的誓言："我，罗伯特·德卢卡，想要加入这个组织，来保护我的家人，保护我的朋友。我发誓永远不会把这个秘密泄漏出去，永远虔诚地遵守'拒绝作证'的准则。"

接下来，这八个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把食指刺破，然后让血液滴落在一张神圣的卡片上，卡片上有帕特里阿卡家族圣人的图像。随后卡片被点燃，当卡片在燃烧的时候，德卢卡重复着第二个誓言："这位圣人点燃了，我的灵魂也随之一起燃烧。我活着进入这个组织，死着离开这个组织。"

秘密团体的诱惑力，领袖人物雄壮威武的姿态，以及最成功人士唾手可得的巨大财富，几乎从一开始，就把女人吸引到了黑手党成员的身边；当然了，反过来说也成立：许多年轻有为的意大利人非常想要加入这个组织，因为黑手党成员在吸引年轻漂亮的女人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任何把自己与黑手党成员联系起来的女人很快就会了解，早在一千年以前穆斯林铭刻在西西里社会中的烙印，现在仍然可以从黑手党成员的态度上反映出来。对他们来说，女人只履行两种角色中的一种：天使或娼妓，妻子或情人。

美国黑手党成员的妻子享有诱人的好处，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些好处包括她的男人有可能在职位上得到升迁，从而使得收入源源不断，让她和她的家人享受意外之财——宽敞的房子、昂贵的服装、豪华的轿车和一流的假期。另外一份收获是来自丈夫以及他同仁的尊敬。在西西里人，尤其是美国黑手党成员间，家庭仍然是一个强大的统一力量。你不会让你的妻子感到难堪，也不会侮辱她。也有例外的情况发生，但是如果知道哪个黑手党成员对妻子动手，或者对她有任何轻视的行为，都会或多或少失去别人对他的敬重。

妻子们所付出的代价可是相当巨大，而且是有目共睹的。在组织内部的男性乱交行为被认为是男子汉气概的标志，任何一个"骄傲自大的家伙"，如果没有一两个情人，那么他的性能力就值得怀疑了。作为黑手党

成员的妻子，她们应该充分理解并接受这一切，正如她们知道，她们必须保持高雅的举止一样。任何打破这个规则的女人都会冒着被人说成是妓女的风险，如果被她戴绿帽子的丈夫碰巧是一位“成功人士”，那么她可就犯了滔天大罪了。

为了避免让妻子们感到尴尬，黑手党成员专门在星期五晚上与女朋友约会，星期六晚上则是给妻子准备的。这个安排必须严格遵守，这会避免让黑手党成员与一个领着不是自己妻子的熟人碰面。在其他场合，这个传统就变得很有弹性了，不止一个黑手党成员带着妻子和情人一起在豪华游船上巡游，配偶和他住在套房里，而情人则委屈在特等客舱内。

在黑手党这个环境中，性与谋杀的碰撞导致了独特的后果。据说维多·杰诺维塞曾经下令杀害一个人，因为他想把这个人的妻子据为己有。谋杀的执行者是杰诺维塞的同行，因为一个情欲高涨的人知道规则和荣誉不可能总控制住他内心的欲望。虽然一个黑手党过度的异性恋活动可能会提升他的地位，但是最小程度的同性恋倾向可能都是致命的，不管他在组织内的地位如何，约翰·达马托的命运可以证实这一点。

达马托是得卡伏坎提家族的头领，这是新泽西州最大的一个家族，被认为是流行电视系列剧《黑道家族》的蓝本。他也是声名狼藉的约翰·高蒂的知己，在其他时代和其他场合，这种关系可能会对他形成保护。达马托与他的女朋友一起，经常出入俱乐部，在那里，男人和女人可以交换伴侣，并且进行群交。在不止一次这样的活动中，达马托的女朋友亲眼看到他给其他男人进行口交，并且声泪俱下地向他的一个傲慢自大的朋友坦白此事。当他的朋友把这件事情汇报给重量级人物文森特·巴勒莫以后，这个匪徒老板立刻下令杀害达马托。杀人动机非常明确，“如果我们让一个同性恋老板坐下来与大家谈生意，那么，没有一个人会尊重我们”，杀害达马托的凶手在法庭上这样辩论。



已故的约翰·达马托。只要你是异性恋者，你可以得到任何想要的性爱。

一千年的保守秘密和残忍活动似乎可以确保黑手党在意大利的生存，那里，其未来是件确定的事情，

即使哪个国家的执法部门不定期地声称，他们已经“瓦解”了这个组织；然而在美国，黑手党的未来几乎很难确定下来。与意大利黑手党不同的是，美国黑手党面临来自其他竞争者更广泛的竞争，它们比自己更加残忍，包括哥伦比亚毒品巨头、越南街头帮和俄罗斯匪帮。

对美国黑手党存亡至关重要的是，在美国黑手党最需要“拒绝作证”时，对这一由来已久的准则的尊重也已经开始瓦解，这个情况可以从我们之前碰到的两个黑手党成员的行为对比上略见一斑，他们一个是路易斯·（利普克）·布查尔特，另一个是约瑟夫·马西诺。

布查尔特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黑手党辉煌时期掌握的大权，他是纽约服装业的权威，因为其冷酷心肠和暴力而臭名昭著。任何生产厂商或店主，如果没有支付摊派的保护费，他会对他们进行警告，或者打断他们的腿，或者会直接杀害这个人，而且通常选择在生意现场。布查尔特在每次谋杀之后的标准“工作习惯”是洗劫这个经营场所，然后放火燃烧，把证据烧毁。

由于其臭名昭著的行为，以及几个不忠的同事，布查尔特被控犯有谋杀罪，并判处死刑，于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在电椅上行刑。尽管他的律师提出上诉，要求减刑，但是利普克的死刑还是执行了，他与两个同伙一起被处决。布查尔特是三个人中最后一个被处死的，前面两个人是跌跌撞撞、战战兢兢地被拖拽到行刑室的，而利普克则充满自信地高昂阔步地走到那里，他扑通一声坐在电椅上，面无表情，镇定自若，好像是正坐着地铁去上班的路上。把他捆绑起来五分钟后，他就宣告了死亡。

第二天，布查尔特的遗孀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地点是在纽约奥西宁监狱附近的一个旅馆里，也就是她丈夫被处死的地方。“我丈夫是在死囚室里口述的这些话”，她对记者说，“我全部写了下来，一字不差”。根据比阿特丽斯·布查尔特的讲述，利普克坚持让他的这些话得到媒体最可能广泛的报道，记者们记下了比阿特丽斯从那张纸上读出的每个字。

“我非常焦虑地希望大家清楚”，利普克是这样说的，“我不会主动找他们谈话并供出信息，作为对我减刑的交换。我不会要求这样做！”据他的遗孀所言，利普克坚持要加上一个惊叹号。



路易斯·（利普克）·布查尔特。他坐在电椅上，好像是坐着地铁去上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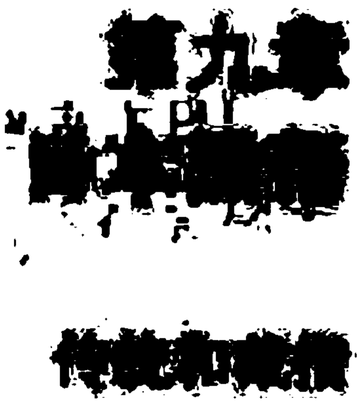
大家一致认为，布查尔特是想向黑手党同伙清楚地表明，他没有违背“拒绝作证”的准则。一些评论家相信，他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对其家庭的报复性暴力行为，但是其他评论家提出，他的动机不是出于现实性，而更多地出于情感的考虑。即使在死亡的时候，让其他人明白他的行为是光荣的，这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是向他的受害者，至少也给他的同事表明了这一点。当五千瓦的电流冲击到他的体内，而且几个小时之内都无法从体内转移出去，这真是关乎于个人自尊的事情。

六十年以后，大约瑟·马西诺成为纽约伯纳诺家族的老板，他是曼哈顿五个最有势力的黑手党之一的最高领导。对利普克·布查尔特施行恐怖统治的同一个服装业，这个四百磅重的黑手党老板也进行勒索敲诈，但他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对布查尔特来说，“拒绝作证”可能意味着一种荣耀，但对大约瑟来讲却什么都不是，即使在他被控犯有谋杀罪和勒索罪而不得不面临艰难的终身监禁时亦是如此。二〇〇四年九月，他被保释出狱，对于世界上最有权力的犯罪团体的掌门人，这个黑手党老板作了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同意佩带 FBI 的麦克风，并且录下了一个同事讨论杀害一个同伙的信息，以及对于一个联邦检察官的有计划的谋杀。通过他的合作，他家族中的十几个成员被带到了正义法庭，马西诺则因此避免了可能的终身监禁。

当马西诺的叛变行为被大家知道后，这对美国黑手党成员的影响不亚于一列快速火车的撞击。马西诺并不是第一个违背“拒绝作证”准则的人，一九六三年，乔·瓦拉奇向美国国会陈述证据，证实黑手党确实存在，公众第一次使用了“美国黑手党”这个名词。从那以后，几十个黑手党成员通过与检察官合作谋求从轻量刑的保证。然而，在之前的每个案例中，这些人都是黑手党地位较低的成员，对于家族运作的了解毕竟有限，他们

根本没有希望到达较高的地位，从而挣上大钱，也许对位于其上的人还存有这样或那样的怨恨。但是一个家族老板的背叛则是空前绝后的，暗示着组织内部纪律约束完全崩溃的可能。如果一个家族老板都背叛了整个组织，那么黑手党的任何一个家族如何重拾尊重和信任，并对地位较低的成员施行纪律约束呢？

美国黑手党内部的秘密性在将来还是一个未可知的事情，它能否继续存在下去？以及对长久以来一直有联系的犯罪活动实施控制，在未来更是无法确定的。



日本东京的银座仍然是令人头晕目眩的娱乐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候没有什么两样，它把纽约的百老汇大街和伦敦的梭霍区融合在一起，再加上点拉斯维加斯的味道。最近的一个晚上，在银座的主要大街上，几十个日本商人坐在那里，痴迷地看着前面弹球机一样的东西，目不转睛地观察着发光的小球蜿蜒穿过金属针的迷宫。这是弹球盘①，风靡在日本男人中的一种游戏，其得名就来自于这些镀铬小球在金属针上跳来跳去所发出的声音。

位于会客室径直上方的这个私人男性俱乐部里的氛围则非同一般，这里灯光非常晦暗，家具十分考究，传统的日本乐器演奏着的柔和音乐在空气中缓缓流动。在远处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坐在一张低矮的桌子前面，侧面是两个年轻的女子，不时地发出咯咯的笑声，老男人以一种严厉而沙哑的腔调向守在近旁的几个年轻男人下达命令。这些人按照他的命令走上前来，不停地点头表示认同，然后鞠躬告退，到俱乐部的其他地方或者到下面繁忙的街道上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去了。老人微微点了一下头，旁边服侍的女人就轻轻端上来一杯酒，或者天妇罗②；类似的手势还可以让旁边正在谈话的年轻男人戛然而止。日本老人不时地对着这两个年轻女人微笑，其中一人穿着超短的鸡尾礼服，另一人是一副学生打扮，格子呢褶裙和浆过的白色罩衣。当他的手在穿着超短鸡尾礼服的女人腿上划过，或者抚摸穿着学生装女人的罩衣时，她们会紧张地大声笑着，然后用手捂住嘴。

对西方人来说，这是日本版本的黑手党教父向他的手下发布命令、惩罚和奖赏的场面。在某些方面来讲，确实如此。但从另外一些方面来看，却

---

① 一种在弹球机上玩的日本赌博游戏。

② 用蔬菜、虾或其他海鲜裹上面糊在动物油中炸制成的一种日本食品。

是迥然不同，尤其是当一个年轻男人出现在俱乐部的门口，好像在那里等人召唤。他与其他同样年龄的男人一样穿着紧身衣，头发闪闪发亮，白色衬衫因为浆过而显得越发笔挺，他紧张地一步一步地挪动着自己的身体，只是脸色十分苍白。他的左手缠着绷带，右手拿着一个仔细包裹起来的小东西。

终于，日本老人头微微点了一下，年轻人继续低着头，眼睛看着地面，慢慢向角落里的老人走近。女人们停止了她们的笑声，其他男人则退到一边，让他从中间通过。整个屋子异常安静。

这个年轻人站在老人面前，眼睛和头依然低垂着，双手毕恭毕敬地把那个小包裹放到桌子上。老人看了看年轻人手上的绷带，点了点头，然后在包裹上挥动着自己的手，示意把它打开，其中一个年轻男人走上前迅速地拆开了包裹。

包裹里面是被截断的小手指的最后一节，是这个刚来的年轻人的，他把自己的手指截断并上缴，目的是为了悔罪，并请求原谅。这个年轻人做了冒犯他老板的事情。显然，这个屋子里的其他年轻男人也做过类似冒犯他们老板的事情，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缺少小手指的一部分，有些人甚至根本没有小手指，表明他们过去肯定犯过很多次错误。这就是日本黑帮，一个秘密的犯罪团体，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日本封建时期的武士，他们的纪律强化也是用类似的方式。

像为女士荣誉而战的勇敢骑士，或者美国拓荒之前的西部具有燧石般锐利眼睛的神探，日本武士被许多人看做是中世纪日本道德标准的捍卫者。但事实再一次偏离了传说，与之不相符合。

日本武士崛起于十二世纪期间武士首领间的联盟，当时日本正在发展成为一个与欧洲的封建社会一样的社会。就欧洲的封建制度而言，力量较小的首领和团体必须向力量较大而且更有实力的宣誓效忠，作为回报，他们可以得到保护。这些靠个人和家庭忠诚感建立起来的组织，开始在他们中间选择最佳的斗士来为之服务，这些人就是“武士随从”，他们善于作战，并为保护他们的首领而随时应战。①

---

① 武士这个词翻译过来就是“服务的人”。



日本武士可能被认为是伟大而高贵的战士，但是他们的英勇行为却与其声望相互矛盾。他们也激发了日本黑帮的形成。

除了超强的作战能力，这些武士还几乎疯狂地致力于对主人的忠诚。随着时间的推移，忠诚这个方面逐渐压倒了武士生活的其他诸多方面，而开始占据主导位置。当面临敌手的时候，什么妻儿之爱，对父母的责任，以及对死亡的畏惧，这些与武士的绝对忠诚和英勇凶猛的职责比较起来，都位居其次了。由派系之间争斗而引发的战争是一场场残酷的战争，像他们的祖先一样，他们会朝着敌人的身体挥舞刺刀，武士们总是津津乐道他们在战斗中的骁勇表现和不凡功绩。

这种作战凶猛和献身精神把日本武士与其他日本团体分离出来，从而给他们赢得了更特殊的权力。比如，只有公认的武士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武士刀，这是一把可以两只手同时操作的长剑，对于武士来说，他们就像对待圣物一样对待它们。如果日本武士认为自己遭到了比他出身卑贱的人的污辱，他可以挥舞大刀把这个冒犯者一分为二，但却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后来，日本武士的武器逐渐发展成一个复杂的荣誉准则的核心物体，在战场上用于屠杀很多敌人的刀剑具有一种精神力量，新刀剑也可以在人体上进行试验，这个人通常是被砍头的罪犯的尸首。

与中世纪的骑士一样，富足的武士也戴着头盔，穿着盔甲，骑在马背上作战，而不那么有钱的武士则作为步兵参加战斗。然而，与欧洲骑士不同的是，激励日本武士的不是宗教热情或者骑士风度，而仅仅是对军阀命令的无条件的奉献精神。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他们是英勇的作战者，还不如说他们更像黑手党的恶棍。

而且，与我们经常与日本武士联系起来的气氛相反，在战斗中他们也没有展示出太多的英勇行为。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描述，十三世纪对一个皇宫的突袭场面：

贵族、侍臣，甚至内室中的宫女都被乱刀砍死……整个皇宫处于一片汪洋火海中，宫里的人向外猛冲，以免被火烧到，在外面有武士接纳他们。当他们转身往回跑……大火就会把他们无情地吞噬……（一些人）甚至成群结队地跳入井里，很快，位于井底的人就溺水身亡，位于中间的人被同伴挤压而死，上面的人则被砍成碎片，或者被大火烧着……

随着时间的流逝，值得敬佩的日本武士标准也开始变质了，最终，连他们高贵的事业都开始坍塌了。在十七世纪，一支独立的武士分支，也就是奢华的日本幕府将军侍从发现，在这样一个长期的和平年代，他们的服务不再得到人们的敬重。在一个普通社会中他们渐渐感到英雄没有用武之地，于是便不再为军阀提供服务，转而在大众中制造故意的身体伤害。有些时候，他们就像受到鲁宾逊精神激励的民族英雄，保护那些穷人和手无寸铁的人，与饥饿的农民一起分享偷来的赃物。然而还有的时候，他们则变得非常残酷无情，剥削成性，就像流氓匪帮一样，尽管他们满口仁义道德。

日本武士从作战英雄到有组织犯罪的转化，也引起了他们所抢劫的受害者的一些反应，这些普通大众把他们对武士们的崇敬一扫而光，进而组成市民民兵力量对此进行抗击，这些人也叫“城镇服务者”。几年之内，法律也开始限制日本武士的行为，城镇服务者被看做是普通日本人的保护者，他们获得了尊重和崇拜，可以超越在法律之上，这与西西里黑手党的兴起正好呈现出并行的趋势。日本武士受到镇压后，城镇服务者仍然是普通大众的保护者，即使现代社会的日本文化是中央集权和实行法律的，城镇服务者还是凌驾于法律之上。

到了这个时候，许许多多的城镇服务者分支机构已经开始自称为“日本黑帮”了，这个名字来源于该组织对赌博的嗜好。他们最喜欢的一个游戏就是花纸牌，这是用三张纸牌玩的一个游戏，其中手气最差的人拿到二十点。在日语口语中，“ya”的意思是八，“ku”的意思是九，“sa”的意思是三，用这个可怕的二十点游戏，来暗示日本黑帮成员都是社会上

的“黑手”。

正如共济会力求与圣殿骑士团的联系，日本黑帮也竭力与日本武士的高贵一面沾亲带故，他们割断小手指作为惩罚手段的做法与古代武士阶级就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挥舞武士刀的时候，剑手的小手指在控制武器方面比任何其他手指都来得重要。如果一个武士的手指受伤或缺少，这在作战中就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因而不得不依赖他的主人寻求保护。这也是日本黑帮老板对其跑腿成员施加的惩罚。

小手指的截断，代表了日本黑帮老板对令自己不高兴或不满的人的惩罚，象征了这个成员所犯下的错误和承认错误的勇气。犯错误的日本黑帮成员必须随时做好截指的准备，这时他的老板会给他两样东西：一把刀和一段用于止血的长绳。一句话也没有，况且也是没有必要的，直到冒犯者实施了对自己的惩罚，加以证实，并接受了来自老板的原谅，他才准许与该团体的其他成员有任何的联系。

除了不完整的小手指外，日本黑帮成员还有一个明显的身体特征，那就是大面积的纹身。他们不像西方人那样，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选择不同的纹身，而是作为一种壁画装饰，如龙、花、风景和抽象设计，纹身的部位也是通常被衣服遮盖的身体部分。他们的脸部、颈部、小手臂、脚踝和双脚是没有纹身的，裸体的匪帮成员通常穿着很长的内裤。纹身图案的刺绣过程要花上几百个小时，花费达到几千美元，然而，除了最亲密的同伴，这些纹身是谁也看不到的。其目的是要向那些能够目睹他们身体艺术的人表明，他们既具备高额花费的财富也拥有忍受痛



日本黑帮成员的裸体显然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全身的纹身表明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同时对痛苦具有忍耐力。

苦的勇气。

任何遭遇一群日本黑帮成员的西方人，在知道他们真实身份之前，都会认为他们很滑稽，而且是并非出于本意的可笑。其成员偏爱紧身丝绸套装，大脚趾尖尖的鞋子，油光可鉴的长头发，梳成大背头的样式，他们走路的姿态更能让我们想起电视情景喜剧中的人物方兹而不是像维多·杰诺维塞和利普克·布查尔特这样的杀人狂。黑帮成员的迂腐之气还通过他们的另一个偏好得到了加强，那就是日本黑帮成员非常喜欢美国的卡迪拉克和林肯车，这在满地跑丰田车和本田车的日本国土上，显得大气而炫耀。

日本黑帮在组织结构上反映出西西里黑手党和美国黑手党经典的金字塔结构，只是更加复杂一些，层次也更加多样化，其基础是“父亲与孩子”的网络关系。“oyabun”的意思是“父亲角色”，“kobun”则是孩子角色的意思。对老板毋庸置疑的忠诚是每个黑帮成员必须做到的事情。日本黑帮教义规定，“当你的老板说经过的乌鸦是白色的，你必须表示赞同”。充当孩子角色的下属永远不能与“父亲”的观点相反，而充当父亲角色的老板，则有义务对他所有的孩子们提供保护和建议。

每个日本黑帮组织中，位于最顶端的是“kumicho”，或者叫超级老板，直接在他下面的是“saiko koman”，也就是他的高级顾问，以及“so-honbucho”，叫做总部组长。“wakagashira”是区域老板，负责管理他自己的几伙人，每个老板都有“fuku-honbucho”（支部组长）的协助，他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几个小团体。较小的区域老板也叫“shateigashira”，协助他们的人叫“shateigashira-bosa”（小区域老板助理）。每个黑帮家族都由几个小的“shatei”，即小兄弟组成，“wakashu”是他们的直接领导。

加入日本黑帮的过程充满了象征性，但从本质上来说，却相当地消极。候选者和充当“父亲”角色的人面对面坐着，这个仪式上要准备日本米酒，但是在煮热的米酒里要加上盐和鱼鳞，然后把混合物倒入每个人的杯子里。这两个杯子在大小上是一样的，但是“父亲”角色的人的杯中酒总是满到杯子边缘了，而候选者杯子里的酒则要少得多。当“父亲”举起酒杯喝酒的时候，候选者也跟着做，然后两个人交换酒杯，喝对方酒杯里

的酒。酒的分享过程就意味着这个年轻人已经加入了这个组织。

日本黑帮在日本存在了三百年，但在社会上却没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尽管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其成员是日本社会普遍腐败的主要参与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数年间，更大的自由和繁荣却使得日本黑帮成员数量急速地增长。最近的一次估算表明，日本全国有五千二百支黑帮团体在活动中，黑帮成员的总体数量达到十八万四千人，一时间，其数量居然比美国军队的数量还要大。

最近一些年来，由于日本警方的压力，日本黑帮势力迅速减弱，但是他们仍然是日本的一支有效的力量，通过中间媒介和政治联合，在朝鲜半岛、中国和菲律宾群岛也是一支不可低估的势力。他们倾向于从事与性有关的犯罪活动，经营管理卖淫团伙，其成员通常是由中国和菲律宾家庭购买来的年轻女孩。来自其他国家的年轻妇女都被日本这块领土深深吸引，因为她们得到了诸如服务员、接待员和模特等高薪工作的许诺。一旦她们到了日本，首先就会被迫从事脱衣舞工作，然后再从事卖淫活动。

近年来，日本黑帮的业务范围也呈现出拓展的趋势，其中就包括向日本走私自动武器和毒品，尽管在目前来看，像海洛因和可卡因这些传统的毒品没有甲基苯丙胺[①]那么受欢迎。据说，他们也广泛参与了世界各地游乐场的经营活动，其服务的对象就是那些日本赌徒，他们在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蒙特卡洛和其他地方获得了大量的现金贷款。这些富裕的赌徒，以为回到日本以后，这些贷款就会无法征收，于是他们受此诱惑，在国外大量地贷款。如果他们赌输了，当然事实通常如此，他们就会回到日本，但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日本黑帮成员成了放高利贷者的合作伙伴，他们负责征收所有的贷款，再加上数量众多的高额利息。

该组织最赚钱和获利的业务也许是在公司领域，黑帮老板们已经对一种独特的日本敲诈形式变得非常老练、精通。首先，他们从一家大型上市公司获得一定的股份，然后日本黑帮成员就开始搜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层的大量的丑闻信息，包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一些活动，比如与妓女调情或者吸毒习惯，其实这也是日本黑帮成员所逐渐养成的喜好。其他诸如逃税、

---

① 即冰毒。

维持不安全的工厂条件以及置环境法于不理的证据，大都是通过行贿方式获得的。

当他们搜集到了该公司足够的劣行，日本黑帮成员就会在一年一度的股东大会举行前不久，与公司管理委员会接洽，然后发出最后通牒：要么毁掉证据，重重地补偿日本黑帮；要么日本黑帮的到会人员在年度股东大会上揭露其全部真相。黑帮的到会人员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他们说话的风格激昂澎湃，并能够通过高声喊叫压过那些试图让他们安静下来的人的声音，他们能用丰富而有煽动性的语言描述高级管理者的不道德行为。



与黑手党一样，日本黑帮在电影中也被理想化了。

日本社会对于能够引起羞耻和难堪的披露非常敏感，公司的 CEO 和其他人通常会马上做出反应，只要日本黑帮开口，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根据日本提供的信息，通过这个手段，日本黑帮赚到了好几百万美元。

但是不管怎么说，日本黑帮的光辉时代已经过去，许多日本市民拒绝黑帮的恐吓，尽管他们使用威胁、毒打和杀害的恐吓手段，日本市民还是把他们从一些居民区赶走了。该组织在内部可能也出现了分化现象，因为与西西里黑手党和美国黑手党不同的是，日本黑帮成员不会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这个组织。许多日本黑帮中的暴徒，都是在血性方刚的年纪时加入其中的，等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他们就会选择离开，或许是由于他们把所挣得的钱全部挥霍掉了，或许是他们更喜欢过一种不太艰难的公司生活。在一些情况下，这些选择离开日本黑帮的成员会发现，这么多年来，他们作为黑帮成员所获得的管理技能在公司领域受到高度重视。显而易见，许多人已经在公司里占据了重要的管理职位，而这个公司可能就是曾经在某个股东大会上遭到日本黑帮成员敲诈过的公司。

对于他们为什么截断小指头，或者在身上纹上复杂的纹身，这些行为到现在也是个谜。



第十章

基本統計

[illegible]

在世界各地的秘密组织中，大多数都选择把自己深埋起来，以免有些团体和个人觉得自己的存在对他们形成威胁，从而对之进行骚扰。也许在历史上，在欧洲和其他地方，没有什么教派能够像巫术那样遭到如此严重的迫害。从中世纪早期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仅仅由于单纯的怀疑或毫无理由的告发，他们就遭到了令人发指的屠杀，死亡人数不下几千人。除了几个例外，受害者几乎都是女性，在许多情况下，迫害他们的恰恰是基督教会的男性成员。

虽然我们普遍认为，中世纪和欧洲宗教改革时期是对女巫进行迫害的时期，但其实巫术早在基督教之前就开始了。最初，巫术这个词指的是任何从事魔法的人，基督教前的希腊人和罗马人都对“白色”巫术和“黑色”巫术加以区分。白色巫术是积极的，包括给人带来好运或者治疗疾病的能力，而黑色巫术则指任何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罗马政府规定，任何女巫或术士，只要是通过咒语或饮剂而致人死亡的，都必须遭受死刑，与对用刀剑或毒药致人死亡的人的处罚一样，这在那个时代还是个很合理的规则。

实际上，巫术仅仅是异教的一个延伸，与德鲁伊教类似，它认为他们的神是自然力量的化身。一些信仰文化并没有像德鲁伊教一样崇拜橡树和槲寄生，把力量赋予在植物生命上，而是以动物为载体，如山羊、牛，在欧洲来说，尤其是猫。这一时期的大量巫术都像任何个人的精神信仰一样，是没有任何伤害性的。只是有几个从事巫术的人，认识到了任何人身上都具备的这种力量，然后合情合理地相信自己能够运用咒语、混合饮剂，从而在对此深信不疑的邻居那里制造恐惧并获得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巫术只是被看做一门手艺，与医疗实践一样，同样有成功也有失败。

基督教的到来改变了一切。在对基督教上帝歌功颂德的神秘法事和没有得到教会批准的类似活动之间，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分。对于一个教会版本的教义，即“你或者赞同我们，或者反对我们”，不被教会批准的神秘活动统统与撒旦有关，因而必将受到谴责。

在基督教所界定的所有罪恶中，与魔鬼撒旦做法联系最为密切的是涉及到性的，由于教会内部的权力完全掌握在男人手里，他们经常会发现，自己在看到女人或者女人的被动活动时，经常会受到某种吸引，于是女性成为教会对女巫进行迫害的主要目标。毕竟，魔鬼撒旦在诱惑一个惧怕上帝的女人走向犯罪时，能有什么比通过引诱一个到了已婚年龄的少女更好的办法呢?

妇女被认为是魔鬼在捕获男人灵魂的圣战中所使用的工具，跟其他因素一样，这一点就促成了千百年来对妇女迫害的动机。在过去的两千年中，成千上万的妇女遭到了绞刑、溺水、火烧、监禁和毁损容颜的酷刑，而这些与颠覆性的意识形态、宗教偏离或种族歧视根本没有瓜葛。这一切全是因为性别造成的，都是由于几个世纪以来，男人对女人的统治支配地位使然，这种支配超出了性和经济上的影响，还包括精神上的绝对权威。

尽管我们对巫术及其从业者的主张更加宽容，甚至感到有趣，但是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人则需要向《圣经》来求助，寻找恰当的理由来谴责任何疑似女巫的人。“因为反叛是巫术的罪行”，他们会阅读《塞缪尔》的第十五章第二十三条，这个证据表明，女巫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拒绝服从命令。为了寻找更加直接的指示，基督徒们可能会审阅《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二章第十八条，“你不能容忍女巫的生存”。

现代神学家可能会对这些训诫的真实意义提出异议，但是自从十九世纪以来，欧洲和美国的文明就开始把这些训诫当作明确的权威，烧死、绞死和溺死那些从事类似女巫行为的妇女。几个世纪以来，数以万计的妇女遭到了这样的厄运，而主要的迫害者总是男人，并且他们对受害者指控的根源几乎仍然与那个高于一切的罪恶有关：性。

在基督教神话学中，对女巫最具破坏性的指控是，她们与魔鬼之间有性活动。也许是为了报答那些屈服于他的性欲的女人们，撒旦给他的性伙

伴身上赋予了神秘的力量，比如控制其他人的大脑活动，运用邪恶的咒语，以及具备仅凭思维或手势就让固体移动的能力。

贯穿整个历史，在把女巫描述为魔鬼方面，罗马天主教会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尤其是在一四五〇年，它重新启用了对异教徒的很多古老的指控。对于那些选择从事魔术的女巫和从事尘世宗教的女巫（这些宗教通常是德鲁伊教的各种形式）之间，基督教会没有做出什么区分，它们的唯一目标是使“异教徒”改变信仰，皈依天主教。事情通常的情况是，其动机和方法既笨手笨脚又不注重事实。比如，教会声称异教徒“崇拜魔鬼”，但有一个事实它们忽略了，那就是魔鬼是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的一个创造，异教徒怎么可能“崇拜”一个根本不知道其是否存在的魔鬼？

这些事实并没有挫败教会官员。他们发布命令说，女巫绑架婴儿，杀害并吃掉她们的受害者；她们还会呼风唤雨，下冰雹和暴风雨；她们还会让骑手胯下的马受惊；她们把自己的灵魂卖给撒旦（或者至少出卖了她们的身体，这是很明显的）；并且还有来自那些信守独身主义的男人的滔天指控，她们不仅仅引起了男性性无能和旺盛的繁殖力，而且还能让男性生殖器消失，即阉割的最终行为。

即使最陈腐的骑着扫帚的女巫的形象也与性联系起来。她们的指控者说，女巫也许能够飞起来，但是骑在扫帚上的行为则更多是与扫帚柄的作用有关，在道德拘谨的基督徒看来，这是一个阴茎替代物，是用来激发性高潮而不是用于飞行的工具。其实真正的起源可能跟性没有太多的联系，在一些中世纪文化中，妇女骑着扫帚在田地间跑，目的是设法让谷物快些生长，或者她们会从扫帚柄上跳下来，目的是恳求谷物能够长得像她们跳得一样高。



传说中的女巫有骑着扫帚柄的习惯，来源于对庄稼的激励或者性高潮的刺激。

新教徒对女巫的看法也不比天主教徒开明多少。路德在《圣保罗使徒书》给《迦拉太书》的评论中写道：“我对这些女巫应

该没有什么同情心，我要把她们全部烧死”（他还写道：“如果一个女人在生孩子的时候，身心俱惫，最终死于痛苦之中，这没什么关系。就让她死于生产吧，她就应该遭受这样的下场。”）加尔文也鼓吹说：“《圣经》告诉我们有女巫的存在，那么就必须得杀戮她们……上帝的这条法律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循道宗教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也训诫说，任何否认巫术事实存在的人所反对的不仅仅是圣经，而且是“所有时代所有国家中最聪明最优秀的人”的集中智慧。

神学家和心理学家一致推断，对疑似女巫的妇女进行迫害背后的真正动机，是要帮助解除那些对基督教义持怀疑论的人的疑虑，强化他们对上帝的信念。妇女接收来自撒旦的邪恶力量的事实，可以证明一个精神世界的存在，如果把这个观点进一步推广，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也可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如果没有上帝的存在，那么就没有撒旦的存在，因而上帝是存在的。一个对该理论非常有研究的评论家说：“没有女巫存在，一些中世纪的神学家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会发生邪恶的事情。科学启蒙到来之前，在一个以圣经为基础的世界上，对于女巫和魔鬼这种不幸存在的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或者上帝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阻止邪恶的事情发生，或者上帝没有足够的善良以至于他不屑尝试。”

长久以来，有组织的宗教一直赋予女性一个替罪羊的角色，尤其是对于教会领导们无法解释的事件或者生活的方方面面。女巫不是自然神学问题的唯一受害者，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也不是唯一陷入尴尬之地的组织，在我们的世界上，至优至善和无所不能的上帝真的与邪恶是同时存在的。但是从公元一〇〇〇年到一八〇〇年，在贯穿西欧和美洲的地区，两个教会都接纳了圣经中有关女巫的指令，而且是按照逐字逐句的意思，尽管他们用于根除巫术所引发的邪恶世界的方法不同，比如在天主教国家，执行死刑的办法是在火刑柱上烧死，而新教国家更偏爱的方法是绞死，但其结果是一样的。

要想证明这个被指控的女人是个女巫，需要证据，而她们的指控者发现了大量的方法获得证据，真的是非常壮观，因为最终的裁决几乎总是有罪。看一看下面他们所采用的方法：

用沸水试验。拿一个很深的容器，里面装满水，然后烧热直到沸腾，这时命令那个被指控的妇女从容器底部拿走一个石头或指环。烫伤的手要用绷带缠着，而且还需要密封起来。如果打开绷带后，水泡像核桃一半那么大小，裁决的结果就是有罪，并判处死刑。在审判的前一天，被指控者通常被告诫要祈祷，并绝食，大多数妇女都这样做了，但是很明显，这样做并没有给她们带来什么好处。

用火试验。这只是稍微变化一些花样而已，要求被指控者光着脚，从一排烧得火红的金属犁头上走过，如果脚底没有任何烧伤的痕迹，那么她就是无罪的。

用溺水试验。这代表了历史的极致。先是把被指控者推入水中，然后法官在一旁观察，看她是否浮出水面。如果这个妇女沉入了水底并溺水身亡，那么就证明她是无罪的；如果她设法漂浮在水面上，她就是有罪的，要立即被绞死或者在火刑柱上烧死，除非美其名曰为了避免牵连到其他人，否则她一定会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用十字架折磨。把被指控者和指控者放在教堂里，通常是在正常的宗教仪式上。两个人都按照命令伸出双臂站在那里，模仿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样子。如果谁的手臂先放了下来，那么谁就是错误的。

对于被控有罪的女巫的迫害时松时紧，这与各种各样的影响有关，从自然灾害到宗教内战都可能产生影响。从一五五〇年到一六五〇年的一百年间，当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关系最为恶化的时候，在法国、德国和瑞士，到处可以看到对女巫的审判和处死的场面，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燃烧的年代”。在十七世纪，对被控女巫的态度开始发生软化，在一六一〇年，荷兰禁止对女巫处以死刑，一六八四年，英国进行了最后一起处死女巫的的审判。到了英国萨勒姆女巫审判时期，当时有几十位妇女和几个男人因为被控传播巫术，或被处死，或被捕入狱，这时，这个浪潮已经在欧洲达到了顶峰。

天主教和新教对女巫的攻击步骤是，先是探究她们尘世的精神性，然后建立起她们与撒旦的联系，这样作法的持久影响是把这个运动推入到地下，她们开始了秘密活动。因而，在主教亲自出马寻找这些魔鬼崇拜者之

前，几个世纪以来所获得的大部分知识和传统都永远丧失了。曾经被视为公开而自由的做法，如崇拜自然，如果还想得以维持，那么只能冒受尽折磨和痛苦死亡的风险。许多人尽管面临危险，但依然从这些活动中找到了慰藉；其他人则遭到了严重的摧残，而他们根本就没有进行什么巫术传播，只是告发了他们的邻居而已。

巫术的核心信仰得以存活下来，是因为那些严格遵守仪式要求并恪守其信条的人转入了秘密的地下活动。他们精神上的后裔在二十世纪中期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这就是巫术崇拜，现代巫师用这个名词把他们自己与遭受迫害的祖先加以区分。

巫术崇拜作为某种有凝聚力的原则体系的出现，其根源既可以从古代也可以从最近找出端倪。其中就包括了对北美及欧洲的许多公司做法的反感和憎恶，这些公司认为他们的做法对环境是无害的，包括对雨林和荒野的破坏，对本土物种的根灭，以及对有限资源的贪婪消耗。这些分散的运动可能有很多种来头，但是最终他们的声音开始传遍各地，吸引了各个行业的皈依者，尤其是年轻人。从对资源保护和环境责任的要求出发，这些皈依者探索和信奉巫术崇拜的诸多信仰就是一步之遥的事情了。

巫术崇拜再次出现的另一个推动力量是对萨满教恢复了敬重，它其实是基督教出现之前的巫术的起源。萨满教的“道士”这个词据说来源于西伯利亚的一个土语，意思是“他（或她）知道”，一个部落或村民拥有治愈疾病的知识，并提供精神上的指导，这个概念先于任何有组织的宗教而存在。对于妇女而言，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部落社会里，要想获得权力和地位，成为女道士不失为一种方法，这一点还在继续对巫术崇拜施加影响，巫术崇拜吹嘘说，这个团体所拥有的女性成员永远比男性成员多得多。古代希腊文学明确了萨满教仪式和习俗在希腊早期的存在，后来，罗马宗教领袖也采纳了这些仪式和习俗的做法。几千年以来，西藏佛教一直与萨满教有着很深的渊源，每个美国本土团体，从北极的因纽特人到巴塔哥尼亚人部落，都在沿袭着同样的信仰，只是稍稍有些变化而已。

基督教出征者决心广泛传播其宗教信条的决心，在美国以及其他地方，对萨满教也产生了同样毁灭性的影响，始作俑者就是西班牙殖民者。

天主教的传教士和牧师指责萨满教道士和追随者为魔鬼崇拜者，处死了几千人。尽管这种毁灭大多发生在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但是就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亚马逊地区的传教士仍然定期地毁损古代岩石雕刻的外观，这些雕刻画展示了萨满教的信仰或传说。

在北美洲事情也没好到哪里去，美国本土的萨满教道士被贴上了“巫医”的标签，他们用自然界自生的元素来治愈疾病的主张遭到了公然的嘲笑。后来，科学家提出，许多普遍的治疗方法，比如通过咀嚼柳树根来治疗头疼和发烧，都是有事实基础的，因为柳树是水杨酸的自然来源，阿司匹林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只有对萨满教做法正面的重新评估逐步展开的时候，萨满教道士才能真正赢得其他文化的尊重。当许多萨满教教义与越来越受关注的环境问题融合起来的时候，巫术崇拜又重新复苏了那些教义，而这些教义是通过与试图消灭它的势力进行千年斗争才得以存活下来的。

但是，旧习惯不是那么容易废除的。大多数的文明世界对巫术崇拜运动仍然抱有敌视态度，从宗教和道德的原因考虑，唯恐它代表一种煽动性的哲学，从对其秘密活动的记载上看，其皈依者拒绝承认自己的身份，这也促使人们更加怀疑。因此，二十一世纪的巫术崇拜仍然不为人知，人们还是谈之色变，仍然有些人一想到巫术崇拜，就会想到咯咯笑的女巫和邪恶的咒语，这些人依然把它当作一个秘密组织看待。

“巫术崇拜”这个词来源于中世纪的“wicce”，意思是“服从”，尽管大多数字典并没有在这两个词之间加以区分。但是词源学的解释表明，巫术崇拜的做法可以做出让步或者发生改变，来满足从业者的需要，这与大多数有组织宗教的固定教义截然不同，这一点很有意思。实际上，巫术崇拜教义的核心伦理，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女巫约章”，是这样描述的，不对任何人造成伤害，做你想做的事情，这也是圣经金箴的一些规定（圣经教导说一个人要别人如何待他，他也应该要求自己那样对待别人），而这是犹太教和基督教所共同拥戴的教义。这种道德上的灵活性让传统宗教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它推崇的似乎是一种情境伦理道德，对于宣讲《基督教十诫》和《古兰经》这些固定的道德指导原则的人来说，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样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怎么可能提供固定的道德

指导？作为回应，巫术崇拜的信仰者提出了“三元法则”。

三元法则与女巫约章一道，成为巫术崇拜成员的道德指导。根据这条法则，一个个体所释放的所有能量都会三倍地返回给那个人，这是对牛顿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法则的一个神秘解释。在这种情况下，积极的治疗能量，如爱、支持以及对健康和成功进行的祈祷，就会以三倍的力量回到释放者那里。同样，有害能量也会返回到释放者那里，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他所得到的能量也是他最初释放的能量的三倍。

巫术是否是一个宗教？也许是吧。其追随者认为这是一种“异教的宗教”，对于一些人来说，这就像矛盾修饰法一样令人难以接受。巫术崇拜的其他成员更愿意把自己定义为“对生活充满个性而积极的庆祝”，许多人可以看到，这里反映出的是传统宗教的目标和活动范围。

所有宗教都对某种实体展开崇拜，在这个方面，至少巫术崇拜是符合的，它崇拜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实体。他们最重要的崇拜对象就是“伟大女神”，尽管她还有几个并行或者次要的身份，如“大地母亲”、“月亮女神”和“星女神”，但她通常还被叫做“地下女王”和“三重女神”，在最后的这个叫法中，她是三个人物的代表：处女、新娘和老太婆，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她代表了少女、母亲和丑老太婆。

在她充当处女角色的时候，她是一个创造者，灵感的赋予者，以及半人半羊的山林畜牧之神潘的永恒处女，对于两人的关系一直存在持久的争论。在巫术崇拜的民间传说中，她爱每一个人然而却没有嫁给任何人，其神圣的颜色是白色。她的形象代表是逐渐盈满的月亮，以及掌管早晨和太阳的金星。这种描述不免让我们回想起圣母玛利亚的形象，但巫术崇拜的追随者声称，他们的这个女神在基督教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诚然，如果后来的宗教都从这里有所借鉴的话，那么这也不算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

接下来，伟大女神作为新娘的形象来源于她作为保护者的作用，她是飞禽走兽之女神，爱情之神和富饶多产之神，其形象代表是一轮满月以及漫山遍野的羊群和茂盛的作物。新娘形象的神圣颜色是红色。

伟大女神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形象，成为了丑老太婆，也就是毁灭者，夜晚之女神和地下之女神，即洞穴和坟墓的领地，就是在这一点上，巫

术崇拜本来温和而模糊的形象变得非常黑暗而不祥。毁灭者是一个母猪的形象，专门吃自己的幼崽，她是死亡和腐败的参与者，最终促成了新鲜的生命。对于毁灭形象的老太婆，巫术崇拜的信仰者认为她是逐渐亏缺的月亮，半夜时分，黑暗和寂静中的一个十字路口。她神圣的色彩当然是黑色了。

伟大女神的伴侣是长着角的神，这种形象会引起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人的负面反应，他们把这种形象或者理解成撒旦，或者是萨梯（一个被描绘成具有人形却有山羊尖耳、腿和短角的森林之神，性喜无节制地寻欢作乐）。显然，长角的神与无节制的和婚外的性活动有密切关系，尽管巫术崇拜教义赋予其好几个次要头衔，来为其正身，如多产的古代之神，生命之王，生命赋予者，尤其是伟大女神的长角配偶。除了这些头衔之外，对长角之神的解释变得非常复杂而令人迷惑。长角之神既是狩猎者，也是被猎者；他既是光明之王，也是黑暗之王；他是白天的太阳，也是午夜的太阳。

这里，巫术崇拜赖以存在的异教传统就非常明显了。长角之神的命运是与收获一起死亡，作为种子被埋在地里，然后在春天来临的时候，从大地母亲的子宫里再次破土而出。同基督教之前的宗教里的神一样，对于他们来说，通常的描述是长着角的公牛、山羊、公羊或者雄鹿，这种形象更会让那些对巫术崇拜持怀疑论者认为他的真正身份就是撒旦，尽管巫术崇拜教义三番五次地强调，魔鬼在他们的巫术中并不占据一席之地。

这种与撒旦的假定联系，再加上继承自萨满教的一些做法，折射出了为什么在“燃烧的年代”开始前很久一直到现代，巫术崇拜蒙受了几个世纪的迫害。与萨满教道士类似的是，巫术崇拜的信仰者也在试图超越物质世界，然后通过每个普通人都能使用的工具和方法，进入一个并行的精神世界。巫术崇拜者认为，这种转变要通过交替的意识形态才能实现，而进入这些状态的工具则是我们很熟悉的，它们包括绝食、饥渴、集中注意力、引起幻觉以及施加痛苦。为了加强幻觉的效果，还经常伴有击鼓、摇铃、音乐、吟诵和舞蹈，而且为了增加若隐若现的火光效果，这些活动通常都在晚上进行。

在贯穿世界各地的本土文化中，这些方法通常作为仪式元素而采用，这也就使得许多怀疑论者认为，巫术崇拜不过是祖先为盎格鲁·撒克逊人

的白种新教徒改编后的仪式，就像旧式电影中美国本土人所表演的战阵舞，或者已经丧失的非洲本土部落的陈旧的种族传统。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在历史上，所有在一个假定更高的智力和精神层面上运作的有组织的宗教，都会运用它们自己的一些神秘仪式。比如天主教会通过燃烧香料，会把圣饼“神奇地”变成肉，把葡萄酒变成血，再加上激动人心的音乐，以及统一说出的不断重复话语[①]，来达到类似的效果。领圣餐礼的做法也是一个类比，然而这些仪式要达到的效果是相似的。

巫术崇拜的信仰者不再把经历痛苦当作从物质世界迈入精神世界的手段了，大多数现代巫师也拒绝使用幻觉剂。然而巫术崇拜仍然受到一些人的玷污，他们把其活动与饮酒狂欢的仪式、魔鬼崇拜，以及毒品和麻醉剂的使用等同起来。正因为如此，许多巫术崇拜者，无论是男是女，都选择隐藏他们的身份，他们唯恐遭到讥笑，面临失业的危险，暴力的威胁，尤其对于妇女来说，可能意味着与她们的伴侣分开，并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对于这些偏见做出的唯一应对就是保守秘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巫术崇拜者在描述公众对他们信仰的接受时说，“他们已经从阴暗的角落里走出来了”。）正如我们可以从其他事例看到的那样，秘密性会加深人们的怀疑，从而导致更大的隐藏秘密的动机。

尽管巫术崇拜可能被看做是最不拘泥于形式，组织结构最松散的秘密团体，但是其入会仪式也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形成的。入会仪式的举行通常有女巫团的参与，当然了，如果愿意，巫术崇拜者也可以通过一个叫做“自我奉献”的过程来入会。用现代心理学术语，这就是一种“与自我定约”的形式，在这个仪式上，个体要对他或她所选择的路做出权衡和考虑，一旦踏上了旅程，那就是视自己为巫术崇拜信仰的一个孩子，发誓要遵守女巫约章并在精神上得以成长。

如果想要加入一个既定的女巫团，则需要更加复杂的入会仪式，而且可能还要等上一段时间，通常是“一年零一天”，然后才能授予她真正的资格。女巫团内部的身份等级也是各不相同的，要求必须提供高级技能或

---

① 几百年以来，吟诵的内容都是罗马教皇格利高里圣歌。

经验的证明，以及入会程度，才能完全地得以接受。或者这些程度可能涉及到神圣的仪式，并具备指定的责任和期待。

在那些对巫术崇拜不熟悉和担忧的人眼里，女巫团的概念仍然产生这样的形象，带着黑色帽子的女人在满月的天空下，用手搅动着一锅锅冒着泡的酿制的酒，就像《麦克白》里的场面一样；或者你的头脑中会浮现出现代一点的场景，在森林里跳裸体舞蹈。《麦克白》的场面描写完全是虚构的，但是现代巫术崇拜者在森林里跳裸体舞的场景则绝对是真实的。

巫术崇拜的一些成员更喜欢“以天幕做衣”来举行仪式，她们把衣服脱掉，作为一种骄傲的表达，对她们从神那里所沿袭的身体的骄傲。她们或许独自举行这样的仪式，或者在女巫集会上举行，但是，同几乎任何与巫术崇拜有关的事情一样，这个决定是由个体做出的。比如说，有许多巫术崇拜者，她们会选择穿着仪式服装，尤其在节日和正式仪式的时候。而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以天幕做衣”也许更多是出于二十世纪男人对肉体的好奇，而不是异教的传统。

巫术崇拜者的一个更加普遍的组织活动就是她们会划出一个“The Magickal① [sic] Circle（神秘圆周）”，把巫术崇拜者与其他世界及其消极性分离开来，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一个球体，包括地面或地板以上或以下的一些空间。这就为现代的居住在公寓楼里的巫术崇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具备足够直径的球体可能会从巫术崇拜者的住处穿过，一直到达位于楼上或楼下的住所。因此，住在高楼里的信徒最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划出这个圆形区域，这个时候周围的住户都在沉睡中，不可能有人从这个“神秘空间”内部穿过。

“神秘圆周”有四个瞭望塔，每个瞭望塔位于罗盘的四个象限，每个瞭望塔都代表了巫术崇拜的四个元素中的一个，它们分别是：地球、空气、火和水。位于北部的是地球，地球代表生命的身体。是四个元素中最黑暗和最沉重的，地球是母亲，我们的生命之源，也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地。巫术崇拜者从地球那里获取稳定、富足、成长和耐心。代表生命气息

---

① 行文中“magick”这个拼法是由阿莱斯特·克劳利引入的。

和不断变化的新鲜微风的空气位于圆周的东部点上，也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空气被认为具有男性化的品质，提供清晰的思维、真理和对意愿的有意识的表达。



一个典型的神秘圆周，看上去就像一个三维的球体。

南部象限上是火，代表生命的能量，仲夏时太阳的位置。火也具有男性化的品质，为大地母亲提供能量，促成丰足的收成，并为巫术崇拜者提供勇气、信念和激情。如果对其表现出不足够的尊重，他也会用愤怒和敌视来威胁你。

大地母亲的发源地是水，守护在神秘圆周的西部象限，这是太阳落下的地方，也是灵魂进入无形世界的地点。水也与月亮相一致，反映出月亮对潮汐的影响。水同时也是一个直觉性的元素，能够弄乱空气的逻辑理性，巫术崇拜者把水看做净化、敏感、同情和爱。

用于营造神秘圆周的方法听上去就像《哈利·波特》里的一样天真，只要巫术崇拜者在头脑里进行想象，就什么都会发生，所以，如果要创造出一个为自己所用的圆周，他们只需要把它想象成像自己的身体那么大就行了。想象的过程似乎有很多种版本，但是最普遍的是下面的提示：

一．圆周形成的内部空间可以是一个高耸的城市公寓，或者在森林或丛林中的茂盛的开阔地上。地点无关紧要。

二．第一步要求清洁这块地方，或者通过清扫地板使这块区域成为神圣的地方，或者发出大量的噪音赶走邪恶之神的影响（不推荐住在公寓里的人在夜深人静时使用这个方法）。

三．如果是单个的巫术崇拜者，他就要站在圆周的中央；如果是三个或更多的人在创建这个神秘区域，那么他们要站在圆周的周边。然后放松自己，感受地球的能量，面对四个瞭望塔的方向站立，用一只手搜集其特殊的力量，另一只手把来自

天空的能量推向自己。

四．他们用两只手把能量推给那个围绕他们的假想的球体，在四个瞭望塔的位置上不断地重复这个过程，每次能量的推送都使得球体的墙壁更加坚固，更加具有保护性。

五．当巫术崇拜者感觉这个无形的球体已经够稳固了，他们就停止建墙程。现在这个球体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感知——作为一种颜色，作为一层密集的空气，作为一面带电的墙，或者只是发出嗡嗡声的源头。

六．如果在仪式结束之前，必须有人离开这个圆周，他们必须用手在“墙上”砍出一道“门”，然后保持手指的伸直状态，并做出好像他们从这个长方形的门走出来的样子，然后在身后把“门”关上。回来的时候，他们要“打开”那扇“门”，再轻轻地关上，用手把门的轮廓再轻轻“抚平”。

七．在神秘圆周内部，巫术崇拜者可以感觉到温度的上升，打开“门”以后，会让冷空气冲进来，也就是一些消极因素。

巫术崇拜者通过集中于他们的自然力量，来产生各种变化，包括他们自身的变化，他们所爱的人的变化，以及整个世界的变化，神秘圆周为此提供了一个安全、舒适而有效的场所。然而，这个变化必须是积极的，巫术崇拜禁止使用魔法的力量来伤害他人。

来自于萨满教的自然主义根源，巫术崇拜的多数信仰和习俗的基础都是生命循环，月亮周期，尤其是季节的循环，在每个年轮中，都有八个节日性的女巫夜半集会。第一次夜半集会是在传统的春秋分附近的日子；其他集会出现在二月份、五月份、八月份、十一月份的第一天前后。这些夜半集会包括：

Imbolg，也叫圣烛节，二月二日举行，预示着第一丝春天的气息，以及地球上光芒的回归。

Ostara，春分，三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此时光明和黑暗呈现出绝对的平衡，光明支配黑暗。

Beltane，五月份的第一天，凯尔特人夏天的开始。在这一天，要将火点燃来纪念生命和繁荣的回归，其他文化的人也采用这一天进行类似的庆祝活动。繁荣的联想与男女在这一天坠入爱河有关。

Litha，夏至，表示接受太阳的光明、温暖和生命的馈赠。

Lammas，八月一日，提醒每个人要开始收获了，并为冬天做好准备。这个名字是因凯尔特战士鲁夫而得名的，他赦免了敌人的性命，作为回报，从他们那里学来其农作物丰收的秘密。这一天是专门奉献给收获的三个夜半集会中的一个。

Mabon，秋分，九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又是一个令人欣喜的日子，白天和黑夜一样长，只是夜晚控制着白天。这是第二个收获的时间。

Samhain，十月三十一日，这是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它标志着巫术崇拜组织一年的开始。这个词来自盖尔语，意思是“夏天的结束”。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为了纪念那些在那一年转为圣徒的人的灵魂，这个日子变成了万圣节，这一天是巫术崇拜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夜半集会，据说在这一天，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帷幔是最稀薄的，在这段时间，已经离我们远去的人的灵魂可以聚集在火堆旁取暖，并向那些活在尘世间的亲属表达爱意。

Yule，冬至，十二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一年中夜晚最长的日子，提醒我们众神必须重生，才能把光芒和温暖重新带给我们的地球。

巫术崇拜大多数益处都扎根在从事巫术者的头脑中了，他们会正义凛然地说，这不会使其权力有任何削减。但是，正如我们从玫瑰十字会、现代卡巴拉教和郇山隐修会所看到的那样，该运动的真正历史和许多“古代”之谜都与持怀疑观点的人物有密切关系。对巫术崇拜而言，至少有一个人试图用深刻的怀疑论观点玷污现代的巫术崇拜运动。

还记得在燃烧的年代对女巫进行的恐怖的审判吗，尤其是那些受到宗教裁判所令人发指的摧残的女巫？天主教会向来以有条理地记录事件为名，包括宗教裁判所对疑似女巫判处死刑的折磨过程。每个指控的详尽描述，甚至每声痛苦的呼喊，都被精心地记录下来。被控女巫因为恐惧和痛苦，在遭到折磨的时候，她们会承认或者主动供出大量的活动。她们坦白

的罪行通常包括与撒旦的性行为，对无辜的人施加咒语，给大地带来风暴和干旱，把她们自己变成猫和其他动物，以及讯问者能够想象到的任何邪恶行为，都是被控女巫必须说出的。

然而，在对女巫进行的几千个记述中，没有一个提到了她们的伟大女神和长着角的神。在任何一个手抄本中，都没有对神秘圆周的描述，也没有什么关于女巫夜半集会和她们庆祝活动的信息。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在忍受折磨遭到审讯的几千个女巫中，对于她们的仪式，没有一个人足够地了解，以至于可以详细地描述出来，或者她们太过软弱以至于无法揭示出真相来？而且有没有可能，真正从事活动的女巫没有一个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讯，因而即使林林总总的折磨，也无法真正讯问出他们试图消灭的所有邪恶的真正渊源？

或者，这样解释是否合理：这些具体的“古代”权力和信条根本就不是那个时候的，而是现代的发明，是那些现代人想通过声称了解所谓的古代神秘知识，从而寻求荣光、财富或者可能的肉欲，因而使得他们突发奇想？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至少有两个人是最佳的怀疑对象，这两个人的信誉我们都不敢恭维。

其中一个人就是我们熟悉的阿莱斯特·克劳利，在他颓废的一生中，他把神秘知识看做是打破其所遭遇到的几乎每个道德法则和理念的手段。在他生命临近终点的时候，他几乎身无分文地生活在黑斯廷斯，这时一个叫做杰拉尔德·布鲁索·加德纳的人拜访了克劳利。克劳利声称对超自然的神秘非常了解，这让加德纳饶有兴致，他当即加入了克劳利的“金色黎明秘密组织”和“东方圣殿骑士团组织（OTO）”。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克劳利去世之前，他们碰了几次面。很快，加德纳就宣布他被任命为 OTO 的总团长，占据了克劳利的位置，成为整个说英语国家秘密运动毋庸置疑的领袖。

从诸多方面看来，加德纳都很胜任这个职位。他于一八八四年出生在上流社会的英国家庭，他年轻时的大部分时光都在地中海和中东地区游历，他曾经居住在锡兰[①]、婆罗洲、新加坡和马来半岛，对于沿路遭遇到

---

①现已更名为斯里兰卡。

的秘密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加入了很多组织，包括玫瑰十字会和一个自诩为埃及秘密组织的英国团体。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加德纳结婚了，婚后定居在英国，此时他对裸体主义滋生了强烈兴趣，他的余生都在发展这一兴趣。他也开始写作，发表了几本反响平平的小说。一九五四年，他的所谓巨著，也是关于巫术崇拜主题的第一部小说，《今日魔法》终于发表了。这本书出版的时间很有意思，就在英国废除禁止从事巫术活动的法令后不到三年，小说内容也非常具有揭示性。这本书建立在玛格丽特·穆瑞创作的作品的基础之上，她是一个早期的神秘学家，她于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女巫之神》把巫术界定为先于基督教存在的异教的一种，加德纳的书引入了伟大女神和长角神的概念。这本书也第一次引入了“巫术崇拜”这个术语。

这本书的出版证明非常成功，同时也提升了加德纳的地位，他蓄着突出的山羊胡须，头发向上拢，故意把自己这幅撒丹模样的打扮弄成一种社会名流的派头。在《女巫之神》后，紧接着在一九五九年出版了《魔法的意义》，不久，他就开始到处宣扬，在英国，常驻女巫所创造的“力量锥体”挽救了这个国家，使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免受纳粹的侵略。当人们迫切要求了解细节的时候，他却非常模棱两可，“除非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才能向大家公示这些秘密”，他解释说，“当时使用了十分巨大的力量，只是我不能说。现在做这些就意味着使用一个人生命的力量”。



杰拉尔德·布鲁索·加德纳。现代巫术崇拜的教父或者只是另一个卑鄙下流的老人家？

或许并非如此。加德纳自己曾经指出，“女巫是最完美的恶作剧者，她们学习这个完全是因为从业的需要，是一种谋生工具”。当他声称于一九三四年获得了新加坡大学的博士学位时，他既是在搞恶作剧，也是在进行欺诈，因为对他的过去所做的调查发现，他获得学位的时间比该大学成立的时间还早。他声称从法国图卢兹大学获得的所谓文学博士学位也不免令人挠头，图卢兹大学没有一个人对他的入校有任何了解或者任何记录。

还有其他令人头疼的事情呢。除了对秘密仪式颇感兴趣，加德纳还同

样着迷并追求其追随者所称的“肉体成就”，也许这是一种通过身体的过度欲望来达到精神发展的手段。加德纳对巫术崇拜的女性皈依者的指导原则之一，就包括进行裸体的仪式活动，尤其是在他视力所及之处，也许这样做的原因，更多是为了满足他对肉体的欣赏，而不是与女巫精神上的沟通。他也主张并倡导“伟大仪式”，其中就涉及到了加德纳本人与女巫团里选出来的伟大的女神职人员在金属饰面的桌子上进行性交活动。在没有自愿者的情形下，加德纳则采用了一个非常实际的解决方法，就是雇用一个妓女来充当那个角色。

加德纳死于一九六四年。在几年之内，这个运动就传到了北美，创建这个运动的人可能更多地还把它当作是放纵的性欲崇拜，而不是精神实现的一个手段，在那里，随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幻觉剂的使用和嬉皮士的流行，该运动达到了顶峰。后来的狂热者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把巫术崇拜变形为严肃的新清教主义，天使般的仙女穿着薄如蝉翼的长裙，在月亮下面，沿着星星点缀的湖畔翩翩起舞，这足以表达新清教主义近乎自我陶醉的温雅的特点。

巫术崇拜仍然是皈依者的秘密传统，她们害怕遭到嘲笑，畏惧主流社会的排斥，这样一来，人们就无法判定那些创造神秘圆周和加入女巫团的追随者们的准确数量。对于那些无法从其他渠道了解这些知识的人来说，女巫的活动也许可以满足他们精神上的渴望，并给他们带来内心的平静。但是他们所主张的巫术崇拜代表了古代智慧和神秘的源泉一说，仍然令人无法相信。

大多数的秘密团体或者是拥有错综复杂的仪式的兄弟组织，或者是犯罪团体，其活动大都受到法律的制约。

然而，有一个团体，对地球上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发挥着日常影响，这种目标的取得不是通过一个严密的组织实现的，而是通过与著名大学内部有特权的年轻人的联合得以完成。该团体的存在是能够得到证实的，其历史与共济会传统和光明会目标密切相联，目前仍然采取秘密的地下活动，且充斥着一些令人怀疑的行为。这就是骷髅会，美国领导人物的孕育地，其成员所取得的权力和威望不仅仅在规模上相当巨大，而且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继续保持着与这个团体的密切联系，这至少营造出了一个秘密团体的外观——也许还不仅仅如此。

骷髅会位于耶鲁大学校园一个无窗的类似陵墓的建筑内，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墓地建筑，是建于一八五六年的一个褐石建筑，一直作为该团体在每个周四和周日集会的地点。每年只从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中选出十五人加入骷髅会，作为在大四的时候为组织服务。这个不同之处意味着这个组织的重点是其成员在校外世界的未来活动，而不是他们眼前的大学生活。兄弟般的友爱也存在于这群饮酒狂欢和大搞恶作剧的年轻人中间，但骷髅会成员更关注大事件，包括对全球施加影响。

“骨人”也许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名词，但仍然被用来称呼这个组织的成员，他们向外界展示了一种敌意的外观，或者至少在耶鲁校园是这样的。那些询问他们有关成员活动和成员资格的任何非成员，被他们公开地称呼为“局外人”或者“蓄意破坏者”。所有骷髅会成员都必须否认与组织的任何联系，如果公开场合有人提到了这个组织的名字，那么他

们必须离开这个地方，并且不做任何评论。然而，在存在的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中，关于其成员和程序的足够数据已经被揭示出来。尽管在模式上非常严肃，但尤其是入会仪式上，该组织至少采用了《动物屋》的影迷们所熟悉但可能更令人不安的方式。

一八七六年，早在外界对骷髅会谈虎色变之前很久，一群耶鲁大学的学生自称为“锉刀和铁钳组织”，闯进了墓地，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内部的装饰。这个组织看上去更像一个十九世纪的男孩俱乐部，而不是未来世界领导者的一个集会地，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对内部房间三百二十三号客厅的一个描述：

> 在西面墙上，挂着众多的绘画，其中有一幅古老的版画，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开放式的穹形墓穴，墓穴里，在一个石板上，放着四个人的头盖骨，周围有一个小丑帽，几个铃铛，一本翻开的书，几个数学仪器，一个乞丐的字条，还有个皇冠。墓穴上方拱形的墙上，是用罗马字母写成的解释性文字：“谁是傻瓜，谁是聪明人，乞丐还是国王？无论是富是穷，所有人的结局都是一个死。”

一个世纪之后，骷髅会新人会者的女朋友（显然，这个人是秘密团体选举成员的失败案例）曝料说，她的男朋友曾经陪同她前往墓地建筑。她对其内部的最生动的回忆是，她看到了一面布满汽车牌照的墙。每个牌照上都有“三二二”这个数字，暗指著名的希腊演说家狄摩西尼于公元前三二二年去世，据说骷髅会就是在那个神秘的年份建立的。她还说，骷髅会的所有成员都被迫“充公”任何带有“三二二”数字的牌照，然后把它们拿到墓地建筑，摆放在墙上。

在过去的多年中，名望上不如耶鲁大学的其他大学的学生，一直在犯比偷盗车牌更严重的恶意破坏的错误，所以这其实不算什



骷髅图案下面的“322”使我们联想起汽车牌照的“摆放”。

么大事。但是我们可以饶有兴致地推测这样一个场景，一个生活在贫民区的年轻人，由于其出身的卑微，缺乏较高的社会地位所必需的特权，由于“充公车牌”等类似的指控被带到法官或者检察官面前，而这个法官或检察官刚好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并且是骷髅会成员，那个名不见经传的罪犯的犯罪行为会不会总是得到宽恕?

偷窃头盖骨是另外一件事情。

据说，每个等级的骷髅会成员都必须“充公”一个著名人士的头盖骨，把它带到墓地建筑里，作为这个等级勇气的证明。墓地里，展示着许多头盖骨。“充公”带有神秘数字“三二二”的汽车牌照而偷窃头盖骨则不亚于盗墓行为，很明显，这是骷髅会成员的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不幸的是，这些人中的很多人甚至在美国的权力席位上占有重要位置。

霍华德·奥尔特曼是美国的获奖作家和编辑，据说在一九八九年，一个叫菲利普·罗梅罗的人拜访了他，这个人声称是阿帕切勇士和首领杰罗尼莫的玄孙。根据罗梅罗的讲述，他的祖先的尸骨也在骷髅会头盖骨展出之列，罗梅罗指控说，一九一八年的时候，其祖先的头盖骨被人从坟墓中挖掘出来，这个人就是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的父亲以及第四十三任总统的祖父，布莱斯考特·布什。奥尔特曼解释说，在把此事公之于世之前，他还需要对这个说法加以证实，但是罗梅罗直接让奥尔特曼与一个叫做奈德·安德森的人联系，他住在亚利桑那州的圣卡洛斯的一个阿帕切人居留地。根据安德森的叙述，早在几年前，针对重新安置杰罗尼莫的尸骨问题，就从俄克拉荷马州的西尔山要塞迁往亚利桑那州的这个问题，他和另一个家庭就发生了争论，这引起了一个骷髅会成员的兴趣，他说自己叫帕特。帕特宣称，七十年来，杰罗尼莫的尸骨根本就不在俄克拉荷马州，而是用于神秘的耶鲁社团所举行的仪式中，这个社团就是骷髅会。

这个故事听上去很合理，布莱斯考特·布什曾经于一九一八年驻扎在西尔山要塞，而这正是杰罗尼莫的尸骨遭到偷盗的时间。让这个故事更具有真实性的是，据说还有一个私人印刷的文献，作者是F.O.马蒂逊，也是骷髅会的一个成员，文献描述了远征，以及在墓地中重获杰罗尼莫尸骨的经过。该文献的样本目前正安放在哈佛大学的一个图书馆里，这是骷髅

会和马蒂逊遗产执行者之间的协议，只是公众不允许观瞻而已。

一九八六年，安德森招募了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与乔治·H·W·布什追踪此事，也就是当时美国的副总统。据说麦凯恩给安德森和一些骷髅会成员代表安排了一次会面，这些代表包括乔纳森·布什，副总统的兄长。据安德森说，骷髅会成员在他面前呈献一个头盖骨，他们说这是杰罗尼莫的，作为交换，他们要求得到那份文献，阻止他和骷髅会的代表继续对此事进行讨论。安德森没有答应，全然不理会他们的鬼话，并且不相信他们拿出的真是杰罗尼莫的头盖骨。与美国大多数州一样，康涅狄格州也规定，除非特殊的法律或者专业用途，个人禁止拥有死人的尸首，这个指控，就像“充公”汽车牌照一样，骷髅会认为这样的指控对他们非常不适合。

关于杰罗尼莫的头盖骨展开的争论引发了对骷髅会收藏品的大量指控，包括墓地建筑内收藏着具有传奇色彩的墨西哥革命家弗朗西斯科·维亚[①]的头盖骨，据说一个小孩的头盖骨也在展出中。虽然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但是鉴于这两个指控以及骷髅会的本质，这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与该组织及其秘密成员的其他活动相比较，充公汽车牌照和偷窃头盖骨的行为都是小巫见大巫了，其他诸如间谍活动、毒品走私、战争投机和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等等，都与骷髅会成员有关，而且在这个方面，存在着大量的事实能证明。

骷髅会的起源可以很好地通过文献来证明，没有丝毫的虚张声势。一八三二年，威廉·亨廷顿·罗素对德国作长期访问后，从那里返回耶鲁继续他三年级的学业，当时他的家族经营着一家企业，叫做罗素公司。那时，影响德国最深的是黑格尔哲学，即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思想体系，在罗素访问德国的前一年，黑格尔作为柏林大学的教授去世。

黑格尔倡导“绝对理性”的理念，认为国家“对个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个人的首要职责是成为国家的一员”。他的作品建立在德国唯心论哲学体系的早期成员的基础之上，比如伊曼努尔·康德，黑格尔理念的影响是轰动性的，后来成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罗素回到耶

---

①也叫潘丘·维亚。

鲁大学，心中洋溢着对德国社会和黑格尔理论的崇敬之情。到纽黑文后不久，他就与同班同学阿丰索·塔虎脱合伙，创立了“骷髅会”，这就是这个团体名称的由来。

在那个时代，也许是耶鲁大学聪明而具特殊身份的学生的某种气氛促成了秘密团体的成立。到十九世纪中期，耶鲁大学至少有七个团体致力于秘密仪式，每当夜幕降临，这些秘密活动就活跃在校园里，其成员都用秘密的暗号和名字来加以识别，这些组织包括卷轴和钥匙协会、书蛇会、锉刀和铁钳协会、狼首会，以及其他组织，其成员以名字和仪式的怪异为乐。其中最独特、最秘密，也是最具有仪式性的当属骷髅会。



一百五十多年以来，奇怪的事情发生在耶鲁大学校园上的墓地建筑内部。

骷髅会最初与德国的联系产生了关于骷髅会与光明会直接联系的猜测。那些赞同这个观点的人援引了光明会的创立者亚当·维索兹的话：“通过最简单的方式，我们将让一切运动燃烧起来。职业必须如此分配和构想，这样我们就可以秘密地影响所有政治事务了。”再没有其他什么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的事实，但是骷髅会创立者罗素的家族所涉及到的活动，其毁灭性远远超过了传说中的（且可能是虚构的）光明会的追求。

当罗素与他人共同创立骷髅会时，他的家族和公司因为从印度和土耳其购买鸦片，然后卖到中国市场，已经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中国政府竭尽全力地禁止鸦片的散布，因为这种东西不仅剥夺了国家大量的硬通货，而且也削弱了民族的生产力。但是收效并不是很明显，十九世纪的中国，在西方国家眼里，就是一个屈服于恣意剥削的市场和民族。

罗素公司是世界上第三大鸦片贸易商，前两位是苏格兰商人查顿·马地臣的公司和英国公司宝顺洋行（登特公司），一时间，罗素公司成为广东地区唯一的鸦片进口商。在这件事情上，英国和美国政府的伪善直到今天依然令人十分不快，因为两个国家都禁止鸦片的进口，以及自己的国民

吸食鸦片，但是他们却坚持每年把成百上千吨的鸦片运往中国市场。

中国政府禁止鸦片的不断努力，以及出口国家对禁运法规的抵抗，导致了一八四〇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战争持续了两年，由于英国陆海空三军在科技上的优势中国政府很快败下阵来。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订，英国与中国协商向中国出口鸦片的最惠权，使中国蒙受了更大的屈辱；两年后，法国和美国也在条约上补充签字，加入最惠国行列。由于鸦片进口权利的正式化，罗素公司直接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在骷髅会存在的一百七十五年里，其成员可能从其他种种渠道获得了大量财富，但是这个组织的根基却深深扎在最可耻也是最无人道的一段贸易历史上。

罗素公司在广东的经营主管是小沃伦·德拉诺，未来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外祖父。德拉诺的主管职位，标志着与公司和骷髅会相联系的冗长的有影响的家族清单上的第一位人物，骷髅会成为那些寻求并获得权力者的温床，其比例远远超出了成员的实际数量。骷髅会的创立者罗素成为美国将军和州立法议员，而他的合作者塔夫脱则从政府和外交官发展成为战争部长——骷髅会的许多成员都坐过这个职位，而且他还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父亲，这个人既当过总统也当过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唯一的例子。

骷髅会的成员清单看上去就像美国版《名人录》最杰出的男性人物的筛选本，这些人包括：惠特尼、邦迪、哈里曼、惠好、平肖、洛克菲勒、固特异、斯隆、史汀生、皮尔斯伯利、凯洛格、范德比尔特、罗维特，当然还有布什，如果你记起每年只有十五个成员被选入骷髅会，你就知道这份清单的分量有多么重了。

骷髅会新人会者的选择过程也是同样地引人注目。四月份的一个选举日晚上，骷髅会的四年级成员来到每个被选上的三年级学生房间外，然后大声地敲门，当这个三年级学生打开房门，一个骷髅会成员会重击候选者的肩膀，然后大声吼叫："骷髅会——你接受吗?"

如果候选者接受了邀请，他们就会递给他一个纸条，用黑色带子缠绕着，并用黑色蜡密封着。打开纸条，除了骷髅会的神秘数字三二二，还有一条信息，命令候选者在入会选举的晚上到墓地建筑，并且不要带任何金

属的东西。

查阅骷髅会的历史，其成员的入会仪式一直是这个组织内保守得很好的秘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仪式还是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其中最持久的一个仪式——至少今年还是如此，就是要求新入会者分两部分讲述他的生平故事。第一段故事在星期四晚上讲述，涵盖了新会员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二段故事在星期日的晚上讲述，要求他从预备学校时的手淫开始详细叙述，一直到昨天晚上的性历史——这可能就发生在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前，而同时他必须赤裸身体躺在一个棺材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随着男女同校思潮的奔涌，女大学生开始来到耶鲁校园，性事的讲述为在场的其他骷髅会成员提供了笑料，对于那些在讲述中涉及到的女人来说，则是令人气愤而尴尬的事情——当着十四个男学生的面，她们的隐私遭到了侵犯，因为这些人对骷髅会的忠诚远远大于他们对爱侣的忠诚。一个女人曾将她的一次极端的个人经历告诉了她的性伴侣，当他从星期日的性史讲述时段回来后，她立刻就从他刻意回避她的方式上看出，他把她最不可告人的秘密泄露给了那帮骷髅会的哥们。

仪式上的诸多变化似乎去了又来，来了又去。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新会员的招募就经历了在棺材里讲述性故事的入会过程，比如未来的华盛顿重量级拳手 W.艾夫里尔.哈里曼，以及 《时代》 杂志的创办者亨利·卢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未来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是它的会员，四年级会员穿着骨骼图案的衣服，冲着新会员大声咆哮，他们的入会程序包括要求他们必须裸体在一个泥坑里相互摔跤争斗。

骷髅会成员得到的回报相比他们受到的所谓屈辱是值得的。据说，如果被骷髅会接受，这个成功的候选者就会得到一万五千美元的现金作为奖赏，在他结婚的时候，他还可以得到一个质量上乘的落地式大摆钟作为结婚礼物。

从最开始，在校园里，非骷髅会成员对他们的反应是消极的，那些没有被选上的人的反应可能有点像酸葡萄的故事，但是对于这个特权人物织成的网络的批评一直都是很具体的。一八七三年十月，一本叫做 《颠覆传统观念的人》 的期刊第一次在纽黑文出现，大多数版面都用于贬低骷

髅会，其中就有如下的观点：

我们通过一个新出版物向大家说明，因为校园新闻对那些敢于公开谈论“骨人”者已经关闭……

骷髅会从每个班级里选择成员，他们走向世界，并且在很多情况下，都成为社会的领导者。他们已经控制了耶鲁大学，耶鲁的业务由他们完成，交付给耶鲁的学费也必须流入他们的手中，并屈从于他们的意愿……

令人窒息的邪恶势力在逐渐增长，对于大学而言，这个社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令人生厌……它从来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傲慢和自我欣赏的优越性。它掌握了大学的新闻喉舌，并试图对之实行绝对控制。向别人亮出他们的资格，不是令人丢脸的事情，他们用有意识的负罪感沉默地握紧手中的权力。

……耶鲁大学是反对骷髅会的。作为我们的权力问题，我们向所有人发问，哪一个应该被允许生存下去？

至少部分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人们再也没有听到类似《颠覆传统观念的人》发出的声音。

即使在这篇文章出版之前，有关骷髅会令人怀疑的联盟和活动模式就已经在耶鲁确立了。一八五六年，骷髅会的三个成员像罗素一样，到柏林大学进行哲学研究。学成归来后，其中的一个叫做丹尼尔·吉尔曼的年轻人，他把骷髅会并入罗素信托协会，自命为财政部长，总裁是该组织的创立者威廉·H·罗素。

从最开始，与罗素公司的联系就影响到了骷髅会的声望，比如，罗素家族对中国鸦片贸易的参与，但这种联系还不足以使人相信，罗素家族之外的任何骷髅会成员直接卷入这种活动的证据到现在也还没有找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联系的继续，再加上不时地发生些不同寻常的巧合事件，这些事件才浮出水面。

也许近年来最令人震惊的披露就是德国纳粹党和骷髅会成员之间的所

谓联系，骷髅会的领导者是布莱斯考特·布什，美国两任总统的父亲和祖父。

布莱斯考特·谢尔顿·布什，耶鲁大学一九一七年毕业生，是骷髅会成员的理想人选，他活跃在校园的任何地方，包括合唱队、拉拉队、耶鲁四重奏、大学棒球代表队以及著名的 Whiffenpoofs 乐队。毕业后，精明的布什娶了乔治·赫伯特·沃克的女儿为妻，沃克是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也是最不受人欢迎的人之一，尤其是他的一个偏好，就是竭尽所能地从合作伙伴和朋友身上压榨钱财。沃克早些年作为重量级职业拳击手的生涯塑造了他的个性，根据他同时代人的描述，沃克的爱好是高尔夫、打猎、喝苏格兰威士忌以及痛打他的儿子们。

沃克的商业伙伴中有一个叫埃夫里尔·哈里曼的，他是一九一三年毕业的骷髅会成员，他在一九二〇年建立了 W.A.哈里曼公司，任命沃克为公司的总裁。两年后，沃克到德国旅行，这个国家似乎对早期骷髅会成员具有不可低挡的魅力，他在柏林成立了一个分公司，在同一次旅行中，他与奥古斯特·蒂森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个人是控制德国钢铁工业的家族的族长。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蒂森工业王国的价值据估计达到了一亿美元，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可能得乘以五十，相当于五十亿美元。

奥古斯特的儿子弗理茨继承了家族的全部财产。一九一八年德国投降后，弗理茨·蒂森担忧社会主义浪潮会席卷他的国家，再加上之后的高度通货膨胀，于是他开始寻求两个救世主的帮助：一个是德国的铁血政治领袖，另一个是一家国外银行家，他希望这些人可以帮助他，最终，他找到了阿道夫·希特勒和乔治·赫伯特·沃克。

希特勒让蒂森为之倾倒，实际上就像整个德国都为之着迷一样，他们都太需要一个强大而具有决策力的领袖了。一九二三年末，他们第一次会面，希特勒告知蒂森纳粹党迫切需要一笔资金，才能成长为一个国家政党，抵抗共产主义和犹太主义的阴谋袭击，从而实现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梦想，重拾国家的光荣。还没等希特勒开口，蒂森就一把抽出支票簿，拱手奉送十万德国马克，并且保证说服其他企业家效仿他的做法。他们确实这样做了，纳粹党的金库顿时财源滚滚，给这个新生的政党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使得它在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之后仍能存在下去。

同时，弗理茨的兄弟迎娶了一位匈牙利贵族小姐，从而获得了蒂森·波涅米撒·德·卡森男爵的称谓，并迁往鹿特丹，在那里，他接管了一家总部设在荷兰的银行，即海运贸易银行。一九二四年，弗理茨依然沉浸在对希特勒的领导魅力和宏伟计划的早期痴迷中，哈里曼的银行，那时掌舵的人就是布莱斯考特·布什，与蒂森家族在荷兰的银行进行力量联合，组建了银行业联盟公司（简称 UBC），其公司办公场所在纽约的百老汇大街三十九号，与哈里曼的银行是同一个地址。通过银行业联盟公司，五千万美元以德国债券形式卖给了美国公民，这与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发展壮大刚好平行。



弗理茨·蒂森，纳粹党的兼职银行家，他与许多骷髅会成员都保持着奇特的关系。

有了这方面的成功，沃克给他的女婿提供了向上爬的梯子，这就是任命布什作为哈里曼公司的副总裁。布什刚刚掌握了行政大权，就把他在耶鲁的两个好朋友增加到他的团队中，这两个人都是骷髅会员，罗兰德·哈里曼和耐特·乌雷。布什工作起来非常卖力，其实沃克手下的每个人都是如此，但也许布什比他们更胜一筹，因为他即将进入到下一个辉煌的职业生涯中，他接管了一个叫做蒂森—傅立克联合钢铁工业的新的德国钢厂，包括西里西亚联合钢铁公司和高级西里西亚煤炭钢铁公司，两个公司所在地都是波兰。

布莱斯考特·布什正在经营着德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厂，这时，希特勒再次遭遇到了经济上的麻烦，于是再一次请求老朋友弗理茨·蒂森的帮忙。这次，蒂森拿出了二十五万到八十万德国马克，他声称是较低的数量，但其他人估计应该是最高的数量，希特勒用这笔钱，以及其他能够利用的资源，把慕尼黑宫殿变成了纳粹党的富丽堂皇的新总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德国和其他国家都不知不觉地陷入灾难中。通过一系列政治操纵和无理性武力的运用，一九三四年，希特勒完全控制了德国，他许诺建造一个错综复杂的高速公路系统，而且要“重振德国军队的雄风”。对于后者，他再次求助于蒂森的钢厂，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钢厂的利润直线上升，财源滚滚流向鹿特丹的海运贸易银行和纽

约的银行业联盟公司。

通过对哈里曼金融机构的指导监督，沃克和他的女婿对这种反民主的政权制度不能说是偏爱，至少也是容忍的。一九二七年，他们既要应对意大利的法西斯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同时又要面临苏联共产党的威胁，这时斯大林已经把这个国家控制在自己的铁腕中。银行业联盟公司与苏联的种种联系，使得英国比尔斯特德郡主提出建议，中止该银行与斯大林的交易行为，这使得沃克做出如下反驳："对我来说，比尔斯特德郡主提出的从苏联撤出业务的建议，似乎是一种无礼而不相干的行为……我想我们已经撒了网，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坚持不懈。"生意毕竟是生意。

四年之后，哈里曼的公司与布朗兄弟公司合并，布朗兄弟是一家英美投资公司，合并后成立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办公部门设在纽约，管理者是布莱斯考特·布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布什与德国纳粹党的金融联系远远超出了银行业联盟公司的范围，包括通过汉堡—美洲公司的船运业务，这是布什办公室负责的，就是经由一家完全私人拥有的公司进行的，这个公司叫做美国船务和商业公司。一九三三年，布什妥善安排了汉堡—美洲公司，或者叫哈帕格公司，与德国北部劳埃德公司的合并，创立了哈帕格—劳埃德航运公司（赫伯罗特公司）。同时，属于同一个母公司的另一家新公司也宣告成立，负责协调美国和纳粹德国之间的所有贸易活动，布什为德国太平洋电缆公司再次融资，提供了德国和美国之间的直接也是唯一的交流纽带。这一安排的所有法律条文都是由一个叫做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华尔街律师最后拟定的，此人后来成为艾森豪威尔总统主张强硬路线的国务卿。

银行业联盟公司成为纳粹德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金融上的联系的主要通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其联合的程度达到最高级。我们来看一看董事会八个成员的身份：

E·罗兰德·哈里曼

骷髅会成员，一九一七年毕业，纽约 W·A·哈里曼公司，副总裁。

H·F·考温赫芬

纳粹党成员，海运贸易银行（奥古斯特—蒂森银行和 UBC 之间的转账银行）的管理合作伙伴。

耐特·乌雷

骷髅会成员，一九一七年毕业，纽约，保证信托银行（W·A·哈里曼公司的附属公司），总管。

科尔涅利俄斯·利埃文斯

UBC 总裁，荷兰—美国投资公司总管。

埃勒里·S·詹姆斯

骷髅会成员，一九一七年毕业，纽约，布朗兄弟公司的合作伙伴。

约翰·格罗宁根

纳粹党成员，海运贸易银行和联合钢铁公司（弗理茨·蒂森拥有的钢厂）总管。

F·L·居恩特

UBC，总管。

布莱斯考特·S·布什

骷髅会成员，一九一七年毕业，纽约，布朗兄弟和哈里曼公司，合伙人。

这八个掌握巨大权力的人中，有六个人或者属于骷髅会，或者属于德国纳粹党。尽管布朗兄弟和哈里曼公司的母公司在重要的位置上雇用了几个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但只有骷髅会成员才坐到了 UBC 董事会的交椅上。

就其本身而言，人际网络，尤其是大学校友的人际网，既不是什么新

鲜事物，也不会得到人们太多的关注。一个与诸如纳粹党这样以残忍著称的国际势力打交道的公司，其董事会的成员结构都是来自同一所大学的兄弟团体，这可能纯粹出于巧合。危言耸听者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人际网是按照日程编就的，把一代一代非常富有、享有高度特权的家族联系起来，他们以事业为中心的儿子们就属于这样一个团体，它能够确保其私密性超乎于普通水平，并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对经济和政治进行操纵。如果这个组织本身有意识地朝着这些活动努力，或者如果该组织的利益反映了对此控制的家族的日程安排，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关键时期，这也许还能说得通。

后一种可能性，就是一个组织受到了几代人的密切关注，引发了骷髅会成员之间为了实现其秘密目标而进行的阴谋活动。这种可能性被怀疑论者推翻了，他们认为，在成百上千个活着的骷髅会成员中，基本上每个成员的工作他们都知道，但是，这些成员都没有进行所谓的阴谋活动。然而，在诸如世界通信公司的破产，以及安然破产事件中的事实表明，只需要几个位居要职的个体就能够谋划一场阴谋，这样的阴谋不仅关系到整个公司的生死存亡，而且还会使少数人因此获利。

再者，引起人们兴趣和关注的不仅仅是骷髅会成员对于 UBC 和其他机构的管理，而且还有证据表明，他们对媒体和政府进行阴谋操纵，比如对希特勒在华尔街的财政支持者——银行业联盟公司衰败的报道。

二〇〇三年，《责任、荣誉、国家》一书出版，这是献给布莱斯考特·布什的一份礼物，作者是米奇·赫斯克维茨，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担任体育新闻记者。赫斯克维茨此前还写作了关于名人的传记，比如牛仔影星吉恩·奥特利，电视评论家霍华德·柯赛尔以及棒球英雄米奇·曼托，这些人都是他非常佩服的，甚至带有些阿谀奉承的感觉，这与他对布莱斯考特·布什表现出来的明显的敬仰很匹配。

在这部生动的散文体作品《责任、荣誉、国家》中，作者主要追溯了布莱斯考特·布什的职业生涯，以及他如何为子孙后代开辟出一条政治道路的故事，他的一个儿子是美国总统，另一个儿子是州长，他的孙子又成了美国总统，他本人于一九五二年在美国参议院获得了席位，并且成为



布什家族的三代人——一个参议员和两个总统——都自豪地宣称自己与骷髅会的联系。

美国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的政治心腹。

自始至终，本书都是对布什家族族长的一个未加任何批评的赞美诗，贝弗利山的任何一家公关公司都会为了客户利益，以发行这部作品为骄傲。为了客观地刻画他的主人公，赫斯克维茨援引了登载在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头版头条的文章，时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揭示出银行业联盟公司与德国纳粹党之间的联系。“蒂森在纽约的银行保险库里有三百万美元现金”，大字标题是这样写的，紧接着是副标题：“银行业联盟公司可能为曾经支持的纳粹党隐藏储备金。”这篇文章是《先驱论坛报》的记者M·J·拉库津写的，提供了UBC与蒂森联系的一些细节，并做出了这样的推断：“也许这根本不是蒂森先生的钱，一些人提出。也许他把钱寄送到那里是为了保管一些纳粹大亨的钱财，也许是为了戈林，为了戈培尔，为了希姆莱，或者为了希特勒自己。”

无论谁有权力得到这笔钱，但绝不是蒂森，整个事件的披露对每个人来说都很尴尬，尤其是布莱斯考特·布什，此前他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

根据赫斯克维茨的叙述，这个事件刚一披露，布莱斯考特·布什就立刻采取了行动。“（他）立刻并公开地做出行动，这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公司的信誉一直非常好，从没有被诋毁过。他利用了所有记录和所有资料。六十年后的今天，在一个充斥着公司丑闻和事业破碎的时期，这些行动无疑是雪上加霜。”

然后这个谄媚的赫斯克维茨继续写道：“那年的早些时候，（布什）接受了USO（联合服务机构）的主席一职，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他在美国到处巡游，共为国家战事基金筹集到了几百万美元的钱款，而且……第一次投身于国家这个大舞台……（并且）鼓舞了美国军队的士气。”

这些记录表明在一九四二年的春天，布什确实跳上了USO的乐队花车，

参加了一项有望成功的事业。不幸的是，赫斯克维茨的这本书在时机选择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很不得主人公的欢心。他说，《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是在一九四二年的夏天发表的，也就是说，在几个月前布莱斯考特·布什已经卷入了 USO 的业务中，从而采取了反纳粹的立场。在他已经积极地支持美国军队的时候（美国于一九四一年加入了反对德国的战事），即在对他提出道德质疑之前，谁能对华尔街金融重量级人物的爱国热情表示怀疑？

但是，《先驱论坛报》上的披露并不如赫斯克维茨所说是在一九四二年的夏天出现的，该文章的发表日期是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这是赫斯克维茨不能忽视的事实，因为他直接引用了这篇文章中的内容。这样一来，布什对 USO 所采取的爱国举动就是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而这篇把布什和他的银行与纳粹政党联系的文章更是先于纳粹党对无辜平民和盟军的凶残谋杀。布什的举动现在看起来已不再是一个毫无私心的利他行为，而更像是为了修复某种关系，而赫斯克维茨的故事就无异于一个有意识的粉饰了。

布什和他在 UBC 的好友都试图尽可能地把藏匿在毯子下的污垢打扫干净，从他所做的一行平淡无奇的宣言中我们可以略见一斑，这段文字出现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的《纽约时报》的金融版面上：

> 位于纽约百老汇大街三十九号的银行业联盟公司已经授权把其主要业务场所转到百老汇大街一百二十。

这个消息的发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 UBC 早在两年前就因为《禁止对敌贸易法案》被美国联邦政府接管，而且百老汇大街一百二十号实际上是外国产业保管机构的办公地址。到了这个时候，当然了，布莱斯考特·布什和他的其他骷髅会密友已经采取了行动，为了说明胜利的来之不易，他们穿着笔挺的衬衫，浑身洋溢着星条旗的光荣，准备好进入他们施展才能的下一个舞台，就布什的情况而言，就是他要竞选美国参议员。

令许多人感到震惊的是骷髅会成员之间金融和政治上的联系。随着骷髅会与美国联邦服务部门之间暧昧的关系，这些人争辩说，肯定是无风不起浪。现在我们可以断言，虽然令人感到不安，秘密的骷髅会已经对政府

管理的秘密团体，也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施加了最大的影响。

来看一看骷髅会成员通过战略情报局（简称 OSS）和 CIA 与美国情报部门联系的部分清单：

休·威尔逊	耶鲁大学一九〇九年毕业生
罗伯特·D·弗伦奇	耶鲁大学一九一〇年毕业生
阿奇博尔德·麦柯勒斯	耶鲁大学一九一五年毕业生
查尔斯·R·沃克	耶鲁大学一九一六年毕业生
F·特鲁比·戴维森	耶鲁大学一九一八年毕业生
阿莫里·豪维·布拉德福	耶鲁大学一九三四年毕业生
休·坎宁安	耶鲁大学一九三四年毕业生
理查德·A·摩尔	耶鲁大学一九三六年毕业生
威廉·P·邦迪	耶鲁大学一九三九年毕业生
麦克乔治·邦迪	耶鲁大学一九四〇年毕业生
鲁本·霍顿	耶鲁大学一九四〇年毕业生
理查德·德莱恩	耶鲁大学一九四三年毕业生
詹姆斯·巴克利	耶鲁大学一九四四年毕业生
乔治 H·W·布什	耶鲁大学一九四八年毕业生
小斯隆·科芬	耶鲁大学一九四九年毕业生
V·范·戴恩	耶鲁大学一九四九年毕业生
威廉·巴克利	耶鲁大学一九五〇年毕业生
蒂诺·皮翁齐奥	耶鲁大学一九五〇年毕业生
大卫·伯伦	耶鲁大学一九六三年毕业生

准确地说，骷髅会成员极其聪明、富有野心，基于他们在秘密团体中的成员身份，他们极有资格在一个诸如 CIA 的秘密组织内部工作。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很合情合理，然而，当遮盖与骷髅会的诸多联系和活动的面纱被一层层拨开，却揭示出他们业务之外的秘密行动，以及大量巧合的证据，这不免令人担忧。

还记得罗素信托协会，即骷髅会的官方公司名称吗？这个公司是在康涅狄格州注册的，但是根据该州的记录，罗素信托协会根本就不存在。但事实是它肯定存在，因为骷髅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活跃，而且很明显，也更加有偿付能力。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骷髅会的母公司是罗素信托协会总公司，这个公司名是在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四日上午十点十五分秘密采用的。

这个时间和日期很有意思，因为不到两个小时之后，CIA 就自我融资、自我指导地发动了对古巴的侵略，其结果是酿成了入侵猪猡湾的惨败事件。CIA 这次愚蠢行动的幕后指使人是理查德·德莱恩，骷髅会的一九四三年毕业班的成员，负责与白宫联络的是麦克乔治·邦迪，骷髅会一九四〇年毕业班的成员，与其紧密配合的是他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哥哥威廉·P·邦迪，骷髅会一九三九年毕业班的成员。这三个人联手策划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外交灾难，助长了古巴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威望，突显了菲德尔·卡斯特罗所主张的美国帝国主义，直接导致了古巴的导弹危机，使得这个世界距离核战争又前进了一步。

公司更名时机的选择，以及入侵猪猡湾的惨败事件都可以被解释成巧合，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以及我们对 CIA 多年来运作的了解上看，这里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更加现实的解释。

尽管没有一个人透露资助一千五百名在美国的古巴流亡分子进行侵略的资金来源，但是仍然有人怀疑是美国政府通过一个 CIA 运营团体达成的。然而因为缺乏明确的线索，我们还无法证实这个金融上的联系。再说，罗素信托协会也不复存在，骷髅会母公司作为一个秘密的资金提供者潜在参与这次入侵活动的任何记录，都在入侵发生的那天早上一扫而光。然而，有一个事实：处理公司名字变更和罗素信托协会兼并的文书工作是由一个叫做霍华德·韦弗的人完成的，他是骷髅会一九四五年毕业班的成员，早在两年前，他就退休了，不再从事 CIA 的秘密工作了。

巧合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从一九五八到一九六六年间，也就是猪猡湾入侵事件发生的时间，乔治·H·W·布什或许代表或许不代表 CIA 的利益工作。从官方记录上看，他的身份是董事会的主席，以及萨帕塔海外石油公司总裁，这是一家总部设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的公司。虽然布什没有任何间

谍方面的经验，在一九七四年，他却当选为 CIA 的总管，这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然而至少有一个资料证明，萨帕塔公司不过是 CIA 的一个伪装。

无论如何，萨帕塔公司恰好是 CIA 发动的猪猡湾入侵事件的代码，让事情更加扑朔迷离的是，配合入侵活动的两艘援助船只分别命名为“休斯敦”和“芭芭拉”，后面的那个船名很有意思，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多次冒险行动的飞行员布什，他的每一架飞机都是以他妻子的名字命名的，那个不认输、争强好胜的芭芭拉·布什。

另一个巧合是关于前总统乔治.H.W.布什和肯尼迪总统的暗杀事件，发生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刺杀事件发生后一个星期，FBI 的一个官方文献就指出，在美国的古巴流放人员可能与总统死亡有关，这个信息是“FBI 工作人员 W·T·弗塞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发布的，口头传给了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乔治·布什先生，以及在美国国防情报局工作的威廉·爱德华兹先生”。

一九八八年七月的一期《国家》杂志上登载了这个文献的重印本，此时正是布什如火如荼地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CIA 立刻发表了一个声明，声称那个“乔治·布什先生”不是当下正在竞选美国最高权威的总统候选人，而是另一个有着相同名字的人，全名是：乔治·威廉·布什。这看上去似乎转移了人们对这个总统候选者的怀疑，即他曾经做过暗探的秘密工作，但是后来乔治·威廉·布什突然站出来，承认他就是那个人，而且曾经与其他政府官员一样受雇于 CIA，但他只是一个低级的研究和分析职员。他还提供了一份口供，作为证明：

> 我把 FBI 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写给情报研究局主管和政府部门的备忘录仔仔细细地重新看了一遍，其中提到了来自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叫做乔治·布什的人……我在中央情报局任职期间，该备忘录的内容并没有作为信息口传给我，或者用其他方式告知我。实际上，在中央情报局任职期间，我并没有收到来自任何形式的政府机构的任何口头信息。在中央情报局任职期间，我没有收到来自 FBI 的有关肯尼迪遇刺的任何信息。基

> 于以上事实，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不是备忘录上所指的那个中央情报局的乔治·布什先生。

因此我们按照逻辑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口口声声说没有在中央情报局供职过的乔治.H.W.布什是中央情报局的侦探。鉴于 CIA 不愿意承认任何它非得承认的事情，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而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但在那期间，布什曾与古巴流亡分子结盟，这些人感到非常愤怒，这就使得一些评论家们把布什与两个灾难性事件联系起来：一九六一年的猪猡湾入侵事件和一九六三年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暗杀事件。媒体对这两个事件的联系采取不理会的态度，这又促使谋判鼓吹者持续了多年的一轮一轮的猜测。

骷髅会不时地对那些胆敢深入探究其具体运作的人进行猛烈的抨击，当荷兰电视制作人丹尼尔·德·威特完成了一部关于这个组织的纪录片的时候，他们就对他采取了行动。德·威特的纪录片把骷髅会与 CIA 联系起来，他们共同卷入到毒品走私活动中，作为给未经批准的秘密机构的融资方式，这种策略在一九八八年的伊朗反对派问题听证会上已经得到了证实。在他的作品播放之前，德·威特接到荷兰政府的命令，要求他剪掉所有与 CIA 和毒品相关的内容，并缓和对骷髅会的批评口气。这次删节使得这个节目的时间从最初的八十分钟缩减到不足三十分钟。该纪录片于一九九八年完成，只在美国播放过一次，而且还是在星期五的下午五点，德·威特曾经说过，“每个潜在的电视观众可能都在坐车回家的路上”。这个节目再也没有重播过。

二〇〇三年八月，德·威特在回忆他与 CIA 和骷髅会的经历时说，“这些……机构和成员表现出一股无理性力量和巨大的集权，这种力量和权力具有如此大的影响，以至于每个人都会很容易地表现出愤世嫉俗的态度。这一定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人们更喜欢与这些机构保持距离。”

与其他任何人或任何事一样，骷髅会也在时间流浙中影响力式微，无论对耶鲁校园曾经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力，在耶鲁校园外的影响依然在持续不断地下降。毕竟在二〇〇四年的总统竞选中，骷髅会一九六八年毕业班的成员乔治·W·布什与约翰·克里间的竞争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根据

观点的不同，这次竞选或者证明骷髅会成员对美国政治舞台的控制达到了一种无法想象的程度，或者说明所谓的阴谋根本不存在，为什么两位谋划者能够穿越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来面对彼此呢？

无论答案是什么，多年来，骷髅会最核心的秘密已经从墓地建筑的石墙内泄漏出来，即使外面世界的事实一直逐渐地渗入墙内。诚然，最重要的一次变化发生在一九九二年，在老骷髅会成员们（其中一个就是声名显赫的华盛顿律师，他指出男女共同加入骷髅会“可能导致约会强奸”）进行了一场战争之后，这个组织真的还是招收女会员了。到二〇〇〇年，那一年的十五名新招收的骷髅会成员中就有六个人是女性。

骷髅会现在也招收犹太人和黑人作为潜在的会员，这在其成立的最初一百五十年是绝对禁止的，鉴于过去四十年的政治动荡所带来的变化，不免让人产生怀疑，许多旧的入会仪式，诸如裸体躺在棺材里，然后讲述自己的性历史，这些仪式现在是否还在举行。据估计，骷髅会在二〇〇〇年的资产达到四百万美元，骷髅会仍然支付得起一万五千美元的津贴以及有摆的落地大座钟作为结婚礼物。

两位骷髅会会员的总统候选人竞造的落败，说明该团体对国家的政治和司法系统的过度影响已经逐渐衰减。在手持即时通讯工具，全球经济化和高科技带来财富的今天，曾经把美国的特权阶级推到更高的权势等级上的人际关系网，可能就不那么有影响力，或者也不那么必要了。美国社会中那些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也不再像三十年前那样唯我独尊了，大学校园里的秘密团体充其量不过是时代的错误，是对穿着紧身衣裤和浣熊皮衣的愚蠢有钱男孩时代的回归。骷髅会似乎也面临崩塌的危险，近年来，拒绝入会邀请的耶鲁大学三年级学生要多于接受邀请的学生。

然而，骷髅会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影响仍然值得人们关注。太多“最佳和最聪明”的学生卷入到了太多的经济和外交政策的灾难中，从猪猡湾入侵事件到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再到越南和伊拉克战争，难道这些人只被当作大学校园内的一小撮独特的学生，一群得天独厚的年轻人，在黑暗的坟墓一般的房间里玩着愚蠢的游戏。我们还有太多想要知道的东西，但是谁来告诉我们呢？

第十二章

无穷的魅力

我们对生活越稳定，就越对神秘事件着迷。神秘事件的娱乐价值显而易见，但是为了更好地感受安全，我们可能也需要那些威胁我们安全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无法解释的事情进行推测，而且对于那些与我们日常生活风马牛不相及的威胁和事件通常极其关注。这个过程也更加令人感到安慰，因为这样可能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欧洲的都市和富足的美洲北部，人们对秘密团体给予了那么深切的关注，那里的居民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最充实的。

对于我们这些与阴影中的人没有直接联系的人来说，我们特别担心的是这种私密性，对我们最具威胁性的则是对我们生活的潜在影响，根据与他们距离远近的不同，我们的态度也会有所不同。对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岛的市民而言，黑手党是一个不需要任何推测的事实，因为其存在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类似看法还可以从香港和澳门的居民中找到，他们直接遭受着三合会活动的影响，而日本商人对日本黑帮的犯罪行为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对于这两个团体而言，秘密团体中的“秘密”是有些矛盾的，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够感受到其直接的影响。

另一方面，诸如蒙古国饲养牦牛的农民，索马里的难民，巴芬岛的因纽特人每天都要为了生存应对不同程度的挑战，这是美国和欧洲中产阶级所不能理解的。单单是为了生存就已经占据了他们太多的主观意识，使得他们无暇对具有千年历史和产地在国外的秘密团体进行推测，更不要说什么娱乐了。

对我们来说，“秘密”意味着神秘，神秘的事情就需要有一个解决方式。当我们找不到解决办法的时候，就会进行推测，当推测脱离了理性的缰绳，并且受到某种影射的激励时，我们就会感觉身边被阴谋集团包围

着，同时信誓旦旦地认为其确实存在，即使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与此相反的证据。

我们的生活越舒适越容易预测，我们对广泛的阴谋团体的理念的反应就会越积极，因为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对各种尚未解决的悬疑问题的解决方案。密谋团体提供了对骇人事件的责难，而这些事件是我们无法深入理解的。刺杀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事件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李·哈维·奥斯华德一个人孤军奋战，就把那个时代最受人仰慕的人物刺杀了，那些不能接受这个观点的人就会去搜寻证据来证明他们的怀疑。在这个事件中，可能我们要发现的东西还有很多，正如我们看到的对于骷髅会的分析一样。在更大的程度上，我们可以把我们经济梦想的失败归结于深不可测和虚幻的企业联合；把一个有天赋的政治家的失败归因于一个国际阴谋；把一个无法解释的气候事件归咎为女巫集会控制的超自然力量。

人们对于灾难性事件的秘密解释越来越着迷，这可以与当代流行文化的影响并驾齐驱，而且呈现出相互扶持的势头。在过去，流行小说和电影涉及到的是相互有直接联系的人，他们的行事动机可能是爱情，也可能是战争，通常两者都涉及，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事件都是开放式的，而不是见不得天日的。

我们来看看神秘小说。大多数评论家都把其根源追溯到埃德加·爱伦·坡于一八四三年出版的《金甲虫》。与坡在文学上一脉相承的达希尔·哈米特创造出了原型的私人侦探，来侦破与国际密谋集团联系最密切的个体的犯罪，这个集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辛迪加，黑手党的密码。其他人，比如阿瑟·柯南·道尔、约翰·布臣、萨克斯·洛莫[①]以及萨帕[②]，他们追踪的罪犯与受害者之间处在一对一的层面上，犯有抢劫、谋杀和类似的令人憎恶和引起人强烈好奇心的罪行。

直到最近这段时间，秘密团体才在大众文学中出现。安·兰德的读者们提出，她的小说《地球战栗》就涉及到了与光明会有关的价值，这也许就是这本书之所以受欢迎的基础。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小说中，共产

---

① 傅满洲系列小说中虚构人物的创造者。

② 赫尔曼·西里尔·麦柯尼尔的笔名，布尔道格·达蒙德系列小说的作者。

主义者是一个大家熟悉的目标，但在这种情况下，熟悉似乎就会导致厌倦，在新闻广播中，共产主义者已经成为一个日常因素，在大多数情形下，这使得他们成为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反面角色。

是伊恩·弗莱明，以及诸如罗伯特·勒德拉姆和约翰·格雷森姆这些后起之秀，表达了读者对于隐秘的阴谋团体的恐惧，害怕它们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发挥广泛的威力。对情节结构进行一点改变，无论从儿童小说还是从文学这个整体来说，都使得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出版现象。至少有三个秘密团体，比如凤凰社，都卷入到哈利·波特的情节当中，每个团体不仅对小说的主人公及其同伙产生威胁，而且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安全而言也是个坏兆头。

当然，哈利·波特是个很有趣的人物，甚至当他被密谋的反派角色追击而狂奔在沼泽地带也是如此。这是很少见的。尽管诸如玫瑰十字会这样的团体有些方面几近闹剧，就像出自一个大学生的恶作剧，以及共济会初入会者的不幸死亡，在大众文化中，秘密团体绝少遭受到这种拙劣的模仿。在电视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杰克·格里森的喜剧《蜜月中人》，就频繁出现了“浣熊的友好之子”这个国际团体，其会员的做事方式不免令人怀疑，使人想到共济会成员和圣地兄弟会会员，他们参加一些密码文字活动，并且互相轻拍各自的浣熊皮帽的底部。最近的也是更尖酸刻薄的要数电视系列剧《辛普森一家》，其中好几个情节中都有石匠的出现。显然这是以共济会为基础的，这些石匠每个星期都会在一个金字塔形的建筑内碰头，他们在那里先是对神圣羊皮纸表示敬意，然后就是大吃大喝，并打乒乓球。为了证明他们的权力，石匠们声称控制了英国君主，并且禁止在美国使用公制。这是对秘密团体轻松一面的准确、有效而闹剧式的模仿。

在一个半严肃的氛围中，伊恩·弗莱明的詹姆斯·邦德系列剧被改编成了电影，第一次激起了好莱坞对国际密谋团体的兴趣，其部分原因在于弗莱明设法挑起了公众对于邪恶的秘密团体的着迷。邦德的死对头魔鬼党（“反间谍、反恐怖、反报复、反敲诈的特别执行者”这个英文词组的第一个字母缩写）是一个操外国口音的男人，他具有反社会的性质，而且享有无穷无尽的财富，作者把这个理念提升到了超出常规的程度，虽然自始至

终都很具有娱乐性，但是永远不属于现实的范畴。同样地，后来基于罗伯特·勒德拉姆、莱恩·戴顿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改编的电影，其情节和冲突通常建立在美国 CIA、英国 M16 和俄国克格勃的相互碰撞上，还会定期地偏离正题进入到纳粹党复苏和以色列摩萨德的领域。

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教父》三部曲令人震惊地再现了美国黑手党的存在事实，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印地安纳·琼斯》系列的第一部《夺宝奇兵》，则因为成功注入了陈腐的纳粹党匪徒的元素，而深入探讨了古代秘密团体在当代的遗迹。

在很大程度上，也许是因为其在当代的存在还有待证实，巴伐利亚的光明会经常在电影和电子游戏中以阴森恐怖的恶棍形象出现。出产于 2001 年的电影《古墓丽影》，就颠倒了通过电影来制作游戏这样一个传统顺序，这是由一个畅销的电子游戏改编成的电影，主演是安吉丽娜·朱莉和乔恩·沃伊特。鉴于这部电影的来龙去脉，其情节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但该电影向我们展示了对于愚蠢的重新定义，把朱莉小姐饰演的角色置于与光明会能力的竞争中，即对时间进行控制，作为光明会控制整个世界的计划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广受欢迎的计算机游戏《杀出重围》中，也刻画了作为秘密团体的光明会，与圣殿骑士团一起企图控制整个世界。光明会除了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施展其政治和经济权力，在《杀出重围》中，光明会还秘密供养了大量的病毒，如果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些病毒就会投放到各个组织或者整个国家中。圣殿骑士团的描述不是特别清晰，只是代表了四种力量中的一种，游戏者可以加入其中，从而达到这个游戏的最终目的。这里或者其他任何地方所介绍的团体中，除了这个与之同名的组织，没有一个和它具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通过所有这些文学、电影作品和计算机游戏，读者和观众会很容易地把幻想和现实区分开来。比如看过《教父》的观众们，当他们离开电影院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已经对美国黑手党的运作有了深刻的了解，但是几乎没有谁感觉到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威胁。无论是小说还是经过改编后的电影，都忽略了这个组织背后的历史遗产，而选择把注意力

集中在这些靠血缘和婚姻纽带联系起来的残忍罪犯的行为上，他们仅仅把自己的工作看做是一种做生意的手段。这些组织是真实的，威胁也异常真实，却显得那么遥远，而黑手党的历史根基却从来都没有提及。

安伯托·艾柯的哲学讽刺作品《福柯的钟摆》中描述，三个意大利编辑陷入与历史性秘密团体的纠葛中，这些秘密团体可以追溯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期，直到此时，才真正有一部小说涉及了历史的事实。在艾柯猛烈而欢闹的故事中，诸如圣殿骑士团、共济会、郁山隐修会、阿萨辛派、卡巴拉教、德鲁伊教和诺斯替教，即所有隐藏起来的秘密团体及其主要特点，作为历史遗迹和当代参与者，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突现。部分是马克思兄弟的电影脚本，部分是罗伯特·勒德拉姆的惊悚小说，部分是哲学论文，艾柯在一九八八年讲述的这个故事让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都感到很满意：一是阴谋爱好者，他们认为生活在地球上的八十亿人都受到一小撮秘密谋划者的控制；一是怀疑论者，看到皇帝的新装最终被公之于世，他们简直是乐此不疲。

很明显，《福柯的钟摆》受到了一部书的影响，这部作品于一九八二年出版，从表面上看，它是非文学作品，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部基于少量事实的幻想小说。《圣血与圣杯》的出版比艾柯的作品早六年，后者给读者带来的是娱乐和启迪，读者们顺着其错综复杂的情节走，同时对愤世嫉俗的幽默做出反馈，而前者则在更容易轻信别人的读者中激起了某种其他的情感。

《圣血和圣杯》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一个英国电影制作人和一个叫做亨利·索斯金的前演员的经历，此前，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们在一部叫做《复仇者》的电视系列剧中担任过演职人员，从而小有名气。索斯金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亨利·林肯，然后从镜头前转到幕后工作，在雷恩城堡的一本被人遗忘的书中，索斯金发现了一个遗失的密码信息的翻译版本。亨利·林肯对索尼埃神父和他神秘的财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最终他制作了一部纪录片，他发掘到了每个故事细节，从而使得该纪录片更具有戏剧性。

过了一段时间，林肯与一个人不期而遇，他是大学讲师，同时也是崭

露头角的小说家，名叫理查德·雷，这个人对圣殿骑士团非常着迷。也许圣殿骑士团和索尼埃的神秘故事可以联系起来，这个故事可以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开始，一直追踪到当代。雷招募了一个先前的摄影记者，名叫麦克尔·贝吉特，这三个人一起用了四年的时间，投入到研究、推断和假定中，最后终于完成了一部十万字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假设升华到了理论的高度，无论是真实还是虚构的，他们把两年多年以来存在的几乎每个秘密团体都联系起来。这个故事的核心是三个未经证明的（也是无法证实的）论断：

一．耶稣并非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的那个人是冒名顶替者，这样耶稣就可以穿过地中海到达法国南部。

二．耶稣并非独身禁欲，他娶了玛利亚·抹大拉，并且至少生下了一个孩子，在出走法国途中一直有这个孩子的陪伴。

三．二十个世纪以来，耶稣孩子的后代在决定世界命运方面表现得一直非常活跃。

作为历史小说的大前提，这绝对是够震惊的。对于不同时期和不同风格的作家，如托马斯.B.科斯坦或者唐·德·里洛，在他们的手中，这些大前提可能是一系列的奇思妙想，或者是一个娱乐，甚至是对于历史上非常有趣的事件提供了大量的信息。

作者和出版商可不这么看待问题，他们认为，非文学作品的假设相比历史小说而言，更能激起读者的兴趣，同时能增加销售量，自从《圣血和圣杯》于一九八二年出版以来，就一直高居畅销书行列，这证明了他们是对的。同时这种观点也激发了另一本书的出版，这是唯一一本在销售量上可以与《哈利·波特》相提并论的小说——《达芬奇密码》。这本书出版之前，布朗几乎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他早先的作品《天使与魔鬼》，以一种令人发笑的拙劣方式，把光明会与叙利亚什叶派混合起来，其中就有作者的一个错误的推断，即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和印度的穆斯林都说并写同一种语言。

《圣血与圣杯》和《达芬奇密码》在文学上的联系，就如同父子一般，甚至到了一种相互映衬的程度——《圣血与圣杯》是一个貌似现实事件，富有的小说；《达芬奇密码》则貌似小说，实为伪现实。

尽管布朗声称，他作品中的许多组织、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存在的，但他仍然有意把自己的作品冠以“小说”的范畴，目的是为了回避读者的批评。《圣血与圣杯》的三位作者则没有这样的保护措施，尽管他们也抗议来自持怀疑观点的评论者的不公正的攻击，在该书的后面几个版本中，他们也有激烈的言语表达，但是对于不公正评论的抱怨仍然难以抵消这部作品的弱点，就是没能消除敏锐读者的疑虑。

在整个故事中，三位作家频繁地提出同一个质询：“如果……将会怎么样?”如果圣殿骑士团的力量达到了与同时代的一个卓越的人相同的高度，结果会怎样？那样是否说明了某种关系？也许，但是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证明。一旦他们“如果……将会怎么样?”的假设确立了，从那一点开始进行的所有推断似乎都经过了证实，然后整个的推断网络都得以串联起来。其结果就是一个只能支撑着蜘蛛的蜘蛛网，但是随着第一丝微风的吹送，蜘蛛网很快就会破碎。

大多数严肃的非小说作品的前提都建立在已经获得的事实上，通过读者能够认同的可信赖的渠道得以确立。《圣血与圣杯》的作者对待事物的看法着实有些令人吃惊。他们声称，当研究人员从明显无关的事件中寻求结论，甚至当事件本身不足以采信的时候，历史也只能以严肃的态度进行诠释。实际上，他们要说明的是，已经用文献证明过的事实与丰富的神话传说一样不具备什么重要性，也许还不如神话传说重要。如果情况果真如此，摆在富有想象力的历史学家面前的是有待发现的大量的新信息，比如，他们把一九四四年初欧洲纳粹党权力的巩固与那年冬天北美洲史无前例的降雪联系起来。

蜘蛛网托住蜘蛛的类推说明蜘蛛网还很有力量，而如果对《圣血与圣杯》仔细研究的话，你就会发现，可能它还经不起一点点的推敲，因为作者自己也请读者原谅他们对各种手法的频繁使用。我们来看看真理的这些不同出处，这是出现在一九九六年平装本上的：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推测性的假设，没有文献加以证实 (P115)

这种可能性无法证实，但是也不能全然不予理会。 (P116)

基于这些联系，我们已经系统地阐述了一个尝试性的假设。 (P117)

林肯等人一再地利用丰富的推测来推进他们的理论，同时对任何对他们提出质疑的证据置之不理。为了巩固证据，他们还提供了一些资料，这些资料不仅在真实性上值得怀疑，而且通常还被证实是欺骗性的。他们的大多数证据都来自 《亨利·洛彼诺的秘密档案》，据说这里面追溯了梅罗文加王朝详细的血统关系，从五世纪的法兰克领袖梅罗温到神秘的吉赛尔·德·雷塞斯再到九世纪的西吉斯贝特六世。自称是其作者的菲利普·德·塞雷西，也就是那个嗜酒如命的恶作剧者，当他把那些起诉皮埃尔·普朗达因为编造欺骗性的文献而重新获得薪酬的所有证据归档时，就已经宣布这些档案都是伪造物。声称自己是达戈伯特和吉赛尔的直系后裔，同时也是郇山隐修会的总管的普朗达，也从来没有反驳过德·塞雷西的主张，尽管他后来编撰了这样的故事，就是德·塞雷西只是复制了普朗达手里的原稿。在 《圣血与圣杯》 中没有一个地方提到过德·雷赛西与普朗达之间的诉讼问题，也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德·塞雷西招人质疑的背景。

诺埃尔·柯布杜撰了大部分神话故事，作为给他的酒店和饭店招揽生意的手段，这个人在 《圣血与圣杯》 中只是作为波萨尼亚别墅的购买者而有所提及，在玛丽·德纳尔诺去世之前，没能把自己的过去详细地告知他，玛丽的死让他陷入了沮丧的境地。关于他的其他事情就根本没有涉及，更不用说客人们在进餐的时候，柯布把这个故事录制好然后播放给客人听这个细节了。然而，这两个事实都能够令作者展示的整个论断站不住脚，但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他们找到历史上最神秘的谜团的答案。

《圣血与圣杯》 让读者通过一个假定的事件并没有发生，来证明一个相反事实的存在，从而向读者提出了挑战。证明不存在的东西可能在数学

领域说得通，因为我们可以从反面进行推理演绎，但是在历史上却不可以这样做。为了证明《圣血与圣杯》前提的空洞无物，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关于圣诞老人确有其人的非文学作品，这是基于没有人能够证明圣诞老人不存在的证据的。

这可能完全是文学尝试上的事情，很适合于那些慢吞吞地来回翻看《纽约书评》和《时代文学评论》的颇有书卷气的大富豪，在作者和编辑中间产生的仅仅是受伤的自我主义和一阵阵的嫉妒（“为什么我就没有写这本书的想法!!??”）。如果这是唯一的一个副产品，那么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将不会或者不应该再去想这个问题。然而，事情远非如此。

顺着历史的线索，去追踪那些奔涌而去的人群足迹，然后把几十个联系缝合在一起，再形成一个明显的证据链条，这可能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然而这种做法却令某个不稳定团体的成员给我们带来了风险。这个更加残暴的团体就处在政治思想的左翼和右翼的最边缘，无论是在个人还是全球的层面上，他们能够快速地识别生活中的每个问题，正如政治掮客组成的秘密集会根深蒂固的一样。从表面上看，这应该没有什么不良后果。偏执狂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当在那些没有更好的办法打发自己业余时间的团体中传播时，也未必会引起什么可担忧的事情。不幸的是，大多数偏执狂的基础通常是与种族有关的，这也是使得这个游戏变得非常严肃的原因所在。

如果《圣血与圣杯》对诸如郇山隐修会这种很容易被证明是欺骗性的事实全然相信，那么，它也能够说服那些相信这种论断的人，就是类似《锡安长老会草约》也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现代犹太复国之父”西奥多·赫茨尔，在一些地区被认为是《锡安长老会草约》的草拟者。

不幸的是，《草约》在《圣血与圣杯》中是以一种非常典型的方式提及的，首先，作者们否认其真实性（“当今的专家一致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于是我们得出结论，那个《草约》至少从目前的形式上看，是一个邪恶而阴险的伪造物。”），后来，在他们认同众多资料来源，认为《草约》确属伪造之后，他们又声称这个

不足信的大部头“对于郇山隐修会是至关重要的”。

它们具有怎样的重要性，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没有任何细节加以说明。几乎到了二百三十页以后，《草约》才再度被提及，原因是作者想要用来支撑他们的一个主张，就是一个新国王将会携带“大卫的神圣种子”，但也只是浅尝辄止，而且以后再也没有提及过。如果《草约》是“一个邪恶而阴险的伪造物”，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文献作为任何的凭借呢？作者们像是在跳舞，一边周旋于粗鄙庸俗的行文中，一边又与此保持密切的关系，为了自己的目的，时不时地“拿来主义”一下。

关于《草约》没有任何确定的观点表明，它们只是一个被当作事实呈现的神话故事，来取得令人质疑的，通常是凶恶的目的。下面就简单地讲一下《草约》的历史：

一八六八年，一个叫做亨曼·古德切的德国小说家，用一个英文笔名约翰·瑞特里夫先生出版了一部小说《比亚里茨》，其情节主要围绕一个旨在征服全世界的犹太人秘密团体展开。古德切似乎受到了法国作家莫里斯·乔利的激励，他的《马基雅维利与孟德斯鸠的地狱对话》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以反对拿破仑三世为基础的。古德切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反犹主义者，他照搬照抄了乔利的情节手法，把犹太人作为恶棍引入他的故事情节中。

要不是十九世纪末期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处在危险的境地，所有这些拙劣作品都无法引起人们的注意。沙皇尼古拉在一次旨在加强对俄国人的控制，并且打击其政治对手力量的举措中迫切需要一种策略，那就是把敌人作为盟友对待，从而实现控制整个世界的阴谋。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控制世界”这个动机就像好莱坞电影编剧给詹姆斯·邦德电影定下的另一个基调，但是在一八九五年，俄国人就像任性的偏执狂，这些举措在一定的时间内，对一些人来说还是相当有效力的。

在沙皇的命令下，俄国奥克兰纳秘密警察机构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寻求灵感。他们在古德切的小说中找到了，一八九七年，那部分讲述犹太人的情节被当作事实得以出版，八年以后，所谓的《草约》被翻译成了英语，由“现代犹太复国之父”西奥多·赫茨尔主持，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第一



推崇《草约》是真实存在的政治和工业领袖中就有亨利·福特。

次犹太复国议会期间，作为会议记录在人们中广泛传阅。

旨在作为统治世界指南手册的《草约》，或者使人觉得不寒而栗，或者让人感到荒谬可笑，这取决于你对黑色幽默的轻信度和欣赏度。《草约》宣称，对全球控制的野心工程提供援助的是共济会，其议程正在长老会和巴伐利亚光明会的操纵中，它们或者是轻易受骗的人，或者是一厢情愿的参加者。

《草约》的实用训导在骇人听闻的概括和彻头彻尾的怪诞之间徘徊，比如第一条的训诫是，“因此，在统治世界时，最佳结果是通过暴力和恐吓取得的，而不是凭借民主讨论的方式得到的”，而第二十三条提出，通过颁布禁止酗酒的法律，从而让普通大众感到不快，这样他们才能屈服。

《草约》中最令人反感的那些部分都被那个时代的右翼政治家采用，作为激励他们最热诚的支持者的一种方式。通过选择那些最能够满足他们需求的部分，然后再把它们装到不停旋转的反犹太人的乐队彩车上，包括阿道夫·希特勒在内的每个人都认为《草约》的内容是绝对真实的。

《草约》的内容成为法西斯主义者理论基础的一个宝贵发现。“我们将在大众中间摧毁家庭及其教育价值的重要性”，这是《草约》第十条的规定。第十二条承诺道，“我们将密切地控制（媒体）……没有我们的准许，任何一个声明也不能为大众所知”。为了把螺丝拧得更紧一点，第十四条宣称，“如果存在任何有异于我们的其他宗教，这是令我们不快的事情……因而，我们必须彻底扫除任何其他形式的信仰”。

在紧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之后的经济和政治动荡中，大部分的美国和欧洲大众文化只需要稍微参考一下《草约》，就可以把它作为秘密阴谋的证明加以利用。其中的鼓吹者就有汽车业大实业家亨利·福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创办了迪尔伯恩《独立》报，部分原因是把它作为

传播《草约》的手段，再加上对共产主义者进行定期攻击。一时间，福特固执地坚守他的观点，认为《草约》预示着犹太人对世界的控制阴谋。在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七日接受纽约《世界》杂志一期的采访中，福特说："我想做出的关于《草约》的唯一陈述是，它们非常适合当前的局势，这些条约已经有十六年的历史了（原文如此），它们适合十六年前的世界局势，同样也适用于现在。"同时，希特勒也在《我的奋斗》中也引用了《草约》的内容，该书的某些段落还被专门挑选出来，在罗马尼亚的议会上作为驱逐犹太人的理论基础而进行宣读。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引用了《草约》的内容。

逐渐地，由于持怀疑观点的记者们进行的严肃调查，《草约》的来源真相终于得以慢慢浮出水面。其中第一个揭露其欺骗性本质的就是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菲利普·格雷夫斯。他把其起源一直追溯到乔利和古德切，慢慢地，证据越聚越多，即使头脑顽固的亨利·福特也承认是自己错了。一九二七年，在一次正式的否认声明中，他为自己曾经支持《草约》骗局一事进行了道歉，责备他的助手对他进行了蒙蔽。

然而，人们的领悟力还在继续着。《圣血与圣杯》先是对《草约》进行软弱无力的指责，后来又用来证明他们的前提假设，这不禁又增加了人们的疑惑，尤其是那些渴望抓住任何一根可以利用的稻草的人，这种草率的推测引起了人们的怀疑。

《圣血与圣杯》的作者们把《草约》插入他们的作品中，营造了早前提到过的镜子效果。就他们的情况而言，一部所谓的非文学作品对待虚构事件的态度，就好像它含有真实的成分在里边。在《达芬奇密码》中，作者丹·布朗用小说作品来捉弄一个真实的组织，即天主事工会，好像它会对人类形成威胁，就像虚构的《草约》一样真实而具有欺骗性。

布朗草率地使用了很多事实，来增加其小说作品的逼真效果，这一点受到了世界各地无数评论家的广泛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小说所涉及到的

只是作者对天主事工会的歪曲描述。

天主事工会是布朗小说中真正的反派角色，他们是如此地致力于保护耶稣的所谓血缘纽带这个秘密，以至于雇用了阿萨辛派成员，其中至少有一个人具有虐待狂的性格。这倒很适合于詹姆斯·邦德的情节和虚构的魔鬼党，或者莱恩·戴顿的故事，其中涉及到了我们熟悉的纳粹党的邪恶行径，但是为了支持一个荒诞的假设，就把这种虚构的属性归因于一个现存的组织，这让许多人感到极为愤怒，这其中包括了天主教徒以及非天主教徒。

与任何其他宗教一样，罗马天主教会一直扮演着消极的角色。但是这个以家庭为中心的天主事工会的议程，就像自由天主教徒不赞同其保守的倾向一样，在布朗的笔下，是用一种尤其怪诞的方式刻画的。作者构建的情节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就是那个患有白化病的虐待狂僧侣。这是对这个组织真正的前提的捏造和彻头彻尾的篡改：僧侣通过与世隔绝寻求神圣，而天主事工会选择在尘世之中活动。

《达芬奇密码》 里所讲的天主事工会的新会员需要服用一种毒品来保持沉默，使用带刺的粗毛布带子作为施虐工具，并且还提到了当梵蒂冈银行遭遇财政困难时，天主教事工会“背离”梵蒂冈，并趁此机会趁火打劫。在毁誉这个组织的一次近乎疯狂的努力中，布朗甚至把天主教事工会在曼哈顿总部的入口都弄错了。男男女女可以从任何他们选择的入口进入该建筑，但是由于该总部为禁欲的男女准备了独立的住处，每个区域的住户就必须通过一个或者另一个门直接地进入他们自己的房间。布朗曲解了这一点，他声称所有的男人都必须通过莱克星顿大街的大门进入，而所有女人则必须通过一扇侧门进入。错误的不仅仅是性别上的限制，而且对于住户而言，这也是一种落后的行为：女人得从莱克星顿大街之外的地方进入居住区，而男性住户的入口则是在附近的街道上。

布朗及其出版商的辩护者指出，《达芬奇密码》 毕竟是一部小说作品，在题献页的对应面也印有类似的免责声明（“本书中所有的人物和事件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然而，你把那页翻过去，就会看到布朗另外的主张，他说郁山隐修会“是一个真实的组织”，天主教事工会曾被指控从事“洗脑、高压统治和一种称作‘肉体苦行’的危险修行方法”，

而且“本书中所有关于艺术品、建筑、文献和秘密仪式的描述都确有其事”。这三个声明都是在没有一丝嘲讽的前提下做出的。

对于书中的矛盾之处我们应该抱有怎样的态度？毕竟，这仅仅是一部小说，而且不属于严肃小说的范畴。作者们必须享受充分的自由，从而任其想象，自由驰骋，来打造那些旨在提供娱乐的故事，无论其基础是廉价的侦探小说，还是如狄更斯或海明威这样的大部头。这个前提在这本书中将不会受到挑战，或者我们希望在其他地方也不会。

想象是一回事儿，出于增加现实性的目的，不公正、不准确地诋毁一个现存的组织或个体又是另一回事儿了。把《锡安长老会草约》的最初以及后续的影响同《达芬奇密码》相比较，不是一件夸张的事情，无论是开始还是后来，《草约》都出现在一部小说作品中；对于《草约》给犹太人带来的种种侮辱，天主教会也不能自脱其咎。

几百年以来，共济会、玫瑰十字会、德鲁伊教、诺斯替教、巫术崇拜和其他的团体都是温良的，它们都不属于主流的范畴，但却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这些人认为每个偶然事件背后的每个无辜的象征和情节都是阴谋。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边缘因素会影响到社会的主要结构，其结果也是很不幸的。即使一个世纪过去了，纳斯塔.H.韦伯斯特以歇斯底里和反犹精神写成的作品——《秘密组织和破坏活动》，有些读者还会把它当作事实来接受，而这些读者在其他方面都是相当敏锐的。

韦伯斯特的这部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浮夸虚饰，然而 80 年以来，却一直都在销售中。该作品的内容包罗万象（她所提及的通常是不太著名的原始资料，这在学术方法上是很特别的），代表了一个完美例证，即把绝好的学术研究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可信的假设，这种假设受到了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的激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她的观点，韦伯斯特认为对世界和平形成最大威胁的是东方共济会、神智学、泛德主义、国际金融和世界犹太民族。



尽管公然表明种族主义观点，秘密团体调查者纳斯塔·H·韦伯斯特还是受到了褒奖。

作为极端爱国的大不列颠人，她对于德国国家

主义的关注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有远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韦伯斯特在写这部书的时候，整个大英帝国都对不人道的德国佬异常愤怒。她的政治立场属于极端右翼，她对任何社会主义目标的憎恨则是明显可知的，她的反犹太人的立场也是不可动摇的，她戴着一副很大的有色眼镜，而且视野还相当狭窄。比如，她没有提到马克思、列宁或者共产主义，而且她继续坚持认为，法国革命是按照各种不同的秘密团体的议程进行的。有趣的是，她对美国独立革命的关注与她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是一样的。

韦伯斯特有权力表达自己的观点，读者在是否接受这些观点上也有他们的自由。

大家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也要能够把握这些给社会团体和个人所带来的风险，这些团体和个体可能会成为人们攻击的目标，他们遭到攻击时，通常都会说自己是无辜的，这是他们的权利，在这点上我们经常忽视。

另一面也是风险，即真正具有险恶目的的组织如果聚合在可爱的边缘人中间，可能会被低估和不予理会。就像隐藏在羊群中的狼，至少有那么几个秘密团体可以让我们真正地担忧，它们轻而易举地停留在公众的头脑中，或者作为一个仁慈的团体而存在，而遭到人们的误解。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对这些组织不予重视，但是这样做也是很危险的。

第十三章

批評家、告白者和預言家的[illegible]

他執狂何時具有意义？

除了那些极端的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宗教团体成员之外，大多数人对邻居和同事都采取不干涉的态度，无论他们信奉的是精灵、UFO、个人天使还是类似的实体。只要我们的接受或怀疑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我们就会自由自在地坚持我们的信仰，同时宽容他人的信仰。

对于一个信仰秘密团体的邻居，我们对他的反应是否应该有所不同？除了美国黑手党、三合会和日本黑帮之外，大多数被冠以秘密团体的组织，一般来讲都是友好的兄弟般的联盟，可是在我们不了解或者不赞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多么严肃地声称，它们在操控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调查这些团体的议程？

后面的这个问题很实际，但却有局限性。

任何连接互联网或者搜索引擎的人，都能够打开几十个团体的网页，其公开宣称的信仰和议程有所不同，从推崇炼金术（俄亥俄州炼金科学中央会所）和“仁慈的撒旦主义（法国联合魔鬼教会）到传导与火星的感应关系（雅瑟留协会）”。实际上，许多此类团体都是建立很久的诸如共济会和诺斯替教的变体，或者是追寻因果报应和再生投胎的宗教的替代。我们对它们的信条的认同或多或少，但是它们的活动应该完全是它们自己要关注的事情。

然而，挡在它们面前的帷幕会不时地拉开，从而显露出来自秘密团体那些令人感到烦恼，而且通常是悲剧性的活动。其中就有太阳圣殿教，其影响程度可能很小且具有局限性，但是其产生和灭亡的教训却是非常深刻的，只是因为它所决定的是宗教崇拜和秘密团体之间的转换点。太阳圣殿教开始的时候就是宗教崇拜的形式，但是后来几乎演变成了秘密团体。

太阳圣殿教由几十个忠实的成员及其孩子组成，其领导者是两位具有



太阳圣殿教，吕克·茹勒特创立，也许达到了秘密团体的资格。

神授领导气质的人：约瑟夫·德·芒布罗，一个出生在扎伊尔的法国公民，他成为了声像效果方面的专家级人物；另一个是吕克·茹勒特，比利时的一个内科医生，据报道，他在从事该团体的仪式的时候，为了获取力量，必须与集会中的女性成员进行性活动。太阳圣殿教是1984年由茹勒特和德·芒布罗创立的，其最初的名字只有那些具有最高资格的成员才能知道，叫做国际太阳圣传骑士团。古代神秘玫瑰十字会是一个占主导位置的玫瑰十字会团体，德·芒布罗成为其成员后，就放弃了自己的珠宝生意，因为他自己卷入到了诈骗的指控中，在这种情况下，他离开了古代神秘玫瑰十字会。一九七〇年，他迁往瑞士边境附近的一个法国区域，在那里他做了几年的心理学家。

一九七八年，德·芒布罗与吕克·茹勒特结识，他们一起加入了圣殿复兴会，致力于圣殿骑士团和玫瑰十字会的理念。茹勒特成为总会长，但是不到一年，他就被迫出局，因为谣传他滥用圣殿复兴会的资金。德·芒布罗以及他的许多追随者跟他一起离开，这些乌合之众最后成立了太阳圣殿教，茹勒特还是担任总会长的职务。

茹勒特曾经是一个有着行医执照的医生，然而结果证明他也是一个颇具魅力的领导，当他环瑞士、法国和加拿大的魁北克进行演讲时，吸引了许多成员。随着该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茹勒特和德·芒布罗确立了三个层次的成员资格。第一个层次是阿曼塔，也就是入会层次，是那些被茹勒特的讲座和研讨会吸引而来的新会员；第二个层次是阿卡迪亚俱乐部，是为那些希望继续探究该团体理念和教义的人准备的；具有最高资格的成员就可以进入国际太阳圣传骑士团了。

茹勒特继续着他的巡回演讲，自诩为“吕克·茹勒特，医生，揭示爱情和生物学的神秘”。他的演讲从“爱情和生物学”逐渐发展到散布精神性和大灾变的一些虚张声势的信息，比如茹勒特警告说火山在喷发，森林就快消失了，以及其他一些环境灾难。茹勒特警告观众说，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身体和智力都足够强大的人，才能度过这些灾难，幸存下来。太阳圣

殿教正在寻找那些有资格的人，准备在其他人从地球上消失的时候，由他们来继承地球。

在他的演讲中，茹勒特声称自己的前生是圣殿骑士，并且强调说，他将带领着最忠实的追随者到达一个环绕天狼星运行的行星上。他同时声称自己是基督耶稣的第三次投胎，他的女儿也属于圣母受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和德·芒布罗把太阳圣殿教的哲学具体化，与新圣殿骑士主义、新时代哲学、基督教和活命主义者偏执症融合起来。他们对其成员教导道，生命是一个幻觉，“解脱不是在人类所认为的地方”，茹勒特这样警告他们，“死亡代表生命的一个重要阶段”。世界末日就要到了，大火将结束世界的一切，只有太阳圣殿教中最值得信赖的成员才能逃过这场大火。同时，茹勒特也宣称带领这个组织朝着许多夸夸其谈的目标迈进，这不免让我们回想起圣殿骑士团的目标，具体包括下面这些：

一. 在世界上重新建立正确的权威和权力理念。

二. 肯定精神高于物质。

三. 归复人类自尊的良知。

四. 帮助人类度过转变。

五. 参与地球假设的三个框架：身体、灵魂和精神。

六. 促成教会的联合，致力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融合。

每个仪式都从忏悔罪行开始，与罗马天主教会在这个过程中的隐私性不同，太阳圣殿教的悔罪形式是有人引导的集体冥想，出自德·芒布罗所进行的视频上的把戏，会出现某种发光的微粒，好像是来自悔罪者身体上的某种被物质化的东西，这就使效果得到了强化。

还有更奇怪的事情呢，在举行仪式前，茹勒特会选择一个女性成员与之进行性活动，从而提供他发表演说的力量。在他的诸多仪式上，在茹勒特的召唤下，似乎都会出现神性的东西，这不是来源于茹勒特的精神力量，而是出自德·芒布罗操纵的一个价格不菲的电子投影设备。尽管德·芒布罗的主要职责是在幕后进行的，他也喜欢参与到与女性成员的性活动中

来，也许这样他才能获得操作投影仪的力量。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具有成员资格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五百人。茹勒特曾经建议会员们储备武器，以备世界某日来临的时候使用，这使得茹勒特在加拿大遭到了非法私藏枪支的指控。该团体内一个叫做托尼·迪图瓦的成员在公开场合说了反对太阳圣殿教的话，很快，他的妻子妮基和孩子就在他们魁北克穆林高地的家里遭到暗杀，场面简直是惨不忍睹，迪图瓦身上有五十多处刀伤，他妻子的脖子上被刺了四刀，背上被刺了八刀，还有一刀刺在胸部，他们婴儿的身体上被刺了六刀，然后装到一个黑色塑料袋里，悬挂在木头柱子上。调查发现，迪图瓦曾经对其他成员说，在该团体的仪式上出现的神秘影像其实是个骗局。

这个团体在一点点地崩塌，变节成员给茹勒特和德·芒布罗带来的污辱，是他们的自尊心所无法容忍的。一九九四年十月四日的晚上，生活在瑞士奇艾瑞地区的居民报告说，他们听到了从太阳圣殿教的住所里传来的震耳欲聋的枪声。第二天早上，在这个建筑的废墟里，他们找到了五十三名成员的尸体，其中就有茹勒特和德·芒布罗。验尸报告表明，两人死于窒息，二十一人在头部遭到枪击之前，服用了安眠药，其他人的头上都裹着塑料袋，许多人都有奋力求生的痕迹，这足以表明这次死亡事件并不是集体自杀。

一年以后，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一个烧坏的农舍里，又发现了十六名成员被烧焦的尸体，他们摆放成星的形状，脚底朝着火源的方向。死亡者当中包括吉恩·维亚尔内的妻子和儿子，这个人在滑雪装和太阳镜生意上赚了一笔大钱。两年之后，最后五个人的生命终结在魁北克的圣卡什米尔，他们丧生在该团体的一个成员迪迪尔·奎兹烧着的房子里。在楼上卧室里的四具尸体摆放成十字架的形状，迪迪尔的母亲则死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头上还套着一个袋子。

在这个新圣殿骑士组织的手中，七十四名成员全部丧生。太阳圣殿教成员，前交响乐指挥家米歇尔·塔巴契尼科，遭到了谋杀罪的指控，但是后来因为无罪而释放。在这场血腥的谋杀中没有一个人被宣告有罪，也没有找到用于谋杀的武器的具体位置。

然而，这个组织所反应出的事情却足以令人们引以为诫。在时事通讯

和互联网站上开始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太阳圣殿教的融资是通过在欧洲和南美之间的武器交易实现的，这就导致了军事—密教联合体的说法，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达到其“法西斯主义—共济会团体”的目的。当然了，要么读者认同这样的断言，即加拿大广播电台的记者发现，该组织的经济所得实际是通过国际信贷商业银行[①]的几亿美元的洗钱实现的。BCCI 于一九九一年关闭，陷入了一系列的指控中，其中包括欺诈性账目记录、流氓贸易、蔑视银行所有制度，以及组织内部的洗钱问题，其涉及到的指控太复杂了，关于其活动的全部内容到现在仍然没有全部揭示出来。[②]德·芒布罗和茹勒特都是躁动不安而危险的扭曲性人物，他们与詹姆斯·琼斯和大卫·科雷什同属一路货色，一九七八年，詹姆斯·琼斯在圭亚那的斯敦镇惨案中，导致了几百人的死亡；而在一九九三年，大卫·科雷什的大卫教派的教徒则死于与 FBI 的激烈僵持中。

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那些掌握其追随者生死存亡的宗教领袖，如果这些领袖选择在全球舞台上发挥他们的权力，那么会发生什么？当这个组织在规模和力量上发展壮大的时候，宗教崇拜和秘密团体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清。

如果你想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寻找来自秘密团体带来的严重威胁，也许你可以从一部电影的对话片断中略见一斑，这是一部好莱坞的电影，出产于一九四八年，电影的名字叫《要塞风云》，是亨利·方达所饰演的一个刚刚上任的中校欧文·斯特迪，与约翰·韦恩扮演的阿帕奇要塞的一个性格乖戾的队长之间的对话。

斯特迪中校：从我来这里的路上看到的几个迹象判断，我认为阿帕奇要塞已经开始腐化了。

约克队长：先生，如果你看到了他们，那么他们就不是阿帕奇要塞的人了。

---

① 简称 BCCI。

② 必须明确指出的是，包括加拿大电台在内，没有一家合法的消息来源机构出版过任何关于太阳圣殿教活动的故事，所有这些都还是被界定为“据传”。

就像韦恩扮演的人物所指的阿帕奇人一样，任何秘密组织都对大部分公众形成一种威胁，而且它们大都会选择隐藏或者伪装自己的真实动机。因而，最具危险性的组织或者不被人知道，或者已经在“躲避视线”的做法上取得了成功。以此为基础，“公认的秘密团体”既是一个矛盾修饰法，也表明了如果它们对我们形成威胁，那也是非常小的。

我们可以按照四个等级把它们进行分类，从而评估每个已知团体带来的风险：

一．以秘密方式运作的虚构或历史性团体；

二．既定前提的确是良性或者不具威胁性的组织；

三．那些阴谋联系还没有完全揭示出来的团体；

四．政府部门超乎其正式授权之上的效力发挥。

虚构和历史性团体。在这个分类中，两百多年以来，一直都在引起谋叛鼓吹者关注的是巴伐利亚光明会。它的组建者是亚当·维索兹，前耶稣会会员，然而，右翼谋叛团体的一些成员认为他是犹太人，在他的组织垮台之前，他设法吸引了几个卓越而杰出的个体加入其中，但是该团体先是受到了巴伐利亚政府的镇压，后来维索兹又开始否认自己的哲学。

与光明会的广泛传播同时发生的是激烈的法国大革命，这个事件在本质上具有如此的预示性，以至许多保守的评论家坚持认为法国革命是巨大阴谋的产物。他们拒绝接受这样的事实，即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对统治阶级古怪滑稽的表现愤愤不平的法国公民，在没有来自各种秘密组织的有力援助下，居然能够取得革命的成功。他们认为，法国王位的推翻永远不可能来自于接近文盲的大众的观念和意图。随声附和的怀疑论者们否认这样一个理念，就是威廉·莎士比亚不可能那么博学，也不可能那么多产。他们提出，法国革命一定是受到了秘密团体的操纵，列入第一号罪人



光明会的批评家认可亚当·维索兹首创了这个运动，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又与之断绝了关系。

的就是光明会。

光明会作为秘密团体建立的时候，最初是躲藏在共济会的羽翼之下的，法国革命的成功证实了它的力量，在谋叛理论家眼里，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焦点。没有哪个组织比成立于一九五八年的约翰·伯奇协会更为热心地推崇这个理念，对秘密团体引发的偏执狂症的运用更加经典。约翰·伯奇协会成员积极参与了反犹主义者纳斯塔.H.韦伯斯特的论证，他们认为光明会为了自己的目的策划了法国大革命。有趣的是，他们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法国君主政体是在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垮台后恢复的。

伯奇协会的创始人罗伯特·韦尔奇继续主张说，在十九世纪初期，罗斯柴尔德银行集团就窃取了光明会的议程，作为控制美国外交政策的手段。该集团在银行业的成功以及封闭的组织结构提供了韦尔奇所需要的所有证据。该金融机构是在十八世纪末期由迈尔·罗斯柴尔德建立的，其成功主要归因于罗斯柴尔德的策略，即他把五个儿子分别安插在欧洲的各个中心地带，包括法兰克福、维也纳、伦敦、那不勒斯和巴黎。他把儿子们的婚姻都在几个有密切关系的成员之间解决，这样该集团就可以在一个封闭而秘密的状态下运作。后面这个方面使得这个集团能够完全自由地决定财富规模，以及各种贸易关系和成就，这就为韦尔奇这样的人提供了一块肥沃的土壤。同时，其家族徽章的形状是一个紧握五支箭的拳头，充分表明了该银行企业的好战倾向，这通常无法与银行业联系起来。

根据韦尔奇及其他人的观点，与罗斯柴尔德集团的联合，同样也解释了作为强大的光明会这样的组织，是如何设法躲避了人们的视线的，而且长达两百年之久。很显然，罗斯柴尔德集团的财富被利用了，但是光明会与共济会的联系才是掩盖的核心，韦尔奇如这样说。其他诸多时事评论家，从无情的纳斯塔·H·韦伯斯特到雅各布·卡茨，《欧洲的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一书的作者，他们争辩说，光明会控制了德国共济会，并把它的总部重新设立在法兰克福。在那里，光明会招募了大量具有显赫地位的犹太领袖和金融家，包括拉比·兹维·赫斯基以及罗斯柴尔德的首席



罗伯特·韦尔奇训诫约翰·伯奇协会的会员，要他们通过秘密团体的运作来达到其目标。

官员西吉斯蒙德·吉森海默尔，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创造了一个“秘密团体中的秘密团体”。韦尔奇把他曾经颇具影响的所有权力隐藏在这个理念之后，从而产生了足够的动能，这使得五十年之后人们的种种推断还在继续。

两个世纪以来，一个组织设法隐藏自己存在的证据，同时操纵全球的经济、政治和武装冲突，我们对这种观点给予的关注小到不能再小了。比如，当黑手党成员已经把该组织最深刻的秘密泄露，甚至公然对血缘纽带提出反抗时，一个像光明会这样的组织怎么能够在其成员间保持完全的秘密性呢？光明会支持者的嘴唇当真密封了长达两百年之久吗？

韦尔奇确信美国受到了光明会的威胁，该团体的目标是控制整个世界，包括把美国的主权背叛给联合国，并通过全球的社会主义政府管理全世界，一九六〇年，韦尔奇开始敦促其追随者拥护他的“我们要脱离联合国！”运动。韦尔奇指出，他们可以通过“学年开始的时候，加入家长教师联谊会，同时劝说你的那些保守的朋友们也参加其中，然后继续工作最终把它接管过来”，从而创造一个卓有影响力的秘密组织，并采取隐秘的行动。也许韦尔奇并没有意识到，他正在倡导的是建立一个新的秘密团体，只是他要把它伪装成援助儿童教育的公共服务机构，而实际是致力于实现自己的国际议程。

没有任何现存的证据表明光明会没有同其建立者一起消亡，对于起初提出的原则，他自己先是觉得很后悔，继而又采取抵制的态度。除非出现相反的值得信赖的证据，否则光明会还只是活跃在人们丰富的想象中，这些人包括计算机游戏编程者和玩家，以及依然相信可以从罗伯特·韦尔奇漫长的冷战废墟中找到任何智慧的人。

良性或者不具威胁性的组织。利用“躲避视线”的策略，这些组织可以公开宣布其成员名单，并把其意图公之于世，同时声称他们是为了更伟大的利益而工作的。他们也会避免使用那些与“传统的”秘密团体相联系的虚饰，包括入会习俗、神秘仪式和保守秘密的誓言。

鉴于其不受约束的特点，在那些偏执狂看来，从救世军到邻近的投资

俱乐部，每个团体都有资格成为一个危险的秘密组织，但是近年来，有一个组织引领了邪恶意图组织的潮流：彼尔德伯格组织。

与彼尔德伯格组织联系紧密的有三边委员会，成立于一九七三年，旨在推进欧洲、日本和北美间的密切合作；还有美国外交协会，是一个致力于增强美国对世界理解的一个智囊团。这些联系使得这个组织陷入了这样的指控中，即它积极参与了各种旨在对全球施加金融、军事和外交活动控制的宏大计划中。那些对彼尔德伯格组织深感担心的人指出，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施加控制，而是由谁来控制的问题。一些诸如英国、瑞典、荷兰和其他的民主君主政体的国家元首，在政治事件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受到了遏制，他们声称，彼尔德伯格组织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即推翻民主国家，恢复君权神授的制度。

彼尔德伯格会议期间所作的决策，据说就涵盖了选举并批准竞选者，参加世界各地的大型民主政体国家的高级政治职位的竞选；他们同时还进一步争辩说，如果没有彼尔德伯格的认同，美国的总统选举，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其他议会制国家的首相选举，都无法取得预期的权力。

其他还包括内容广泛但并非具体的责难，彼尔德伯格成员通过与各个秘密团体和谐相处，或者与光明会、共济会和其他令人怀疑的秘密团体并肩作战，从而实现对整个世界的暗中操纵。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个组织曾经被指控消灭战争，作为控制和指导欧洲国家间的民族目标和理念，好像用外交替代战争也是一种危险的行动。

这样一个自称享有如此大权力和影响力的组织，其成员及其集会的地点，关于即将到来的统治世界的议程在哪里提交并得到批准，在事前都是广而告之的，这不免让人觉得有些奇怪。

彼尔德伯格组织的存在和名声都归功于一个人的技巧、联系和远见，甚至在他去世五十年之后，他依然被人称作“荣誉会长”。这个人就是约瑟夫.H.拉辛格，他从小是在耶稣会的影响中长大的，拥有极大的政治直觉，敏锐的判断力和无穷的魅力，所有这些都使得他能够对天主教会的行政机构发挥影响力，以至于促使他成为教皇和耶稣会主教父之间的关键纽带。在一九六〇年拉辛格的葬礼上，其中一个挽联是这样颂扬他的：“我



约瑟夫.H.拉辛格（右）：教皇和美国总统总是听从他的召唤。

记得拉辛格在美国拿起电话，然后马上就与总统订立了约会，在欧洲，由于他身上散发着信任、奉献和忠诚的魅力，使得他享有特权，可以从容地进入每个社会圈子。”

拉辛格生活中的最初目标证明了一个具有社会意识的价值体系。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墨西哥待过一段时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期间，在他的努力支持下，一个卓有成效的工会运动得以在那里展开，敦促墨西哥政府把美国控制的石油利益归为国有。如果现在能够看到的关于拉辛格的些许传记信息是真实的，那么他可以说是一位传奇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波兰将军西科尔斯基的政治助手，一九四三年当他五十八岁的时候，他在华沙附近被纳粹占领的地区跳伞，目的是指挥一次破坏行动。

拉辛格的影响和成就促成了遭到重创的欧洲的复苏。一九四九年，在他的努力下，欧洲理事会得以建立，总部设在斯特拉斯堡。作为欧洲理事会执行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拉辛格通过创造欧洲的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联合体，来实现他的梦想，也就是避免让欧洲再度陷入与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五年两次世界大战相类似的冲突中。达成这个组织的一个目的就是基于一个国际组织对发展的长期承诺将会抵消政府之间频频爆发的短期的意识形态上的冲突的理念。任何对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困境的状况略有了解的人都清楚，这样的组织将会证明对世界和平的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在众多的国家内部，一个代表强大利益的中立多国组织，能够平息各种导致战争的因素，避免了一系列火药味很强的协定，而这些火药协定正是引发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在欧洲，他的工作得到了来自左翼的支持，同时由于与梵蒂冈的关系，他又可以对之加以利用与右翼进行联合，作为这样一个组织的催化剂，拉辛格是最佳人选。他自己也证明了这一点，一九五四年五月，他劝说荷兰的伯恩哈德亲王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代表主办了一次秘密会议。伯恩哈德亲王是荷兰皇家石油公司，也就是现在的壳牌石油公司的主要投

资者，他把这次会议的会址选在了荷兰欧斯特贝克的彼尔德伯格酒店。出席第一次会议的有美国将军沃特·贝戴尔·史密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总管，以及洛克菲勒家族的代表，该家族控制了美国标准石油公司，也是壳牌石油公司最大的竞争对手。

自此之后的五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组织几乎每年都会碰头一次，他们的集会把阴谋鼓吹者推向一阵狂乱的猜测中，他们对于上至天空，下至落在地上的每样东西都充满了悲观的担忧。有势力的男人（以及越来越多的女人）一边进行着秘密的讨论，一边享受着旖旎的风光，这不免引起人们的猜测。

美国的右翼批评家猜想，出席彼尔德伯格会议的代表们正在谋划一个世界政府，对得之不易的权力和自由进行恣意践踏。他们争辩说，如果彼尔德伯格会议继续我行我素，美国将担负沉重的国家医疗保健费用，并应该在律法的约束下实行裁军计划。同时，左翼认为彼尔德伯格为了对全球经济进行有效的控制，他们的会议代表操纵货币，商谈资源权力，并且挫伤工会热情。几个气量大的（或许只是迷惑不解）的网站对该团体动机的两种解释都表示了支持的态度。

从实际的角度来说，对彼尔德伯格组织的严肃批评主要有如下四个具体方面：

它们是凌驾于政府之上的组织。所有代表国际利益的政府机构都值得我们关注。属于这个范畴的其他团体包罗万象，从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到大学研究科学家团体，他们钻研的领域包括军需品发展和基因控制。然而，人们对其实际情况还是不能完全肯定的。鉴于民主政府没有长远的全球意识，并不善于以一种迅速而恰当的方式加以处理，那么，彼尔德伯格组织聚集起来对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进行商讨，并在实施贯彻方面发挥影响力，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

它们操纵货币并确立全球的金融汇率。流通货币的操纵及其对市场和个人的影响可能是一个法律上的事情。但是期待此事的讨论将会影响到首脑之间达成任何协定，然后对其选民产生消极的影响，从而影响连任的前

景，这样合乎情理吗？对于中央银行和其他银行而言，它们在私底下而不是在会议上进行磋商，同时这些会议的地点、时间和参加者都公之于世，那么私下讨论是否更合逻辑，或者是否对公众形成更潜在的威胁呢？谋叛鼓吹者对这个理念提出了反驳，他们指出，民主领袖的选举都是在彼尔德伯格组织的严密监控下进行的，消除这些领袖可能具有的对于会议决定的任何严肃的反对意见。对二〇〇〇年和二〇〇四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进行的密谋行动内幕有所了解的世界各地的大多数人，都确信一点，如果总统选举幕后操纵事件确实存在，那么这些密谋者更有可能存在于美国国内，而不是彼尔德伯格组织内部。

它们选举政治人物成为未来的领袖，并有意逼迫当前的领袖辞职。几十个男男女女聚集在一起，指名任命并授权下一位美国总统、下一任英国首相，或者卡塔尔的下一个领袖，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前景。然而，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丧失权力的领导者们就必须优雅而沉默地接受他们的命运。二〇〇四年六月三日至六月六日，在意大利的斯特雷萨召开了一次彼尔德伯格会议，据说出席会议者包括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令人感到万分震惊的是还有美国副总统候选人约翰·爱德华兹以及他的竞争对手约翰·克里，克里在五个月以后输给了布什。布什连任的决定是否在意大利的六月会议上就已经决定好了？爱德华兹是否恭顺地接受了这样的安排，也许他接受了二〇〇八年被选举为美国总统的承诺？这是否是斯蒂芬·斯皮尔伯格一手导演的？

它们决定哪个国家向其他国家发动战争。自一九四五年之后，欧洲国家享受了一个漫长的和平时期，这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在这六十多年当中，潜在的冲突不断，但其大部分的和谐时期都可以直接归功于拉辛格的远见卓识。谋叛倡导者可能争辩说，彼尔德伯格组织既控制着战争，也掌握着和平，但是自从该组织发端以来的大多数冲突所涉及到的国家都不在这个组织的成员国之列，这些国家有越南、伊朗、伊拉克、前南斯拉夫及其辖区。这并不会使彼尔德伯格组织完全脱离这些干系，但是……

然而，有些批评还是有根有据的，其根源主要在于彼尔德伯格会议的

参加者身上。彼尔德伯格的建立者伯恩哈德亲王本身就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对那些在国家主义理念下成长起来的人们进行再教育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说服他们向一个超国家的机构放弃自己的部分主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个观点，再加上彼尔德伯格会议上讨论的问题，以及会议参与者的影响力，令那些通常安静沉着的人们感到有些担忧。就我们可以得到的证据来说，彼尔德伯格的会议议程，似乎更多专注于其本身权力的蔓延以及成员的吸纳，而不侧重于对全球健康、能源供应、环境危机以及广泛的饥饿问题的关心。

彼尔德伯格组织的支持者将会争论说，持有截然不同观点的人们之间所进行的自由讨论必须在私底下进行，目的是促进思想观念的开放和诚实。他们同时还指出，所有的政治和商务决策，无论是在公司董事会还是政治内阁做出来的，都享有不同层面的私密性。这绝对正确。然后真正让大多数人担忧的是彼尔德伯格的国际层面。对彼尔德伯格的关注焦点是：作为伪民主社会的成员，我们想要相信，对于我们国家内部、州界以及国家边境的事件，我们至少拥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我们不愿意把这个控制权拱手让给外国人。

没有明显谋叛活动的团体。当骷髅会成员还是耶鲁大学的学生的时候，他们对校园之外的事件没有任何影响力。但是当他们进入商业和政治领域后，成员之间的关系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

自从人类第一次把自己组织成一个个的部落，人际关系的理念就一直存在着。对兄弟会、姐妹会、社团集会、服务俱乐部、童子军和类似组织的活动进行监视和控制，将会是一种劳而无功的行为。然而，当这些组织的成员密谋运作，并把其存在于校园环境内部的无伤大雅的秘密誓言拓展到世界舞台上时，那么将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组织，其享有特权的成员积极地谋求较高的权力职位，旨在追求反映这个秘密封闭团体的价值目标，而对此他们曾经宣誓永远保持沉默。然后再想想班迪兄弟会的活动，布什家族的纽带关系，罗

素信托协会和银行业联盟公司令人质疑的古怪行为，以及骷髅会成员的胆大妄为。

中年骷髅会成员仍然赤裸身体躺在棺材里，相互讲述性历史（尤其现在是男女同校的教育环境），或者他们见面后相互交换某种秘密仪式，而不是尴尬地咧嘴而笑，这几乎是极其不可能的事情。然而，颇有才干、抱负和野心的人们相互谋划国际金融和政治策略时，能够轻松地摒弃自己的组织，这个理念同样也很难让人接受。

官方组织超乎其正式授权之上发挥效力。如果秘密决策的制定会对民主社会产生相反的影响，那么这个秘密集会一定不是具有几个世纪传统的秘密团体，而是运行于政府机构内部的强大利益组织，它们的真实目标隐藏在深不可测的国家安全的外衣底下。

这些组织不按照与秘密团体相关的一些做法行事，这确有其事，比如那些复杂的入会仪式，在这样一个计算机掌纹和虹膜识别高度发达的社会里，是敌是友瞬间就可以辨认出来，谁还需要密码和手势来相互证明身份呢？

众所周知的联邦政府机构，比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 NSC），在这种情况下，也要同阿萨辛派和美国黑手党一样受到评估，这种想法可能会令一些人感到恼怒，但如果这是唯一可比性的话，那些批评可能就会不攻自破。但在一个更宽泛的层面上，确实存在着这样的证据，即这个组织所做出的秘密决策会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其影响的程度远远大于某些团体的任何已经证实的行为，如共济会、圣殿骑士团、玫瑰十字会、卡巴拉教、光明会以及谋叛鼓吹者喜欢的其他靶子。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直被称作“华盛顿政府最终的局内人俱乐部，是拥有权力改变历史的名人录”。该委员会由哈瑞·杜鲁门总统在一九四七年建立，旨在使自己时刻了解国际局势，NSC 赋予一个精心挑选的秘密团体的成员资格，这些年来，他们的任务一直纠结于国防政策、情报搜集和外交关系这样的事件中。

在尼克松总统任职期间，从第一天进入 NSC 就掌控了它的命脉的是

亨利·基辛格，此人虽然一直没能选举到政府部门工作，但他在秘密国际事务中四十多年的积极活动，使他有资格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与美国的其他联邦机构不同的是，NSC 是按照开放式指令行事的，据说其含混的目的只局限于协助总统决定并协调军事和外交政策。这种有意识的职权模糊性就使得基辛格及其各色阿谀奉承者，对美国事务施加了某种控制，具体说来，是对国际活动产生影响，这不免让人有些担忧。

在这点上，基辛格权力的巅峰时期发生在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任职的后期。由于水门事件受挫，尼克松正步履维艰地走向其不可避免的命运，他放弃了对 NSC 的掌控权。基辛格立刻走进这个真空地带，攫取了对该组织的控制权，并且在尼克松辞职之前，抢先把美国海陆空三军置于高级防御警备状态，而按照宪法，只有美国总统才具有实施这种行为的权力。

这或许可以理解为超常行为，在特殊情况下所做出的应急反应，但是这里有两个因素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基辛格在非法国际活动中的被广泛认同的角色，包括轰炸柬埔寨，推翻智利民主选举的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这两个例子都是授予 NSC 成员权力而导致人心惶惶的例子，在国家宪法下，NSC 既缺乏官方的权威也不具备直接的制度。

另外一个因素是开放性和透明度的问题。拥护 NSC 和基辛格的人正义凛然地争辩说，从事国家安全的行动，需要秘密地制定一些决策，既不需要经过事先商讨，也不需要事后证实这些决定被制定过。公司首席执行官为了确保董事会的决策不被股东知道，也会采取同样的方式。然而，NSC 的决定通常会对全球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最大的公司也是远远不可及的。很明显，如果对诸如圣殿骑士团、共济会、光明会、郁山隐修会和其他团体的疯狂关注的视线转移到现存的公认的组织，例如 NSC，其权力和遭受谴责的可能性既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极其广泛的，那么，这可能是对人的精力的一个更有效的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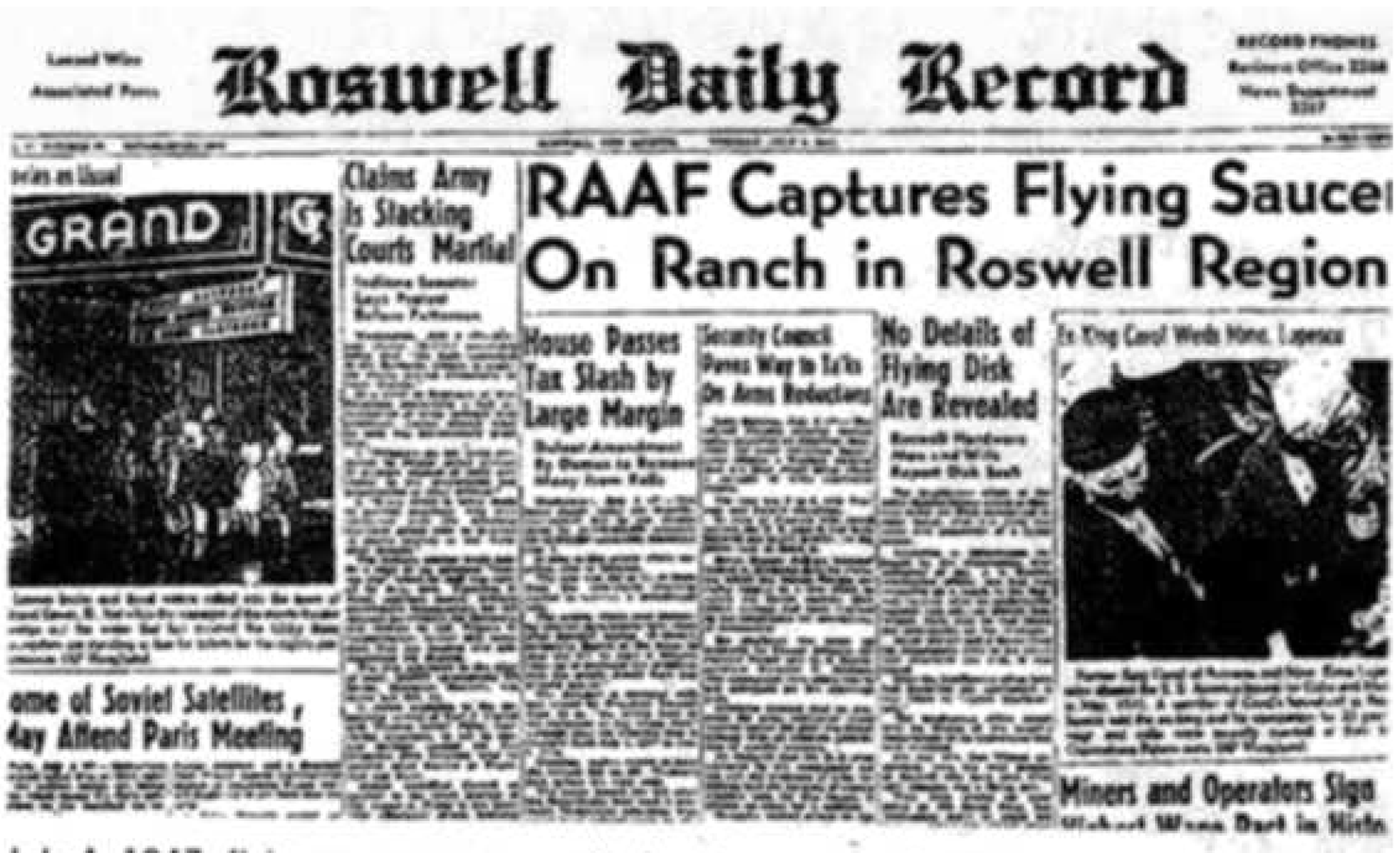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其完美平衡的缺乏应该给我们以警醒，让我们意识到，没有任何事情像我们感觉和喜好的那么稳定和容易预测。宇

宙脱轨和潮汐引力都是超乎于我们能力之上的现象，我们无力改变，也无法预知。只有当灾难性事件以逐渐接近的冰川期，或者剧烈地震的形式出现时，我们才承认其存在和危险。要不是这样，我们对待这种可能性就像我们对待自己的死亡一样：完全当作是一种传闻，直到真相大白时才能明了一切。

我们中的许多人很少去应对宇宙可能带来的风险，而是对其他的危险忧心忡忡，包括阴影中的组织给我们带来的威胁，而这些组织的存在可能仅限于想象力过于丰富的作者和网站所有者的主观臆断和猜想中。似乎我们永远不能拥有太多的秘密团体，从而把我们的恐惧投射在上面，不管这样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而且似乎我们也不准备退出对这些秘密团体的关注，它们上一次公认的活动是在几百年以前发生的。

每年都有新的秘密组织产生，大多数都会在研究和嘲讽的炙烤下渐渐枯萎，但也有一些秘密团体设法发展壮大，并存活下来，可能在未来的一个或两个世纪以后，我们的后人会认定它们是邪恶的源泉，而这可能是我们今天的人无法想象的。一个当今的例子就阐述了秘密团体的起源，一些事件促成了它们的繁荣，一些个人则成为了滋养了它们的沃土。

一九四七年新墨西哥州罗斯韦尔附近的一个开放式农场里残骸的发现，对于那些对政府阴谋和秘密团体有疑虑的人来说，就是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此事件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上百万的美国市民依然相信，那些废墟或者是来自另一个行星的宇宙飞船的残骸，或者是能够执行超常飞行任务的绝密军用飞机的碎屑。其追随者提出，两种理论都解


Roswell Daily Record

RAAF Captures Flying Saucer On Ranch in Roswell Region

Claims Army Is Stacking Courts Martial

House Passes Tax Slash by Large Margin

No Details of Flying Disk Are Revealed

Miners and Operators Sign

July 4, 1947: flying saucers are spotted and new conspiracies are born.

1947 年 7 月 4 日：发现了飞碟，从而产生了新的阴谋

释了政府对于揭露事实真相的坚定的抵制态度。正如现存的证据和逻辑理论所证明的那样，事实的真相是，那是一个降落到地面上的军用气象气球，旨在取样温度、风力和其他气象元素，这是所有此类装置都能够实现的。在好奇的小母牛把它踩踏到地里，或者农场帮手把它搜集起来，拿到工棚展示之前，军队匆忙地收回这个材料和设备，是可以理解的。有军事头脑的人极其善于以安全的名义虚构一些掩护性的故事，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这确实是个真实的解释。

但并非每个人都认为这是真实的。围绕这个平常的事件，人们构建了传奇的故事，这些奇特的故事表明了实质内容之所以没有揭示出来的过程和原因。这引起了人们的猜测，即秘密组织监控着公众的好奇心，维持着必要的秘密性，保护着证据，并且使任何可能会更加接近“事实真相”的公共调查转变方向。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秘密团体就被认为是“詹森协会”，据说这个秘密团体的建立是为了隐藏外星人登陆美国的证据，包括“飞碟”在罗斯韦尔地区的坠毁。

传说是这样的，詹森协会由艾森豪威尔总统创立，其成员包括三十二个地位显赫的人，许多人都与 CIA 有密切的联系，负责确保美国公民和世人不能发现有关罗斯韦尔的事实真相，包括在废墟中发现了两个外星人的尸体这个“事实”。詹森协会的十二个成员，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MJ-12，负责管理该团体的收入问题，其收入大多来自世界范围内的非法毒品买卖，在这种情况下，詹森协会是隐瞒议会成员而存在的，如果议会知道其存在，可能会通过预算拨款进行干预。作为通过毒品而产生基金的一个副产品，在必要的时候，这个组织就能够识别并消灭美国社会的一些疲软因素。

詹森协会所宣称的其他行动和特征提供了一个类似临床诊所的地方，在这里，众多的谋叛理论元素缝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结论，不仅仅比单个部分加起来还要巨大，而且还是截然不同的。

詹森协会的信仰者声称，约翰·肯尼迪总统对这个团体的发现，进一步促使了 CIA 内部的 MJ-12 成员对他的暗杀。肯尼迪想向美国公众揭露外星人存在的真相，以及他们的武器样式和材料，这些 CIA 特工不赞同他

的计划，因为总统的这个举措将会切断该组织的基金来源。詹森协会决定，美国总统必须被杀掉，藏在詹森协会保险库里的是一个电影胶片，上面记录着肯尼迪总统豪华轿车的司机，在驾驶座位上转过身来，手里拿着一把手枪，给总统致命的一枪，而同时他还在指挥着这辆轿车穿越达拉斯大街。奇怪吗？当然了。但是基督耶稣后代统治世界时间长达两千年，而同时还设法隐藏其存在的事实，同这样的观点比起来，还有什么可奇怪的？毕竟，奇怪只是相对的。

当秘密团体的信仰者能够围绕着一些个人聚集起来，并且这些个体的感知能力可以成为追随者的灯塔，那么这些团体就会繁荣起来。当那个领袖成为一名烈士，其激烈的死亡可能作为证据，证明他拥有为此付出生命的信息，那就更好了。就詹森协会来说，卓有成效地起到这个作用的是米尔顿·威廉·库珀，他宣称自己掌握着关于罗斯韦尔事件和其他行动的大量的政府机密，包括约翰.F.肯尼迪总统遭到自己司机的暗杀。库珀查看过这些事件的证据，此时他正好是美国海军的情报军官，可以接触到最机密的文件。

美国社会超右翼边缘的信仰者，尤其是那些每天都收听库　收音机节目的人，或者那些不辞劳苦地从头到尾翻看他于一九九一年写成的《十面埋伏擒蛟龙》（光电技术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的人，都称他为“美国最伟大的爱国者”，甚至当他声称《锡安长老会草约》是真实的（尽管他向他的听众暗示，他们用“光明会员”取代了“犹太教徒”），这个荣誉依然是授予他的。为了给他的许多主张提供证据，他说自己曾经是德·莫里组织的成员，这足以让他更深入地洞察共济会成员的秘密力量所在。

库珀不断地对一系列的秘密团体冷嘲热讽，而且总是吹嘘说他拥有其存在和邪恶影响的切实证据。他并不拥有一张世界地图，这太糟糕了。在攻击彼尔德伯格组织的时候，他声称其总部位于“瑞士的海牙”，并且还指出，瑞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没有受到侵略和轰炸的欧洲国家，他把这个事实（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归因于彼尔德伯格与会者的影响。也许他还应该弄一本日历，因为彼尔德伯格组织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十年才成立的。



米尔顿·威廉·库珀声称飞碟存在，外星人曾经登陆地球，而且他会遭到政府的谋杀。只有最后一点证实是真的。

无论他具有怎样的共济会员资格，库珀并不是海军的情报专家。根据美国海军的官方记录，他在海军里只混到了二等海军士官的职位，后来在一九七五年被解雇。二十五年以后，库珀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偏远的角落过着隐居的生活，后来，在与几个行政长官代理人外出打猎时遭到杀害，这几个长官试图给他提供证据，反驳对他的一些指控，其中包括偷税漏税，以及使用致命武器进行攻击。

自从二〇〇〇年十二月的那天起，围绕库珀及其揭示事件展开的一些传说逐渐地具体化。故事是这样说的，他之所以被谋杀，是因为他掌握了太多有关政府的秘密。他的追随者争辩说，他的军事记录已经修改过了，目的是为了拿走有关他情报工作的任何证据。他们坚持说，关于罗斯韦尔、肯尼迪遇刺、九一一事件、詹森协会、理查德·尼克松被迫辞职的真正原因，以及其他由秘密团体操纵的事件，所有这些真相都随着他一起埋葬了。

不难想象库珀的“烈士”之死，以及他所掌握的知识都是基于“不可辩驳的事实”，他声称自己掌握了邪恶的秘密而危险的阴谋，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这些秘密和阴谋最后成为一个机构，用来传播秘密计划和叛逆活动。这个传说无疑会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他们愿意相信这个世界的残缺，以及他们本身的财富，都不是我们的经济体制或者他们本身缺乏进取心的结果，而是女巫集会和委员会通过使用秘密誓言和仪式实现了其目标。他们将会依靠秘密团体未被证实的活动，这是他们希望或者需要相信的。

[illegible]记

[illegible]

我之所以着手写这本书是希望，如果说不是期望的话，能够在世界的权力精英中发现具有几个世纪历史的阴谋。我希望在这里与那些阴影中的人相遇：他们操控着世界货币，藏匿起外星人登陆地球的证据，或者找出基督耶稣尸骨的地点。我试图找出这些人聚拢财富和权力的证据。但是，在寻找过程中，我所遭遇到的尽是些偏执狂，他们或者用幼稚的语言，或者用主流媒体的零星故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些故事旨在取悦读者，增大发行量，而不是传达真正的新闻或知识。邪恶和无形权力是每个谋叛理论的核心，这些故事或是半真半假，或是纯粹的虚构，或是历史和想象事件的荒谬组合——没有事实依据的主张在世界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今先进工业化的文化氛围下，我们作为个体对于可能会丧失的控制力和个性化忧心忡忡，而这些主张恰好触及到了这些。同样，它也表达了我们许多人心中怀有的恐惧，在一定程度上，关于其存在的论述，无论多么古怪离奇，对我们来说都是某种安慰。

邪恶和无形权力是每个谋叛理论的核心，这些故事通常或者半真半假，或者就是彻头彻尾的虚构，或者就是历史和想象事件的荒谬组合。这些没有事实依据的主张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先进的工业化的文化氛围下，我们作为个体对于可能会丧失的控制力和个性化忧心忡忡，这些恰好触及到了这点。同样也表达了我们许多人心中的恐惧，关于其存在的论述，无论多么地古怪离奇，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都是某种安慰。

我的结论是这样的，如果不经过逻辑和推理就完全接受这些理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转移了人们对具体风险的注意力。我们太多人都花了太多的时间周旋于秘密团体为基础的各种假象的解释中，而在探究导致真正的灾难事件的原因时我们所花时间甚少……抑或说我们是否忘记了那些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谋叛理论家不仅没能让那些容易轻信的读者意识到实际的危险，从而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相反，他们的故事进一步加重了人们的无助感，同时减弱了人们应付社会和政治局势的能力。

在这些传说中，不时地会出现几个契合实际的闪光点。阿萨辛派和基地组织的线性联系就是很明显的，掌握阿萨辛派的方法和结构是否有助于同极端穆斯林恐怖主义者进行斗争，这还要看将来事态的发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美国边境，为了追求美国利益，他们倾向于单方面行事的做法仍然成为对其权力进行监视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我们对于秘密团体的着迷似乎更植根于它们提供的娱乐价值，而不是基于它们对全球形成的威胁。

受人尊重的科学家卡尔·萨根在他的作品《魔鬼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纽约：巴伦丹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中，把手指径直指向秘密团体现象的核心地带。在该书中，萨根主要探讨的是美国人对飞碟的持久着迷，以及外星魔鬼驾驶飞碟光顾地球的现象，这些都促使他指出，百分之九十五的美国人都是科学盲，他们对于自然事件寻求奇异的解释。萨根提出，我们不要从语法上去分析许多秘密团体背后的以迷信为基础的炼丹术士和神秘大师的故事，而应该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更激发人恐惧和更广泛的事情上，这些事情都近在我们身边，等待着我们去探寻、解释和理解。“我们太渴望从我们平凡单调的生活中警醒了”，萨根写道，“再度点燃我们从儿时起就记得的好奇心和神秘感”。秘密团体提供了与儿时好奇阶段的连接，但当我们陷入他们的诱惑中时，也会冒险地认为其存在的传说是真实的，这时，我们通常会回避运用逻辑和推理。我们太容易满足于迷信的说法而不愿意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

萨根尤其谴责了一些人中盛行的“无知庆典”，这些人更偏爱严格的教条而不是推理演绎。“迟早”，他警告说，“无知和权力的可燃性混合物将会在我们眼前爆炸。当政府和社会丧失了批评性思维的能力时，其结果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不管我们对那些接受了鬼话的人寄予了怎样的同情”。

当我重新审视并分析有关秘密团体的所有素材、观点、证据和评论的时候，发现这还一直都是卖方的市场。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注 释

引言——傻瓜、恐惧和宗教狂

用食物盖着婴儿的身体，第 3 页：米尼科斯·费利克斯所著《米尼科斯·费利克斯的奥克塔维厄斯》，第九章。费利克斯是一个基督徒，这里引用的对话是来自异教徒和基督徒之间的一个假想对话，前者只是重复了罗马人中流传甚广的基督徒活动的故事。

把刑具作为符号和特征，第 5 页：基督徒还用鱼作为象征，这是对他们身份的一个不太具有威胁性的描述。然而长久以来，鱼一直用在中国、印度、埃及和希腊的文化中，用来表示肥沃多产（还是带有性的暗示）。基督徒对鱼的使用远远没有十字架那么广泛而统一。你是否曾经看到过一个基督徒在胸前比划鱼的形状？

卡巴拉教，第 7 页，这个词存在着众多的拼写方法，包括 Qabbala，Cabala，Cabalah，Cabbala，Cabbalah，Kabala，Kabalah，Kabbala，Qabala 和 Qabalah。“Kabbalah”似乎赢得了大家的认可，但只是因为占有相对多数的优势。

第一章　阿萨辛派——一切皆虚幻，万事都许可

他给城堡重新命名，叫阿拉穆特，第 20 页：也叫“老鹰之导航”和“兀鹫之巢穴”。

“派人建造了一个巨大的花园，里面还修建了喷泉”，第 21 页：1837

年，在托马斯·凯特利的作品《中世纪的秘密团体——阿萨辛派、圣殿骑士团和威斯特伐利亚秘密裁判所》（波士顿：维撒图书出版公司，2005 年）中，他再次进行了描述，参见第 74 页。凯特利的研究无可挑剔，早在好莱坞煽情理论家和以事实为基础的小说作家对这个话题公然讨论之前，他的结论就已经形成了。

他们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伊斯兰教阿萨辛派，也叫暗杀派，第 25 页：对这个名词的另一个解释声称，assasseen 是个阿拉伯语，翻译过来就是“秘密的守护者”。然而，有关印度大麻药的联想还是更广泛地被人们接受的。事实上，还有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就是概念的相反面，也就是 assasseen 来源于 assassins 这个词，而不是把这两个词反过来。不管怎么说，assassins 几乎是这个组织专用的一个欧洲术语，穆斯林更愿意把他们叫做尼查尔派。

《思想改革和极权主义心理学》，第 26 页：罗伯特.J.利夫顿（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9 年）。

……他也叫阿拉丁（最高信仰），第 28 页：这可不是《一千零一夜》中寻获神灯的少年阿拉丁。

……后来成了人们所知道的霍贾派（可敬的皈依者），第 29 页：不要把霍贾派与暗杀团混为一谈，暗杀团是印度的一个暗杀盗匪组织，在 1861 年英国殖民管理者抓获并绞死他们之前，这些人对印度的部分地区施行了恐怖统治。

第二章　圣殿骑士团、光明会和共济会——秘密的权力席位

……这些人就包括签署《美国独立宣言》的开国元老，第 33 页：签署了《美国独立宣言》的共济会会员人数根据讲述者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些资料声称大多数签署者都是共济会员。对于有关共济会的档案，历史学家杰斯珀·里德列可以自由地参考使用，他证实说，56 个签署者中只有 9 个人是共济会员。

……不是英勇行为带来的结果，甚至也不是基于对基督教信仰的奉献，而是出于封建主义者的职责，第 34 页：关于圣殿骑士团的大多数信息都来源于凯特利的 《中世纪的秘密团体》 一书。

……“脾气随和，全身心地奉献，为了信仰近乎残忍……”，第 39 页：罗伯特·白恩所著 《坟墓之梦：十字军的历史》（纽约：斯坦—戴出版社，1984 年），第 64 页。

“他们身上兼备了僧侣的文雅和骑士的英勇”，第 40 页：凯特利的作品第 193 页。

……主动提出如果圣殿骑士团放弃这笔钱，他们就会皈依基督教，第 42 页：F.W.布塞尔所著 《中世纪的宗教思想和异教》（伦敦：R.斯科特出版社，1918 年），第 796 页。

……等待他的将是被慢慢地折磨而死，第 42 页：凯特利的作品第 206页。

……而日尔曼语也获得了一个新的表达方式，他们用 Tempelhaus 这个词来描写一所拥有恶劣名声的房子，第 43 页：Tempelhaus：对圣殿骑士团业余活动的描述来自于 G.摩拉所著 《阿维尼翁的教皇》（巴黎：装订厂不明，1912 年），第 233 页。

……双方展开了一场战争，据说是因为圣殿骑士团想要把对手的金银财宝弄到手才发动的，第 43 页：凯特利的作品第 219 页。

“对上帝无法形容的背叛，使人反感的偶像崇拜，令人憎恨的恶行，以及很多异教邪说”，第 43 页：纳斯塔.H.韦伯斯特所著 《秘密组织和破坏活动》 （伦敦：博斯韦尔印刷出版公司，1924 年；1998 年由 A&B 出版集团重新发行），第 51 页。韦伯斯特的作品在学术方面无可挑剔，但她的种族主义观点，尤其是她的反犹太观点，使得她的很多结论都戴上了有色眼镜。

“……会忘记他们灵魂的拯救，来做这些无谓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倾听这种含沙射影的话”，第 43 页：韦伯斯特引用米什莱所著 《圣殿骑士团的诉讼》 （1841 年）。一些历史学家声称，圣殿骑士团把他们的财产留给了法国国王，但是这与国王后来反对他们的做法相互矛盾。

“大火首先从他们的双脚点燃”，第 45 页：凯特利的作品第 326 页。

至少有不下十六位美国总统都曾经骄傲地宣称自己是共济会成员，第 47 页：但不一定是权力的集中。在这种情形下，骷髅会成员很有可能占据主导地位。

“尽管我们的思想、语言和行为能够躲避世人的眼睛……”，第 48 页：托马斯·史密斯·韦布所著 《共济会员的监督或共济会制度的证明》（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库欣 & 阿普尔顿出版社，1821 年），第 66 页。

“在最黑暗的深渊的内部……”，第 52 页：马奎斯·德·鲁切特所著《有关光明会秘密的杂文》（巴黎，1789 年）。

尽管华盛顿总统持反对意见……，第 53 页：来自多个出处，包括阿尔伯特·派克所著的 《古代和公认的苏格兰教共济会的道德与教义》（纽约：新视野出版公司，2004 年）。这里是来自 totse.com 网站。

华盛顿街道布局中的符号……，第 54 页：在华盛顿特区的街道上存在有各种不同的共济会图形注解和撒旦符号。

……初入会者要经历指南针尖压向胸口的过程……，第 55 页：关于这个仪式似乎有些令人困惑的地方。很明显，一些共济会团体继续着这个仪式，而有些团体则废弃了这个做法。

最近，他们的形象已经大打折扣，有消息透露他们所接受的 80 亿美元的捐赠中，真正用于慈善活动的只有不到 25%，第 56 页： 《托洛》 杂志，“黑色阴影” （2005 年夏），第 41—45 页。

“‘弟兄’指的是男性……”，第 57 页：同上，第 45 页。

开枪的人应该是 77 岁的阿尔伯特·伊德，第 58 页： 《新闻周刊》 (2004 年 3 月 11 日)。伊德因过失杀人罪被判刑，缓刑 5 年执行。

第三章　郇山隐修会——圣杯的守护者

Priory of Sion 的意思是修道院的一个分支，其上级是修道院长；Sion 是拉丁语，指锡安山，大卫就是在这座山上建立了耶路撒冷。

尽管在基督徒中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玛利亚·抹大拉不是耶路撒冷的娼妓，第 63 页：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关于玛利亚·抹大拉在法国生下孩子的故事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解释。这个版本的解释基础来自好几个渠道，最主要取自吉姆·马斯所著的《秘密统治》（纽约：哈柏考林斯出版社，2000 年）。

多亏占据了几个地理上的优势，雷德的人口可以达到三万多人，第 65 页：关于雷恩城堡过去的详细资料都是从这个城镇的官方网站上得到的，www.renneslechateau.com。

有些时候，普朗达会摆出法国黑社会成员所特有的迂腐举止和面容，第 73 页：关于普朗达的详细生平介绍都来自《灵知》杂志，“郁山隐修会的骗局”（1999 年春）；以及雷恩的《观察报》，“圣殿骑士团的启示录”，作者让·吕克·肖梅伊，（1997 年 6 月 5 日）第 19—20 页。

后者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法国的皇家档案得到证实，第 74 页：这份档案是应对一封两页的质询信件提供的，该信是 1956 年 6 月 8 日由安马斯市长写给圣朱利安侬日内瓦次长的，档案文件中包含郁山隐修会 1956 年的原始法规 [文件编号为 KM94550]：“……在我们的档案中，我们有一份来自 I.N.S.S.E 的文件，日期为 1954 年 12 月 15 日，该文件告知我们说，根据刑法第 406 条和第 408 条，皮埃尔·普朗达先生以背信罪在 1953 年 12 月 17 日由圣朱利安侬日内瓦法庭判处六个月的监禁。”旧式刑法的第 406 条和第 408 条与现代刑法的第 314 条第一款、第 314 条第二款和第 314 条第三款相对应。这些条款都归类在刑法第三卷内，“损害财产的犯罪”——偷窃、勒索、敲诈、欺骗和挪用公款。

埃沃拉则推崇与君权神授学类似的一种哲学理论，第 79 页：埃沃拉的教义令边缘团体一直很着迷，包括大量的光头仔和沉湎于“哥特”文化中的年轻人。关于其生平和教义的详细情况，请阅读尼古拉斯·古德里克·克拉克所著《黑色的太阳：雅利安崇拜、隐秘的纳粹主义和个性政治》（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从索尼埃的教堂里搜出的信件表明，第 81 页：关于索尼埃用于弥撒的邮购业务的详细情况参见让—雅克·博杜所著《一个神话的剖析》，1990

年出版。

神话传说还在继续着，第 81 页：关于郇山隐修会，最后要提的是：为了论述这个综合话题所进行的最广泛研究的著作，即凯特利的《中世纪的秘密团体》（1837 年）和韦伯斯特的《秘密组织和破坏活动》（1924 年），都没有提到关于梅罗文加血统和郇山隐修会的任何信息。两本书都是在普朗达声称其存在而且对世界事件产生影响之前很久就出版了。自 1970 年以来，关于这个论题出版的图书多得不胜枚举，但真实性的程度各不相同。

第四章　德鲁伊教徒和诺斯替教徒——知识和永恒灵魂

在这个运动影响的顶峰时期，那些极力要成为德鲁伊教徒的人，第 87 页：这个论述的提供者是曼利.P.豪尔所著的《所有时代的秘密教义——读者版》（纽约：杰瑞米.P.塔曲尔／企鹅出版公司，2003 年）。

凯撒在观察和记录社会结构时，与其指挥军队一样是个天才人物，第 89 页：裘力斯·凯撒所著《高卢战记》，第六卷，第 13 段。

诺替斯教的支派卡珀克雷特派的追随者，第 94 页：这个评论是塞浦路斯的康斯坦莎大主教伊皮哈尼务斯（公元 310—403 年）提供的。他在修道院生活、教会学习和正统学说方面的热情赋予了他卓越的权威，也可能激发他夸大了诺斯替教的更加放纵的活动，毫无疑问，这是他所不喜欢的。

作为施洗者圣约翰的追随者，西蒙也招揽了自己的信徒，并且被当作早期基督领袖一个很有潜力的竞争者，这也不足为奇，第 95 页：西蒙的拥护者声称，作为撒玛利亚人，犹太人对他采取嫌恶和怀疑的态度，因而他的话可能遭到了曲解。然而，这个传统一直活跃在英语辞典中。

由于基督教在力量上逐渐强大，它越来越无法宽容诺斯替教，第 98 页：韦伯斯特所著《秘密组织和破坏活动》，第 32 页。

不管诺斯替教徒是否遭到了基督教的攻击谩骂，第 98 页：同上，第

32 页。

“在古代世界，”荣格写道，第 98 页：卡尔·荣格博士所著 《作品合集》，第九卷，（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9 年）第 10 页。

第五章 卡巴拉教——启示录的源泉

除了这些圣经故事之外，还有三本书也统领着古代卡巴拉教的哲学思想，第 106 页：埃利法斯·利维所著 《卡巴拉的秘史：新约和旧约的神秘协议》 （纽约：塞缪尔·维萨出版公司，1974 年；维萨图书出版公司 2000 年重新发行），第 123 页。

……“异教徒”很可能就是那些犹太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娱乐和目标，对基督教进行嘲讽，第 106 页：豪尔在 《所有时代的秘密教义》 中暗示了这个理论，但是后来又不予理睬，其他人对此不是很确定。

生命之树的底座（马尔库特）代表世界，这个具备所有缺点和完美的世界。最高点（凯特尔）代表上帝，或者最高皇冠，第 107 页：“源质”这个词有不同的拼法和解释。

九个源质构成了三个三角形，在马尔库特上方用路径相连。它们是人类身体的象征，最顶端代表头部，中间部分代表人类的躯干和四肢，最底部代表腿和生殖器官，第 107 页：关于“源质”，卡巴拉教的不同派系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比如有一个解释是这样的，中心地带安排有三个柱子，左边的柱子叫严厉之柱，代表女性一方；右边的柱子叫仁慈之柱，代表男性一方；中间的柱子叫均衡之柱，代表阴阳之柱间的平衡。

在韦伯斯特看来，《光明之书》 最初明智的忠告已经“与拉比的野蛮迷信混为一谈，第 111 页： 《秘密组织和破坏活动》，第 11 页。

“他的房间由墙上的一个银子烛台照得通亮”，第 111 页： 《犹太百科全书》。

从这里到与圣杯之间的联系只有一步之遥，据说，圣杯是由圣殿骑士团拥有，后来转到了共济会手中，这激发了与新的一群秘密谋叛者的新联

系，第 112 页：卡巴拉教和圣杯之间的联系在 《圣血与圣杯》 中有详尽而严肃的描述。

克劳利于 1947 年去世，当时他孑然一身，第 114 页：克劳利的名声并没有彻底地消失，至少在大众化中是这样的。他的脸就出现在一个专辑封面的一群人中，这是甲壳虫乐队的 《佩帕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 专辑；而齐柏林飞艇乐队的主吉他手吉米·佩齐则居住在克劳利在苏格兰的宅子里，周围是引起对克劳利回忆的各种物品。BBC 电台在 2002 年进行的一个民意测验中，调查 100 个英国杰出人物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其结果简直令人大跌眼镜：克劳利排在第 73 位，在劳埃德·乔治、乔叟、菲尔德·马歇尔·蒙哥马利和沃特·罗利爵士的前面。

那个人的名字叫费维尔·格鲁博吉，第 114 页：有关费维尔·格鲁博吉／菲利普·博吉和卡巴拉中心起源的详细信息来自与多种渠道，包括 《每日邮报》 （英国）（2004 年 4 月 22 日）中一个冗长的描述。

第六章　玫瑰十字会成员——秘密智慧的追求者

在罗森克鲁斯相当长的生命历程中，没有发生过一个这样的讨论，第 122 页：《法莫》 的真实出版日期一直是存在争议的，大多数资料上都表明是 1614 年，也有几个资料表明是 1610 年，而 《天主教百科全书》 非常肯定地认为是在 1604 年出版的。后面的这个日期不免让人感到奇怪，因为这刚好是在罗森克鲁斯去世后的 120 年，这也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时期，在这些年中，其建立者要求在他死后保守秘密，而且如同读过安伯托·艾柯的 《福柯的钟摆》 的读者所了解的那样，它代表的是圣殿骑士团所要求的秘密周期。

……这个人“对钢笔的使用根本不熟悉，很明显，这些签名或者是复制的，或者在他手写的时候有人从旁指导，第 123 页：曼利·P.豪尔所著的 《所有时代的秘密教义》 引用。豪尔的这部作品最初于 1928 年出版（2003 年由企鹅出版公司重新发行），历来被认为是这类作品的经典之作。

书中广泛讨论了培根作为莎士比亚作品的真正作者，并且提供了培根作为玫瑰十字会员的证据。

英国文学一个最大的传统仅仅是一系列的信封里包含着的用密码写成的秘密信息，这可能吗？第 124 页：这些主张的资料（其他众多的资料和主张）来自豪尔的《所有时代的秘密教义》，第 543—551 页。

在《亨利四世》的第一部分，“弗兰西斯”这个词在同一页上出现了 124 次，第 143 页：弗朗西斯这个词早在第四幕，第一场，就有多次提及。

“培根不仅仅被当作一个人看待，他还是一个焦点，第 125 页：参见豪尔的作品，第 548—549 页。

利帕德的一个同时代的人，名字叫帕斯卡尔·贝弗利·伦道夫，也与林肯过从甚密，第 130 页：关于伦道夫生平的详细资料参见他的作品《死亡之后：或者脱离肉体的人》（波士顿：罗克威尔—罗林斯出版社，1868 年）。

AMORC 竭尽全力为自己正名，它不是一个宗教团体，而是“一个非营利的教育慈善机构”，第 132 页：该报道可以在玫瑰十字会组织的网站上找到，www.rosicrucian.org。

“我们不提出一种信仰系统，也不颁布教义上的命令”，第 132 页：参见 AMORC 网站。

“一个真正的玫瑰十字会成员不会沉溺于秘密的手势、庆祝、虚荣的财富展示”，第 133 页：R.S.克莱莫《玫瑰十字会组织》（夸克镇：哲学出版公司，1916 年）。

“与共济会不同，玫瑰十字会没有特殊的戒指”，第 133 页：R.S.克莱莫《玫瑰十字兄弟会》（夸克镇：哲学出版公司，1929 年）。

对于约翰森冗长而接近聊天式的文章，读者们获悉，这是来自于“世界和平会议上的总会长或者权威统治者所提出的论述。” 第133–134 页：约翰森文章中的数据来自《玫瑰十字会文摘》（2005 年第一期）第 10 页。

第七章　三合会——文化罪人

关于三和会和堂的大多数材料都要归功于作家兼罪犯调查员詹姆斯·杜伯罗，他把这些团体的大部分历史加以归纳整理，形成了一部卓越的作品《罪恶之龙：亚洲黑社会内幕》（多伦多：章鱼出版集团，1992年）。

中国人通常把这些团体叫做“黑社会”，从字面上翻译就是“秘密、不详或邪恶的团体”，第141页：《南华早报》，澳门版（1999年12月12日）。

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简称RCMP）的调查者声称，14K和其他三合会组织在遍及北美的每个重要的中国社区都存在，第143页：RCMP的三和会文件——ecdp0062.doc。

“我不必按照百分比把任何利润上缴给14K领导”，第145页：澳大利亚议会联合委员会关于国家罪案调查局的讨论稿（1995年2月）。

一个选择公开反抗三合会威胁的香港商人，收到了一个切断的狗头，第145页：珍·莫里斯所著《香港》（纽约：兰登书屋，1988年）第44页。

英国的国家刑事情报局（简称NCIS）对三合会在英国的活动情况进行了一个研究，第146页：ERRI网站（设立于荷兰，是一个面向全球的服务性非官方组织）提供《论中国三和会在英国》，是一家网络新闻服务机构。

1988年，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个研究估计，进入到那个国家的85%至95%的海洛因都是中国的三合会在控制，第146页：《在澳大利亚的亚洲有组织犯罪》——澳大利亚议会联合委员会关于国家罪案调查局的讨论稿(1995年2月)。

……美国的调查表明，与东南亚国家和他们的组织相比起来，三合会的主导地位正在逐渐下降，第146页：史蒂文·W.卡斯特尔的论述（2005年8月6日），他是情报局的主任助理，此前在美国参议员委员会司法部任职。

“早期帮派的领袖是越南战争的产物”，第 147 页：来自对作者的采访(2005 年 8 月 6 日)。

第八章 黑手党和科萨·诺斯特拉——聪明人和商人

在公元 1000 年，诺曼底人随着入侵浪潮接 而来，第 152 页：这一章节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盖亚·瑟瓦狄奥的经典著作 《黑手党成员：黑手党从起源到现状的历史》（纽约：斯坦—戴出版社，1976 年)。

“拒绝作证”的准则规定，任何请求法律实施机关对错误进行纠正的人不是傻瓜就是胆小鬼，第 156 页：瑞克·珀瑞罗所著 《克利夫兰黑手党的兴衰史》 （芬特—李，新泽西州：屏障出版公司，1995 年)。

最近一个意大利高级政府官员把恩德拉盖达描述为，第 157 页：意大利政府新闻发布，内政部 (2004 年 9 月 22 日)。

“只有血缘关系不会背叛”，第 158 页：S.阿卡多所说，由 M.拉·索特引用，参看如下。

……尽管在 2004 年，意大利政府提出，恩德拉盖达由 155 个家族组成，成员总数超过 6000 人，第 158 页：M.拉·索特所著 《卡拉布里亚的恩德拉盖达》（纽约州立大学：恩德拉盖达赫然耸现，2004 年 12 月)。

这个地区被推升为一个度假胜地，卡拉布里亚的旅游局承认“你不会在卡拉布里亚找到佛罗伦萨人或威尼斯人，第 158 页：同上。

……如果你进入一个卡拉布里亚村庄，你也许会遭遇与托利亚诺瓦市民目击到的类似场面，第 159 页：同上，来自 P.兰德所著 《有组织的犯罪》（纽约：DK 出版公司，2004 年)。

潜伏在里面的 FBI 听到有人指示德卢卡重复老板所说的誓言，第 167 页：“FBI 的磁带提供了一些黑手党入会仪式的稀罕内幕资料，”波士顿《环球报》 (1990 年 3 月 27 日)。

达马托是得卡伏坎提家族的头领，这是新泽西州最大的一个家族，被

认为是流行电视系列剧《黑道家族》的蓝本，第168页："黑手党首领因为同性恋被杀害，犯罪歹徒证实说，"《加拿大国家邮报》(2003年5月2日)。

当5000瓦的电流冲击到他的体内，而且几个小时之内都无法从体内转移出去，这真是关乎于个人自尊的事情，第169页：有趣的是，布查尔特是犹太人，而不是意大利人。他选择做这样的声明是对黑手党准则权力的某种敬仰，而且他也被认为是一直到死都保持荣誉的人。

第九章　日本黑帮——传统和截指

"贵族、侍臣，甚至内室中的宫女都被乱刀砍死"，第175页：J.N.雷纳德所著《早期的日本人》(纽约：时间—生命图书出版公司，1968年)，第58页。

除了不完整的小手指外，日本黑帮成员还有一个明显的身体特征，那就是大面积的纹身，第177页：戴维斯.E.卡珀兰和亚利克斯·杜伯罗所著《日本黑邦——日本犯罪黑社会团体的爆炸性记录》(马萨诸塞州里丁镇：爱迪生—卫斯理出版社，1986年)。

黑帮的到会人员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他们说话的风格激昂澎湃，并能够通过高声喊叫压过那些试图让他们安静下来的人的声音，第179页：克里斯托弗·塞穆尔所著《日本黑帮日记——在日本黑社会的日子》(纽约：大西洋月刊新闻社，1996年)。

第十章　巫术崇拜——伟大的女神和长着角的神

"没有女巫存在，一些中世纪的神学家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会发生邪恶的事情"，第186页：沃特·斯蒂芬斯所著《魔鬼热爱者：女巫、性和信仰危机》(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

100 页。

……二月二日举行，预示着第一丝春天的气息，以及地球上光芒的回归，第 194 页：据此，女巫夜半集会不适用于赤道以南的国家。

“除非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才能向大家公示这些秘密”，第 197 页：菲利普·赫斯顿所著 《杰拉尔德·加德纳和灵感的漩涡——对加德纳巫术来源的调查》（米尔沃顿：凯帕尔·班出版公司，2003 年）。

“女巫是最完美的恶作剧者，她们学习这个完全是因为从业的需要，是一种谋生工具”，第 197 页：G.B.加德纳所著 《今日魔法》（旧金山：堡垒出版社，1954 年 /2000 年），第 27 页。

第十一章 骷髅会——美国的秘密机构

“在西面墙上，挂着众多的绘画’，第 203 页： 《赋予骷髅会血肉》（沃特镇，俄勒冈州：三位一体出版社，2003 年），第 473 页。

霍华德·奥尔特曼是美国的获奖作家和编辑，据说在 1989 年，一个叫菲利普·罗梅罗的人拜访了他，第 204 页：同上，第 33—36 页。

让这个故事更具有真实性的是，据说还有一个私人印刷的文献，第 204 页：罗布·罗森巴姆所作“关于骷髅会的更多骇人听闻的故事”，《纽约观察家》（2002 年）。

骷髅会成员得到的回报相比他们受到的所谓屈辱是值得的，第 208 页：罗恩·罗森巴姆所作“骷髅会的最后秘密” 《君子杂志》（1977 年 9 月），第 89 页。

“我们通过一个新出版物向大家说明，因为校园新闻对那些敢于公开谈论‘骷髅会’的人已经关闭，第 208 页： 《赋予骷髅会血肉》，第 3—4 页。

布莱斯考特·谢尔顿·布什·耶鲁大学 1917 年毕业生，是骷髅会成员的理想人选，第 209 页：同上，第 40 页。

希特勒让蒂森为之倾倒，实际上就像整个德国都为之着迷一样，他们都太需要一个强大而具有决策力的领袖了，第 210 页：蒂森在他的无所不谈的自传 《我为希特勒埋单》 描述了这个交易，以及他的动机，（纽约：法老—雷那哈特出版社，1941 年）。

对于后者，他再次求助于蒂森的钢厂，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钢厂的利润直线上升，财源滚滚流向鹿特丹的海运贸易银行和纽约的银行业联盟公司，第 211 页：战后对蒂森家族武装纳粹德国所起作用的调查评估，1938 年，这个家族提供了占如下比例的德国国民产出：

50.8%的生铁

41.4%的标准厚钢板

36.0%的厚钢板

38.5%的镀锌薄钢板

45.5%的钢管

22.1%的电线

35.0%的炸药

出处：《德国战争资源的根除》，美国国会报告，军事分委员会（1945 年 7 月 2 日）第 507 页。

银行业联盟公司与前苏联的种种联系，鼓动英国比尔斯特德郡主提出建议，中止该银行与斯大林的交易行为，第 211 页：W.艾夫里尔·哈里曼论文，国会图书馆（1927 年 9 月 12 日）。

我们来看一看董事会八个成员的身份，第 212 页：《赋予骷髅会血肉》，第 205 页和第 249 页。

2003 年，《责任、荣誉、国家》 一书出版，这是献给布莱斯考特·布什的一份礼物，第 213 页：引自 《责任、荣誉、国家——布莱斯考特·布什的生平和传统》（纳什维尔：拉特利奈山出版社，2003 年），第 72 页。

来看一看骷髅会成员与美国情报部门联系的部分清单，第 215 页：《赋予骷髅会血肉》，第 9 页。

处理公司名字变更和罗素信托协会兼并的文书工作是由一个叫做霍华德·韦弗的人完成的，第 217 页：罗恩·罗森巴姆所著 《命运的神秘方面：

三十年的密切调查和狂野热情》（纽约：哈珀常青出版社，2000年），第155—167页。

巧合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第217页：乔瑟夫·麦克布莱德所作“乔治·布什，CIA特工”，《国家杂志》（1988年7月16日）。

萨帕塔公司恰好是CIA发动的猪猡湾入侵事件的代码，第217页：麦克·R.比齐罗斯所著《危难时期：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纽约：爱德华·伯林格姆图书公司，1991年），第89页。

另一个巧合是关于前总统乔治·H.W.布什和肯尼迪总统的暗杀事件，第217页：乔瑟夫·麦克布莱德提供文献，参见上面提到的那本书，该文献是这样写的：

日期：1963年11月29日

转交：内务部，情报调查局

来自：约翰·埃德加·胡佛

主题：1963年11月22日总统约翰·F.肯尼迪遇刺

1963年11月23日，我们在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办公室发来信息，迈阿密的古巴事务协调办公室报告说，内务部认为，某个被误导的反卡斯特罗团体可能利用目前的局势，对古巴进行一次未经授权的进攻，他们相信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遇刺可能预示着美国政策的变化，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的消息来源以及与迈阿密地区古巴问题熟悉的资料提供者说，反卡斯特罗地区的普遍情绪是震惊和怀疑，即使在那些不完全认同总统对古巴政策的人中间亦是如此，这种情绪是，总统的死亡不仅对美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对整个拉丁美洲地区也损失巨大。这些消息来源者对任何有关袭击古巴的未授权计划都不知情。

过去一直提供可靠信息并且与迈阿密一个反卡斯特罗的小组关系密切的一位消息灵通人士透露，那些人害怕总统遇刺事件可能会导致针对他们的强烈的镇压措施，尽管亲卡斯特罗的普遍情绪是对总统遇刺感到惋惜。

上面提到的内容主体是于1963年11月23日由中央情报局的W.T.弗塞口述给中央情报局的乔治·布什先生，以及防御情报机构的威廉·爱德华兹上尉的。

“我把 FBI 于 1963 年 11 月 29 日写给情报研究局主管和政府部门的备忘录仔仔细细地重新看了一遍”，第 218 页：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民事诉讼 88-2600 GHR，档案和研究中心对中央情报机构，乔治·威廉·布什的供词（1988 年 9 月 21 日）。

2003 年 8 月，德·威特在回忆他与 CIA 和骷髅会的经历，第 219 页：《赋予骷髅会血肉》，第 212 页。

据估计，骷髅会在 2000 年的资产达到 400 万美元，第 220 页：耶鲁大学档案馆，《耶鲁大学社团生活实用指南》。有意思的是，秘密团体的竞争对手卷轴和钥匙协会的资产高达 600 万美元。

第十二章　大众文化中的秘密团体——无穷的魅力

“当今的专家一致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于是我们得出结论，那个《草约》至少从目前的形式上看，是一个邪恶而阴险的伪造物”，第 231 页：贝金特等人所著《圣血与圣杯》（伦敦：箭图书出版公司，1996 年），第 198—203 页。所有引用都来自这个版本。

旨在作为统治世界的指南手册的《草约》，或者使人觉得不寒而栗，或者让人感到荒谬可笑，取决于你对黑色幽默的轻信度和欣赏度，第 232 页：《草约》存在几个来源，这里所引用的选自吉姆·马尔斯的作品《秘密统治》（纽约：哈柏考林斯出版社，2000 年），第 145—153 页。该作者是秘密团体的危言耸听者，但其作品对《草约》内容的选择上至少是准确的。

与任何其他宗教一样，罗马天主教会一直是一个适合的批判目标，第 234 页：对于这个记录，我没有与罗马教廷的联系，也没有其他宗教的联系。

第十三章　批评家、危言耸听者和谋叛理论家——偏执狂何时具有意义？

根据韦尔奇及其他人的观点，与罗斯柴尔德集团的联合，第245页：这部分的资料来源包括《欧洲的犹太人和共济会员》（波士顿：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威廉·T.斯蒂尔所著《新世界秩序：秘密团体的古代计划》（路易斯安那州拉斐特：亨廷顿出版公司，1990年），第104—141页。

在1960年拉辛格的葬礼上，其中一个挽联是这样颂扬他的，第247页：这个挽联是爱德华·贝丁顿—贝伦斯送的，他是欧洲运动中东欧委员会的主席。这里所引述的内容在几十个网站中都可以见到，其目的在于传递彼尔德伯格组织幕后“真正”的故事，尽管大多数网站都把这个组织的名字拼错了。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直被称作“华盛顿政府最终的局内人俱乐部”，第251页：丹·丹斯基所著《统治的两种程度》，多伦多《环球邮报》(2005年6月25日)，第D3页。

在这点上，基辛格权力的巅峰时期发生在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任职的后期，第252页：对NSC详尽而令人烦扰的考察及其引发的危险，参见大卫·J.罗斯考夫的经典巨著《统治世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权力构成的内幕故事》（纽约：公共事务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

编后记——关于魔鬼与荒谬

“我们太渴望从我们平凡单调的生活中警醒了”，第260页：《魔鬼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第123页。

“迟早，”他警告说，“无知和权力的可燃性混合物将会在我们眼前爆炸”，第260页：同上，第209页。

致 谢

这本书的灵感发源于安娜·波特以及她在出版方面的远见卓识。安娜为道路做出标记，铺上铁轨，逐渐增大引擎中的蒸汽压力，然后把真正的旅程交给了我，我非常感激她给予我的这次机会及其他机会。

这本书的塑造多亏了克莱尔·麦克恩。她去除了书中的冗长部分，进一步拓展了观点，在这个过程中，她表现出了极高的热心，并具有极高的编辑技巧，每个观点都是那么地恰到好处，这些技巧总是值得我去效法并欣赏的。

我从众多素材中选取了很多内容，鉴于这些故事的本性以及职业的特定方面，作者的身份并没有在这里揭示。每位作者都了解我的感激，而且我相信所有作者都很满意，我能够使用他们如此慷慨提供给我的资料。

最后，每个诚实的作者（尤其是男作者，这很奇怪）都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两个人的帮助和鼓励，他的作品永远无法实践从灵感到完成的现实之旅：他的代理人和他的配偶。在这里，我把最衷心的感激和挚爱送给希拉里·麦克马洪和朱迪。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阴影中的人　历史上著名的秘密团体
作者=（加）约翰·劳伦斯·雷诺兹著；隋荷译
页数=278
出版日期=2008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阿萨辛派
第二章　圣殿骑士团、光明会和共济会
第三章　郇山隐修会
第四章　德鲁伊教徒和诺斯替教徒
第五章　卡巴拉教
第六章　玫瑰十字会成员
第七章　三合会
第八章　黑手党和科萨·诺斯特拉
第九章　日本黑帮
第十章　巫术崇拜
第十一章　骷髅会
第十二章　大众文化中的秘密团体
第十三章　批评家、危言耸听者和谋叛理论家
编后记　关于魔鬼与荒谬
注释
致谢